

李时珍评传

第一章李时珍生活的时代

李时珍，字东璧，号濒湖，湖广蕲州（今湖北省蕲春县蕲州镇）人。生于明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卒于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他生活的整个16世纪，正是中国历史经历巨大震荡的时期。明代中后期的社会历史环境，为科学巨人李时珍的成长，造成了种种困境，也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一代英杰冲开艰难险阻，脱颖而出，显示了民族文化的无比潜力。全面了解李时珍所处的时代背景，环境气氛，社会心态。文化氛围，对于认识他成长并取得卓越成就的各种历史条件，是十分必要的。

一、16世纪的中国社会

从明英宗（1436—1449）到明神宗（1573—1620），史称明代中叶。在此150多年期间，有过五朝天子。李时珍生活在明中叶的后半段，经历了正德（武宗，1505—1521）、嘉靖（世宗1522—1567）、隆庆（穆宗1567—1572）、万历（神宗，1573—1620）四代王朝统治。他逝世后刚好半个世纪，明王朝就覆灭了（1644）。

明朝初期，曾经取得过辉煌成就。那时政治比较稳定，社会生产力有较大发展，经济相当繁荣。为加强同南亚和非洲的往来，15世纪初，著名航海家郑和（1371—1435）曾率领浩浩荡荡的船队七次远航，大振国威。当时的中华帝国无论在政治、经济方面，还是在科学文化方面，都雄踞世界先进行列，为万国所瞩目。1435年，明英宗即位，从此明帝国进入中衰时期。政治上日益腐化，社会日益动乱，经济濒临崩溃。李时珍在社会动乱的年代，忍辱负重，苦苦挣扎，自学成才，终于攀登上科学高峰。

李时珍生活的年代社会一直动荡不安。自英宗开始，经武宗（正德），到世宗（嘉靖），几代君主昏庸享乐，长期不问政事，宦官乘机窃取政柄，形成宦官专政局面，以致人们只知有太监，不知有天子。武宗时，宦官刘瑾当权，皇帝形同傀儡。民众讽刺说：北京有两个皇帝，一个是坐皇帝，一个是立皇帝；一个是朱皇帝，一个是刘皇帝。（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一，〈内臣〉上）

宦官们实行特务统治。原来皇室设东厂，作为侦探臣僚不法行为的机构。宦官控制东厂，横行不法，打击异己，以巩固自己的权力。宪宗时，宦官汪直另设西厂以控制东厂，武宗时刘瑾又设立内行厂以控制东厂和西厂，在北京和南京（留都）侦察异己，坑害良民，镇压人民的秘密结社活动，人民蒙冤而死者无计其数。（《明史》卷九，〈刑法志〉三）嘉靖时期，宦官势力受到排斥，由亲近皇帝的内阁大学士中的首辅当政，首辅位极人臣，独揽内外朝政。为了争夺首辅权位，大学士联结朋党，攀引门生，互相倾轧。严嵩以善于撰写“青词”（道教斋醮祷神文告）而得到天子宠信，于1548年取代夏言为首辅。从此他家“子为侍郎，孙为锦衣中书，宾客满朝班，姻亲尽朱紫，”（《明史·张羽仲传》）不少人趋炎附势，与之狼狈为奸。大臣起来弹劾，无不为他所害。朝臣、宦官相互倾轧，无有宁日；国事混乱，无人过

问。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而嘉靖皇帝则成天忙于拜神、炼丹、求仙。上行下效，全国一派乌烟瘴气。

明代中叶的经济状况更不如前。当时严重问题是土地高度集中。王公贵族大肆霸占上地，农民纷纷破产。勋戚、宦官原来都有庄田。庄田的数量一年年扩大，到明中叶，已大大超过前代。弘治时期（1488—1505），京畿的皇庄只有5座，占地18000余顷；到正德年间（1506—1521），皇庄扩充到36座。占地达37000多顷。（《皇明经世文编》卷二二，夏言《查勘报皇庄疏》）皇亲国戚、宦官、军官四处掠夺土地，巧取豪夺之风，遍及州县。弘治年间，顺天府庄田共332座，占地33000多顷；到正德十六年（1521年），由顺天府延至北直隶，庄田占地已达209000余顷。奸相严嵩一家，在北京附近有庄田150余所，又“广置良田美宅于南京、扬州，无虑数十所”。（《明史》卷二一，邹应龙传）严嵩原籍袁州府，该府四县之田，十分之七被他侵占。（《皇明经世文编》卷三二九，《申逆罪正其刑以彰天讨疏》）当时，豪绅地主的土地“阡陌连亘”，往往“一家而兼十家之产”。广大农民丧失土地，沦为佃户，“佃富人田，岁输其租”，每亩收成只得数斗，而所交地租却高至一石二三斗。“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贷者”。高利贷者，乘机盘剥农民，利息高达四、五倍。不少农民卖了田地，仍需上税，造成“产去税存”局面。（《日知录集释·苏松二府田赋之重》）当时流行的民谣说：“一亩田无七斗收，先将六斗送皇州。止留一斗完婚嫁，愁得人来好白头。”（《广治平略·舆地篇》）地主剥削农民敲骨吸髓，相当残酷，无异于“夺泥燕口，削铁针头；鹭丝脚上剥精肉，蚊子腹内刮脂油”。

农民除了忍受地租剥削，还要遭受差役之苦。明宪宗时给事中丘弘曾指出：“孤寡老幼皆不免差。空闲人户亦令出银。故一里之中，甲无一户之闲，十年之内，人无一岁之息。甚至一家当三五役，一户遍三四处。”（《明宪宗成化实录》卷三十三，成化二年八月）正德之后，除了银差，又征力差。为了逃避差税，农民被迫流亡四方，成为无业流民，因此，全国户口大大减少。明初永乐年间（1403—1424）全国户口有2000万户，到弘治四年（1491）只剩下900余万户，不足永乐时三分之一。农民流亡后，地主为了逃避地税，大肆隐瞒土地。明初全国有土地850余万顷，到弘治十五年（1502）只有422万多顷了。有的地区，人口“逃亡过半”，甚至“十者只存其一”。大量土地被抛荒，农民背井离乡，逃亡他乡，扶老携幼，露宿荒野，以野菜树皮维持生活，抛妻卖儿，惨不忍睹。

农民破产，人口流亡，土地抛荒，造成政府财政危机。嘉靖年间，政府每年收入仅200余万，还不及全年支出的二分之一。只好向人民“加派”。嘉靖三十年（1551）明政府在南畿、江浙等富裕州县开始实行“加派”，年增赋百二十万。后来巧立加派，名目繁多，有“箕敛”，“派括”、“箕税契”，“折民壮”、“提编”等。（《明史·食货·赋役》）农民不堪重负，为生活所迫，只好铤而走险。明中叶以来，农民、流民起义，矿工、织工暴动，连绵不断。顺天年间（1457—1464），刘通、石龙等起义于湖广房县，转战于四川；成化年间（1465—1487）李原起义于湖广荆襄地区，群众达百万之众。后又有福建佃农丘隆起义。广西瑶族壮族农民起义。15世纪中期，以邓茂七为首，农民、矿工联合起义，自号“铲平王”，主张“铲主仆、贵贱、贫富而一之”。16世纪初，正德五年（1510）刘六、刘七领导的起义，声势最为浩大，他们的战斗口号：“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

重开混沌之天。”（《皇明资治通纪》卷三十三）起义军转战于黄河、长江下游各省，“纵横数千里，所过若无人。”（同上）农民矿工的起义，一再说明明朝封建统治已面临空前危机，必须改弦易辙，刷新吏治。

在社会政治危机激发下，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掀起了一场政治革新运动。张居正（1535—1582）是这一改革的核心人物。他是湖北江陵人，穆宗隆庆元年（1569）入阁，神宗万历元年（1573）为首辅。在他主持内阁期间，顺应历史发展，实行了一系列社会政治改革，使明代中叶的社会，一度出现中兴气象。首先，整顿内政，裁减冗官，节约财政开支；整顿邮传与铨政；杜绝结党营私。做到“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强公室，杜私门”。（《明史·张居正传》）为了打击豪门，改变土地高度集中所造成的弊端，他厉行清丈全国土地。万历六年（1578）开始清丈，数年完成。清丈出被勋戚、豪强、军官隐没的庄田、屯田共700余万顷。这一措施，“在小民实被其惠，而于官豪之家殊为未便”。（《张文忠公全集》，《答应天巡抚宋阳山论均田足民》）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改革赋税制度。万历九年（1581）在全国推广“一条鞭法”，目的在平均赋役。原来实行的是按户、按丁派役政策，地方豪绅纷纷荫庇户口逃避赋役，将全部赋役重担转嫁于无地少地农民。一条鞭法，改为按丁按粮派役，或丁六粮四，或丁四粮六，或丁粮各半。再同夏秋两税和其他杂税合编为一条，无论粮食、差役，一律改为征银。使无地、少地农民，减轻丁役负担。这样使万历初年，政府收入大为增强，太仓之粟，多达1300余万石；国库之银，存六至七百余万两。（《明史·食货二》）近20年间，阶级矛盾有所缓和。张居正更重视发展农业生产，重用治河专家潘季驯治理黄河、淮河，疏通运河，为发展农业生产创造条件，使得“田庐皆尽己出，数十年弃地转为耕桑。”（《张文忠公全集》，附录《行实》）

明代中叶，封建经济仍以自然经济为主。但商品经济在江南地区有了显著发展，为资本主义萌芽准备了良好条件。当时手工业相当繁荣，冶铁、铸铁、造纸、印刷、制造瓷器，都达到空前规模，特别是丝织业和棉纺织业发展更快。“以机为田，以梭为耒”已成为江浙某些地方的社会风气，居民“尽逐绫绸之利，有力者雇人织挽”（《吴江县志》卷三十八，《生业》）手工业分工已很细密，炼铁业中，有煽者、看者、上矿者、取矿砂者、炼生者，“各有其任，昼夜轮番。约四五十人。”丝织业中，有车工、纱工、缎工、织工；织绸分打线、染色、改机、挑花等工序。社会分工的加强，是工场手工业生产的标志之一。商品经济的发达，促进了商业城镇的兴起，货币流通的加快，这又为从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转化创造了条件。同时城市工商业的繁荣，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也起了促进作用。李时珍的科学创造，受到当时社会经济条件的刺激，更受到明代中后期文化思想领域掀起的革新思潮的鼓舞，从而他能冲破封建制度造成的重重障碍而取得卓越成就。

二、 16世纪中国的科学文化

李时珍的科学创造植根于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历史上任何重大科技发展，都不可能脱离当时科学文化发展的基本轨迹。剖析明代中叶的文化思想背景，特别是当时哲学思想、文学思想和科学思想的基本概况，对于理解李时珍学术思想的产生，不无重要意义。譬如一颗幼苗要长成参天大树，

不能离开它生长的整个自然生态环境一样，李时珍的成长，是受当时整个文化氛围制约的。

（一）面临崩溃的理学禁锢

明代推行的是一套窒息人们创造精神的思想教育制度。国家实行科举考试，把青年的思想，紧紧束缚在儒家经典的思想牢笼中，容不得半点自由。成化（1465—1487）年间，科举考试采用八股文。这种文体，强调谨守儒家经典，凭学子对四书、五经及其注疏的背诵程度，来衡量学识水平的高低。科举制度的实质是强迫学子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要他们谨守儒家的处世为人准则，遵从三纲五常名教，死心塌地为封建统治者服务。

明代中叶，王阳明（1472—1528）的主观唯心主义心学，被封建统治者奉为官方哲学。它诱导人们树立“万化唯心”、“心外无理”的唯心主义世界观，要他们深入体验“人心唯危，道心唯微，唯精为一，允执厥中”的所谓十六字心传。要首先“破心中贼”，才能“破山中贼”，防止人民作乱，以巩固封建统治。王阳明去世后，阳明心学发生分化。以王阳明的学生王艮（1483—1541）为首，形成泰州学派，其成员多是樵夫、渔夫、陶匠。他们农忙时进行农业、手工业生产；农闲从事文化宣传活动，向农工商贾进行启蒙式教育。黄宗羲曾称赞泰州学派韩贞的讲学方式说：“（韩贞）以陶瓦为业，粗识文字，有茅屋三间，以之偿债，遂处窑中。……以化俗为任，随机指点；农工商贾，从之游者千余。秋成农隙，则聚众讲学。一村既毕，又之一村。前歌后答，诵读之声，洋洋然也。”（《明儒学案·泰州学案》）泰州学派的活跃，显然是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情况下，适应广大农工商贾强烈的文化生活要求，自发地掀起一股文化普及运动。

民间文化生活的活跃，人们对封建统治思想逐渐发生动摇，封建统治思想的叛逆者应运而生。和李时珍同时代的著名思想家李贽（1527—1602）是封建叛逆思想的代表者。李贽是泰州学派的激进分子，统治者称之为“异端之尤”。他以“异端”自居，明火执杖同“正统”理学思想展开斗争。当李时珍撰写《本草纲目》时，李贽正好住在湖北麻城县，撰写《焚书》和《藏书》。这些战斗性很强的著作有如刺向封建卫道者的投枪和匕首。他要“颠倒千万世之是非”，反对封建独断论和封建蒙昧主义。他称赞陈胜、吴广起义为“匹夫首倡，古所未有”；赞扬梁山泊起义领袖都是“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要求各级官吏人人应读《水浒传》；称赞卓文君之私奔，是“归凤求凰”；赞扬红拂自择配偶是“千古来第一个嫁法”。他同封建礼教针锋相对，发出思想解放的先声。李贽思想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思想界经过长期礼教禁锢之后，止在冲破中世纪的思想牢笼，要求自由思想，主张个性解放，力图打碎统治者强加在人民头上的封建思想枷锁。封建思想统治的松弛，无疑为早期启蒙思想的萌芽和科学创造精神的发扬，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异军突起的市民文学

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城市的兴起，市民阶层的成长，必然要在文学方面有所反映。文学作品是社会生活的写照。嘉靖万历年间出现的一批小说，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新习俗，充分显示了作者们冲破礼教束缚的思想风貌。吴

承恩的《西游记》（嘉靖时作），李开先的《金瓶梅》（嘉靖万历年间作），天启年间，冯梦龙编辑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和凌濛初编辑的“二拍”（《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或借伸话故事，讽刺 16 世纪封建统治下没落阶级的腐朽、贪婪、残暴，歌颂人民对黑暗势力的反抗精神；或用现实手法，描绘豪绅地主的道德堕落和新兴市民阶层的思想情趣。当时文学领域掀起了一股批判现实的新风，处处同传统礼教相抗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行商业贾成为一种新的社会风尚，儒门子弟纷纷弃儒经商，入学中举的道路不再像以前那样受人羡慕。女人改嫁、私奔，在小说中被视为值得同情的行为；节烈观念，开始褪色；在小说中甚至出现了纵欲的描写。这都是以往在名教思想束缚下不敢想象的。这说明人们正在改变观察人生问题的价值尺度，数千年来的封建礼教价值观念，经受着猛烈冲击。

明代中叶，中国戏曲有了新的发展，汤显祖《牡丹亭》的创作，地方戏曲“昆曲”的兴起；都适应了当时城镇市民文化生活的需要。经过长期封建思想禁锢之后，文学、戏曲方面掀起的思想开放的风气，要求人们打破旧思想、旧观念的束缚，想前人不敢想的事，说前人不敢说的话，写前人不敢写的书，这股文化新风，对李时珍的科学创造无疑有激发、诱导的作用。

（三）超越前代的科技创造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宋代达到它的极盛时期；此后数百年里，呈现一种沉闷局面；到明代中叶又有了大的发展。这一发展有着相当深刻的社会根源。在此之前，科学技术缺乏长足进展，主要原因在于封建统治者顽固地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城市工商业始终未有大的发展，中国长期停滞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水平，对科学技术的发展难于提出新要求，更难显示有力的支持与推动；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使士人沉溺于“进士及第”的黄金梦，陷入“学而优则仕”的思想牢笼，不屑于弃科举而攻“雕虫小技”。在封建社会，科学技术从来遭到鄙弃。士人们往往是在进士梦破灭之后才被迫研究人所不齿的方技。到明代中叶，以上两方面情况都有了变化。工商业的空前发展，儒学道路的一度冷落，科学技术工作受到人们另眼相看。这一时期的创造发明，是随着整个手工业的空前发展而出现的，此时的中国手工业有了许多比较发达的部门。首先，纺织业中，棉织、丝织、毛织部有很大发展，特别是丝织业，所产的锦缎，巧夺天工，远销海外，令人倾倒。其次，冶铁和采煤业，生产模范宏大，生产技术改进，生产组织合理化，预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第三，瓷器制造业，尤其令人瞩目。景德镇的官窑、民窑共 3000 余座。嘉靖时期，官窑每年出产“五色龙凤诸器”多达 44 万余件。（《明史·食货志》）生产分工已很细致，“一杯工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天工开物·陶埏》）印刷业也是当时最发达的行业之一，南京是当时印刷业中心，无论雕版印刷还是活字印刷都有极高技术，大部头的丛书、小说、戏曲、本刻画，都广为印行。彩色套印技术，已达到极高的艺术境界。

伴随着手工业的发展，16 世纪我国科学技术成就十分辉煌。

（1）北京天坛回音壁的构建。回音壁是环护“皇穹宇”（安成祭天牌位的地方）的圆形围墙，建于嘉靖九年（1530）。墙壁设计奇特，砌得整齐光

滑，赋有神秘的声音反射效果。有人在一端面向墙壁小声讲话，在很远的另一端，别人会听得很清楚，二人可以对话。其原因是发音者的声音与墙面受音点的切线所成的角度小于 22 度，声音分布在近墙面的一条不超过 2.5 米宽的圆环内，不致碰到皇穹宇反射到别处去。配合回音壁的三音石和圆丘也具有奇特的声学效应。这一组建筑是我国建筑史上的奇迹，在世界文化史上亦属罕见。

(2) 卓越的“十二平均律”的发明。乐律学在我国发展很早，历来极受重视。明中叶，卓越的乐律学家朱载堉（1536—1610）发明的十二平均律，比欧洲乐理学家梅尔生（1588—1645）的发明早半个世纪。朱载堉本是一位王室世子，不慕荣禄而潜心乐律、历算。于万历十二年（1584）写成《律学新说》，采用求等比级数的方法平均分配倍频程的距离；以珠算为计算工具，取公比为 $\sqrt[12]{2}$ ，精确度达到小数后 25 位，使十二律中相邻两律之间的频率差完全相等。从而彻底解决了“旋相为宫”的转调问题，作出音乐史上划时代的贡献。19 世纪德国物理学家赫姆霍茨对此有过高度评价。

(3) 伟大的治河工程的胜利。黄河之水天上来，它源远流长，日泻千里，气势雄伟，但却是一匹难于驯服的脱缰之马。治理黄河是世界水利史上最棘手的难题，自汉代贾让以来，世代水利专家为它绞尽脑汁，同泛滥的河水进行过惊心动魄的搏斗。“黄河斗水，泥居其七”。它每年要从黄土高原冲刷下来 16 亿吨泥沙，堆成 1 米见方的大堤，可绕赤道 27 圈。黄河肆虐，则淮河、运河及其下游广大地区就要陷入极大灾难。明中叶，李时珍的同代人潘季驯（1521—1595）为驯服黄河作出了卓越贡献。他奉嘉靖、隆庆、万历三朝重命，四次出任总理河道御史，前后主持治河 27 年。针对黄河含沙量大的特点，断然改变以往采取的“分流”办法，指出：“水分则势缓，势缓则沙停，沙停则河饱”；反之“水合则势猛，势猛则沙刷，沙刷则河深”。（《河议辨惑》）他提出卓越的主张：“筑堤束水，以水攻沙”。其战略决策是以人工筑堤，约束洪水，加快流速，增大洪水冲刷力，带走泥沙，以免河床淤浅而导致河水决堤泛滥。具体措施是先筑缕堤作为第一道防线，缕堤之内造月堤以止水；再筑遥堤作第二道防线，遥堤之内设格堤以阻水流。用这种防洪与疏导紧密结合的办法，终于控制了明初以来长期出现的黄河游荡、运河阻塞的局面，此后近两百年使黄河再未发生大的改道。将治河工程从单纯治水，转移到水流、泥沙、河床三者并治的轨道上来。这一思想，对此后三百多年的治黄工程发生重大影响。黄、淮、运三位一体的治河工程的卓有成效，成为水利科学史上的光辉篇章。

以上事例，虽不足以反映明中叶科学技术发展的全貌。却显示了中国 16 世纪的科学技术在某些领域一直居于世界先进水平。李时珍生活在这样的科学氛围中，他的科学创造取得卓越成就，绝不是偶然的。

三、16 世纪中国医学药学的发展

明代初年，社会的相对稳定，经济的发达，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医药卫生条件获得很大改善，医学、药物学的研究累积了不少优秀成果，为李时珍的科学创造提供了良好条件。他在科学上的卓越成就，除了个人的天才与勤奋，更应看作是时代的赐予。

（一）前人的医学贡献

宋代以来，中国印刷术相当进步，到明代刻书风气更为盛行，使许多文化典籍得以迅速而有效的传播，重要的医学著作，容易得到普及。李时珍编撰《本草纲目》过程中，参考了41种药物学著作，277种医学著作，还有经史百家著作440种。图书资料上的这种有利条件，是他的前人不曾享受的。特别是金元时期，医学界开展百家争鸣，四大家医学理论独立发展，竞相争高，各有千秋，形成中医学发展的鼎盛时期。李时珍得以纵观诸家之长，参照比较，择善发挥。刘完素的清热解毒理论，张子和的汗吐下三法，李东垣的脾胃学说。朱丹溪的滋阴降火原理，这些先进医学思想，都是敢于打破陈规，大胆创新的产物，对李时珍的创造思维活动，有着强烈的启迪作用。明代中叶，学术界、文学界革新思潮的掀起，更为李时珍的创造增加了无穷助力。比李时珍年长或与他同时的医学家，在医学理论、医学文献研究、各种临证经验上作出重要贡献者为数不少。

较李时珍年长的医学家中，薛己（1486—1558）曾任职太医院，著《内科摘要》，是医学史上首次以“内科”命名的医书。他兼通内、外、妇、儿诸科，其著述合编为《薛氏医案二十四种》。其中《正体类要》（1529）论述正骨手法，外科方剂，成为外科正骨法重要著作。韩懋著《韩氏医通》（1522）强调四诊在鉴别病证上的重要性，对书写病案作了全面规定。儿科名医万全（约1495—1580）著《幼科发挥》、《痘疹心法》等合编为《万密斋医书十种》，总结本人行医50余年及家传三代的临证经验，对儿科贡献尤为突出。

与李时珍同年的医家，更是人才辈出。马莛对《内经》很有研究，分卷注释，编成《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1586）、《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1586），后者为《灵枢》最早的全注本，二书于医理分析、宁义解释多有发挥。嘉靖时名医徐春甫，辑录230余部医书及其他文献中的医药内容，编成《古今医统大全》（1556）共100卷，分为内经要旨、脉法、经络、针灸、本草、养生及临证各种证治等类，为16世纪重要医学类书。杨继洲（1522—1620）任嘉靖皇家侍医，博览群书，行医40余年，著《针灸大全》，集明以前针灸学之精华。王纶撰《明医杂著》（1549），主张外感法仲景，内伤法东垣，热病用完素，杂病用丹溪，对内科学的发展作了重要概括。

略晚于李时珍的卓越医学家则有张介宾、赵献可、王肯堂等。张介宾（1563—1640）号景岳，是著名医学理论家，与朱丹溪持不同见解，认为“人体虚多实少”，主张温补肾阴肾阳，创立多种补肾方剂，著《景岳全书》（1640），成为医学史上的重要文献。赵献可（生于16世纪下半期）发挥李时珍命门学说，撰《医贯》（1617），将命门说贯穿于养生、治疗诸方面。王肯堂（1549—1613）著《六科证治准绳》，其《疡医证治准绳》载有多种手术法，如气管吻合术，耳廓整形术，唇舌整形术等，是外科学史上最早的记载。这些都表明，当时我国的外科学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在医学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李时珍时代我国已发明了接种人痘以防天花的医术。人痘接种法，一说起于唐代，一说起于宋代，都缺乏充分根据。可靠的说法是出自俞茂鲲《痘科金镜赋集解》，书中说：“种痘法起于明朝隆庆（1567—1572）年间，宁国府太平县，姓氏失考。……由此蔓延天下。至今种花者宁人居多。”足证在16世纪我国发明并推广了接种人痘以防天

花的医术，这是确凿无疑的。这一发明，先传入俄国，后传入土耳其，再传入英国，然后普及于欧洲，造福人群，功勋卓著。

（二）前人的本草学成就

纵观中国医药学史，宋代和明代是中草药最发达的时期。李时珍撰写《本草纲目》，参考的41种本草著作中，宋代占6种。明代占9种。

宋代的6种著作是李时珍的主要参考书。他从《开宝本草》（973年，马志、刘翰等著）中，引用了药物111种；从《嘉祐本草》（1057年，掌禹锡等撰）中引用药物74种；从《日华子诸家本草》（宋初·大明撰）中，引用药物25种；从《证类本草》（1082年，唐慎微著）中，引用药物8种，此书是他用作蓝本的重要著作。此外，还从《本草衍义》（1116年，寇宗奭撰）中引用1种。前人的研究成果，为李时珍的创造奠定了基础。

明中叶以前，新编的本草学著作共有9种之多。9种本草著作中，李时珍主要参考的有下列5种：周定王《救荒本草》（1406），汪颖《食物本草》（正德时编），宁原《食鉴本草》（嘉靖时编），汪机《本草会编》（嘉靖时编），陈嘉谟《本草蒙筌》（1565）。他从这些著作中引用了几种或十几种前代本草书中未载的药物。他肯定《救荒本草》，对440种药物“咨访野老田夫”，图其形状，“详明可据”。肯定《本草蒙筌》“颇有发明”，便于初学，对其余的4种著作，3种被列入《历代诸家本草》。但评价不高，对所载药物未加引用。他指出洪武时丹溪弟子徐用诚所编《本草发挥》（1384）只取洁古、东垣、海藏、丹溪等人之说，合成一书，“别无增益”；指出宣德中宁献王所编之《庚辛王册》，只是《外丹本草》、《造化指南》等外丹著作中有关金石草木可备丹炉者缀合成书；批评弘治时王纶所编《本草集要》（1492）只取常用药品及洁古、东垣、丹溪所论序列。加以节略而成，“斤斤泥古者也”，“别无增益”。蓝茂（1397—1476）所撰具有地方特色的《滇南本草》（约1476）未被李时珍列入《历代诸家本草》。在明中叶以前的百余年间，新编撰的本草学著作竟有9种之多，充分表明当时医家对本草学研究普遍有着浓厚兴趣，形成了一种可贵的社会风气。李时珍创造性地编撰《本草纲目》，正是在这种学术风气熏陶下进行的。他汲取诸家本草之长，克服诸家本草的历史局限性，取精用宏，完成空前巨著，将我国本草学研究推向历史新水平。这是时代的赐予，也是他的智慧的结晶。如果没有广大群众对改善医药条件提出的强烈社会要求，没有前代科学家在医学、药物学上积累的丰富经验，作出的重要贡献，单凭李时珍的主观努力，是不可能取得如此辉煌成就的。王世贞在讲到李时珍善于汲取前人留下的科学资料，从事《本草纲目》的编撰时指出：“上自坟典，下及传奇，凡有相关，靡不备采”。李时珍自己也说，他编撰《本草纲目》曾“渔猎群书，搜罗百氏。凡子史经传，声韵农圃，医卜星相，乐府诸家”，无不广为参考。李时珍如同辛勤的蜜蜂，采集百花，酿出蜜汁，造福于人类。

第二章科学巨人学辉的一生

李时珍是我国 16 世纪的伟大科学家，中国人民骄傲地尊称他为“医中之圣”。他在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落的时代里诞生，在国家回临严重内乱和频繁外患中成长。他生活在一个科学技术很不受尊重的社会，胸怀壮志，努力攀登科学技术的高峰。他发愤图强，冲破重重阻碍，克服道道难关，含辛茹苦，忍辱负重，终于摘取了人类智慧的硕果，为祖国医药科学的发展树立了丰碑。

李时珍是一位杰出的医学家、卓越的药物学家，唯物主义者和战斗无神论者。他为祖国甚至世界医学、药学、博物学留下了宝贵遗产，编写出了 16 世纪中国的百科全书——《本草纲目》。他为我国唯物主义思想、朴素辩证法思想以及无神论思想的发展，都留下了不朽的功绩。

李时珍是一个具有开拓精神的科学家。他为了拯救人民群众的疾苦，造福子孙后代，认真地总结祖国文化遗产。他同人民群众心心相印，血肉相联，急人民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坚决地同社会上的顽固势力斗争，同人民群众中的愚昧和落后作斗争，步履艰难地跋涉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崎岖道路上，把毕生心血献给了祖国医药学事业。

李时珍不为名缰利锁所羁绊，不为困难所屈服，时时考虑用自己的才智去解除人民的疾苦，把自己钻研得来的科学成果，无偿地奉献给祖国和人民，树立高尚的医德和科学精神。

李时珍由一个体弱多病的平民之子，成长为一位世界科学巨人，经历了曲折复杂的艰苦奋斗过程。他那自学成才的光辉道路，为万代留下卓越的楷模。唯物主义的求实精神，力摧宗教迷信的无神论思想，为民纾困的高尚情操，是他取得卓越科学成就的主观条件。

李时珍光辉的一生，大体上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在他成长的每一个时期，具有独特的生活经验和奋斗目标。了解他的生活道路，对理解他的医学、药学和哲学思想很有帮助，对我们为振兴中华而勇攀科学技术高峰，尤有借鉴意义。

一、胸怀壮志献身医学事业 (1518—1539)

1518 年（明正德十三年），李时珍出生在一个中医家庭里。祖父是一个走乡串户的“铃医”，社会地位低下，没有留下名字。他的父亲李言闻号月池，医术比较高明，在当地颇有名气，曾被荐为太医院吏目（即皇家医院的医官）。李时珍自幼受祖父和父亲的思想影响，对医药有一定的兴趣。

李时珍生活的时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后期，封建统治者日益腐朽，残酷地剥削压迫人民。李时珍出身平民家庭。没有权势，凭着他父亲有高明的医术，才受到地方贵族豪门的另眼相看。蕲州城当时是南北交通要地，物产丰富，风景秀丽，明朝皇室后代荆宪王特把王府迁到那里。镇上还有顾、郝等封建地主豪门。贫苦农民和乡镇平民常受王府及豪门的欺凌。李时珍的父亲，把光大门庭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那时只有靠科举考试，才可能平步

青云，进入封建官吏的行列，这种社会风气顽强地腐蚀着人们的思想。李时珍自幼对医学很感兴趣，但禀承父命，不得不寒窗苦读，按时去参加科举考试。

李时珍从小聪颖过人，发蒙后，几年内就学会写诗、作文。14岁那年（1532年）参加了在家乡黄州举行的“童试”。两门考试科目：四书义（即八股文）和试贴诗，都取得好成绩。中了秀才，可谓少年得志。父亲鼓励他继续努力，勤奋地学习四书、五经，努力去参加三年一次在武昌举行的“乡试”。更希望他乡试中考后，能进府学去学习，争取参加廷试，金榜题名，成为一名“进士”。李时珍对八股取士那一套并不感兴趣，他的思想总是同科举考试格格不入，乡试一次再次遭到失败。大约在第二次乡试后，身体就累坏了，得了可怕的骨蒸病，长期发高烧，几乎死去，幸得他父亲精心治疗，终于战胜了病魔。李时珍经过两次科举考试的失败，仍抱病苦读，幻想下次乡试得中，不致辜负父亲的希望。他夜以继日，一遍再一遍地钻研科举考试所规定的内容，把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和五经（《诗》、《书》、《易》、《礼》、《春秋》）读得透熟，对可能遇到的议论题和策试题都尽量作好准备。

按照明朝考试制度，乡试每逢子、午、卯、酉年举行。嘉靖十九年（1539年）正是庚子年。李时珍抱着极大希望，第三次去参加乡试，结果仍然名落孙山。这次考试的失败，对23岁的青年人是一次极大的打击。多年的“进士梦”彻底破灭了。

李时珍三次乡试不中，并非偶然。原因在于他所发表的议论和提供的时务对策，完全不符合封建统治者的心意。当时封建统治日益衰落，内忧外患频仍；资本主义萌芽正在滋长，要冲破封建经济的桎梏；农民要求改变土地高度集中、租税加重、饥寒交迫的困境，日益增长着愤怒情绪。封建统治者希望秀才、举人们能为他们出谋献策，扭转社会危机。李时珍是受剥削、压迫的平民子弟，不愿意味着良心去为封建统治者提供什么救命良方。他熟读四书、五经，精研典谟训诂，所想的是如何为人民做点事，解除他们的痛苦，实在没有心思去为统治者想出一套挽救危亡的办法，所以他的答卷一次又一次地不能入选。

李时珍未能通过科举考试的道路，挤进候补官员的行列，今天看来，这并不是一件坏事，反成了促使他献身科学事业的契机。在准备应付科举考试的那些日日夜夜，献身医药事业的雄心，已在年轻人的心灵里慢慢滋长。他的青云之志，不在入学中举，进士及第，获取高官厚禄，而是想精研医术，为人民解除疾苦，为发展祖国的医学药学做一番贡献。

十多年的寒窗苦读，对于入学中举来说，算是白费了，可是却为李时珍转向医学研究创造了良好条件，打下了各方面的知识基础。

首先，通过四书、五经及其他文史典籍的刻苦学习，初步具备了古代历史文化知识，这对于研究医学史、药学史，是十分必要的。

其次，四书、五经及其注释中，本来包含某些古代的科学知识，如天文、历法、地理、农学、生物、矿物、工艺等。这些科技知识尽管十分肤浅，很不系统，对科举考试也很不重要，可是对于从事医学、药学研究倒是不可缺少的。

第三，在应付科举考试过程中，李时珍对于古籍研究、文字训诂、音韵、考据，以及文章写作都下过扎实的功夫。运用这些文化基础知识，转向医学

研究，足以在科学领域创造出出色的成绩。

“祸兮福之所倚”。科举考试的失败，坚定了李时珍献身医药学事业的决心。1540年，未来的科学巨人脱离了十多年耗散精力的科举道路，改弦易辙，向崇高的奋斗目标迈进了。

二、钻研医典精通医术 (1540—1550)

23岁的李时珍，经受了三次科举考试落榜的打击，终于说服了父亲，告别了八股生活，向父亲学习医术。经过三四年刻苦学习，经常随父亲临证实践，逐步掌握医学理论与临证经验。26岁时开始独立行医。

年轻的乡村医生开始行医，恰遇社会上发生了两桩重大事变，对他的专业学习和医疗实践影响极大。

正好在李时珍立志学医的第一年（1540），明朝嘉靖皇帝（世宗朱厚^熹）决意炼丹成仙。1542年，奸臣严嵩入阁，为讨得皇帝喜欢，叫真人陶仲文大建雷坛，为皇帝求神祝福。第二年，明世宗干脆不临朝政，专心炼丹。地方官府奉命逼迫人民上山采灵芝，捕梅花鹿，进献于朝廷，以保皇帝长生不死。皇帝下诏设雷坛、修道院、炼丹、求药，对广大老百姓是一场大灾难。官家强迫民众运送檀木、献灵芝、献梅花鹿，不少人受逼死于非命。道士、方士受统治者优宠，在地方上十分猖獗，更加愚弄人民。在李时珍的家乡，他们父子以前行医治病的场所玄妙观，也改建雷坛设醮。道士们神气舞扬，他们父子被赶出现外。这些事李时珍看在眼里，恨在心头，无法阻止他们的横行，还得花费宝贵时光去揭穿方士们炼丹求仙的骗术。

正当方士们炼丹猖獗之时，蕲州地区1545年惨遭大旱，接着又遇水灾。人民衣食无着，四处饿殍枕藉。可怕的瘟疫大肆流行，人民遭受双重灾难，有病无钱医，死者无人理。官家设立的“惠民局”并不能予人民以恩惠。28岁的李时珍同父亲一起，全心全意为群众治病防疫，深受群众爱戴，史称“千里就药于门、立活不取值”。瘟疫流行，向李时珍提出许多疑难病症，促使他认真钻研医术，精益求精，他的医术迅速提高，远近闻名。

公元1546年，李时珍的父亲补了贡生；由于他医术高明，地方上的人们对他刮目相看；他可出入顾、郝等名门，较受尊敬，渐与郝家有了交谊。郝家有位儒士好医，家藏不少名贵医书。这些医书他们自己并未经常阅读。李时珍凭着父亲同他们的交谊，常去他家借医书看。除了为人治病，只要有闲暇就刻苦钻研。史称李时珍“读书十年，不出户庭”，就是指这段在家行医苦读的事。由于有了丰富的临证经验，又有珍贵的医学典籍可供参考，勤学深思的李时珍，很快就具备了超出一般乡村医生的理论水平。这时，他的父亲也在写自己的医学著作。父子相互启发，共同研究，李时珍在医药学上进步很快。

李时珍从实践中获得大量直接经验，又从书本上得来不少间接知识，相互参照比较，发现古代药学著作，存在许多缺点和错误。或者同一药物被误为几种，或者几种药物混为一谈，或者主次不清，或者图文不一。这些问题如不加以纠正，很易造成医疗事故，危及患者的生命。由此李时珍渐渐地滋长了重修本草的念头。这一念头一经浮现，就使他梦寐不安，决心不辞千辛万苦加以实现。以往修本草，多由官府召集众医多年努力，耗费巨资才得完

成。李时珍想修本草，缺乏人力、财力，没有官府支持，谈何容易。

困难吓不倒有志人。李时珍深深明白，他现今具备的医学、药理学知识，已为重修本草准备了主观条件。

在医学上，许多著名的医学著作，已经一一研读过。上自《黄帝内经》、《伤寒论》，下至金元四大家的名著，凡属祖国医学的代表作品，不只读过了，而且有着自己的新见解，他已写出大量读书笔记，只要进一步加以整理、充实，自信对医学是有所发明的。

在药学方面，凡是能看到的药学著作，也已经读过。《神农本草经》药物味数不多，其三品分类法现已很不实用；《名医别录》虽出自名医陶弘景之手，其中也有许多不妥的地方；《经史证类本草》集中药学之大成，算是最完备的本草书，但自成书以来也已有 400 多年，新的药物已大量发现，何况其中有些药物图文并不一致，不少地方是有文无图，或有图无文，药物分类上，更须大加改进。自信新编一部本草，其科学水平是可以大大提高的。十多年来的临床辨证与药物考察，锻炼了自己的理论思维能力及科学研究方法。一个科学家能否在科学领域超越前人，理论思维能力的锻炼，科学研究方法的改进，具有决定作用。多年来，李时珍不但善于发现问题，而且善于严肃地思考问题，遇到问题决不轻易放过，把疑难留给别人。他总是抓住不放，深入调查研究，务必解决。因此，他自信凭着自己的创造性的科学研究精神，本草学中许多问题，通过主观努力，定能一一解决。

李时珍从医 11 年之后，1552 年当他 35 岁时，毅然结束了单纯的开业行医生涯，开始担当起重修本草的科学重任，一步一步地奋力向科学高峰攀登。

三、万里跋涉采方问药 (1552—1567)

李时珍撰写《本草纲目》，从 1552 年开始，到 1578 年完成，共经历了 27 年。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前 16 年，采方问药。广泛收集资料；后 11 年，厘订纲目，三次修改定稿。

在第一阶段，李时珍的工作受到各方面的阻碍，进展迟缓，困难重重。他知难而进，紧紧地依靠群众，巧妙地排除干扰，克服困难。

当时最大的阻碍是社会不安定，缺乏研究科学技术的安定环境。李时珍开始重修本草的那一年（1552 年），东邻倭寇入侵东南沿海诸省；次年，西方殖民主义者葡萄牙人乘机强租我澳门。外寇压境，封建王朝十分恐慌。然而昏庸的封建君主，并未惊醒过来，仍一味炼丹求仙，命令州县广采灵芝仙草，进奉朝廷。对人民的疾苦漠不关心，他们从来没有想到像唐宋时代那样，由官家来主持重修本草，只挖空心思，收揽天下名医去为他们炼丹长生的卑鄙的服务。

1556 年，楚王府慕李时珍之名，把他请去给世子治病。病愈后，委他为王府奉祠正，当个主管祭典的七品官，目的是要他兼管王府的“良医所”，充当王府贵族的专用医生。一人王府，实际上就同广大群众隔绝了。楚王府真正宠信的是一批专搞炼丹的道士，并不把名医李时珍放在眼里。李时珍常常对炼丹道士们的行为不满，故时时遭到他们的刁难。李时珍只好利用机会走出王府，到蛇山观音阁去为群众诊病，以便于向群众寻方问药。1559 年，

皇家下诏招揽天下名医，李时珍被楚王府推荐入太医院。同太医院的老御医相比，李时珍只算年轻无名之辈，因此很不受重视。他利用在太医院工作的方便，建议由官家主持修订本草。建议一出，老朽们群起反对。李时珍在那里供职一年，连个太医院吏目都不如，唯一的益处是有机会出入寿药房和御药库，实地观察了不少难以见到的名贵药物，为重修本草扩充了药物知识。他对那里尊崇方士、炼丹求仙的气氛十分厌恶，一年后，只好托故回家。后来有人说他当过太医院院判（即太医院院长），这是不确的。难怪他的儿子为他立碑，连太医院三字都不见于碑文。

决心修本草，本当精力集中于研究药物，但他胸中酝酿数年的一些医学知识，尚未整理出来，不得不一面研究药学，一面总结医疗经验，撰写医学著作。1564年左右，《濒湖脉学》等医学著作终于写成。多年的医学经验得到总结，如释重任。以后可更好地集中精力，完成宏伟的研究计划。

这时期李时珍的父母相继去世，他必须承担繁重的家务。抚养儿子，教徒弟，又分散了他不少精力。他还要劳神费力，修建新居——菴所馆。这所新居，濒临雨湖，风光秀丽，是他晚年从事科学研究的地方，从此自号濒湖山人。待弟子庞宪不久学成行医，才成了他唯一的得力助手。

在安排好家务之后，精力充沛的李时珍，带着儿子和徒弟开始远出寻方采药，广泛地向老农、渔夫、樵夫、铃医请教，足迹遍及湖北、安徽、江西、湖南、江苏等地。万里跋涉，登过太和山、大别山、茅山、伏牛山等名山，采集了许多珍贵的药物标本，写下了数百万字的访问记录，为进一步研究整理本草，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实际资料。这对于《本草纲目》的写作，有着决定性意义。任何一个科学家，想有所发明，有所创造，除了切实掌握以往的全部科学研究成果外，最重要的是获得足够的新的科学资料。李时珍大约花费了15年的时间，首先实现了自己的第一步计划。

他的科学创造取得成功，秘密正在于此。他坚定地依靠群众，虚心地向他们为师，从他们那里细心地收集关于祖传药物、单方、验方的零散资料，像蜜蜂一样，勤采百花，以酿新蜜。他不作无米之炊，不求无本之木。他的创造性思维加工，建立在丰富而可靠的药物学资料上。

李时珍这一时期的科学活动，突出地显示了几个特征：一是具有顽强的开拓精神，这表现在他对工作不是得过且过，应付现实，而是永不满足，不断进取；深入群众，进行社会调查，扎实占有第一手资料，汲取群众智慧来丰富自己的知识，发展自己的思想。二是进行刻苦的思维活动，他善于开动脑筋，提出问题；一经发现问题，就要穷根究底，不获得问题的解决，决不甘休。三是具有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科学领域没有平坦的大道，他一无充裕的经费，二无完整的资料，三无强有力的助手，凭着高尚的理想作支柱，祖孙三代，师徒数人，克服万难，终于完成宏伟的科研任务。他的这些精神，值得人们永远学习、纪念。

四、深思熟虑创立本草新体系

（1568—1578）

大约在1568年，即李时珍51岁左右，编撰《本草纲目》的工作进入关键时期。十多年来，广泛收集药物资料，经过反复的思想酝酿。这时要着手营造自己理想中的本草学新体系。在这一阶段，主要任务是进行艰苦探索，

反复比较，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一次又一次对药物资料加工整理，使自己的认识不断趋于正确，使《本草纲目》的科学体系日益完善。直到1578年，《本草纲目》最后定稿，大约花了11年时间。这是李时珍一生中科学创造的黄金时代。

这一时期，李时珍的心情比较舒畅。宠信奸臣严嵩、一心炼丹成仙不理朝政的嘉靖皇帝，已于三年前（1560年）服丹中毒丧命；上一年，穆宗朱载堉，下诏严惩方士，废止建坛设醮，撤消了皇家的炼丹所，不良的社会风气为之一扫；一贯反对炼丹成仙的李时珍感到扬眉吐气。政治改革家张居正于1567年入阁视事，开始掀起一股改革之风。到1573年，实行一系列封建政治改革，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贪官污吏、地方豪强，限制土地的高度集中，开展城乡经济交流，活跃了民办手工业和商业。这些都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新的生机。

此时，李时珍的大儿子李建中，科举考试得中，1571年出任河南光山教谕；1575年升任四川蓬溪知县。李家总算开始光耀门庭，改变了世代平民地位。客观环境有利于李时珍安心进行科学实验和科学创造。1574年，支持张居正进行改革的文坛领袖王世贞就任湖广按察使，对澄清地方吏治、奖励文化建设相当重视，李时珍在医药学上的革新活动，再不像过去那样受方士们的冷嘲热讽和顽固派的刁难打击了。

李时珍创建本草学新体系的艰苦思索过程，很少留下文字记载。人们只知道“稿凡三易，然后告成”（《四库全书提要》）。从现在的这一科学巨著来看，不难想见他所遇到的困难是很多的，研究工作非常艰巨。

第一，反复思考，确定分类体系。旧本草共有1500多种药物，自己又新增370多种，对于近1900种药物，如何加以分类，是个大问题。汉代《神农本草经》建立上、中、下三品分类法，这一分类法已沿袭两千年。《本经》只载365味药，三品分类法虽不科学，倒还适用，检索比较方便。现在，药物多至近1900种，这种分类法已不适用了。宋代庸慎微编撰《证类本草》先按十部分类，每部之下，再按三品分类，虽有改进，仍不科学。李时珍吸取《证类本草》十部分类的思想，加以发展，建立15部、60类分类法，废除三品分类法，只在药名下保留三品分类的历史痕迹，以利于检索旧本草。以部为纲，以事项为目，创建了药史上新的科学体系，促进了中药研究的科学化。李时珍耗费20多年精力，经过反复修改，方才形成这一纲目体系，完成了这项卓越创造。废除一种科学研究中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是一项学术上的创举，需要极大的科学勇气。

第二，细心剖析，确定“主治”、“发明”。李时珍对各种药物，先从八个方面进行研究。纲目中对药物知识也按八个方面进行概括论述。这八个方面是：释名、集解、正误、修治、气味、主治、发明、附方。这八大研究项目中，他用力最勤、剖析最精的主要在“主治”与“发明”两项。这是衡量他的科学研究水平的两个主要方面。“主治”一项，大多是对药物研究的新发展。既有继承，又有创造，是李时珍关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医与药相结合的重要论述。“发明”一项，更是他发表自己独到见解的方面，是他多年研究心得的结晶。李时珍运用哲学思想对药物作理论分析，发表许多精湛见解，大部写在这一项下。研究李时珍的哲学思想，这一部分保留的思想资料最丰富。他分析问题，独运匠心，于此可窥其奥秘。不难想象，“三易其稿”过程中，这两部分是他呕心沥血、反复修改、用心独苦之所在。

第三，笔工精细，绘制药图。这又是一项繁重的任务。这项工作是在李时珍指导下进行的。金陵本《本草纲目》中说主要由他的儿子李建元绘制，总计绘了 1100 多幅，其中不少植物和动物药图都绘制得精致生动。有人称它是一部画谱。《证类本草》有药图 800 多幅，但存在不少问题，或图文不相符，或有图无文。李时珍作了很大改进。现存《本草纲目》中的药图，采用的是江西刻本，它是以金陵本为基础，选用了《证类本草》中的部分插图合并而成。这些药图比金陵本精致，它帮助人们图药对照，按图寻药，对识别药物有重要帮助（见《药图》1、2）。

可想而知，李时珍在这 11 年内，反复修改分类提纲，深入研究每项药物的气味、主治、发明，精心绘制药图，“三易其稿”。他坚持谨严的学风，求实的精神，对每项研究都一丝不苟。他的弟子和全家子孙都基本动员起来，投入这项艰巨的科研工作。《本草纲目》实际凝聚了他们师徒数人和祖孙三代人的心血。

1578 年，《本草纲目》最后定稿。它建立了新的分类体系，处处闪耀着新的发明，大大扩充了新方新药，改进了药图。《本草纲目》以新的面貌呈现在人民面前，丰富了祖国医药学宝库，为我国药物学发展史，确立了划时代的标志。

五、《纲目》问世誉满天下 (1579—1593)

《本草纲目》定稿时，李时珍已 61 岁了。在他去世前，有过 15 年的晚年生活。李时珍时而喜泪交流，时而暗潜悲酸，常在悲喜交集中过日子。总的说来，悲多于喜，绝代科学家终于在失望中抱憾终天。

李时珍苦斗了 27 年，除了写成《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等重要医学著作，完成的重大项目是《本草纲目》。不难想见。他的最大心愿是早日将它刻印出版，发挥社会效用，推进医药科学。可是这部 190 万字的巨著，一时艰难找到承印的主人。他到过黄州，到过武昌，四处奔走，没有书商敢刻印。这部书的巨大科学价值，尚未为人们所认识，没有名家的赞许与政府的支持，私人刻印此书，不管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有很大风险。李时珍为此书的刻印问题，颇伤脑筋。倾毕生心血，撰成此书，却长期积压案头，不能广泛发生社会效益。科学家的伤心之事，莫大于此。

1579 年，即《本草纲目》定稿的第二年，万历皇帝害怕儒生议论朝政，下诏尽毁天下书院，著名思想家何心隐为此提出反对，从而触怒了皇室竟被杀头。这件事对于知识分子是一个沉重打击。在这种历史环境下，出版者更是小心翼翼。李时珍的药学巨著，短时间无法出版，是毫不奇怪的。

李时珍看到自己的著作在蕲州、黄州、武昌无法刻印，就毅然到南京去。南京是当时刻印书籍的中心。他在南京大约找过几家刻书家洽谈，都未得到满意的结果。1580 年九月，他去江苏太仓访问了著名学者王世贞。王世贞曾在湖广任过按察使，同李时珍虽不相识，却时有所闻。王世贞是当时文坛领袖，对天文、地理、文史、诗词、曲艺等都有研究。这时王世贞也已罢官居家。李时珍对他十分尊重，把《本草纲目》献给他。请他作序，“愿乞一言，以托不朽。”（转引自王世贞《本草纲小序》）王世贞留他住了几天，饮酒长谈，相处甚洽，答应为《本草纲目》写序。李时珍十分高兴。李时珍在南

京参观了当年航海家郑和下西洋带回来种在海静寺里的一些异乡植物；当年随郑和出洋回来的一些老船工，向人们谈到海外医药情况。这类传说流传在民间，李时珍有机会听到一些有关药物的传说，可能还见识了某些传留下来的海外药物。南京药王庙是一个著名的医药市场，汇集了全国各地的药物，李时珍也趁此仔细观察访问。凡他所见到的药物与原先的记载有出入的地方，都一一作了记录，准备回家对书稿再作个别修改。虽然联系刻书的事未有着落，此行的收获实在不少，在苦闷中也有几分高兴。

从南京回到家乡，国内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改革家张居正，于 1581 年（明万历九年）全力推行“一条鞭法”，大刀阔斧进行社会经济改革，打击豪强，略抒民困，社会上出现一线好希望。不料第二年竟因病去世，改革之风暂时停止。攻击张居正改革的人，乘机蜂起。1584 年，顽固势力抄了张居正的家，对张居正施行戮尸惨刑。张居正是湖北江陵人，这件事震动全国，对湖广群众震动极大。社会风云突变，是李时珍所无法理解的。他一贯同情张居正，目睹世态炎凉，心情十分难过。

事件发生的第二年（1585 年），李时珍的长子李建中由蓬溪知县调任云南永昌府通判。李建中知道政局不稳，不肯就任，三次呈文请求回家侍候父亲。封建社会，提倡孝道，若父母年满 70，无人照顾，居官的儿子可以请求放弃官职，回家尽孝。这时李时珍还未满 70，儿子这么做是有难言之隐。——由于未得允许，他的长子这一年并未还家。

1586 年，湖广蕲黄地区大灾，人民无法生活，封建统治者却不顾人民死活。李时珍的家乡蕲州爆发了农民起义，农民领袖梅堂不久被捕，黄梅人刘汝国继续领导起义农民劫富济贫。蕲州农民聚众响应，与刘汝国会合，战于蕲黄各地。1588 年两支明军聚蕲州进行合剿，起义农民奋战九个月，终于失败。在这样的故乱下，李时珍已不能安心研究医药。《纲目》的刻印也更加困难，内心的苦恼，难以言宣。

1587 年，李时珍满 70 大寿，长子李建中回家省亲，全家团聚。在农民起义声中，这次 70 大寿虽然过得并不称心，毕竟是他晚年比较高兴的日子。大约在这时，李时珍把他多年写的诗篇编成了《苴所馆诗集》，肯定其中不少诗反映了他献身科学的精神和思想。可惜这部诗集早佚，现在尚未发现。

1590 年传来一大喜讯，《本草纲目》终于得到南京藏书家、刻书家胡承龙的支持，开始刻印，这是李时珍多年梦寐以求的事。王世贞为《纲目》写了序言。（序言写于“万历岁庚寅春上元日”，即 1590 年正月十五日）序中对《纲目》作了很高的评价，称赞此书“博而不繁，详而有要，综核究竟，直窥渊海。……实性理之精微，格物之通典，帝王之秘录，臣民之重宝也。”称赞李时珍为“北斗以南一人”。知己之言，其贵胜金。李时珍生前能获得文坛领袖如此评赞，喜出望外；30 年的辛勤劳动，总算得遇知音。对于饱经沧桑、年逾古稀的李时珍，这是莫大的安慰。王世贞的序言，虽然写得很简单，评价亦较抽象，但基本上肯定了《纲目》一书的特点。“博而不繁，详而有要”，同以往药学著作相比，它的确是既博且详的，内容之丰富，体例之新颖，叙述之审慎，医药结合，图文并茂，实在大大超越前代。称许《纲目》一书“实性理之精微，格物之通典”，这一评价很有见地。《纲目》的确不只是一部药学著作，它包含着极丰富的哲学思想（古人称为性理之学），还包含丰富的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天文学、物候学知识。今天人们借伟大科学家达尔文的话称之为“古代百科全书”，实非过誉。王世贞的序言

称《纲目》为“帝王之秘录，臣民之重宝”，肯定《纲目》在推进祖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方面具有巨大的实用价值，这一评价也是中肯的。王世贞是当时学术界最有威望的人，他的评价，句句有份量。李时珍自三次科举考试落第以来，自学苦斗的长期抑郁之情，为之一扫。

这种喜悦心情，可惜为时太晚。《纲目》开刻后，李时珍就病倒了。卧病一年多，一直未起沉疴。一代科学巨人，未及看到毕生心血写成的科学巨著的问世，就与世长辞了。时在 1593 年，享年 76 岁。《本草纲目》是在他去世后 1596 年才印成的。《纲目》出版后，他的儿子李建元根据父亲写好的遗表，将此书进献于朝廷。明神宗只批了“书目览，礼部知道”七字，就再无下文了。足见封建统治者对这本书始终不重视。但《纲目》问世，很快誉满天下。此书印行后，引起学术界极大重视，印出的书，供不应求，很快就再版了。1603 年，金陵本出版后第七年，江西巡抚夏良心加以重刻，并改正金陵本中的一些讹误，药图也加以调整，刻印也更精致。金陵本印行后第十一年（1607 年），此书传到日本，受到日本医学界的重视；不久传到朝鲜；以后陆续传到欧洲，译成德文、法文、英文等多种文本。这一科学巨著迅速地在世界各国产生学术影响，有的资料被生物进化论者达尔文引用。《纲目》受到达尔文的高度学术评价。李时珍死而有知，定将含笑于九泉。

李时珍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他在封建社会里，艰苦奋斗，克服重重困难，自学成才，勇攀医药科学高峰，取得辉煌成果，但生前却郁郁寡欢，终至抱憾而死。他在科学研究中，不为名，不为利，忍辱负重，兢兢业业进行医药研究工作，他树立扎实的学风，发挥开创精神，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终于为人类科学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祖国文化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

六、李时珍活在人民心中

李时珍逝世快 400 年了。他生前为人民解救疾苦，医德高尚，在他的家乡至今还广泛流传着关于他的各种传说。湖北省蕲春县文化局曾组织人员搜集整理，将其中四十则民间传说，编印成《李时珍的传说》（第一辑），表彰他的精神。

笔者 1982 年在李时珍故乡访问过几位老农，他们将李时珍的故事，讲得十分生动，令人听之入神。一位古代科学家，死后数百年受到人民的如此崇敬，不能不令人感动。这些传说，或者表彰李时珍的神奇医术，或者表扬他的高尚医德，或描述他刻苦学习、虚心向群众请教的精神，还有一些是申张他不畏权贵，同封建官吏巧妙斗争的凛然正气。从以下几则传说中，不难看出人们怀念他的感情。

传说李时珍诞生之日，就出现神异现象。清代文学家顾景星所写的《李时珍传》中早有这样的记载：“时珍生，白鹿入室，紫芝产庭，幼以神仙自命。”（《白茅堂文集》卷三十八）蕲州地方流传的故事是这样。时珍的父亲知道妻子快要分娩，十分高兴，连忙挑水、劈柴、打鱼、杀鸡，忙碌一阵子，只等接生婆报喜。由于太累，不觉伏在桌上打了一个吨，梦中看见一只白鹿含着一颗灵芝草跑进堂屋来了，一场惊喜，正好接生婆出来向他祝贺，“又添了一位公子”，生下的就是李时珍。

李时珍这个名字的来历，也有一个传说。说李时珍出生那天，他父亲去雨湖打鱼，起初连下几网都一无所获，很不耐烦。最后再下一网，拉起来重

沉沉的，以为是条大鱼，那知是一块石头。他父亲叹气说：“石头呀石头，我与你无冤无仇，今日为何捉弄我，令我愁上添愁”。这石头实是雨湖神，他突然说话了：“石头呀石头，前来贺喜不用愁，先生娘子快落月，不知先生有何求。”他父亲回家，正好时珍生下地，于是给他起名“石珍”，母亲张氏称他“时珍”。当晚他父亲又做一个梦，仙人铁拐李前来道喜说：“时珍时珍，百病能诊。做我高徒，传我医名”。

流传最广的是李时珍开棺救母子的故事。一天李时珍来到江西、安徽交界的糊口地方，一群人正抬棺送葬，棺材里直往外滴血。李时珍仔细一看，不是瘀血是鲜血。连忙上前说：“停棺停棺！快点停棺！棺材里的人还有救呀！”人们都不相信。当问明棺中是一妇女，因难产而死后，他再向死者的丈夫说：“你家娘子是难产、假死，开棺后，定教你妻还阳，添贵子”。于是开了棺，李时珍先是进行按摩，再在她心窝处扎了一针，不一会，这妇女“哎哟”一声，回活过来，接着生下一个儿子。从此湖口传出佳话，李时珍果真是神医，“死人诊得活”。说他一根针救了两条性命。

另外，有一个神化李时珍的故事，说他“活人断其死”。李时珍用一根银针救活母子两人的事迹，一传十，十传百，在湖口家喻户晓。时珍走到哪里，那里的人无不想一睹这位神医的风采。一天，有家药店老板的儿子正在柜台里大吃大喝，听说神医来了，急从柜台上翻身跳下，挤入人群，前去看热闹。他挤到李时珍跟前，出奇地问道：“先生，你看我有病么？”李时珍看他气色不好，急忙给他诊脉，说道：“小兄弟，可惜呀，年纪轻轻，活不了三个时辰。请赶快回家去吧，免得家里来抬尸。”老板的儿子，气得七窍生烟，大骂李时珍：“你红口白牙说鬼话，我刚才能喝半斤酒，吃四大碗饭。能纵身一跳，翻下柜台。好心好意前来看你，你怎么胡说八道，咒我死？”众人听了，面面相觑，不知究竟。果然，不到三个时辰，老板的儿子死了。原来是吃饭过饱，纵身一跳，肠子断了，内脏受损。后来，人们称赞李时珍医术神妙，“活人断其死”。

民间传说中，还有一些是表彰李时珍不畏权贵、为人民申张正义的。其中有一传说叫《千年长寿方》。一年除夕，李时珍从武当山采药回家，还未歇脚，门外有人高叫，“李时珍在家吗？”李时珍一向热心救死扶伤，随叫随到，急忙把门打开，原来是州官的差役马三。这官差仗人势，坏事做绝，那州官也欺凌良民，无人不恨。李时珍冷冰冰地回问：“马大人到此，有何见教。”马三说：“州太爷传唤你，不说也该知道。”李时珍说：“难道是害了什么病吗？”马三说：“太爷福体康泰，能有什么病？”“那么，他是想长生不老方啰？”李时珍鄙视地回答。“正是。哈哈，李时珍呀李时珍，你果然名不虚传，一下子猜中老太爷心病。走吧，给太爷效劳去。”马三说着催李时珍上路。李时珍说：“马大人，望你回禀，今夜除夕，实有不便，我先开个药方你带回去交差。说罢写了一个方子，交与马三带回。州官一看，药方是：“千年陈谷酒，万载不老姜，隔河杨搭柳，六月瓦上霜，连服三万七千年。”

蕲春县二里湖医院 83 岁老中医还向人们讲过一个李时珍《巧治苟县官》的故事。一天，两个官差来请李时珍去为县官苟步云看病。此人是当地一霸，人民恨之入骨。李时珍先为他切脉，然后说：“大人六脉正常，并无别的病，只是身体肥胖。将来恐有不测。”县官说：“只要你把我的病治好，要银有银，要金有金。”李时珍说：“我为人治病，向来不为报酬。只要求严格依

照我的处方治病就行。”“那就请你处方，我一定照服。”县官回答。李时珍说：“我的处方，一不服药，二不扎针，只有三件要求：（一）不吃鱼，不吃肉；（二）每天步行三十里，去民间走一走；（三）用高价收购穷苦农夫、车夫、轿夫、渔夫的破毡帽，烧成灰和蜂蜜煎成明芝明膏（谐音民脂民膏）.每天服用。”县官明知李时珍是在捉弄他，但也无可奈何，只得哼哼哈哈把李时珍打发走。

类似的传说很多。说明李时珍的思想品德，一直受到人们的崇敬，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人们一直怀念他同情贫苦大众，救死扶伤的高尚医德，以及不畏权贵，敢为人民申张正义的精神。

蕲州人民为纪念这位伟大的科学家，特将他同其有益于人民的三位后人长子建中、季子建木、孙子树初合称四贤，祀于乡贤祠。明亮宗天启甲子年（1624），为建四贤坊，坊表上刻“六朝文献，两镇干城”赞语。明末清初文学家蕲州顾景星为四贤作传，载《白茅堂诗文集》；清代《黄州府志·李时珍家传》详载四贤事迹。后来，四贤坊一度毁坏，清光绪乙巳年（1905）为之重立坊表，其故碑至今存湖北省蕲春县蕲州李时珍医院医史文献馆。

第三章走自学成才之路

在科学上取得光辉成就的李时珍，一未入高等学府进行深造，二无举世闻名的名师指点，三无完备的图书馆、资料室供他利用，全靠自己坚韧不拔的毅力，刻苦自学的精神，博洽经史，独立思考，一步一个脚印，踏实前进，终于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他是古代科学家中自学成才的典型之一，他的成功经验至今值得借鉴。

一、利用天然课堂

李时珍研究药物，是从观察他家乡的花鸟虫鱼开始的。蕲州城附近的自然环境是他研究药物学的天然大课堂。

明代中叶，李时珍出生的蕲州城，是个繁荣而美丽的城市。从南北朝到明代初期，蕲州一直是州、路、府级行政区划。蕲州城是府治和州治所在地。明代中叶的蕲州城里，设有藩署、学宫、书院，有主管湖北、江西、安徽数十城的下江防道，还有统兵 5000 人的蕲州卫。这“吴头楚尾，荆扬交汇之区”，俨然成为长江中游的一个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如此江防重镇，的确地势不凡，“背麟岗，面凤岭，大江襟于前，诸湖带其后，左控匡庐，右接洞庭”。（《蕲州志》）

蕲州城三面环水，两座小山耸立城内。靠东北的是麒麟山，儒学、文庙在其上，有茂林修竹；靠城西的是凤凰山，参天古木掩映着寺庙亭阁，荆王府就在它的南麓。《雨湖春潮》一诗，描述了这儿美丽的风光：

盈盈春水欲洗天，村里人家镜里悬。
青草岸平三月雨，绿杨堤锁一湖烟。
觅桥忽没滩头路，问渡新寻谷口船。
浊怪闹情属鸥鹭，终朝游水不知还。

蕲州城附近还有一些大小山岗，如大泉山、盘龙山、平顶山、北障山、龙峰山等；城郊有方圆二三十里的大湖——雨湖。在这些山林湖水之中，生长着各种花草虫鱼、珍禽异兽，全是李时珍研究本草取之不尽的活标本。其中有土茯苓、山药、生地、益母草、蒲公英、甘菊、南星、苦参、半夏、紫苏、香附子、麦门冬、蕲艾、蕲竹、苍术；有野雉、鹌鹑、老鹰、云雀、竹鸡、野鸭，土蜂、蟾蜍、蕲蛇、蕲龟以及多种鱼类。这些植物和动物无不引起李时珍的研究兴趣。其中蕲艾、蕲竹、蕲蛇、蕲龟，号称蕲州四大特产，李时珍父子都对它们作过深入研究。蕲艾的特点是，叶与其他的艾叶不同，能被酒炙透，有较好疗效。李时珍的父亲专门研究艾叶，写成了《月池文叶传》。蕲竹，小者可作笛，故名笛竹，大者作簾，织成竹簾（席），人卧其上，凉爽宜人。在唐代，蕲竹簾是上等馈赠礼品。白居易曾将之赠与友人，写诗赞美道：

笛竹出蕲春，霜刀劈翠筠。

织成双人篔，寄与独眼人。
卷作筒中信，舒为席上珍。
滑如铺韭菜，冷似卧冰麟。
清润宜成露，鲜花不受尘。
通州炎热地，此物最关身。

——《寄篔与元礼》

韩愈收到友人赠的蕲竹篔，写了长诗《谢郑公惠篔》，盛赞道：“蕲州笛竹天下知，郑君所主尤瑰奇，携来当昼不得卧，一府争看黄琉璃。……青蝇倒翅蚤虱避，肃肃疑有清飏吹；倒身酣寝百疾愈，却愿天日常炎曦。”宋代苏东坡、明代王廷相等都写有称赞蕲州竹篔的诗篇。蕲蛇，本名白花蛇，因蕲州花蛇有特别药用价值，故称蕲蛇。李时珍研究白花蛇，写了《白花蛇传》。蕲龟，又名绿毛龟，因身上寄生绿色藻类，有奇特的观赏价值和药用价值。王廷相在《蕲民谣》中描写蕲龟说：“龟背生毛绿的，大如钱，贵如璧，养来盆中水凝碧。”（《嘉靖蕲州志》）

李时珍对蕲州的山林、湖泊中各种可供药用的动物、植物，或者就地观察，或者采作标本；有的加以解剖，有的移植宅旁药园中，仔细研究其生长规律；更常用的方法是向熟悉有关药物的老农、渔夫、樵夫进行调查访问，充分了解其特征、习性。

与上述自然课堂有联系的，还有另一个天然课堂，那就是蕲州城内的药市。蕲州城水陆交通方便，有大道贯通南北，是湖北、河南、安徽、江西四省交汇之地，诸省药材多在此交易。南北药材商人来往不绝，市上药材因时而异，不下数百种。李时珍正好利用这一药市，就地取材，并常常向药商了解各种药材的产地，生态特征，质量差异，生长规律，采集季节等问题。

李时珍从蕲州药市得到益处后，积累了经验，以后每到一个新地方，都少不了要探听当地药市情况，赶到药中进行调查。他先后到过黄州、武昌，从药材市场、药材商人那里得到不少意外的信息。许多远地难得的药材，往往通过这些渠道取得标本，获得有关知识。

利用自然界进行药物实际考察，当然不限于他的家乡。后来李时珍同徒弟庞宪曾到武当山、大别山和安徽、江西、河南、江苏等地进行过长期的药物考察。这是他在本草学上取得重大成就的关键性的一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闻名世界的大科学家，正是从这一草一木的观察研究开始的。在一个用心观察的医药家眼里，哪怕是山林水符的花草虫鱼，无不值得研究；穷乡僻壤的樵夫、农妇，无不可以为老师。

二、拜能者为师

李时珍自学成才过程中，得到他父亲和邻里师友的帮助，并不是全靠一个人在黑暗中摸索。他依靠长辈们在医药知识、文史知识上的指点，经过独立钻研，最后在科学上作出新的创造，大大超出他的师友们的意料。

李时珍在文化上和医学上的启蒙老师是他的父亲月池公。他是一个具有矛盾性格的人物，热心仕途而仕途失意，精于医术却鄙弃医业。

李月池之所以热心仕途，是当时社会环境造成的。他自幼学习儒家经典，“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十分浓厚。当时社会风气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眼看蕲州城内的顾、郝、冯、李四大名门，哪一家不是靠入学

中举的途径跻身官场的？李月池博通经史，一次再次参加乡试，终究未得高中，只好把光耀门庭的希望寄托到李时珍身上。

李月池的以医为业，显然是仕途失意后的被迫选择。他深知自己父亲一生当铃医，处处遭人白眼的辛酸。在封建社会里，医生同卜卦、看相的江湖术士一样，都被称为“下九流”人物，没有社会地位，横遭歧视。不过，李月池同他父亲毕竟大不相同。他中过秀才，饱读诗书，具有学术研究能力。他在业医过程中，写了好几部医、药学著作，如《医学八脉注》、《四诊发明》、《人参传》、《艾叶传》等。他医术高明，为人忠厚，颇受邻里称赞。到晚年，他终于被举为贡生，入京师当过太医院吏目，虽然只是一个下级医官职务，回到家乡人们不得不刮目相看。

李月池在蕲州城里，小有名气，出入于顾、郝等豪门，同顾家有着特殊亲善关系，这一点倒使李时珍后来也从中得到益处。

李时珍的父亲对他的教育影响，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一是灌输给他基本文化知识，特别是在准备科举考试时期；二是在医药学上对他进行基本理论和基本技术的教育，教给他从事药物学和医学的研究方法；三是在养成良好医德，善于处世待人方面，为他做出表率。还疏通了李时珍同顾、郝名门接近的关系。顾、郝二家对李时珍自学成才有着微妙的影响。

蕲州城中的四大名门，首户要数冯天驭，他曾官至刑部尚书；李儒一家，是世袭千户。这两家同李时珍家的关系不甚密切，缺乏文献记载。与李时珍家最密切的是顾家与郝家。

顾家是个大家族，明代中叶，正处于显达时期。其中名气最大的是顾问。顾问号日岩，嘉靖十七年（1538年）进士，时方18岁。比李时珍小3岁。后来官至福建参政，为官清廉，受到社会敬重。《蕲州志》说：“时天下诵慕，乃在公卿硕辅之上。”这虽属虚美之词，亦可反映此人确非贪脏在法之辈。其弟顾阙。号桂岩，亦进士出身。这两兄弟当时号称“二顾”，均属理学名家。

顾家居蕲州城东门外的全胜坊。家有大园林，园中有“流觞池”，上建仁寿堂，古洁高雅。顾家与其他名门不同，以养士著名，门下收养一些寒士，包括某些方技人物。二顾归隐后，常在家中聚会名儒，讨论学问，饮酒赋诗，一派风雅，宗室樊山王、名士周复、刘应元等乃座上常客，李月池亦在其中。顾日岩和顾桂岩兄弟常在蕲州城内阳明书院和崇正书院讲学，有生徒数百人，《蕲州志》称“天下向学之士赴蕲者项背相望”。顾问讲学时，李时珍也曾前去听讲，虚心向他请教，故顾家后代、清代文学家顾景星为李时珍写传时，称时珍“师日岩公”。其实他们的关系属师友之间。当李时珍将所著《奇经八脉考》送请顾问写序时，顾问不好称作序，谦称“引”，署名是：“同里日岩顾问顿首书”。突出“同里”关系，并以“顿首”自谦，显然顾问未以老师自居。特别是顾李二人到了晚年，情谊甚笃，常形影不离。传说顾问做梦都在同李时珍对诗。顾云：“远山隔林静”，李对：“明霞对客飞”。二人讨论学问，思想亦相投，《蕲州志》载，李时珍“与顾日岩晤言相证，深契濂洛之旨”。（《蕲州志》卷十一）李时珍从顾问那里受到的教益，主要是在文史知识、哲学思想方面。李时珍从顾家获得的帮助有两方面：一是“二顾”学识渊博，李时珍可同他们相互问难，共同切磋，增长才智；二是顾家有大量藏书，足供李时珍随意查阅。

蕲州城的郝家，也有两弟兄。兄郝守正，进士，官至怀庆知府。离官归

隐，组织编撰《蕲州志》。弟郝守道，好医术，曾游历京师、山东、江淮等地，广泛罗致医药著作，藏书甚丰富。他爱好医木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济世益民，纯粹在寄托雅兴，以利养生长寿。由于李月池同郝家常有往来，交谊较深，李时珍也受到郝家的器重，他家的医药藏书可供李时珍不时借阅参考，这对李时珍的研究工作无疑有很大帮助。李时珍善于虚心求教，也常与郝守道讨论医理、药理。他注意吸取别人之长，扩充自己的知识，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水平。郝守道无疑是李时珍自学成才的良师益友之一。

李时珍的师友肯定不只顾郝二家，从现有资料看，留下姓名的很少，对他自学成才有帮助的，再无从查考了。只有为《本草纲目》作序的王世贞，算是他的一位特殊朋友。

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凤洲，江苏太仓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官至刑部尚书。他比李时珍小8岁，但成名较早。才识渊博，是明代文人“后七子”之一，主盟文坛20年。任过湖广按察使。李时珍同王世贞初次见面是在万历八年(1580)九月，那是去请他为《本草纲目》写序。关于这次见面的情况，王世贞在《本草纲目序》和他的诗集中留下一些有趣的记载。在《序》中王世贞写道：“楚蕲阳李君东壁一日过予弇山园谒予，留饮数日，予窥其人，晬然貌也，癯然身也，津津

然谈议也。真北斗以南一人。”当时，李时珍已63岁，因操劳过度，身材枯瘦，面容憔悴，但精神饱满，谈话甚有风趣，给王世贞以不凡的印象。由于谈话很投合，留饮数日，并欣然同意为书作序。

有趣的是，王世贞对这位初次见面的朋友居然写了《赠李时珍诗》，同他开玩笑。诗前题词曰：“蕲州李先生见访之夕，即先师（按：指著名女道士昙阳子，死于1580年九月九日）上升时也，寻出所校定《纲目》求序，戏赠之。”原诗是这样：

李叟维肖直塘树，便睹仙真跨龙去。
却出青囊肘后书，似求玄晏先生序。
华阳真隐临欲仙，误注本草迟十年。
何如但附贤郎舄，羊角横抟上九天。

——《弇州续稿》卷十

诗的大意是说，李老头骨瘦如柴，好似直塘镇上的枯树，快成仙的样子，却还著书来求我写序。当年华阳陶真人（弘景），为了注《神农本草经》，耽误了10年成仙的机会。要是早将修本草的重任交与你家贤郎，岂不正好同我先师一道入仙境。诗中所说的“贤郎”，王世贞自注云：“君有子为蜀中名令。故云。”

为什么王李二入学术兴趣本不相同而又能一见如故，赠诗为戏呢？这不能不从他们谈话的内容上找原因。原来王世贞晚年隐居弇山园，自号弇州山人，对道家养生成仙之术很有兴趣，居然拜女冠昙阳子为师。昙阳子之死，他看作是升仙。自己也在研究仙丹，玩味《丹铅卮言》。撰写《弇山卮言》。见到《本草纲目》喜出望外。故在《本草纲目序》中写道：“予方著《弇山卮言》，恚博古如《丹铅卮言》后乏人也，何幸睹兹集哉。”《丹铅卮言》是谈道教炼丹的书，涉及许多炼外丹的药物，王世贞未必完全弄得清楚；不少炼丹药物，李时珍都有深入研究。载之于《本草纲目》。王李二人从昙阳子升仙，谈到仙丹木，由仙丹术深入到炼丹药物，显然谈得相当投机，互相引为知音，所以一见如故。王世贞对李时珍的科学成就的取得未必有什么帮

助，但他为《本草纲目》写的那篇有名的序，对此书的出版、流传无疑起着相当作用的影响。

李时珍自学成才过程，最值得效法的是他虚心拜知医识药的农夫、樵夫、药商、铃医为师的精神。在这方面虽然没有国下多少文献资料，却有不少动人的口头传说。不妨介绍一个《千里拜师》的故事，以见一般。有一年，蕲州城里一位四川商人来请李时珍看病。时珍一看，这是人们说的不治之症，估计活不了多久，怕他死在外乡，便开了一个药方，叫他路上服用，早日回川。不料，过了一年，那商人又来到蕲州，红光满面，身强力壮。李时珍一见，吃了一惊，忙问：“是哪位神医的仙丹妙药治好了你的病？”商人回答：“全凭你的药方，我才拖着病躯到了夷陵（今之宜昌）。遇到一位人称小华佗的医生，他问我可曾服药？我说是服了你给我开的方，好容易才到了夷陵。小华佗看了你开的药方，起初频频点头，继而摇头微笑。后来他在你开的药方上加了两味药。我服用这个药方，不到一个月，病就全好了。”李时珍听了，昼思夜想，不知是加了两味什么药，决定亲自去拜访这位名医。到了夷陵，他先不露身份，只诚心求小华佗收他为徒。他每天为小华佗磨墨、扫地，格外勤恳朴实，终于取得小华佗信任，然后才告诉他到夷陵拜师的由来。小华佗指出：“你下药虽有画龙之功，却无点睛之术。”于是告诉他那两味药和加这两味药的道理，李时珍满意地谢师而归。

三、刻苦读书

李时珍自学成才，一靠亲自进行药物调查，拜能者为师；一靠发奋忘食地刻苦读书。他认真地钻研了大量的古代学术著作，不断扩充自己的知识，提高自己的思想。所读的书有上千种。

李时珍家庭并不富裕，难于购置大量参考书。他读的书是从哪里来的呢？这是人们关心的问题。

他家几代人从医，父亲和他都是秀才，儿子成了进士，经济上虽然不很宽裕，但必要的经、史、子、集和医药书籍，只要蕲州、黄州、武昌所能买到的，他家还是买有不少。尽管很不齐备，毕竟为他编写科学巨著准备了常用的参考书。

自家的图书资料不多，只好向外借阅。他在楚王府和太医院期间，借阅到一些珍本。当年的王府，除受朝廷封赏土地、山林、钱财外，也受赏赐文物、图书。王公们附庸风雅，往往刻印图书互赠，所以王府里有不少珍贵图书，是市上买不到，民间看不着的。太医院虽是皇家御用医疗机构，因其太医多是世袭，故有责任对医家子弟进行医学专科教育，任命教师，规定课程，每季考试，所以那里有一定数量的藏书，有些也是坊间难得的珍本。不过，李时珍在楚王府和太医院工作时间不长，所能见到、读到的书是十分有限的，远远不能满足编撰科学巨著的需要。

李时珍一生主要时间的生活范围是在蕲州家乡。他所需要的大量图书资料，不得不靠当地解决。蕲州城里，私家藏书可供李时珍借阅的有顾、郝两家。李时珍所缺少而必须参阅的天文、地理、医学、药学、诸经注疏、稗官野史、诸子百家、笔记小说、神仙传奇等，多是依靠这两家慷慨提供。

李时珍为编撰《本草纲目》参阅了多少图书呢？根据他自己的统计，共有 800 多种，其中列有书目的为：历代诸家本草 41 种，古今医家著作 277

种，经史百家 440 种，还有 300 多种书属于间接引用。从这 800 余种著作，我们大体上可以了解李时珍自学读书及研究工作所涉猎的文化思想范围、读书方法以及他的整个知识结构的轮廓。

剖析一下他自学成才的读书方法，是有教育意义的。依据他自己总结的经验，参照他的读书目录，不难发现，他的读书方法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广泛涉猎。正如他自己所说：“上自坟典，下及传奇，凡有相关，靡不备采。”（《本草纲目序》中引李时珍语）顾景星的《李时珍传》也说：他的读书兴趣极为广泛：“凡子、史、经、传、声韵、农圃、医、卜、星、相，乐府诸家”，都刻意攻读。说他：“读书十年，不出户庭，博学无所弗窥。”李时珍的学问，的确不愧一个“博”字。他的“博”又是同“专”相结合的。

从本草著作来看，除《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唐本草》、《开宝本草》、《证类本草》等划时代重要著作外，《食疗本草》、《海药本草》、《救荒本草》、《本草蒙筌》等亦在研究之列。同类的书读过 40 余种，此可谓专中之博。

再看医学著作，《黄帝内经素问》、《灵枢经》、《伤寒论》、《金匱要略》等重要经典，固然为他所精读，至于张子和《儒门事亲》、李东垣《医学发明》、《脾胃论》、王海藏《医垒元戎》、朱丹溪《格致余论》等，也是他专心研究的必读书。《本草纲目》引据医家著作达 270 余种，既专且博，更是令人佩服。

第二，依类专攻。就是他说的“凡有相关，靡不备采”。上面所说的是博中求专，专不离博。“依类专攻”是指读书时十分注意各类著作的相关性。在每一个研究领域，凡能收求到的书籍，他都一一读述大有“一书不读，儒者之耻”的气概。不妨举两个方面为例。

李时珍决心批判道教长生成仙的思想，要着重分析道教宣扬的服食成仙的种种丹药。为此，他阅读的道教著作有数十种之多。葛洪《抱朴子》、《神仙传》、《肘后百一方》，陶弘景《登真隐诀》，孙真人《枕中记》，张三丰《仙传方》，邵真人《青囊杂纂》等，他都读过。为弄清道教炼丹术，读过许多炼丹书，魏伯阳《周易参同契》、独孤滔《丹房镜源》、东华真人《煮石法》、张果《丹砂秘诀》、肖了真《金丹大成》、昇玄子《伏汞图》、青霞子《丹台录》，还有《九鼎神丹秘诀》等。从这些书中，他一方面看出道教服食成仙之说的荒谬，一方面也吸取了其中有些药物的科学内容，《本草纲目》的矿物类药物，就引用过这方面的成果。

李时珍为研究植物类和动物类药物，阅读了许多有关植物和动物的著作，触类旁通，非常有趣。

有关植物的著作，他读过陆羽《茶经》、毛文锡《茶经》、韩彦直《桔谱》、蔡襄《荔枝谱》、欧阳修《牡丹谱》、刘贡父《芍药谱》、范成大《梅谱》、《菊谱》、陈翥《桐谱》、沈主《海棠记》、戴凯之《竹谱》、李翱《何首乌传》、李月池《人参传》、《艾叶传》、杨天惠《附子传》、《菖蒲传》等，以上著作都是就一种植物，或花、或草、或木进行单体研究；此外还有一些综合性著作，李时珍也一一研究，如周叙《洛阳花木记》、李德裕《平原草木记》、魏王《花木志》、王西楼《野菜谱》等。

关于动物的著作，他读过师旷《禽经》、黄省曾《兽经》、贾诚《马经》、王元之《蜂记》、朱仲《龟经》、《相贝经》、淮南八公《相鹤经》、袁达

《禽虫述》、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以及《蟹谱》、《异鱼图》等。

除连类相及、阅读许多动、植物著作外，对历代博物学著作，他也同样喜爱。读过张华《博物志》、李石《续博物志》、唐蒙《博物志》、杨孚《异物志》、房千里《南方异物志》、孟瑄《岭南异物志》、万震《南州异物志》，特别是对僧赞宁《物类相感志》，他读得相当认真，《本草纲目》多处引用其中资料。

第三，勤写笔记。李时珍同王世贞初次见面时，就介绍过自己的读书经验，“渔猎群书，搜罗百氏。……稍有得处，辄著数言”。（《本草纲目序》）他临终前交与儿子呈给皇上的《遗表》也说：“耽嗜典籍，若啖庶飴，考古证今，发奋编摩，苦志辨疑订误，留心纂述诸书。”（《进本草纲目疏》）李时珍读书有明确的目的性，不是一般地泛观博览，而是一边读书，一边思考问题。或从参考书中收集资料，以便“考古证今”，或根据不同著作的记载，进行“辨疑、订误”。总之，读书过程中，时时“留心”，务求“有得”，而且一旦有了心得，就随时笔记，决不轻易放过。正因为他是一个有心人，故每读一书，“辄著数言”，为编撰《本草纲目》积累了资料。博学深思，边读边记，这正是李时珍自学成才攀登科学高峰的成功经验。

四、培养助手

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李时珍编撰《本草纲目》，是一个巨大科研任务，如果没有得力助手，靠个人单枪匹马去干是难以完成的。

在封建社会里，完成私家科学研究项目，不可能靠政府部门给他配备助手。李时珍需要的助手，全靠自己培养。他的培养方法就是让助手们在科学研究实践中提高。

协助李时珍完成《本草纲目》的得力助手有两个，一是他的次子建元，一是他的学生庞宪。

建元，字不详。小时候中过秀才，为黄州府儒学诸生，学习期间由封建官府为他提供食宿费用。由于乡试未中，加之他父亲需要助手，就跟他父亲学医。医术比较高明。但根据李时珍学术研究工作的需要，在《本草纲目》完成之前，建元的任务是负责校订工作，同时为《本草纲目》绘制全部药图。

庞宪，字鹿门，蕲州人。民间传说他幼年患病，几乎死去，是李时珍救了他的命。长大就拜时珍为师。他对自己的老师十分尊敬。此人性格孤僻，但学习认真，工作踏实，对人诚恳，深受李时珍喜爱，常带他一起外出采药问方。庞宪对医学基本理论有较深造诣，《灵枢》、《素问》都有独到心得，后来成为名医。

李时珍对这两个助手花过苦功夫，耐心培养。他培养助手的指导思想和培养方法，有几点突出经验值得重视。

首先，要求他们认真钻研医药学基本理论。过去医生们流行一句口头禅：“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李时珍认为，作为良医，固然要靠丰富的临证经验，但熟读医药学基本文献也是十分重要的。要靠理论指导临证实践，不然岂不是盲人骑瞎马？所以他要求建元、庞宪认真钻研医学基本典籍。后来庞宪对《灵枢》、《素问》有独到见解，这不是偶然的。

其次，要求他们从药物的实际调查做起。古代流传下来的本草学著作很

多，往往互相矛盾：古人的观察分析，难免有局限和错误。李时珍决心重修本草，就是因为他已发现种种错误，再不纠正将贻害无穷。订正本草的基本功夫在于实地调查研究。李时珍身体力行，背着行囊，进入深山实地考调，向老农、樵夫、猎户请教。他也要求两个助手，照自己的榜样去作。在寻方问药过程中，庞宪同他真是形影相随，李时珍对他言传身教。他要求建无不只把药物生态特征笔之于书，尤其要画成药图，流传后世。《本草纲目》中1000多幅药图，无不是经过反复观察、比较，多次修改而成的。

更重要的是，要求他们掌握药物学的研究方法。药物很多，首先要加以分类，这就要求他们掌握各部、各类药物的基本特征，一一进行比较，熟悉分类方法。《本草纲目》中16部、60类药物，都是经过他们师徒三人反复比较研究，确定其部类的。除了比较分析方法，还要求他们掌握对每一种药物进行单体分析的方法。李时珍对药物的分析，列了气味、主治、集解、发明等八个方面，考核诸家异同，以求明体达用。两个助手，正是在他的严格要求下，逐步掌握这一套科学分析方法的。《本草纲目》是李时珍在他亲自培养的助手协助下，按照严密的科学研究方法，反复研究取得的辉煌成果。

李时珍自学成才的道路是艰苦的，没有像今天这样进高等学府深造的机会，就在医、药实践的大课堂里深造；没有名师指点，就虚心拜能者为师；没有完善的图书资料，就千方百计四处寻求。工作艰巨，没有助手，就自己培养。不难想象，在科学道路上，每前进一步，他都要克服种种困难。“有志者事竟成。”李时珍正是踏着自学成才的艰苦道路，百折不挠，终于取得了成功。

第四章明代药王对 本草学的发展

李时珍以毕生的精力研究医学、药理学，为祖国医学和药学的发展都作出卓越贡献。他博览群书，批判地汲取历代医药学成果，总结他家祖孙三代的医药实践经验，在医学和药学两方面都有独特建树。他对中药学的贡献尤为卓越，创立了先进的中药学体系，按照这一体系写成了中药学巨著——《本草纲目》，人们尊称他为明代药王。他治医药于一炉，结合方药论医理，结合医诊论方药，论医论药，相得益彰，发千古之秘奥，阐岐黄之精微。

李时珍撰写《本草纲目》经过艰苦的历程。多年深人民间进行药物调查，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还广泛参考历代本草著作，和其他有关著作。”渔猎群书，搜罗百氏。”“岁历三十稔，书考八百余家，稿凡三易。”（转引自王世贞《本草纲目·序》，校点本第一册，第17页）不难想象，李时珍广泛参考历代医、药学著作，旁及经史百家，耗费了何等巨大的精力。李时珍开列的参考书目中，历代本草著作有《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唐本草》、《蜀本草》、《开宝本草》、《图经本草》、《证类本草》、《救荒本草》、《食物本草》等41种。参考历代医学著作有《黄帝内经素问》、《灵枢经》、《伤寒论》、《金匱要略》、王叔和《脉经》、张子和《儒门事亲》、张洁古《医学启源》、李东垣《医学发明》、王海藏《医家大法》、朱丹溪《格致余论》等271种。参考经史著作有《春秋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后汉书》、《通鉴纲目》等。参考科学著作有郭璞《山海经注》、酈道元《水经注》、张华《博物志》、贾思勰《齐民要术》、沈括《梦溪笔谈》、王桢《农书》等。总共直接参考的著作758种。《本草纲目》的基本特点，正如他的儿子所说的：“上自坟典，下至传奇，凡有相关，靡不收采，虽命医书，实该物理。”（李建元《进本草纲目疏》，校点本第一册，第24页）

为了创立本草学的新体系，李时珍对历代有影响的本草著作，一一作了分析，扬其所长，避其所短，纠其谬而补其缺，做到全局在胸。南朝医学家陶弘景所著《本草经集注》，是本草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此书在《神农本草经》365味药的基础上，增加了汉魏以来名家所用新药365种。开始对药物进行分类，每类之下仍分三品。李时珍评论道：“此书颇有裨补，亦多谬误。”（《历代诸家本草》校点本第一册，第2页）唐代苏恭主持修订的《唐新本草》，将药物重加分类，附有药图和《图经》。李时珍经过认真研究，评价说：“苏恭所释虽明，亦多驳误。”（校点本，第一册，第3页）他批评宋代掌禹锡、林亿等人主修的《嘉祐补注本草》说：“其书虽有校修，无大发明。”（同上书，第一册，第7页）批评苏颂撰的《图经本草》说：“考证详明，颇有发挥。但图与说异，两不相应。或有图无说，或有物失图，或说是图非。”（同上书，第一册，第8页）李时珍比较器重的是宋徽宗时蜀医唐慎微编纂的《证类本草》，此书图文并茂，并有附方。李时珍虽批评此书“夷考其书，疵瑕不少”，但仍肯定编者的功劳：“慎微寝陋而学识博，使诸家本草及各药单方，垂之千古，不致沦没者，皆其功也。”（校点本，

第一册，第8页）李时珍评判诸家本草，目的在坚定自己的创造精神。《本草纲目》正是在批判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修订完成的。

一、编撰《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继承祖国 2000 多年来的本草学传统，总结李时珍长期医药实践经验，作出创造性贡献，为本草学的发展树立了光辉里程碑。

为了正确地评价《本草纲目》在药物学史上的地位，不可不了解本草学发展的历史概况。

我国本草学的发展，从药物品种的增益和药物分类的改进上看，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以《神农本草经》为代表。此书有人说它成书于秦汉之际，有人说它成书于东汉。作者姓名不详。原书失传，今所印行的是清人辑本。此书载药只有 365 种，不分玉石、草本、禽兽等类，只分上、中、下三品。三品的区别是按药物功能性质划分。“上药 120 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中药 120 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无毒有毒，斟酌其宜。”“下药 125 种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多毒，不可久服。”“三品合 365 种，法 365 度，一度应一日，以成一岁。”（《神农本草经名例》，校点本第一册，第 44 页）三品分类法，是对秦汉时期的药物知识的总结。当时药物数量不多，三品分类法，未按药物的科学分析与应用，反映了医药发展的初级阶段人们对药物的认识水平。

第二阶段，从《本草经集注》到《证类本草》，四五百年间，药物分类既有新的突破，又有旧的纠葛。

《本草经集注》——南朝梁陶弘景撰。《本草纲目·历代诸家本草》将此书标为《名医别录》，今据敦煌残卷本改正。此书载药 730 种，恰比《神农本草经》载药增加一倍。突出的贡献是首创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食、有名未用等七部分类法。不过在每部之下仍将药物分上、中、下三品。这是两种分类法并存的开端。

《唐本草》（或《新修本草》）——唐代医学家苏恭（又名苏敬）等 20 余人于 659 年（唐高宗显庆四年）完成，载药 850 种，比《本草经集注》增加 115 种。此书是在封建政府支持下，普查全国药物，总结历代本草文献，绘制药图，编纂成功的。药物分类也有改进。书成由朝廷颁布通行天下，不久流传海外。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公布的药典。

《证类本草》——全名《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本草纲目》问世前最完善的本草著作。它由宋代医学家唐慎微于北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将《嘉祐补注本草》和《图经本草》二书合编而成，博采经史百家有关本草论述，起初载药 1558 种，附方 3000 余首。经过四次修订，到 1249 年《南宋淳祐九年）的《重修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已载药物 1746 种，达到宋代药学最高成就。《证类本草》的编撰体例是：首标药名，下附药图（不少药未附药图），用大字说明其性味，有毒无毒，讲其主治，收采季节，炮制方法、产地、形态，下用小字汇集诸家注释。全书以朱书分条刊载《神农本草经》内容，以墨书记后代论述。正文有大字小字之别。而未分栏目，且过于简略，不易通考诸家发明。

《本草纲目》的创立，使药物分类进入更加科学化的第三阶段。它的特

点可从《本草纲目》的名称上反映出来。其科学体系结构的基本特点是：以纲带目，纲举目张。

李时珍把 1892 种药物，按照自己建立的科学体系，作了精心安排，博而不繁，条理清晰，结构谨严。贯彻全书有三个纲目系统，掌握了他的纲目体系，要检索某一味药，了解它的产地、性状、主治、修治方法，就如同从《辞源》中查找一个词条一样简便。

它的三个纲目是：（一）以部为纲，以类为目；（二）以类为纲，以药为目；（三）以药为纲，以八项分析力目。现分述如下。

（一）以部为纲，以类为目

李时珍首先把 1892 种药分为 16 部。

16 部的名称和顺序是：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服器，①虫，②鳞，③介，④禽，⑤兽，⑥人。

这种分类方法的优点首先在于暗中贯彻了三大部类的分类原则。先分无机物和有机物，有机物中分动物与植物。

无机界——水、火、土、金石四部；

植物界——草、谷、菜、果、木、服器（植物制品）六部；

动物界——虫、鳞、介、禽、兽。最后列人部，共六部。

这种分类原则有深刻的哲学思想作指导。《本草纲目·凡例》阐述其指导思想说：“首以水、火，次之以土，水火为万物之先，土为万物之母也。次之以金、石，从土也。次之以草、谷、菜、果、木，从微至巨也。次之以服器，从草、木也。次之以虫、鳞、介、禽、兽，终之以人，从贱至贵也。”

在无机物中，先列水、火，而不先以玉石，符合金元以来医学界五行尊水火的基本观点。水火对维持生命最为重要；其次是土，人和万物生长都靠土。金石出于土中，故应列于后。

在植物中，草、谷、菜属本草，果、木属木本，表明先有低级植物，后有高级植物，即“从微至巨”。服器属于草木制品，归属于后，理所当然。

在动物中，由虫到兽，从无脊椎到有脊椎，由低级动物到高级动物。人居最后，从生物学上看是最高等的动物，此即“从贱至贵”的原则。这种排列次序，实质上包含着生物进化论思想因素。16 部分类，只是一个大纲。每一类仍过于庞杂，例如草部共有 439 种（附录、有名未用除外），仍不易掌握。李时珍进而创立 60 类分类法，每部之下，再细分若干类，使纲目更加清晰。

60 类的名称和它所属的部如下：

水部——天水、地水	2 类
火部——火类	1 类
土部——土类	1 类
金石部——金、玉、石、卤石	4 类
草部——山草、芳草、隰草、毒草、蔓草、水草、石草、苔草、杂草、有名未用	10 类
谷部——麻麦稻、稷粟、菽豆、造酿（指谷物制品）	4 类
菜部——葷辛、柔滑、蓴菜、水菜、芝栢	5 类

果部——五果、山果、夷果、味果、蓂类、水果	6类
木部——香木、乔木、灌木、寓木、苞木、杂木	6类
服器部——服帛、器物	2类
①虫部——卵生、化生、湿生	3类
②鳞部——龙类、蛇类、鱼类、无鳞鱼类	4类
③介部——龟鳖类、蚌蛤类	2类
④禽部——水禽、原禽、林禽、山禽	4类
⑤兽部——畜类、兽类、鼠类、寓类、怪类	5类
⑥人部——人类	1类

有了60类的划分,人们对药物类别的了解更进一层。草部的山草、隰草、水草、石草,按草的生长环境划分;芳草、毒草,按气味、毒性划分;蔓草按形态划分。果部的山果、水果,按生长环境划分;蓂果,按性质划分。木部的乔木、灌木、苞木,按形态划分;香木,按气味划分。禽部的山禽、水禽,原禽、林禽,按栖息环境划分。兽部的畜与兽,按家养与野生划分。

按照60类的划分,知道药物的名称,就大体可了解其所属部类;掌握了部类,也易于检索药物。《本草纲目》自第5卷至52卷所载药物,就是按这种以部统类的纲目划分的。

李时珍按照“析族区类”的分类原则,在类之下,还分有若干族。为了避免烦琐,书中没有标明族的名称。在植物类药物中,这种族的归纳容易为人所觉察。亲缘关系相近的植物往往排列在一起。例如草部芳草类,廉姜、山姜、豆蔻、姜黄、郁金等属姜科植物;草部芳草类,菊、野菊、艾、千年艾、青蒿、白蒿、黄花蒿等都是菊科植物;果部山果类,梨、棠梨、木瓜、山楂、林檎、枇杷、樱桃等都属蔷薇科植物。

《本草纲目》中植物药居多,其中草部8类,谷部3类,菜部5类,果部6类,木部5类。五部共计27类(杂草、有名未用、造酿、杂木四类未计人)。五部27类的植物分类法,较之西方植物分类学鼻祖林奈1755年创立的两类24纲(显花植物、隐花植物两大类,显花植物中分单雄蕊、双雄蕊、三雄蕊等23纲)分类方法,不但早100多年,还富有实用科学价值。

现代药物家进行生物化学研究的结果表明:果部的李、杏、梅、榔梅、桃等,都是蔷薇科李属植物,其种仁都含有氰甙化学成分,具有镇氮、祛痰效用。桔、柑、柚、金桔等都是芸香科柑桔属植物,其果皮均含有黄酮类有机化学成分,具有理气、化痰功效。李时珍虽然没有也不可能认识用植物所含的化学成分作为分类的根据,但其分类法却对今天进行药物化学分析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 以类为纲,以药为目

将1892种药物分入60类,这是一项十分复杂而细致的工作。立部、立类,在分类学上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创造,因为它是对前人药物分类思想的巨大突破。《本草纲目》废除三品分类法,建立16部60类分类法,纲举目张,全书结构井然有序,使中药分类学面貌一新。以往分类法中,药物归类,存在不少严重缺点。正如李时珍指出的,“或一药而分数条,或二物而同一处;或木居草部,或虫入木部;水、土共居,虫、鱼杂处。……名已难寻,实何由觅。”(《本草纲目》卷一,《神农本草经名例》)那种归类法,不只药物

的名称在书中难以寻觅，而且容易造成对药物性味、主治的错误判断。李时珍的儿子李建元在《进本草纲目疏》中，列举了以往本草著作在药物归类上的许多错误，指出：“生姜、薯芋，菜也而列草品；槟榔、龙眼，果也而列木部。……黑豆、赤菽，大小同条；硝石、芒硝，水人混注。……酸浆、苍朮，草菜重出，掌氏（禹锡）之不审；天花、栝楼，两处图形，苏氏之欠明。五倍子，构虫窠也，而认为木实：大蘋草，田字草也，而指为浮萍。”（校点本第一册，第23页）这些错误，李时珍详加调查、比较，反复研究，一一作了纠正。虽然《本草纲目》也难免存在以正为误的地方，如南星与虎掌，本非一物而视为一物；独活与羌活，本不同种而视为同种异产，但它比起先前的本草著作，却更加接近现代的科学认识。

（三）以药名为纲，以八项分析为目

《本草纲目》按郭沫若同志的说法，实际上是“1892种药物说明”。所谓“说明”就是对每种药物的气味、主治、修治、发明等内容作出科学论述。李时珍对药物论述的方法，同以往本草著作不同，有着自己的基本结构。每药标一总名，就是立一大纲，下面分某些项目，逐项论述。各种药名下所列的项目，或五项或七项不尽一律，通观全书，基本上有八个项目。表明李时珍是从八个方面对药物进行分析的。八个项目的名称和内容是这样：

（1）释名——解释药物命名的由来，指出除了总名外，还有不少别的名称。同一药物往往有多种名称，如不论列清楚，极易发生错误。如茈胡即柴胡，又名地熏、芸蒿、山菜、茹草。地黄又名苕（音户）、芑（音起）、地髓。

有些药名列有“正名”一项，同样是考证药物名称，纠正错误的命名。

（2）修治——记述该药采集的季节，炮制的方法，特别指出由于不同的修治方法，同一药物将有不同的气味、主治，归经也有区别。

（3）气味——论述药物的四气（寒、热、温、凉）、五味（辛、酸、甘、苦、咸）、有毒无毒的性质区别，以及经过炮制后引起的气味变化。

（4）主治——论述药物的功效，列举其可能主治的各种疾病。区分内服、外用，论其或补或泻，或调气或散热等等。其中总结有前人的经验，也有李时珍亲身体会。

（5）集解——列举诸家本草关于药物的详细说明，讲明出产的地域、药物的形状、同类似药物在形态上的区别、采收的季节和方法等。这部分论述中，李时珍并不盲从前人，常常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

（6）发明——对药物主治功效的具体阐发，往往列举生动的医案或医话，给人以深刻印象，帮助人们对药物的功效有透彻的了解。李时珍在这一项目中，经常谈到自己的切身体会，对前人的经验，也往往加以独到的评论。他的哲学思想、无神论思想、科学方法论，常在“发明”和“集解”这两项中阐发出来。

（7）辨疑、正误——辨析前人论断的可疑之处，纠正前人的某些错误。全书所列“正误”只有70余条，或纠正药物名称的错误，或纠正出产、形态方面的错误，或纠正气味和主治方面的错误。李时珍坚持科学态度，毫不含糊。

人们对药物的认识，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或地理环境的影响，难免产生

种种误解。单从各种本草文献上考察，关于某种药物的名称、品类、形态、气味、主治的论述，往往互有矛盾，错误是相比较而发现的。李时珍既广泛考察诸家本草的论述，又深入进行实物考察，以临证经验和亲身尝试为根据，校订旧说，去伪存真，发表自己的科学论断。但《本草纲目》也难免有误，如番木鳖有剧毒，误记为“苦寒无毒”。

(8) 附方——结合药物的主治范围，列举他当时所能收集到的全部方剂。有经方、时方，大量的单方、验方，大大增强了《本草纲目》的实用价值。

《本草纲目》建立 16 部 60 类的分类纲目，是对药物进行宏观分析的成果；列气味、主治、修治等八个项目，是对每种药物进行微观分析的方法。二者有机结合，成为《本草纲目》编撰方法的两大基本特征。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凡例》中阐明自己设立八个栏目的指导思想说：“诸品首以释名，正名也。次以集解，解其出产、形状，采取也。次以辨疑、正误，辨其可疑，正其谬误也。次以修治，谨炮炙也。次以气味，明性也。次以主治，录功也。次以发明，疏义也。次以附方，著用也。”“诸物有相类而无功用宜参考者，或有功用而人卒未识者，俱附录之。”

特别是其中“气味”、“主治”、“发明”诸栏，凝结着李时珍对医学、药学期研究的心血，继承了历代诸家本草的精华，又加以独到的补充和阐发。李时珍从药物的生长、采集、炮制，到对其气味、归经、主治的研究，不少地方都有新发展、新贡献。李时珍的哲学思想，多从“发明”、“集解”等栏透露出来，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二、发明新药 丰富药性

李时珍对中药学不可磨灭的贡献，还在于他发现了 374 种新药。李时珍选作范本的《证类本草》，载药 1746 种，其中有一药两名，有的有名未用。去其重复与未用者，两相比较，《本草纲目》实际比《证类本草》新增药物 374 种。金石部增加 26 种，草部增加 86 种，果部增加 34 种，虫部增加 26 种，鳞部增加 28 种，其他各部新增数种或十多种。这些新增药物，有的考自历代本草中有其名未列专条论述者；有的直接从民间收集而来。李时珍新加的药物，有一些已成为今天的常用药，如土茯苓、半边莲、淡竹叶、丝瓜、三七、紫花地丁、番红花（即藏红花）、樟脑、白蜡、曼陀罗花、九仙子、虎耳草等。他对这 300 多种新药的研究论述，有首创之功。不可讳言，服器部有些新增药物实属谬误。如“上元盗取富家灯盏，置床下，令人有子”等。瑕不掩瑜，《本草纲目》对本草学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是卓著的。

李时珍是卓越的医药实践家，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同时也是卓越的医药理论家，善于作理论分析和探讨。《本草纲目》不少地方对药性理论有重要发展。李时珍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对古代名家在药性论断上的矛盾，详加分析订正：对有些药物的气味，前人未加论述者，作了弥补；对有些药物的功效，根据新经验作了新规走。特别是发展了药物归经理论，用自己的临证经验，确定或补充了药物在六经中所归之经，并重视属气、属血的区分。还总结药性升降浮沉的变化规律，强调人们可以通过改变药物的升降浮沉之性，以适应临床需要。李时珍对药性的充实与发展，大大提高了本草著作的临证指导作用。

三、增广百病主治药

百病主治药，前代医家曾有研究，李时珍加以扩充完善，列为《本草纲目》第三、四卷的内容。他同样运用纲目结合的原则，立病证为纲，列主治药物为目。共立 113 项病证，包括内科、外科、儿科、妇科、五官科等：每项病证下面列举数种以至数十种主治药物，以供医家临证选用，按病查药，一目了然。可供研究，可应急需，科学性与实用性紧密结合。《百病主治药》实际上是一部独立的医学著作。其所以将这一部分编在《本草纲目》正文的前面，主要是为了促进医药结合。它同《本草纲目》的体系相为表里。《本草纲目》的论述方法是就药论治，以药为纲；《百病主治药》的记述方法是就病证论药，以病证为纲。二者结合，就药论治，按证寻药，实为完璧。

四、汇编《濒湖集简方》

李时珍善于结合本草研究方剂，每味药物之后，特辟“附方”一栏。《本草纲目》较之《证类本草》，新增了单方、验方 8000 多个。李时珍在访药过程中，同时注意采方。凡渔夫、车夫、猎夫、村野老妪所知道的单方、验方他都广泛收集。传说他给穷苦人治病时，可以不收钱，患者如果向他提供一个、二个单方，就认为是最好的报酬。李时珍曾经将他收集到的药方，专门编成一部方书叫做《濒湖集简方》。此书虽已失传，《本草纲目》“附方”一栏，可以说将其内容基本上保留下来了。《本草纲目》共附 11000 多方，比附有 3000 多方的《证类本草》超出两倍以上。其中包括的方剂可大体分为四类：一是张仲景《伤寒论》、《金匱要略》等古代经典方书中所载的“经方”；二是金、元以后流行方书中所载的“时方”；三是更多地广泛流传民间、治疗某种疾病的常用“单方”；四为临床应用有特效的“验方”，乃至民间祖传“秘方”。有人统计，其中以“单方”为最多，经方、时方所占比例极小。这是《本草纲目》附方的一大特色。其所以具有这一特色，是由于李时珍出身平民，与各方面群众有广泛联系，能征集到民间大量单方、验方，将其集中起来，笔之于书。所列的 1 万多个药方，可说是我国劳动人民数千年来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结晶。《附方》集 16 世纪以前医方之大成，具有极大实用价值。有些方剂至今仍是制造各种中成药的根据。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对祖国药物学的贡献，举其大者约有四端：一是创造了药物分类的纲目体系，革新了本草学；二是对 1800 多种药物作了深入研究，发展了药物学内容；三是增加 300 多种新药，充实了药物学宝库；四是结合本草研究方剂，体现着医和药的紧密结合，理论和实践的紧密结合。既有深远的理论价值，又有显著的实用价值。每一个方面都是他在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艰苦的科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

第五章 医中之圣对 传统医学的贡献

历代名医，不一定是本草学家；著名的本草学家，大都是名医。李时珍首先精通医术，有着丰富的临证经验，后用更大精力从事本草研究。因此，在论述药物特性时，处处结合论述医理，并通过大量医案、医活阐发医学奥秘。《本草纲目》是药学巨著，又深含医学内容；既论药，又论医，是医药结合的宝典。李时珍在编撰《本草纲目》过程中，还劳心苦思，写成了六部医学著作。关于脉学的有《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脉诀考证》；关于三焦、命门理论的有《三焦客难》、《命门考》；还有关于临证医疗经验的《濒湖医案》。现只存前面三部著作，后面三部著作虽已失传，但其部分内容可从《本草纲目》中考知。《本草纲目》所包含的医学思想，不像药理学那样容易为人掌握，但其包含的医学理论却是十分深刻的。为了使人们在研究药理学时具备必要的医学知识，李时珍别出心裁，特地编纂《序例》两卷，冠于全书。《序例》的内容，可从两种角度加以研究。从本草学角度看，它引导人们研究药物的采集、修治方法，了解药物的性味、归经，及如何改变药性的方法；注意相反诸药，及各种药物的禁忌等。从医学角度看，它引导人们紧密地结合药物的基本特性，正确地辩证施治；论述用药的基本理论，如七方、十剂、四时用药例、五运六淫用药式、脏腑虚实标本用药式、李东垣随证用药凡例、陈藏器诸虚用药凡例、张子和汗吐下三法等。《序例》以简要的论述前人经验为主，不少地方作了创造性发挥。总之，《序例》要求良医必须是随证施药，知药论医得心应手的行家。《序例》从形式上看，它是摘取前人医药理论的精华，实际上凝聚着李时珍医学心得结晶。

李时珍在医学上的贡献，举其卓著者约有以下四端。

一、《濒湖脉学》与《奇经八脉考》

切脉是传统医学的一种特殊手段，在世界医学史上独树一帜。切脉方法，已有数千年发展史，历代医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留下了不少脉学专著。但脉学中存在的问题很多，不少问题颇有争论。李时珍批判地继承历代医家的脉学思想，结合自己的临证实际经验，从两个方面对它作了充实和发展。

第一个方面，充实发展脉学理论体系，撰写脉学指南——《濒湖脉学》。

脉学发端于《黄帝内经》。《素问》的《脉要精微论》、《经脉别论》、《阴阳脉解》、《脉解篇》、《三部九候论》等篇；《灵枢经》的《经脉》、《经别》、《动输》、《根结》等篇，都对脉候作了开创性论述。后来有人假扁鹊（秦越人）之名，作《难经》，对《内经》中的脉法、经络，以问答形式加以阐发，因此扁鹊被称为脉学之祖。司马迁说过：“天下至今言脉者，由扁鹊，盖论脉莫精于《难经》。”（《史记·仓公扁鹊列传》）汉代名医张仲景撰《伤寒论》，谈到的单见脉象有数十种，复出脉象上百种，学者不易掌握。晋代名医王叔和（约170—255年）撰《脉经》一书，将上述散见的脉学论述，加以系统整理，定出浮、芤、洪、滑等24种基本脉象，对每种脉

象作出简单明确的诠释，成为后世研究脉学的经典根据。

从《脉经》问世到李时珍时代，千余年间，脉学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道路。总的看来，在理论体系上，没有大的突破。六朝时高阳生用歌诀形式编写了《脉诀》（《王叔和脉诀》），托名王叔和撰，该书误错很多，却风行一时。宋代朱熹和元代戴同父等人对之严加批驳，因该书采用歌诀形式，易诵易记，仍流行不衰。这种状况一直继续到李时珍的父辈。李时珍的父亲在其所著《四诊发明》中，对《脉诀》的错误曾予以纠正，并对宋代崔紫虚（嘉彦）用四言诗写的《脉诀》（《崔氏歌诀》）加以修改。李时珍继承并发展他父亲的思想，用七言体写成二十七脉的《体状诗》、《相类诗》、《主病诗》和《分部诗》。在《濒湖脉学》题词中，他谈到写此书的宗旨和经过说：

宋有俗子，杜撰《脉诀》。鄙陋纰谬，医学习诵，
以为权舆；逮臻頹白，脉理竟昧。戴同父曾刊其误：
先考月池翁著《四诊发明》八卷，皆精诣奥室，浅学
未能窥造。珍因撮粹撷华，僭撰此书，以便习读，
为脉指南。

李时珍撰《濒湖脉学》，除了基于上述《脉诀》鄙陋，脉理竟昧；月池翁所著，浅学不易窥造这两个原因外，实际上还由于长期以来医家的临证经验对脉学已有所发展，急待认真加以总结，用新的科学内容去充实《脉经》，建立新的脉学体系。王叔和撰《脉经》的旨趣，主要是由繁入简，从《内》、《难》中数十，以致上百项脉象中，去其重复，选其重点，归纳为二十四脉。以简御繁，这当然是对脉学的重要发展。实践表明，到了明代中叶，二十四脉已不足以概括《内》、《难》以来切脉的基本经验。李时珍决然把脉象发展为27种，新增长、短、革三种，并将二十四脉中的革脉订正为牢脉。此外，流行的《脉诀》对脉与脉之间的联系缺乏逻辑系统，次序比较紊乱。李时珍按对立统一原则，将相反相成的脉象，如浮与沉、迟与数、滑与涩、虚与实、长与短、洪与微、紧与缓，……比邻排列，便于人们前后比较，仔细琢磨其间的区别与联系，较之《脉经》排列顺序更为科学。李时珍继承宋代崔嘉彦的脉学思想，突出浮、沉、迟、数四脉，更具有深刻用意。他主张：“浮、沉、迟、数，脉之纲领。”李时珍将原来二十四脉发展为二十七脉，其旨趣在于由简单而充实，发展已有经验；进而从二十七脉中突出浮、沉、迟、数四脉，则是以简驭繁。便于掌握纲领。这样就恰当地处理了博与约、繁与简的辩证关系。在脉象的分类上，李时珍也作了新的发展。《内》、《难》和张仲景都只分阴脉与阳脉，高阳生的《脉诀》将二十四脉分为三类：七表脉（浮、芤、滑、实、弦、紧、洪）；八里脉（微、沉、缓、涩、迟、伏、濡、弱）；九道脉（细、数、动、虚、促、结、代、革、散）。李时珍反对七表、八里、九道说，推崇《内》、《难》，但又不拘泥于阴阳二分法。他首创二类四分法，即八阳脉（浮、数、实、长、洪、紧、动、促）、十五阴脉（沉、迟、涩、虚、短、微、缓、革、濡、弱、散、细、伏、结、代）、三种阳中之阴脉（滑、芤、弦）、一种阴中之阳脉（牢）。《濒湖脉学》仍以阴阳类脉，不违《内》、《难》以来的医学原理，又首创四分法，提高了脉学的实用价值和科学性。既有批判继承，又着重于新的创造。

《四库全书提要》称赞《濒湖脉学》的功绩说：

宋人剽刻王叔和《脉经》，改为《脉诀》。其书之

鄙陋，人人知之，然未能一一驳正也。……李时珍
乃撮其父言闻《四诊发明》，著成此书，以正《脉诀》
之失。其法兮浮、沉、迟、数、滑、涩、虚、实、
长、短、洪、微、紧、缓、乳、弦、革、牢、濡、
弱、散、细、伏、动、促、结、代，二十七种，毫
厘之别，精核无遗。自是以来，《脉诀》遂废，其廓
清医学之功，亦不在戴启宗（同父）之下也。

为便于初学与记忆，《濒湖脉学》仍以歌诀形式表述。科学的内容，辅
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大受后人欢迎。清人林之翰在其《四诊抉微·凡例》中
称赞此书说：“切诊，前人往往编成歌，以括其要，无非便初学之诵读，由
浅入深也。诸家歌诀，未惬人意，惟李濒湖《脉学》，包括义理，可称美善，
固为诸家之翘楚。”《脉诀考证》一书，只 2000 余字，主要在考证《脉诀》
非王叔和著作，并驳斥七表、八里、九道的分类说法。

李时珍对脉学贡献的第二个方面，是发幽阐微，研究奇经，而写出《奇
经八脉考》。

祖国医学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全靠经络系统来交通脏腑、
营卫、血气。经络之中，有正经，还有奇经。《内》、《难》、《伤寒论》
等医典，对正经的阐述比较清楚，于奇经则语焉不详。奇经对人体的作用，
它的分布路线，以及同正经的关系等问题，以往医家都缺乏系统论述。王叔
和的《脉经》着重论述正经，而略于奇经。李时珍在研究脉学过程中，对奇
经尤为留意，这是他的又一项开拓性科学研究。

李时珍将散见于《内》、《难》等医典中关于奇经的论述作了深入研究，
系统整理，对历代医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问题，进行精心考辨，根据自
己的实践经验，作出详细论述，从而使人们对奇经有了完整系统的认识。奇
经八脉的名称是：任、督、冲、带、阳跷、阴跷、阳维、阴维。人身的十二
经脉，每一经都与一脏或一腑相通，有了病可通过两手寸、关、尺部不同的
脉象反映；奇经八脉则不然，除任、督、冲三脉起于少腹胞中外，多不同脏
腑直接相通，其脉象与十二正经很不相同，需要医家采取特殊的诊察方法，
方可判别。《奇经八脉考》，是李时珍总结整理出来的关于奇经的特殊切诊
方法。为了便于人们掌握脉理，李时珍还绘有《气口九道脉图》附于《奇经
八脉考》后。关于绘此图的目的，他说：“奇经之脉，世无人知。今撰为图，
并附其说于后，以泄千古之秘藏。”

《四库全书提要》赞扬这种著作说：

《奇经八脉考》一卷，明李时珍撰。其书谓人身
经脉有正有奇。……正经人所共知，奇经医所易忽。
故特详其病源、治法，并参考诸家之说，荟粹成编，
其原委精详，经纬贯彻，洵辨脉者所不可废。又创

为《气口九道脉图》发《内经》之旨，而详其诊法。尤
能阐前人未泄之秘。

关于奇经八脉同十二正经的关系，李时珍经过深入研究，也作了明确的论述。他说：“盖正经犹乎沟渠，奇经犹乎湖泽。正经之脉隆盛，则溢于奇经，故秦越人比之天雨下降，沟渠溢满，霏濡妄行，流于湖泽。”可见研究奇经对于掌握正经是十分重要的。

虽然奇经多不与脏腑直接相通，它对于调节脏腑的机能。维持人体生理机能的内在平衡，对于疏通经络之气，有不可取代的特殊作用。李时珍说，经络之气，周流全身，”阴阳相贯，如环无端，莫知其纪，终而复始，其流溢之气，入于奇经，转相灌溉，内温脏腑，外濡肤理。”不难看出，奇经同正经、脏腑、营卫息息相通，组成人身整体结构，维持脏腑机能的稳定平衡，故李时珍在《奇经八脉考·总论》中阐明奇经的重要性时指出：“医而知乎八脉，则十二经、十五络之大旨得矣。”反之，“医不知此，罔探病机”。

奇经八脉同十二经脉的诊断方法大不相同，《濒湖脉学》中有所概述：

奇经八脉，其诊又别。直上直下，浮则为督，牢则为冲，紧则任脉。寸左右弹，阳跷可决。尺左右弹，阴跷可别。关左右弹，带脉当诀。尺外斜上，至寸阴维。尺内斜上，至寸阳维。

关于奇经八脉所主的病证，《濒湖脉学》根据临证经验，一一作了论述：

督脉为病，脊强癱痲。任脉为病，七疝瘕坚。冲脉为病，逆气里急。带主带下，脐痛精失。阳维寒热，目眩僵仆。阴维心痛，胸胁刺筑。阳跷为病，阳缓阴急。癱痲瘕疝，寒热恍惚。八脉脉症，各有所属。

这一论述是对《内》、《难》以来关于奇经的诸家论述的创造性总结，其中包含着李时珍的临证实践经验。《奇经八脉考》大约成书于16世纪60年代。明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李时珍的友人吴哲为此书题词说：“奇经八脉，闻之旧矣，而不解其奥。今读濒湖李君八脉考，原委精详，经络贯彻，顿觉蒙开塞决，胸次豁然。”《奇经八脉考》的撰写，是李时珍对祖国医学发展又一创造性贡献。

二、《濒湖医案》与东壁医话

《本草纲目》在分析药物特性、功效时，保留了李时珍的部分医案，还留下许多他分析研究过的历代医家的医话，为后人研究临证医疗经验，提供了宝贵资料。

李时珍一生记录临证实践经验而留下的成功医案本来很多，曾经编撰为《濒湖医案》一书，可惜已失传。《本草纲目》中保留下来的医案，只有十多条。每条医案都是理、法、方、药的具体运用，十分可贵，从中可窥探李时珍医学思想的一斑。

《升麻·发明》记载一则医案说：一患者喜饮酒，寒冷时节哭母受凉，病寒中。每餐不离姜蒜，否则不能下咽。发病时，从腰至胸口胀痛，大小便频数。或吞酸，或吐水，或作泻，或阳萎，或厥逆。服用温脾、胜湿、滋补、

消导诸药，都时愈时发。李时珍根据古方，加以变化，终于治愈此病，留下医案说：此乃饥饱劳逸，内伤元气，清阳陷遏，不能升发所致。”他的处方是：“用升麻葛根汤合君子汤，加柴胡、苍术、黄芪煎服。服后仍饮酒一二杯助之。”照此医案施治的结果，成效显著。“其药入腹，则觉清气上行，胸膈快爽，手足和缓，头目精明，神采迅发，诸症如扫。每发，一服即止，神验无比。若减升麻、葛根，或不饮酒，则效更迟。”这一医案记载十分完备，病情、病因、治则、药物、功效，都很明确，后人便于参考。不止如此，李时珍进一步从医理病理上加以分析，指出：“大抵人年 50 以后，其气消者多，长者少；降者多，升者少；秋冬之令多，而春夏之令少。若禀受弱而有前诸证者，并宜此药活法治之。”（校点本第二册，第 797 页）从个别病例，总结出一般原则，便于将局部经验，加以推广。

《延胡索·发明》中，记载了李时珍的另一医案：“荆穆王妃胡氏，因食养麦着怒，遂病胃脘当心痛，不可忍。医用吐下、行气、化滞诸药，皆人口即吐，不能奏功。大便三日不通。”李时珍针对这一病证，反复思考，终于以单方治愈。他说：“因思《雷公炮炙论》云：‘心痛欲死，速觅延胡。’乃以玄胡索末三钱，温酒调下，即纳入，少顷，大便行而痛遂止。”此单方何以有此神效？他分析道：“玄胡索，味苦微辛，气温，入手足太阴、厥阴四经，能行血中气滞、气中血滞，故专治一身上下诸痛。”他还根据这一临证经验，治愈另一垂危患者：“华老年 50 余，病下痢，腹痛垂死，已备棺木。予用此药三钱，米饮服之，痛即减十之五，调理而安。”正如他所说的：“药之中的，妙不可言。”（校点本第二册，第 804 页）

在《牵牛子·发明》中，保存有李时珍用牵牛治病的两件医案。其一说：“一宗室夫人，年近 60。平生苦肠结病，旬日一行，甚于生产。服养血润燥药则泥隔不快，服消黄通利药则若罔闻，如此 30 余年矣。时珍诊其人体肥膏粱而多忧郁，日吐酸痰碗许乃宽，又多火病。此乃三焦之气壅滞，有升无降，津液皆化为痰饮，不能下润肠腑，非血燥比也。润剂留滞，消血徒入血分，不能通气，俱为痰阻，故无效也。乃用牵牛末皂荚膏丸与服，即便通利。自是但觉肠结，一服就顺，亦不妨食，且复清爽。”李时珍用一服“牵牛末皂荚丸”治愈老妇 30 年痼疾，关键在于他抓住病根，判明患者乃三焦之气壅滞。然后对症投药，一服而愈。以往医家或用润燥药，或用消黄通利药，其所以不见效，都因其“不能通气”。所以他得出科学结论：“盖牵牛能走气分，通三焦。”牵牛末皂荚丸，是用牵牛子四两，半生半炒，不蛀皂荚酥炙二两为末，生姜自然汁煮糊为丸，服时用荆芥汤下。故能“气顺则痰逐饮消，上下通快。”其二，李时珍用牵牛子治愈了外甥的精隧不通之症：“外甥柳乔，素多酒色。病下极胀痛，二便不通，不能坐卧，立哭呻吟者七昼夜。医用通利药不效。遣人叩予。予思此乃湿热之邪在精道，壅胀隧路，病在二阴之间，故前阻小便，后阻大便，病不在大肠、膀胱也。乃用楝实、茴香、穿山甲诸药，入牵牛加倍，水煎服。一服而减，三服而平。”（校点本第二册，第 1257 页）这一医案表明，有的医生只根据二便不通，以为病在大肠、膀胱，欲用通利药治之，不能奏效。李时珍断定这是由于湿热之邪在精道、壅胀隧路，病根在二阴之间，导致二便不通，用牵牛子能奏效，是因为“牵牛能达右肾命门，走精隧。人所不知，惟东垣李明之知之”。此二医案，不只将牵牛的功效阐述清楚，尤其教导医家治病，要善于深入思考，抓住病证的关键。

李时珍留下的十多个医案，大都原原本本、生动具体他说明疾病的起因、

症状。医家曾经采取过的医疗措施，自己辨证论治的原则，施用的方剂。有理论，有实效，以理服人，予人以深刻启示。

卡时珍过留下大量医话。他本人未能将其医话编辑成书，仅散见于《纲目》各卷。若将其集中起来，编成《东壁医话》是十分可观的。医话是医家认真记录下来的心得，或阅读医书的体会，或临证悟得妙理，或对前人医案的评论、发挥，都以不同方式反映人们的医学思想。李时珍留下的大量医话，对于后人临证诊治具有很大参考价值。下面我们引用几段，以飨读者。

关于补骨脂补肾的功效。补骨脂，又名破故纸，属草本药物。气味辛，大温，无毒。主治五劳七伤，骨髓伤败，止小便，明耳目等。李时珍说它可“治肾泄，通命门，暖丹田，敛精神。”在《补骨脂·发明》中，记载他的一节医话说：“许叔微《本事方》云：‘孙真人言补肾不若补脾’，予曰补脾不若补肾。”李时珍解释补肾与补脾的关系：“肾气虚弱，则阳气衰劣，不能熏蒸脾胃。脾胃气寒，令人胸隔痞塞，不进饮食，迟于运化，或腹胁虚胀，或呕吐痰涎，或肠鸣泄泻。譬如鼎釜中之物，无火力，虽终日，不熟，何能消化？”运用鼎釜与火力的关系，比喻脾胃与肾气的关系，阐明补脾不若补肾的道理。道理已讲明，意犹未尽，接着具体地分析了补骨脂补肾的施治过程中应注意的方法。“济生二神丸，治脾胃虚寒泄泻，用破故纸补肾，肉豆蔻补脾。二药虽兼补，但无斡旋。往往常加木香以顺其气，使之斡旋，空虚仓廩。仓廩空虚，则受物矣。屡用见效，不可不知。”（校点本第二册，第878页）这一节医话，实际上阐发了补脾不如补肾的医学理论。理论结合实践，分析透彻，论述具体，富有实用价值。“附方”中列了二神丸的服用方法，“脾肾虚泻”服二神丸。“用破故纸炒半斤，肉豆蔻生用四两，为末，肥枣肉研膏，和丸梧子大，每空心米饮服五、七十丸”，“加木香二两，名三神丸。”（校点本第二册，第880页）

关于仙茅久服长生的问题。仙茅久服是否能长生，李时珍查阅了有关著述，《仙茅·发明》中写下独到心得。首先，服仙茅长生之说，见于许叔微的医书，“按：许真君书云：‘仙茅久服长生’。其味甘能养肉，辛能养节，苦能养气，咸能养骨，滑能养肤，酸能养筋，宜和苦酒服之，必效也。”其次，查阅苏颂的著作，说：“本西域道人所传。开元元年婆罗门僧进此药，明皇服之有效，当时禁方不传。天宝之乱，方书流散，上都僧不空三藏始得此方，传与司徒李勉、尚书路词恭、供给事齐杭、仆射张建封，服之皆得力。”还查阅了沈括《梦溪笔谈》的记载：“夏文庄公禀赋异于人，但睡则冷如逝者：既觉，须令人温之，良久乃能动，常服仙茅、钟乳、硫黄，莫知纪极。”根据以上三人的论述，李时珍发表自己的观点：“观此则仙茅盖亦性热，补三焦命门之药也。惟阳弱精寒，禀赋素怯者宜之。若体壮相火炽盛者服之，反能动火。弘治间，东海张弼《梅岭仙茅诗》有‘使君昨日才持去，今日人来乞墓铭’之句。皆不知服食之理，惟借药纵恣以速其生者、于仙茅何尤？”（校点本第二册，第753—754页）这里指出：仙茅丸具有壮筋骨、益精神、明目等功效，阳弱精寒之人服之相宜；体壮相火炽盛者服之，适得其反。对仙茅丸的功效作了科学分析。

豆蔻同知母并用，能产生奇特疗效。李时珍关于豆蔻的医话极富哲理。《豆蔻·发明》写道：

豆蔻治病，取其辛热浮散，能入太阴、阳明，除寒

燥湿，开郁化食之力而已。南地卑下，山岚烟瘴，饮啖酸咸，脾胃常多寒湿郁滞之病。故饮食必用，与之相宜。然过多亦能助脾热伤肺损目。或云：与知母同用，治瘴疰寒热，取其一阴一阳无偏胜之害。盖草果治太阴独胜之寒，知母治阳明独胜之火也。

此篇医话，包含三层深刻医理：南方之人易感山岚烟瘴，常患脾胃寒湿郁滞之疾，用豆蔻除寒燥湿是很对证的，此其一 用时当适度，若用之过多，则助脾热伤肺损目，走到事物的反面，造成危害，此其二；若知母与豆蔻同用，则能产生奇效，治瘴疰寒热，因豆蔻辛热，可驱寒，属阳性，知母苦寒利遂热，属阴性，一阴一阳，相反相成，无偏胜之害，此其三。

菊能除风热、益肝补阴。李时珍关于菊的医话，蕴涵着朴素辩证法思想。《菊·发明》写道：

菊，春生夏茂，秋花冬实。备受四气，饱经风霜。叶枯不落，花槁不零。味兼甘苦，性禀平和。昔人谓其能除风热，益肝补阴，盖不知其得金水之精英尤多，能益金水二脏也。补水所以治火，益金所以平木。本平则风息，火降则热除，用治诸风头目，其旨深微。

此医话根据中医学五行生克原理，阐述了菊的双重特性。一方面，它能补肾水，故可伏心火；另一方面，又能益肺金，故能平肝木。二重特性又根源于菊“得金水之精英尤多”，“味兼甘苦、性禀平和”，故能疏风、清热、明目、解毒。医话告诉后来医家，辩证施药时，不只当知其然，尤须知其所以然，以理论指导实践，才能顺理成章，药到病除。

《本草纲目》中类似上述的医话有百余条之多，都是李时珍博学深思，认真分析前人临证经验，并总结自己的临证经验取得的成果。这是他遗留给后世的一笔珍贵的医学遗产，值得认真研究。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李时珍医话中阐述了关于脾土为本的医学理论。

脏腑之中，脾胃的功能在于受纳营养物质，经过运化，输布于全身。脾胃健旺，则元气自然充足，邪气难于侵犯。根据这一原理，金代医学家李东垣（1180—1251）创立调理脾胃，培补元气，扶正祛邪的“补土”学说，自成学派。李东垣的老师张元素（洁古，1151—1234），是这一学派的先驱。

《本草纲目》中，李时珍多次称赞洁古和东垣，对他们创立的补土派医学思想作了重要发挥。李时珍推崇张洁古的医学理论说：“深阐轩岐秘奥，参悟天人幽微。言古方新病不相能。自成家法，……大扬医理，《灵》、《素》之下，一人而已。”（《序例·历代诸家本草》，校点本第一册，第9页）他称赞李东垣说：“受业于洁古老人，尽得其学，益加阐发，人称神医。”

（同上）对以脏腑病机辨证为中心的补土派医学理论的创立者，李时珍推崇备至。他说：“《素问》云：“阴精所奉，其人寿，阳精所降，其人夭。千古之下，窥其奥而阐其微，张洁古、李东垣二人而已。”（《升麻·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797页）李东垣阐述补土学说的基本观点说：“土为万物之母。”“人以胃气为本。”“脾胃之气既伤，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由

生。”把脾胃气充足与否，同人体的健康和疾病紧密地联系起来，作为临证施治的指导思想。

李时珍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对李东垣创立的脾胃为元气之本的学说，作了新的发展。首先，他肯定脾胃的功能。同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血液的营造有密切关系，写道：“人之水谷入于胃，受中焦湿热熏蒸，游溢精气，日化为红，散布脏腑经络，是为营血，此造化自然之微妙也。”（《红曲·发明》，校点本第三册，第1547页）其次，他用五行生克原理，强调培土健脾对其他脏腑机能的调整的重要性。他说：“土者万物之母。母得其养，则火水既济，木金交合，而诸邪自去，百病不生矣。”（《黄精·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720页）

李时珍在一节医话中，用补土原理创造性地解释了木瓜治转筋的道理。按常理，肝主筋，转筋似乎由肝病引起，木瓜能治转筋，岂不是对肝有益？李时珍认为不然，指出转筋是脾胃病不是肝病，它由寒湿之邪伤害脾胃造成。木瓜之所以能治转筋，在于它有“理脾而伐肝”的效用。他说：“木瓜治转筋，非益筋也，理脾而伐肝也。土病则金衰而木盛，故用酸温以收脾肺之耗散，而借其走筋以平肝邪，乃土中泻木以助金也。木平则土得令而金受荫矣。”（《木瓜·发明》，校点本第三册，第1769页）李时珍还运用培土原理医治好一些疑难病例，留下了主贵的医案。他发展补土派学说既有理论又有临证经验，坚持了理论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李时珍的医话中还有关于脑主思维的创论。

祖国传统医学有许多特殊术语、特殊概念。李时珍对一些医学的基本概念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结合历代医学文献的研究有所发展。由于他的专门医学著作有的已失传，难窥全貌。《本草纲目》留下的医话中保存了一些基本观点。例如关于脑为元神之府的学说，很值得重视，他肯定脑是人的思维器官。400年前李时珍提出这一重要观点，难能可贵。

自先秦以来，中国学术界一直认为“心”是人的思维器官。《素问·灵兰秘典论》说：“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灵枢·邪客》说：“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代表了医学界的看法。孟子从哲学家立场明确论定“心之官则思。”（《孟子·告子篇》）直到明代中叶，著名哲学家王阳明（1472—1528）仍然坚持这种观点。李时珍第一次提出脑是人的思维器官的观点。他在《辛夷·发明》中明确论定：“脑为元神之府”。（校点本第三册，第1936页）中医学称脑为奇恒之府，由髓汇集而成。《灵枢·海论》说：“脑为髓之海”。《素问·五脏生成论》说：“诸髓者，皆属于脑。”都没有强调它与精神活动的关系；《灵枢·大惑论》只强调视觉器官与脑有直接关系。李时珍称脑为“元神之府”，明确论定脑是精神活动的总枢纽。后来清代著名医学家相继发展李时珍的思想。汪昂《本草备要》（1694）肯定“人之记性皆在脑中”。（《本草备要》卷三辛夷条）王清任在《医林改错》（1830）中，专门写了《脑髓说》，详细论证了视觉、听觉、嗅觉与脑的关系，并用羊痫风患者是“活人死脑袋”的事实，证明“灵机记性在脑”的科学论断。王清任特别引用了李时珍“脑为元神之府”的观点，作为自己的论据。他们都把“元神”看作高级中枢神经机能。“脑为元神之府”，即肯定脑是高级中枢神经活动的司令部。在中国学术史上，推翻了几千来“心之官则思”的传统观念。

《本草纲目》中保存的李时珍的医案、医话，是他多年研究医药学的心

血的结晶，无一不是医学理论与临证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是医圣李时珍留给人民的一笔珍贵的医学文化遗产，可传之永久，受用无穷。

三、《命门考》与《三焦客难》

李时珍对医学理论的另一贡献，是创立肾间命门说，写了《命门考》、《三焦客难》，可惜二书均已失传，《本草纲目》中保存了关于这一学说的部分观点。

命门，是中医学的特殊观念，被认为是主宰人体生理功能的一种实体，对维持生命具有极端重要作用。李时珍称它为“生命之原”。这种实体的形质如何？居于人体哪一部位？言人人殊。历代医家认为，命门同肾是相同实体，人有二肾。左谓之肾，右谓之命门。首创此说者为《难经》。《难经》指出：“命门者，诸精神之所舍，原气之所系也。故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表明它十分重要。同时提出“左肾右命门”的说法：谓“两肾者，非皆肾也。其左者为肾，右者为命门。”对于这一说法，隋代杨上善注释《内经》时加以重申，在宋以前，一直视为定论。宋元时期，医家亦沿用此说，《太平圣惠方》写道：“夫肾脏者，足少阴之经，左侧为肾，右为命门。”在医学史上，第一个推翻这一传统观点而创立新说的就是李时珍。他对命门作出新的解释，认为命门并不是右肾。首创“肾间命门说”，认为命门实是两肾之间的另一实体。其位置在人体脊椎自下向上数的第七节之旁。他说，命门“其体非脂、非肉，白膜裹之。在七节之旁，两肾之间。”对命门的形质和部位，第一次作出新的判断。

李时珍申述命门的极端重要性，指出：命门系于脊，“下通二肾，上通心肺，贯属于脑。为生命之原，相火之主，精气之府，人物皆有之，生人生物，皆由此出。”（《胡桃·发明》，校点本第三册，第1804页）

李时珍关于命门的考订，从以上文献可以归纳为四个基本观点：第一，命门非即右肾，而是另一实体，这种实体非脂非肉，白膜裹之。第二，命门的位置，在七节之旁，二肾之间。第三，命门同其他脏腑的关系，二系著脊，下通二肾，上通心肺，贯属于脑，是三焦的本原。第四，命门的功能。为生命之原，精气之府。从此命门学说更为医家所重视。

命门和三焦具有体用关系，更是李时珍的创造性见解。基本观点可从《本草纲目》窥见。

命门同三焦的关系，历代医家少有专门论述，更未强调认识这种关系对发展中医的重要性。李时珍在弄清命门的功能和它与其他脏腑的关系后，专门写了《三焦客难》一书。从书名不难想象他采取《内经》中黄帝和歧伯等对话的方式，自设宾主，系统地论述了自己关于三焦的全部观点。《本草纲目·序例》中《脏腑虚实标本用药式》一文，反映了李时珍对命门、三焦的基本论断，“命门，为相火之原，天地之始，藏精生血；降则为漏，升则为铅，主三焦元气。”“三焦，为相火之用，分布命门元气，主升降出入，游行天地之间，总领五脏六腑、营卫经络、内外上下左右之气，号中清之府。上主纳，中主化，下主出。”这两段论述把命门、三焦在人体生命活动中的重要地位及其作用，以及三焦同命门的相互关系讲得十分清楚。《胡桃·发明》中，李时珍对命门与三焦的关系更有概括性论述：“三焦者，元气之别使；命门者，三焦之本原，盖一原一委也。命门指所居之府而名，为藏精系

胞之物；三焦指分治之部而名，为出纳腐熟之司。盖一以体名，一以用名。”命门借助于三焦，“下通二肾，上通心肺，贯属于脑。”《奇经八脉考》中，李时珍还论定：命门“与冲、任、督三脉相通”。这些论点基本上奠定了独立发展的命门三焦体用学说的理论基础。

李时珍关于命门学说的新见解和命门三焦体用关系的理论，广为后世医家所接受，影响深远。医家赵献可（1550-1625）写《医贯》（1617）更以命门、三焦学说作为贯通全书的基本理论，从疾病的病机分析、诊断、治疗法则，到立方遣药，无不以命门三焦学说为基本指导思想。著名医学家张景岳（1562—1639）著《类经附翼》，亦大大发展这一学说。指出：

“命门，属两肾之间，即人身之太极。由太极以生两极，而水火俱。”

——《类经附翼》

张景岳继承李时珍命门乃“生命之原”的观点，申论命门为“人身之太极”。并以水火对立统一观点，阐述“太极”对生命的极端重要性。他申论说：“三焦者，五脏六腑之总司。”“命门者，为水火之府，为阴阳之宅，为精气之海，为死生之窠。若命门亏损，则五脏六腑皆失所恃，而阴阳病变无所不至。”（同上）可以说：《内》、《难》提出的命门学说，经过李时珍、张景岳等人的阐发，乃成为独立发展的医学理论，在中国传统医学中，成为值得进一步阐发的重要课题。

四、发展“十剂”思想

十剂，是药物学的专门术语。它是对药物和方剂按其性能进行分类的原则。十剂指的是：宣剂、通剂、补剂、泄剂、轻剂、重剂、涩剂、滑剂、燥剂、湿（润）剂。这一药物、方剂分类原则，创自北齐医药学家徐之才，唐朝陈藏器对它作了发展，历代医药家多有遵循。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列上专门条目，对十剂思想作了重大补充、纠正和发展。

首先，对“十剂”作了创造性解释。他不再从狭义的分类原则去理解，而将其当作辨证论治的准则。通过十剂思想使辨证原则与施治原则紧密结合。当一种病证被确定后，可遵循十剂原则，考虑相应的施治方案。十剂思想，实际上在李时珍那里已成了一种医药结合的总体思维模式，大大提高了十剂的临证应用价值。

由于李时珍改变了十剂的价值观，从而对徐之才、陈藏器以来的十剂思想，在不少地方作了重要发展。如宣剂，徐之才只谓：“宣可去壅，生姜、桔皮之属是也。”这是说，生姜、桔皮一类的药称为宣剂，它的效用在于去壅，如此而已。李时珍从医理上加以阐发，首先阐明患壅的原因，然后论宣的作用。他写道：“壅者，塞也；宣者，布也、散也。郁塞之病，不升不降，传化失常，或郁久生病，或病久生郁，必药以宣布、分散之。”这里表明壅是指郁塞之病，这种病的产生，是由于不升不降，传化失常。起因有二，或郁久生病，或病久生郁。所以当以药宣之。郁塞之证有六种，气郁、火郁、湿郁、痰郁、血郁、食郁。郁证类型不同，所用宣剂亦有区别。不特如此，

气郁有“有余”与“不足”之别，火郁、湿郁等，各有“微”发与病“甚”之别，施用宣剂还当具体分析。郁证微发，与郁证已甚，由于程度不同，所用宣剂不可一律。他说：“气郁有余，则香附、抚芎之属以开之；不足，则补中益气以运之。火郁微，则山栀、青黛以散之；甚，则升阳解肌以发之。”他坚持朴素辩证法思想，对病证作具体分析，宣剂的功效也就更清楚了。他对通剂、补剂、重剂、滑剂等都作了重要的补充、发挥。

再次，匡正十剂思想中的谬误。

以往的十剂思想，有些地方论述并不正确，以致历代医家不得其解。李时珍结合实践经验，考证前人论述，对湿剂、轻剂、泄剂作了订正。关于湿剂，徐之才说：“湿可去枯，白石英、紫石英之属是也。”李时珍认为这一说法包含双重错误。首先，湿剂应当称润剂，不当以“湿”作为治疗方法。当代中医学专家任应秋指出：“无论从理论、从经验来说，从来都欠确切。《素问》诸治法中，有‘燥者濡之’之法。未闻有以湿言者。所以时珍说：‘湿剂当作润剂’，这是正确的。”（《本草纲目精析》）李时珍把“湿”字改正为“润”字，一字之差，观念不同，造福医林，功实不小。其次，以石英作润药治燥证，尤为不妥。李时珍指出：“枯者，燥也。阳明燥金之化，秋令也；风热佛甚，则血液枯涸而为燥病。”他将枯证订正为燥证，也很有指导意义。人们一见便知，白石英、紫石英都味甘气温，作为润剂以治燥证，不符合对证投药的原则。

李时珍分析了燥证有各种类型，“上燥则渴，下燥则结，筋燥则强，皮燥则揭，肉燥则裂，肺燥则痿，肾燥则消。”既然燥证类型不同，润剂用药亦当有别。他指出：“养血，则当归、地黄之属；生津，则麦门冬、栝蒌根之属；益精，则苁蓉、枸杞之属。”“凡麻仁，阿胶膏润之属，皆润剂也。”这样先明病证类型，再定方剂部类，然后考虑所用药物，完全符合朴素辩证法的认识方法，使十剂思想更加科学化。关于轻剂和泄剂，李时珍同样从实践经验出发，提高到理论上分析，加以订正，发前人之所未发。徐之才说：“泄可去闭”，李时珍订正为“泄可去实”。徐之才说：“轻可去实”，李时珍订正为：“轻可去团”。一字定论，实为长期临证经验的总结，堪为后人辨证论治的准绳。

李时珍对祖国医学发展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以上四端是其荦荦大者。他批判继承前人医学成果，总结自己多年临证经验，撰写的医学著作共有六部之多。《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撰成之后，受到医学界的重视，曾合刻于《本草纲目》，广泛流传。他的医学著作同《本草纲目》一样，都是医药学宝库中瑰丽的珍宝，对祖国传统医学的卓越贡献值得永远珍视。

第六章 李时珍对古代 博物学的研究

我国古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除数学、天文、地理、历法、农学、医学等少数学科外，大都没有具体分科。凡涉及动物、植物、矿物、冶金、酿造、工艺等方面的知识，统统称为博物之学。最早的博物著作是晋代张华的《博物志》，杨泉的《物理论》，宋代李石有《续博物志》。这些著作只是分类记录异物、奇境的种种琐闻，间有科学参考价值，并非真正科学技术著作。宋以后或名为“格致”之学，表明其知识多由格物而来。明末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清初方以智的《通雅》、《物理小识》，对博物学知识作了分类研究，这已是李时珍以后的事了。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王世贞称它为“格物之通典”，达尔文称它为16世纪的中国百科全书，因为它涉及无机物、植物和动物，共1000多种。李时珍在记述、分析1000多种药物时，涉及了许多博物学知识。可以说他是一位真正的博物学家。

《本草纲目》关于动植物、矿物、农林方面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对古代博物学研究贡献突出。

一、对植物学的研究

《本草纲目》记载的16部60类药物，属于植物的有草部8类，谷部3类，菜部5类，果部6类，木部6类，共5部28类，药物1181种。由低等植物到高等植物品类繁多。植物药的种数约占《本草纲目》1892种药物的61%，超过动物药和矿物药的总和。

植物中举其常见者，草部有水藻、海藻、菟丝子、何首乌、芍药、牡丹、当归、贝母、三七、人参等；谷部有小麦、大麦、稻、粱、大豆、绿豆等；菜部有葱、蒜、生姜、莱菔、苦瓜等；果部有桃、李、梅、杏、桔、柑、葡萄、猕猴桃等；木部有松、柏、樟、楠、樟脑、梧桐等。虽同近代植物学分类不同，甚至分类失当，但在当时世界上，这种植物分类法是相当先进。

李时珍对千余种植物的研究，涉及的方面很广泛。对每种植物，他都收集了前人的记载，记录了本人的实际观察；有的采集了标本，有的进行过栽培。关于植物的产地、生长的地理环境、发育成熟的季节，植物的形态，根、茎、花、叶、果实种子的特征，培育、采集的方法，病虫害及防治等都——作了详细记载，大都画上图形，为后人把所列植物药当作天然植物加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从这方面看，《本草纲目》实是中国植物学发展史上划时代的巨著。《本草纲目》传入欧洲，不少科学家都从植物学方面吸取它的科学成果。

《本草纲目》善于采用比较研究方法，把同种异态的植物和异种而形态相似的植物加以比较，观其同中之异，异中之同，纠正前人的错误。

《本草纲目》十分注意植物的变异，同一植物，由于地理气候、生长环境的改变，往往形态、气味发生变化，经过考察和研究，作了如实描述。

《本草纲目》的植物知识，内容丰富，研究细致，已初步形成中国植物

学的独特的学科体系和研究方法，值得高度评价。

以菖蒲为例，不难看出《本草纲目》对某种植物的观察和描述如何详细。

“菖蒲，乃蒲类之昌盛者，故曰菖蒲。又《吕氏春秋》云：冬至后 57 日，菖始生。菖者百草之先生者，于是始耕。”（《释名》）“菖蒲凡五种：生于池泽，蒲叶肥，根高二三尺者，泥菖蒲，白菖也；生于溪涧，蒲叶瘦，根高二三尺者，水菖蒲，溪荪也；生于水石之间，叶有剑脊，瘦根密芦，高尺余者，石菖蒲也；人家以沙栽之一年，至春剪洗，愈剪愈细，高四五寸，叶如韭，根如匙柄粗者，亦石菖蒲也；甚则根长二三分，叶长寸许，谓之钱菖蒲是矣。服食入药须用二种石菖蒲，余皆不堪。”（《集解》）将菖蒲生长的季节、菖蒲的种类、生长的环境、形态、功效都一一描述。研究的方法是先作实际观察，后进行形态比较。

李时珍还注意外来植物的引进及推广问题。

葡萄，产自西域。何时传入内地？李时珍根据古史记载，作了论述：“葡萄，《汉书》作蒲桃。可以造酒。……《汉书》言：张骞使西域，始得此种。”（《葡萄·释名》，校点本草第三册，第 1885 页）李时珍还认为，张骞通西域之前，陇西可能已有葡萄，不然，《神农本草经》何以将葡萄列入上品？大概当时尚未传入关内；内地普遍种植，是在张骞通西域之后。

关于西瓜，《本草纲目》不只详述其种类、特性及种植过程，至于它何时传入中国并逐步遍于中土，也作了有趣的记载。《西瓜·集解》说：“按胡峤《陷虏记》言，峤征回纥，得此种归，名曰西瓜，则西瓜自五代时传入中国。今则南北皆有，而南方者味稍不及。”李时珍还考证，五代之前，浙东地区已有西瓜：“但无西瓜之名，未遍及中国耳。”（校点本第三册，第 1884 页）

《本草纲目》还记述了域外传入的多种植物药，不但对研究药物的产、制、沿、革有意义，对研究古代中外药物交流也有意义。

二、对动物学的研究

随着人类社会由渔猎时代进化到农业种植时代，人们对植物的认识，逐步超过对动物的认识，故植物药品种日益增多，中药乃以本革命名。但本草著作中，动物药仍占一定比例。《本草纲目》将动物药分为虫、鳞、介、禽、兽等五部，总计有 462 种。李时珍对各种动物的产地、形态、生活习惯、遗传、变异等方面都作了深入研究，细致描述。

《本草纲目》将 400 多种药用动物分为 17 类，虫部有卵生类、化生类、湿生类；鳞部有龙类、蛇类、鱼类、无鳞鱼类；介部有龟鳖类、蚌蛤类；禽部有水禽类、原禽类、林禽类、山禽类；兽部有畜类、兽类、鼠类、寓怪类。不难看出，有低级动物也有高级动物，许多都是常见动物，还有不少稀有动物。

《本草纲目》中提供的科学资料，对于今天动物学研究昆虫类、鱼类、蛇类、鸟类、兽类的某些生物，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许多动物，李时珍都亲自观察、饲养，甚至进行解剖，加以生动记述。他通过细致观察，揭穿了“螟蛉有子，果蠃负之”的秘密，否定了螟蛉的幼虫经过果蠃的祝咒而变成细腰蜂的说法。（《螻蛄·正误》校点本第四册，第 2233 页）通过解剖，否定了穿山甲是用甲片诱食蚂蚁的旧说，肯定它是“吐

舌诱蚁食之”。（《鲮鲤·集解》校点本第四册，第2384页）

《本草纲目》兽部所列动物，大部分是野兽，不少野兽的皮、毛、角、蹄都有较高的经济价值。了解这些野兽的特性，对于猎取野生动物和保护稀有动物都有意义。例如对于虎、豹、象、狮、野马、野猪、熊、鹿、麝、豺、狼、猕猴等野生动物的产地、形态特征、生活习惯、繁殖方式与季节，它们各自的天敌，都有或详或略的论列，特别对有些野生动物的捕获方法与驯化方法还作了论述。

兽部有些动物属家畜，如豕（猪）、狗、羊、牛、马、驴、骡等，《本草纲目》经过深入研究，详述其品种、特性、饲养方法、病态等。关于牛，他写了两万多字的说明。

牛的品种有犏牛、水牛两种。犏牛小而水牛大。犏牛有黄、黑、赤、白、驳杂数色。水牛色青苍，大腹锐头，其状类猪，角若担矛，卫护其犊，能与虎斗。

关于识别老牛和幼牛的方法：牛齿有下无上，察其齿而知其年。三岁二齿，四岁四齿，五岁六齿。

牛病的特点：“马病则卧，阴胜也；牛病则立，阳胜也。”牛和其他动物都生内脏结石病，不同动物的胆结石或肾结石。反而成为人类可贵的药物。指出：“时珍尝思之，牛之黄，狗之宝，马之墨，鹿之玉，犀之通天，兽之鲋笞，皆物之病。而人以为宝。”（《狗宝·集解》校点本第四册，第2802页）

《本草纲目》禽部列有各种常见的野禽，鹤、雁、凫（野鸭）、孔雀；家禽鸡、鹜（鸭）、鹅、鸽等。

鸡的品种和养殖，《本草纲目》记载颇详。鸡类甚多，五方所产，大小形色往往亦异。朝鲜一种长尾鸡，尾长三四尺。辽阳一种食鸡，一种角鸡，味俱肥美，大胜诸鸡。南越一种鸣鸡，昼夜啼叫。南海一种石鸡，潮至即鸣。蜀中一种鹑鸡、楚之一种伦鸡，并高三四尺。江南一种矮鸡，脚才二寸许。

鸡的特性，其鸣也知时刻，其栖也知阴晴。不同的鸡肉，药物价值不同，有丹雄鸡、白雄鸡、黄雌鸡、乌骨鸡、反毛鸡、泰和老鸡等，各举其主治与附方。对于鸡头、鸡血、鸡子（蛋）、卵黄等的药用价值无不详加论述。

《本草纲目》鳞部所列鱼的种类有鲤鱼、青鱼、鲫鱼、鲈鱼等。关于石首鱼（黄花鱼），李时珍引用田九成《游览志》的记载说：“每岁四月，来自海洋，绵亘数里，其声如雷。海人以竹筒探水底，闻其声乃下网，截流取之，泼以淡水，皆圉圉无力。初水来者甚佳，二水、三水来者，鱼渐小而味渐减矣。”《本草纲目》关于金鱼的记述，曾被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引用以说明金鱼在家养下发生变异的事实。李时珍的记述是这样：“金鱼有鲤、鲫、鳊、鳙数种。……自宋始有畜者，今则处处人家养玩矣。春末生子于草上，好自吞啖，亦易化生。初出黑色，久乃变红，又或变白者，名银鱼。亦有红、白、黑、斑相间无常者。”（《金鱼·集解》校点本第四册，第2450页）

《本草纲目》介部所列生物有水龟、绿毛龟、蟹、蚌、贝子、蛤蜊等。关于珍珠（真珠）的生成情况有详细记载：珍珠为蚌腹中特产。蚌之孕珠，如怀胎，谓之珠胎。中秋无月，则蚌无胎，左思《吴都赋》“蚌蛤珠胎，与月亏全”是正确的记载。珍珠有大小，颜色各异。李时珍引《格古论》云：南番珠，色白圆耀者为上，广西者次之。北海珠，色微青者为上。粉白、油黄者下也。西番马价珠为上，色青如翠，其老色。夹石粉青，有油烟者下也。

《本草纲目》对于 462 种动物的记载，堪称当时世界上最完备的动物学著作，它不只论述了这些动物的药用价值和经济价值，同时描述了许多动物的形态、生理特征、繁殖情况及病症等。当这本书传入西方后即引起许多生物学家的重视，对世界生物学研究无疑作出了贡献。

三、对农学的研究

《本草纲目》关于草木、谷菜、禽兽等药物的论述，包含着不少的农业生产技术知识。当我们抱着探讨古代生产技术发展的目的来研究《本草纲目》时，发现其中包含的生产技术知识相当丰富。《本草纲目》是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对不同的科学家具有不同的科学价值。药物学家从中汲取药理学知识，生物学家从中汲取生物学知识，农学家们能够从中汲取农学知识，这是十分自然的。

《本草纲目》中的草、谷、菜、果等部，论列了许多农作物、果木和粮食加工产品。所载农作物，有数十种之多，今天农业生产中的主要作物差不多应有尽有。

粮食作物有：小麦、大麦、稻（糯米）、粳、粬、玉蜀黍、大豆、绿豆等。

经济作物有：胡麻（芝麻）、大麻、芸苔（油菜）、甘蔗、桑等。

蔬菜有：葱、蒜、莱菔（萝卜）、生姜、菠菜、苦瓜、丝瓜等。

果类有：李、杏、桃、梨、桔、柑、荔枝、龙眼、葡萄、猕猴桃等。

《本草纲目》对于粮食作物，详载其不同品种、生长的季节、耕种、收藏的技术，以及这些作物的病虫害。以粳为例，可知其梗概。

关于粳的品种：“粳乃谷稻之总名也，有早、中、晚三收。”“粘者为糯，不粘者为粳。”

三收的时间：“粳稻六七月收者为早粳（止可充食），八九月收者为迟粳，十月收者为晚粳。”“诸本草独以晚粳为粳者，非矣。”

关于水稻与旱稻：“粳有水、旱稻。南方土下涂泥，多宜水稻。北方地平，惟泽土宜旱稻。西南夷亦有烧山地为畲田种旱稻者，谓之火米。”

栽种方法古今有别：“古者惟下种成畦，故祭祀谓稻为嘉蔬，今人皆拔秧栽插矣。”还有特种稻和两熟稻：“真腊有水稻，高丈许，随水而长。南方有一岁再熟之稻。”“香粳，长白如玉，可充御贡，皆粳之稍异者也。”

茶叶，是我国的一种特产。历代所产名茶甚多，远销国外。《本草纲目》对明代各种名茶的主要产地作了记载：“昔贤所称，大约谓唐人尚茶，茶品益众。有雅州之蒙顶、石花、露牙、谷牙为第一，建宁之北苑龙凤团为上供。蜀之茶，则有东川之神泉兽目，硤州之碧涧明月，夔州之真香，邛州之火井，思安黔阳之都濡，嘉定之峨嵋，泸州之纳溪，王垒之沙坪。楚之茶，则有荆州之仙人掌，湖南之白露，长沙之特色，蕲州蕲门之团面，寿州霍山之黄牙，庐州之六安、英山，武昌之樊山，岳州之巴陵，辰州之淑浦，湖南之宝床、茶陵。吴越之茶，则有湖州顾渚之紫荀，福州方山之生芽，洪州之白露，双井之白毛，庐山之云雾，常州之阳羨，池州之九华，丫山之阳坡，袁州之界桥，睦州之鸠坑，宣州之阳坑，金华之举岩，会稽之日铸。皆产茶有名者，其他尤多。”（《茗·集解》校点本第三册，第 1871—1872 页）关于茶的经济价值，《本草纲目》称：“茶之税，始于唐德宗（780 - 805），盛于宋、

元，及于我朝，乃西番互市易马。夫茶一木尔，下为民生日用之资，上为朝廷赋税之助，其利博哉。”（同上）这都是研究茶叶发展史的有用史料。

《本草纲目》记载了常见的粮油加工产品，豆腐、酱、醋、烧酒、饴糖、神曲，红曲、豆豉、豆油、芝麻油、糕等，有的记载了加工的技术操作过程，有的分析其营养价值。例如对红曲的制作技术，有甚详细的记载。红曲具有“消食活血、健脾燥胃、治赤白痢、下水谷”的功效。“本草不载，法出近世，亦奇术也。”

“其法：白粳米一斗五升，水淘浸一宿，作饭。分作十五处，入曲母三斤，搓揉令均，并作一处，以帛密覆、热，即去吊摊开。觉温，急堆起，又密覆。次日日中又作三堆，过一时分作五堆，再一时合作一堆，又过一时，分作十五堆，稍温又作一堆，如此数次。第三日，用大桶盛新汲水，以竹箩盛曲作五六分，蘸湿完又作一堆，如前法作一次。第四日，如前又蘸。若曲半沉半浮，再依前法作一次，又蘸。若尽浮则成矣，取出日干收之。其米过心者谓之生黄，入酒及酢醢中，鲜红可爱。未过心者不甚佳。入药以陈久者良。”（《红曲·集解》校点本第三册，第1547页）制红曲的技术操作过程《本草纲目》描写得十分具体，其他农副加工产品的记载有详有略。

葡萄酒为当今常用的饮料。用葡萄酿酒，在中国起于何时呢？如何检验其质量？《本草纲目》为我们提供了史料。《葡萄酒·集解》写道：“葡萄酒有二样：酿成者，味佳；有如烧酒者，有大毒。”同时指出：“酿者取汁用曲，如常酿糯米饭法。”此法在中国出现较早。魏文帝就讲过葡萄酒，甘于麴米。“烧者，取葡萄数十斤，同大麴酿醉，取出甑蒸之，以器承其滴露，红色可爱。”此法创于西域，“唐时破高昌始得其法”。元朝规定，酿成的葡萄酒须经官府检验。叶子奇《草木子》云：“元朝于冀宁等路造葡萄酒，八月至太行山辨其真伪。真者，下水即流；伪者，得水即冰冻矣。”（校点本第三册，第1568页）

《本草纲目》的果部和木部记载了常见果木、林木的生长环境、形态、嫁接、移植技术、虫害的防治等，保留了许多古代林业知识。

木部有香木，松、柏、杉、桂等；乔木，梧桐、梓、槐、柳、杨等；灌木，桑、酸枣、女贞、冬青等，包含了许多值得重视的用材林木和经济林木。

《本草纲目》研究了这些果、木的根、茎、花、叶、果实、寄生物、分泌物，保留了不少有价值的林业生产资料。

柏树，人所常见。《本草纲目》却有一些有趣的记载。“万木皆阳，而柏独西指。……柏之指西，犹针之指南也。”引寇宗奭的记载说：“予官陕西，登高望柏，千万株皆一一西指。”（《柏·释名》）柏有许多变种，“柏叶松身者，桧也，其叶尖硬，亦谓之栝；今人名圆柏，以别侧柏。松叶柏身者，枞也。松桧参半者，桧柏也。峨嵋山中一种竹叶柏身者，谓之竹柏。”（《柏·集解》校点本第三册，第1913页）

竹，《本草纲目》将它列入苞木类。关于竹的繁殖及所宜肥料：“根下之枝，一为雄，二为雌，雌者生笋。其根鞭喜行东南，而宜死猫，畏皂刺、油麻。”竹的病害：“六十年一花，花结实，其竹则枯。”竹的种类甚多，其中皆虚，而有实心竹出滇广；其外皆圆，而有方竹出川蜀。交广由吾（梧）竹长三四丈，可作屋柱。篔簹竹大至数围，可作梁栋。可以为箭矢者，谓之矛竹、箭竹。有的可供观赏，有的可造笛，有的可织席，有的可织布，有的可作舟。

我国古代以农立国，历代学者重视农业研究，写过不少农学著作，留下丰富的农业、林业知识。李时珍广搜博采，根据研究药物的需要，同时积累了农业、林业的大量资料。《本草纲目》虽是药学著作，从另一角度看，它够得上是中国 16 世纪农林知识的汇编。

四、对矿物学的研究

《本草纲目》金石部，记载金石药物 137 种，分为 4 类，金类 28 种，玉类 14 种，石类 75 种，卤石类 20 种。研究金石类药物涉及许多金属、非金属及矿物知识。将金石类独立成编，显然就是我国 16 世纪的矿物知识大全，故最早引起两方注视的是《本草纲目》的金石部。金类，论及金、银、铜、铁、锡、铅等金属的产地、开采、冶炼方法以及它们的化合物。玉类，论及白玉、青玉、珊瑚、玛瑙、云母、石英等的产地、种类、特性。石类，论及丹砂、水银、雄黄、理石、滑石、石脑油（石油）、金刚石等的产地、提炼方法、物理、化学特性等。卤石类，论及食盐、卤碱、朴消、消石、蓬砂、绿矾等的产地、提炼方法、性味、功效等。李时珍在研究金石药物过程中，除了涉及矿物知识，还涉及冶金、化学知识。《本草纲目》对于祖国重要金属矿产的分布地域以及找矿的方法也有不少论述。例如，“草青茎赤，其下多铅”的记载（引自《地镜图》），对于植物找矿的方法就有启示。（《铅·集解》校点本第一册，第 470 页）以银为例，可见其关于矿物论述的梗概。

关于银的产地：“闽、浙、荆、湖、饶、信、广、滇、贵州诸处，山中皆产银。”

关于银的提炼：“有矿中炼出者，有沙土中炼出者。”

关于共生矿和植物找矿知识：“《管子》云：上有铅，下有银。《地镜图》云：山有葱，下有银。”

关于银的种类：银有 17 种，分真银、假银。真银有四种：天生牙，生银坑内石缝中，状如乱丝，色红者上；生银，生石矿中，成片块，大小不定，状如硬锡；母砂银，生五溪丹砂穴中，色理红光；黑铅银，得子母之气。“此四种为真银。”假银有 13 种之多，又分二类，水银银、草砂银、曾青银、雄黄银、硫黄银等，“皆是以药制成者”。还谈到所见域外银四种，有波斯银、新罗银、林邑银、云南银。（《集解》）

关于其他药物对银的特殊作用。“荷叶、蕈灰能粉银。羚羊角、乌贼鱼骨、鼠尾、龟壳、生姜、地黄、慈石，俱能瘦银。羊脂、紫苏子，皆能柔银。”（《气味》）

还论述了用银器辨别毒物的问题，指出：“银本无毒”。“今人用银器饮食，遇毒则变黑；中毒死者，亦以银物探视之。”（《发明》）

关于铜，李时珍分析了它的种类及成因。他说：“铜有赤铜、白铜、青铜。赤铜，出川、广、云、贵诸处山中，土人穴山采矿炼取之。白铜出云南，青铜出南番，惟赤铜为用最多，且可入药。”还有黄铜和响铜。“人以炉甘石炼为黄铜”。关于发现铜的方法，“《管子》云：上有陵石，下有赤铜。

《地镜图》云：山有慈石，下有金若铜。草根黄秀，下有铜器。”铜与其他物质发生作用，引起变化。“苍术，粉铜；巴豆、牛脂，软铜；慈姑、乳香，哑铜，物性然也。”（《赤铜·集解·气味》校点本卷一，第 465 页）

《本草纲目》金石部所列药物中，都有关于金、银、铜、铁、锡、铅等金属的冶炼知识，虽然远非化学分析，但对研究我国冶金科技史仍有参考价

值。

铅，又称金公，乃五金之祖，能伏五金。“朱砂伏于铅而死于硫，硫恋于铅而伏于碓，铁恋于磁而死于铅，雄〔黄〕恋于铅而死于五加。故金公变化最多，一变而成胡粉，再变而成黄丹，三变而成密陀僧，四变而成白霜。”这些知识当然是从古代炼丹术总结而来的，却充分揭示了铅的各种化学变化。

《本草纲目》还论及铅矿工人的职业病问题。指出：“铅生山穴石间，人挟油灯，人至数里，随矿脉上下曲折所取之。其气毒人，若连日不出，则皮肤痿黄，腹胀不能食，多致疾而死。”（《铅·集解》校点本第一册，第470页）

古代注重炼丹，多与铅打交道，故对铅的各种变化及毒性有较深了解。这些知识都是从长期科学实验中积累起来的。

对我国石油的发现、开采、使用的历史，《本草纲目》也有记载。《石脑油·集解》写道：石脑油即石油，以前名石漆、猛火油、雄黄油、硫黄油。关于它的产地写道：“石油所出不一，出陕之肃州、邠州、延州、延长、广之南雄，以及缅甸者。”张华《博物志》载，延寿县南山产石漆，燃之极明。

《西阳杂俎》载，高奴县有石脂，可燃灯。《昨梦录》载，猛火油出高丽东。李时珍说：“此数说者，皆石脑油也。”关于石油的用处，土人多以燃灯；沈括曾扫其煤作墨，光黑如漆，胜于松烟。段成式说，石脂可采以膏车；康誉之说，猛火油边人用以御敌。关于我国从明朝开始由官家开采石油的情况，李时珍写得很明白：“国朝正德（1506—1521）末年，嘉州开盐井，偶得油水，可以照夜，其光加倍。沃之以水则焰弥甚，扑之以灰则灭。作雄黄气，土人呼为雄黄油，亦曰硫黄油。近复开出数井，官司主之。此亦石油，但出于井尔。”（校点本第一册，第570页）《博物志》为晋朝张华（232—300）所撰，可见我国在公元3世纪已发现石漆；唐朝王冰称它为“龙火”，其特性是：“得湿而焰，遇水而燔，光焰诣天，物穷方止。”明正德末年，已由官家主持采用，比西方人于1859年始首次发现石油的时间要早得多。

我国的食盐有海盐、井盐、池盐等不同种类，它们的产地何在是研究经济地理学所关心的问题。《本草纲目》对明代以前我国食盐的主要产地，有详细记载。《食盐·集解》写道：“盐品甚多，海盐，取海卤煎炼而成，今辽、冀、山东、两淮、闽、浙、广南所出是也。井盐，取井卤煎炼而成，今四川、云南所出是也。池盐，出河西安邑、西夏灵州，今惟解州种之，疏卤地为畦陇，而塹围之，引清水注入，久则色赤，待夏秋南风大起，则一夜结成。……海丰、深州者，亦引海水入池晒成。并、成、河北所出，皆碱盐也，刮取碱土，煎炼而成；阶、成、凤州所出，皆崖盐也，生于土崖之间，状如白矾，亦名生盐。此五种皆食盐也，上供国课，下济民用。”对五种食盐的产地及制盐的方法部作了说明，这是研究明代盐业史的可靠资料。

李时珍对古代金属、非金属矿物的论述，从采掘、冶炼、检验，明其变化，知其特性，标其有毒无毒，汇集了我国大量矿物学、冶炼学、化学知识，故《本草纲目》绝不能单纯以本草学著作看待。

人类的自然知识是从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的实践中不断积累起来的。卓越的科学家取得成功的奥秘之一，就在其善于继承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珍品，加以发扬、创造。《本草纲目》中包含的广泛的博物学知识，以及他对古代博物学的贡献，正是如此。

第七章李时珍的文学素养

李时珍是一位科学家、思想家，同时兼有诗人和文学家的才华。他的著作中，经常引诗咏药，别有风味；以生花之笔，描绘药物特性，妙语联珠。他于文字训诂造诣颇深，方言、转语，顺手拈来，运用自如，不愧为语言大师，其文学素养令人钦佩。

一、善于吟诗引诗咏药

李时珍好诗、工诗，写过不少诗篇，在他 70 寿辰那年（1587），曾选编为《菑所馆诗集》。“菑（音科）所”一词，源于《诗经·考槃》，表露其宽和的胸襟，也反映了好诗的情怀。诗集惜已失传，至今仅留下两首。

一首七言律诗，题为《吴明卿自河南大参归里》。明卿为时珍知己，兴国（今湖北阳新县内）人，同时珍隔江相望，交谊甚笃。吴因抨击奸相严嵩而遭削职还家，时珍以此诗慰藉故人，诗云：

青锁名藩三十年，虫沙猿鹤总堪怜；
久孤兰杜山中待，谁遣文章海内传？
白雪诗歌千古调，清溪日醉五湖船；
鲈鱼味美秋风起，好约同游访洞天。

诗中对吴公为官 30 年，刚正不阿而遭罢官，深表同情；安慰他与其兰杜孤芳于山中，何如吟诗为文传之海内？日醉五湖，诗传千古，远比混迹官场清高；约二三好友朝夕同游，共饌鲈鱼，信为人生乐事。劝慰故友之深情，粪土宦宦之气概，跃然纸上。

另一首七言绝句，为赞刘雪湖《梅谱》而作。雪湖亦时珍好友，浙江会稽（姚、漉二水所经地）人，明代著名画家王冕的高徒，以写雪梅著名，亦工诗。时珍得其《梅谱》，寄诗称赞：

雪湖点缀自神通，题品吟坛动钜公。
欲写花笺寄姚漉，画梅诗句冠江东。

诗中盛赞刘公点缀梅花独具神韵，其题画之诗亦久为诗坛名家所倾倒。打开《梅谱》，爱不释手，急展花笺寄诗遣怀，以博诗画冠江东的老友一晒。此诗赞美雪湖诗画之高雅，反映了二人的深厚情谊，流露了李时珍的诙谐风度。

从以上二诗，不难想象李时珍广交士林，吟诗品画的高雅情趣。李时珍的诗文雅兴，尤为突出地反映在他“搜罗百氏”而汇集的历代名家咏药诗中。

翻开中国文学史，很难找到以咏药闻名的诗人。文学史家从未编集过吟药诗，分析吟药诗的艺术特色。只有《本草纲目》为我们提供了宝贵资料。

《本草纲目》中，李时珍为了说明药物产地、性味、主治的特点，经常引用名家诗篇。全书引诗咏药有数十处之多，独具一格，耐人寻味。

李时珍常引《诗经》名句，证明某药早已为人注意。著名诗人李白、杜

甫、白居易、刘禹锡、张籍、王维、苏东坡等人的作品，或引全诗，或引名句，顺手拈来，阐明药性药理，读来令人赏心悦目。

薤名薤头（读叫头），是韭蒜一类蔬菜。其药性是温是冷，众说不一。李时珍主性温说，引杜诗为证。“按杜甫《薤诗》云：‘束比青乌色，圆齐玉箸头。衰年关膈冷，味暖并无忧。’亦言其温补，与经文相合。则冷补之说，盖不然也。”（《薤·发明》校点本第三册，第1591页）的确杜甫的诗句：“衰年关膈冷，味暖并无忧”，正是薤性温补的有力明证。读者印象深刻，历久难忘。

百合，其根如蒜，《名医别录》注明它有止泪功效。李时珍引用唐代王维诗云：“冥收到百合，真使当重肉。果堪止泪无，欲纵望江目。”（《百合·发明》校点本第三册，第1681页）送别江干，孤帆远影，珠泪纵横，冥收百合，以备止泪，是很自然的。名人诗句，验证百合止泪之功，格外生动。

百合可止眼泪，车前子则可治眼病。唐朝诗人张籍的诗被李时珍引用。诗云：“开州五月车前子，作药人皆道有神。惭愧文君怜病眼，三千里外寄闲人。”（《车前·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1070页）时珍看中此诗的药学内容：（1）车前子果有治眼良效；（2）以开州产者最佳；（3）以五月采收为宜。

菰草，别名禹余粮，一种海边野生植物，其子可食，久食健人。灾荒年月，可作度荒食粮。李时珍希望找到一首菰草诗，求之不得，乃借用明人方孝孺《海米行》。他说：“按《方孝孺集》有《海米行》，盖亦草之菰类也。其诗云：‘海边有草名海米，大非蓬蒿小非芥，妇女携兰昼作群，采摘仍于海中洗。归来涤釜烧松枝，煮米为饭充朝饥。莫辞苦涩啖不下。性命聊假须臾时。’”（《菰草·集解》校点本第三册，第1489页）在李时珍心目中，菰草值得重视，应列入救荒本草。

樱桃，小儿最喜吃。多食易生病。《本草纲目》引用《儒门事亲》中故事，舜水一富家，有二子，好食紫樱，日啖一二升。半月后，长者发肺痿，幼者发肺痈，相继死去。感叹道：“呜呼，百果之生，所以养人，非欲害人。富贵之家，纵其嗜欲，取死是何？邵尧夫诗云：‘爽口物多终作疾’，真格言哉！”（《樱桃·发明》校点本第三册，第1800页）不特樱桃如此，一切果物都当食用有节，否则物极必反，难免受自然规律的惩罚。把“爽口物多终作疾”，当作格言，实为医家真知灼见。

萝卜，可治大麦面毒。《本草纲目》引用一首民间歌谣来证明。《洞微志》载一故事，齐州有人病狂，说在梦中见一红裳女子引入宫殿，小姑令歌，歌云：“五灵楼阁晓玲珑，天府由来是此中，惆怅闷怀言不尽，一丸萝卜火吾宫。”（《莱菔·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1617页）后经道士点明，此人犯大麦毒作病，以药及萝卜治之果愈。道士得秘方，编为歌谣，故神其说。李时珍特别抄来，以备医家参考。

《石胡荽·发明》中引用《王玺集要》中一首民歌，说明鹅不食草（即石胡荽）治疗眼病的功用。歌曰：“赤眼之余翳忽生，草中鹅不食为名。塞于鼻内频频换，三日之间复旧明。”（校点本第二册，第1392页）李时珍作了科学解释：“鹅不食草，气温而升，味辛而散，阳也，能通于天。头与肺皆天也，故能上达头脑，而治顶痛目病。……其除翳之功，尤显神妙。”

《蚤休·集解》引俗谚云：“七月一枝花，深山是我家。痈疽如遇者，

一似手拈拿。”（校点本第二册，第 1201 页）李时珍说：“虫蛇之毒，得此治之即休，故有蚤休、螫休诸名。”俗名七叶一枝花，生于深山阴湿之地。惊痫、疟疾、痈肿者宜之。民歌俗谚，多是群众总结切身经验而来，李时珍不拘一格，广泛引用，反映他撰著《本草纲目》汲取了大量民间验方。

《本草纲目》的《鹿茸·发明）一条，引用《澹寮方》所载一首道人所唱的民歌，著明“斑龙丸”治一切虚损、耳聋目暗、眩运虚痢之效。歌曰：“尾闾不禁沧海竭，九转灵丹都漫说。惟有斑龙顶上珠，能补玉堂关下穴。”（校点本第四册，第 2848 页）当年此方一出，朝野遍传。李时珍在《鹿茸·附方》中详载斑龙丸的构成药物，主要成分为鹿茸、鹿角胶、鹿角霜。

《本草纲目》引用的咏药诗歌，远不止此。欧阳修诗中谈银杏，杨万里诗中写枇杷、状鲈鱼，陆龟蒙以诗讽鸦舅（乌桕），刘禹锡以诗咏枸杞等，时珍随手征引，使本草著作妙趣横生。人们常见咏山水诗，咏花鸟诗，咏物诗，咏史诗，游仙诗，而咏药诗从来罕为读者注意。时珍是诗人，特别关心咏药诗。故于名人诗集、野史、笔记中广为搜求，纳入本草巨著。李时珍《濒湖脉学》全用韵语写成，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述脉学科学内容，令人读来朗朗顺口，易诵易记，经久难忘。其诗文修养根柢之深，于此可见。

二、长于散文 为药立传

李时珍是诗人，亦精文学，所写散文，颇有文采，说理透彻，逻辑性强。

他父亲李言闻，曾为药立传，写过《艾叶传》，描写家乡特产蕲艾；还有《人参传》，全面介绍人参的产地、形态、功效。李时珍继承父志，写了《蕲蛇传》。他亲自观察蕲蛇的生活习性，访问善捕蕲蛇的老农，汲取其经验，然后为之立传。《蕲蛇传》失传，《本草纲目》保有其要点。它是一篇十分精练的散文。

花蛇，湖、蜀皆有，今惟以蕲蛇擅名。然蕲地亦不多得，市肆所货、官司所取者，皆自江南兴国州诸山中来。其蛇龙头虎口，黑质白花，胁有二十四个方胜文，腹有念珠斑，口有四长牙，尾上有一佛指甲，长一二分，肠形如连珠。多在石南藤上食其花叶，人以此寻获。先撒沙土一把，则蟠而不动。以叉取之，用绳悬起，剗刀破腹去肠物，则反尾洗涤其腹，盖护创耳。乃以竹支定，屈曲盘起，扎缚炕干。出蕲地者，虽干枯而眼光不陷，他处者则否矣。

——《白花蛇·集解》校点本第四册，第 2401 页

文章不足 200 字，记叙的内容很丰富，名药花蛇兴衰的历史，昔日蕲蛇擅名，今只兴国产者盛行；体形特征，龙头虎口，白花，有方胜文，念珠斑，尾有甲片；生活习性，以石南藤花叶为食；捕捉方法，先撒沙，再用叉取；还讲了解剖、炮制技术，验辨真伪的要点。通篇叙述何等生动具体，简练明日。

李时珍为描述菊花的特点及药用功效，写了一篇菊花赞，可称千古妙文：

菊，春生夏茂，秋花冬实，备受四气，饱经露

霜，叶枯不落，花槁不零，味兼甘苦，性禀平和。昔人谓其能除风热，益肝补阴，盖不知其得金水之精英尤多，能益金水二脏也。补水所以制火，益金所以平木；木平则风息，火降则热除，用治诸风、头目，其旨深微。黄者入金水阴分，白者入金水阳分，红者行妇人血分，皆可入药，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其苗可蔬，叶可啜，花可饷，根实可药，囊之可枕，酿之可饮。自本至末，罔不有功。宜乎前贤比之君子，神农列之上品，隐士采入酒肆，骚人餐其落英。……钟会菊有五美赞云：圆花高悬，准天极也。纯黄不杂，后土色也。早植晚发，君子德也。冒露吐颖，像贞质也。杯中体轻，神仙食也。

——《菊·发明》

文章描写菊的生长特点，揭示菊的气味特性，分析菊的药用价值，旁及菊的多种用途，引用前人赞菊妙语，字字珠玑，韵味无穷。非大手笔，何能出此妙文。

《本草纲目》的《枸杞·发明》中关于枸杞根、苗、子药用价值的记述，写得也很别致。

按刘禹锡《枸杞井》诗云：“僧房药树依寒井，并有清泉药有灵。翠盖叶生笼石甃，殷红子熟照铜瓶。枝繁本是仙人杖，根老能成瑞犬形。上品功能甘露味，还知一勺可延龄。”又《续仙传》云：朱_子子见溪侧二花犬，逐入于枸杞丛下，掘之得根，形如二犬。……据前数说，则枸杞之滋益不独子，而根亦不止于退热而已。但根、苗、子气味稍殊，而主治亦未必无别。盖其苗乃天精，苦甘而凉，上焦心肺客热者宜之；根乃地骨，甘淡而寒，下焦肝肾虚热者宜之。此皆三焦气分之药，所谓热淫于内，泻以甘寒也。至于子则甘平而润，性滋而补，不能退热，止能补肾润肺，生津益气。此乃平补之药，所谓精不足者，补之以味也。分而用之，则各有所主；兼而用之，则一举两得。

首先引出文学家刘禹锡的咏药诗，令人觉得枸杞神奇；次引野史记述，益加深枸杞的神秘性；然后对子、根、苗分别予以论述，突出其药用功效，展示科学内容。论述中采用排比句法，便于参照，易于记忆。李时珍的文章，多用排比句法，翻开《本草纲目》，比比皆是。此种句法，亦反映他的科学研究特点，即常从比较观察中，认识药物的同中之异，或异中之同。例如兰草和泽兰本有区别，古代有些药物学家，往往认泽兰为兰草，将二者混为一谈，李时珍区分道：

兰草、泽兰，气香而温，味辛而散，阴中之阳。足太阴、厥阴经药也。脾喜芳香，肝宜辛散。脾气舒，则三焦通利而正气和；肝郁散，则营卫流行而病邪解。兰草走气道，故能利水道，除痰癖，杀虫辟恶，而为消导良药；泽兰走血分，故能治水肿，涂痈疽，破瘀血，消癥瘕，而为妇人要药。虽是一类而功用稍殊，正如赤、白茯苓、芍药，补泻皆不同也。

——《泽兰·发明》校点本第二卷，第907页

兰草与泽兰，气香而温，味辛而散，是异中之同，兰草走气道，为消导良药，泽兰走血分，为妇女要药，是同中之异。排比分析，委委动人。

关于艾叶，或生用，或熟用，或服或灸，功效有别。《艾·发明》用排比句法，三言两语，分辨异常清楚：

艾叶，生则微苦太辛，熟则辛热太苦，生温熟热，纯阳也。可以取太阳真火，可以回垂绝元阳。服之，则去三阴，而逐一切寒湿，转肃杀之气为融和；灸之，则透诸经，而治百种病邪，起沉痾之人为康泰，其功亦大矣。苏恭言其生寒，苏颂言其有毒。一则见其能止诸血，一则见其热气上冲，遂谓其性寒、有毒，误矣。

论列独到的心得，匡正前贤之误解，要言不烦，恰中肯綮，李时珍的文章，句句扣人心弦，发人深思，既有文采，又富科学性，读之引人入胜。

不难看出，李时珍富有古代科学家的非凡气质。既有精湛的专业技能，又具有多方面文化素养，可同汉代张衡、晋代葛洪、宋代沈括媲美。张衡精通天文和机械制造，同时又是才华横溢的词赋家；葛洪长于医药、方剂研究，在医药学上贡献突出，同时善于骈文，《抱朴子》一书的文采，在古代科学著作中，罕有其匹；沈括可谓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对古代科学技术无不娴熟，而其诗词文章，亦属佼佼者。先辈科学家们多方面的文化知识结构、文学涵养、艺术爱好，都对李时珍有着良好影响。他继承这一优良文化传统，加以发扬光大，在科学技术方面固然作出了卓越贡献，其文化素养、文学爱好亦堪称后世楷模。其思维方法之先进，哲学见解之敏锐，远远超出当时某些思想家。李时珍这样杰出的科学家、思想家诞生于16世纪的中国，的确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第八章 李时珍的 科学研究方法

李时珍在科学上取得巨大成就，首先由于他采用了一系列正确的科学研究方法。在科学史上，著名科学家们的重大科学发现、科学创造，无不是依靠正确的科学方法取得的。科学提高一步，科学方法将随之进步；科学方法前进一步，科学技术必然获得飞跃的进展，二者相辅相成，彼此促进，永无止境。正确的科学研究方法，是科学家们攀登科学高峰的重要阶梯。科学研究的方法不对头，宛如在黑暗中摸索，找不着方向，事倍功半，甚至会前功尽弃。

李时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自己的实践经验为基础。灵活运用古代科学方法，加以充实提高，取得新的成就，积累了许多运用科学方法取得科学成就的宝贵经验。

科学研究是人类征服自然的旷日持久的战斗，人们总是沿着前人开拓的道路前进，又为他们的后继者留下可贵的足迹。重要的科学研究成果，固然是引为骄傲的科学发展的里程碑；成功的科学方法，对后来者更加具有指导意义。李时珍留给祖国人民的，有《本草纲目》、《濒湖脉学》等我国医药学发展的丰碑；尤其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科学方法，武装后代研究者从事新的探索。李时珍毕生的科学实践，成功地运用了观察和实验的方法、比较和分类的方法、分析和综合方法、批判、继承方法和历史考证方法等，这些方法他都得心应手、运用自如。他的科学成就雄辩地证明了他运用各种科学方法十分准确、熟练。

李时珍的科学方法是在他的哲学思想指导下发展起来的，成为他的哲学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所运用的逻辑思维方法，明显地带有古代辩证逻辑的色彩，同他的哲学认识论相互辉映，是他的认识论的具体运用。

一、观察与试验

在药物学研究中，李时珍使用得最多的是观察和尝试方法。传说中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使用的就是采集、尝试方法。李时珍继承并发展这一本草研究的基本方法，时有新的发现、发明，大大发展和丰富了祖国本草学，也推进了本草研究的这一基本方法。

（一）——采视，以得其真

历代本草著作中，同一种药物单就其外形特征来说，言人人殊，莫衷一是。核定名实，不能单凭原有书本的记载，必须一一采集，仔细观察。采集标本，认真观察，这是研究本草的第一步功夫。李时珍对此深有体会。

蘋和荇这两种植物性药物外形如何区别，有几种不同说法。曜仙说：开白花者为蘋，开黄花者为荇。苏恭说：叶大者是蘋，叶小者是荇。杨慎《卮言》说：四叶菜是荇。李时珍加以实际考察，认为以上种种说法，“皆无一

定之言。盖未深加体察，惟据纸上猜度而已。时珍一一采视，颇得其真云。”（《蘋·集解》校点本第二册，第1370页）他“一一采视”研究之后，指出：叶茎一二寸，有一缺而形圆如马蹄者，莼也。似莼而稍尖长者，荇也，其花并有黄白二色，白色为蘋，黄色为荇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叶茎四五寸如小荷时而开黄花，结实如小角黍者，是萍蓬草。四叶合成一叶，如田字形者才是蘋。李时珍用采视方法，把荇、蘋、莼的形态分别清楚。“一一采视”，是他克服据书“猜度”的错误研究方法的对症良药，也是他揭示大同小异的药物形态区别常用的方法。

有的药物，属本本植物或草本植物，还是别的东西，单凭以往本草记载，很难弄明白。例如五倍子，宋代《开宝本草》将其收入草部，《嘉祐本草》则将其收入木部。李时珍经过认真观察，指出它“生于肤木之上”，“乃虫所造也”，《本草纲目》详细记载他所观察的结果。“肤木，即盐肤子木也。此木生丛林处者，五六月有小虫如蚁，食其汁，老则遗种，结小球于叶间。”“起初甚小，渐渐长空，其大如拳，或小如菱，形状圆长不等。初时青绿，久则细黄，缀于枝叶，宛若结成。其壳坚脆，其中空虚，有细虫如蠨螋。山人霜降前采取、蒸杀货之。”（《五倍子·集解》校点本第四册，第2236页）李时珍对五倍子的生长过程、形态、结构、采取时间、炮制方法，通过访问、观察，弄得清清楚楚；并订正其分类错误，移入虫部。

有些药物，容易以假乱真。李时珍主张要在采取它的时候，亲自观察，以定真伪。麋茸与鹿茸，离开麋鹿之体，则难于分别。李时珍在《麋角·修治》中写道：“麋、鹿茸角，今人罕能分别。陈自明以小者为鹿茸，大者为麋茸，亦臆见也。不若亲见其采取时为有准也。”（校点本第四册，第2861页）又如蛇黄，生于蛇腹中，如牛黄一样，是一种结石，因其难得，人们妄用蛇含石代替。说蛇入蛰时，含土一块，起蛰时，化作黄石。李时珍称这是“不稽之言”。为什么呢？他说：“有人掘蛇窟寻之”，并无此石。（《蛇黄·集解》校点本第一册，第623页）

关于螻蛄（又名果蠃、细腰蜂）繁殖的说法，李时珍也经过实地观察而正误。《诗经》记载：“螟蛉有子，果蠃负之。”说螟蛉是一种青虫，非蜂类，其子被果蠃抱走养大，就变成细腰蜂了。《庄子》说“细腰者化”，认为它由青虫变化而来。《列子》证明细腰蜂纯雄无雌，不能自行繁殖，故名稚蜂。扬雄《法言》中说：果蠃抱来螟蛉子后“祝之曰：类我！类我！久之变为蜂”。陶弘景对此作过观察，有正确记载。指出细腰蜂并不是有雄无雌不能自行繁殖，它生子如粟米大，捕青虫置蜂房中，目的是待子大时为粮。李时珍经过考察，在《螻蛄·正误》中写道：“今通考诸说，并检视其卵，及蜂之双双往来，必是雌雄。”（校点本第四册，第2233页）从而肯定陶弘景的正确说法。可见他光凭“通考诸说”，不能肯定谁是谁非。经过“检视其卵”并观察了细腰蜂的“双双往来”，才肯定细腰蜂是自行繁殖的。

（二）解剖、尝试，以核其实

药物的外部形态，可以通过视觉器官仔细观察，加以辨别；有些动物的内部构造和植物气味如何，就得进行解剖，或通过味觉器官的尝试，才能弄得明白。李时珍对许多药物都亲自进行尝试而品其甘、苦、辛、酸，进行实际解剖而知其内部结构。关于栝楼的气味，张仲景说它甘寒，成无己说它苦寒。李时珍亲自尝其味，肯定张仲景的论断正确。在《栝楼·发明》中写道：

“张仲景治胸脾痛引心背、咳唾喘息及结胸满痛，皆用栝楼实。乃取其甘寒不犯胃气，能降上焦之火，使痰气下降也。成无己不知此意，乃云苦寒以泻热。盖不尝其味原不苦，而随文傅会尔。”（校点本第二册，第1268页）李时珍批评成无己“不尝其味”而随文传会，把甘寒之药定的苦寒，他自己则力戒此等弊病，每每亲尝其味，再作结论。

花乳石（又作花蕊石），李时珍说它的功用专于止血，能使血化为水，又能下死胎，“非寻常草木之比”。对这味药物的气味，旧无记载。李时珍亲自尝试，然后记道：“今尝试之，其气平，其味涩而酸。盖厥阳经血分药也。”（《花乳石·发明》校点本第一册，第613页）

曼陀罗花是一种具有麻醉作用的重要药物。由于方言不同，名称不一，以致无人认识。李时珍按照古书对曼陀罗的描写，到武当山访问药农，重新确定了这味药物。此物当地人称风茄儿。为了证实风茄儿就是曼陀罗，李时珍进行了种种尝试。首先是经过尝试证实了关于它的传说：“相传此花笑采酿酒饮，令人笑；舞采酿酒饮，令人舞。”李时珍试验之后更正说：“予尝试之，饮须半酣，更令一人或笑或舞引之，乃验也。”（《曼陀罗花·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1211页）说明笑或舞不是来自采花者，而是麻醉后的表现。其次，证实曼陀罗花，须与火麻子花同用，才具有麻醉作用。他说：“八月采此花，七月采火麻子花，阴干，等分为末，热酒调服三钱，少许昏昏如醉。割疮、灸火，宜先服此，则不觉苦也。”（同上，第1212页）不难想象，曼陀罗花同火麻子花，合药的方法，服药的剂量，李时珍经过多次尝试才弄得如此准确。为了给割疮、灸火的病人减轻痛苦，他亲自实验，不知经受了多少痛苦。这种献身科学的精神，实在难能可贵。亲自尝试，以求真是，包含着极可宝贵的唯物主义格物精神。

为了研究动物穿山甲（即鲛鲤）的体内构造，李时珍曾对它进行解剖。这种动物外形有不少特点，它生活于湖广深山之中，其状如龟，背如鲤而阔，首如鼠而无牙，腹无鳞而有毛，长舌尖啄，尾与身同长。陶弘景说穿山甲，“张甲诱蚁”。李时珍亲自解剖，发现它“腹内脏腑俱全，而胃独大。常吐舌诱蚁食之，曾剖其胃，约蚁升许也”。（《鲛鲤·集解》校点本第四册，第2384页）穿山甲食蚁，经过剖其胃而得到证实。通过观察，发现它吐舌诱蚁的实际情况，校正了“张甲诱蚁”的陈说。这都反映了李时珍亲自实验以核其实的精神。他取得真知的见，主要靠这种精神。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指出：“知识的问题是个科学的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64页）李时珍在科学研究中，继承了我们中华民族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对一切科学知识采取诚实和谦虚的态度，走访四方，向许多农夫、渔夫、药农、樵夫虚心求教，甘当小学生，从而取得第一手科学资料，他亲口尝试，亲手解剖，弄清真象，才作出科学判断。他把亲眼察看、亲口品尝、亲手解剖的方法，作为他研究本草、解除疑难、订正错误所运用的第一位的科学方法。不少药物，为了便于观察、尝试，他还进行了栽植培养。他的家里有一个小小的药用植物园，他的父亲着手栽培，他从小就很感兴趣，他那种“——采视”，务求其真的精神，从少年时代就开始培养起来。

科学观察有直接观察和间接观察之别。针对本草学研究对象的特点，限

于当时的科学发展条件，李时珍主要是采用直接观察的方法，即用自己的眼、耳、鼻、舌、身等感觉器官，直接感知不同药物的外形、气味及内部构造，没有更多利用科学仪器和别的技术手段去考察研究对象。事实雄辩地证明，李时珍凭直接观察方法，也在本草学研究领域作出巨大科学贡献。这种科学方法，虽然比较简单，只要有诚实的态度，只要持之以恒，同样可以积累可靠的科学资料，推进药物学的深入发展。

二、比较和分类

在广泛收集标本、进行观察、试验的基础上，李时珍对大量药物资料进行比较、分类、加工整理，熟练地运用了比较和分类的科学方法。

在药物研究中观察试验方法，多使用于个体，目的在认识个别药物的形态、结构、气味等方面的特征。在这个过程中也少不了作某些比较。比较和分类方法，多施于若干个体之间，揭示它们之间的同中之异、异中之同。同中之异，指揭示形态相同相似的药物，在性质上的差异；异中之同，指揭示外部特征差异极大的药物，在气味主治上的共同性，经过科学比较，才能作科学分类。这就是通过揭示药物之间的外部特征或外部联系而进行现象的分类，以及通过揭示其本质特征或内部联系而作自然分类。李时珍运用比较、分类方法，对历代先贤所积累的以及他自己积累的知识，加以精心整理，编成 16 世纪的中国百科全书——《本草纲目》。这部药物学宝典为药物分类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同时把我国传统科学中的比较、分类方法，推进到一个新水平。这种科学方法，乃逻辑方法之运用。李时珍虽然没有写下系统的哲学著作，但在他的本草学科学体系和比较分类的科学方法中，闪耀着光辉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一）反复比较，以辨异同

李时珍运用科学的比较方法，对所收集的大量药物资料进行加工整理。要进行比较，应以确知的药物的形态、气味、主治等特征为依据；没有切实的依据而进行的比较，只能是不着实际的空谈。通过比较，目的是要使人们的知识更加清晰、可靠，易于把握，帮助人们触类旁通，汲取新的知识；不科学的比较，只能把事物之间的联系弄得更紊乱，得出错误的判断。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通过比较方法，纠正了不少以往本草的错误。或者属于名实之误，在“正名”栏中有所叙述；或者属于形态、产地之误，在“集解”栏中，多有涉及；或者属于气味之误，在“气味”栏中，作了论列；还有属于主治之误。以往本草中存在的这些问题，除通过观察与试验纠正部分错误外，更有效的是运用比较方法。我们不妨从形态比较、气味比较、主治比较三十方面加以分析，略见李时珍运用比较法的成就。

关于药物形态的比较。这是比较方法的初步运用。李时珍运用这种比较方法，揭示了众多药物的“同中之异”，即外部形态特征基本相同，在本质上却存在差异。这种现象在植物性药物和动物性药物中都大量存在。

石龙子，是动物性药物。以往本草书中，关于它的记载很多，描述各异。李时珍将同类动物加以比较后，指出：“诸说不定。大抵是水旱二种，有山石、草泽、壁屋三者之异”。（《石龙子·集解》校点本第四册，第 2385

页)他对石龙子和守宫进行考察,然后加以比较,分别描述道:(1)生山间者曰石龙,即蜥蜴。似蛇,有四足,头扁尾长,有细鳞,金碧色,入药。(2)生草泽间者曰蛇医。蛇有伤,则衔草以敷之。状同石龙而头大尾短,形粗,其色青黄,亦有斑白者,不入药用。(3)生屋壁间者曰蝮蜒,即守宫也。似蛇医而短小,灰褐色,不螫人,入药。(同上)经过李时珍的比较,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同一类动物,因生长的自然环境不同,各具有不同的保护色,形态也小有差异。一类动物有多种不同的名称,有的入药,有的不入药,经过比较分析就十分清楚。

菖蒲,是植物性药物。共有六七种名称,李时珍详加比较,确定菖蒲有五种,可作药用的只是其中的两种而已。他记述道:(1)生于池泽,蒲叶肥,根高二三尺者,泥菖蒲,白菖也。(2)生于溪涧,蒲叶厚,根高二三尺者,水菖蒲,溪荪也。(3)生于水石之间,叶有剑脊,瘦根密节,高尺余者,石菖蒲也。(4)家人以沙栽之一年,至春剪洗,愈剪愈细,高四五寸,叶如韭,根如匙柄粗者,亦石菖蒲也。(5)根长二三分,叶长寸许,谓之钱蒲。对五种菖蒲进行详细比较之后,李时珍诊断说:“服食之药,须用二种石菖蒲,余皆不堪。”(《菖蒲·集解》校点本第二册,第1357页)

对石龙子和菖蒲这两类生物进行比较后,使人认识到同类生物大同中有小异,有的入药,有的不可入药。还有一些植物,虽都可以入药,但存在大同小异。李时珍也用形态比较法,加以区分,然后得出新的科学结论。

杜衡、细辛、鬼督邮,三种不同药物,由于形态大致相似,常易混同,李时珍加以比较,作出区分。《细辛·集解》中写道:

《博物志》言,杜衡乱细辛,自古已然矣。……

大抵能乱细辛者,不止杜衡,皆当从根、苗、味细辨之。叶似小葵,柔茎细根,直而色紫,味极辛者,细辛也。叶似马蹄,茎微粗,根曲而黄白色,味亦辛者,杜衡也。一茎直上,茎端生叶如伞,根似细辛、微粗直而黄白色,味辛微苦者,鬼督邮也。

——校点本第二册,第817页

不少药物,自古相互混乱,给药物鉴定造成不少困难。李时珍的宗旨是,从根、苗、色、味等不同方面,详细比较,严加辨别,务求分别清楚,不致相乱。

关于药物的气味比较。和形态比较不同,药物气味的同与异,非表面观察所能解决,实际上是对药物的性质加以比较。石龙同守宫,白菖同钱蒲的形态差异,大约小学生部可以辨别,难的是不知其同。有些药物,形态之异,容易辨别,其性味之异同,则很难确知。一部本草,如不对药物性味作认真比较,一一认识清楚,则可能造成很大危害。李时珍决心重修本草,是由于他深知日本草的谬误,不可等闲视之。

及已和杜衡,形态同细辛很相似,前者有毒,后者无毒。李时珍通过试验,加以比较,得出结论。他说:

古方吐药,往往用杜衡者,非杜衡也,乃及已也。及已似细辛而有毒,吐人。昔人多以已当杜衡,杜衡当细辛,故尔错误也。杜衡则无毒,不吐人。功虽不如细辛,而亦能散风寒,下气消痰,

李时珍概括植物形态与功用、气味之间的异同，存在三种情况：功、苗皆异，功、苗皆同，功同苗不同。他举杜衡、及已、鬼督邮、徐长卿、细辛五种药物互相混乱的情况为例，在《徐长卿·集解》中写道：

鬼督邮、及已之乱杜衡，其对不同，苗亦不同也。徐长卿之乱鬼督邮，其苗不同，其功同也。杜衡之乱细辛，则根苗、功用皆仿佛，乃弥近而大乱也，不可不审。

——校点本第二册，第 822 页

在这里，李时珍启示人们，针对本草学这门学科的特点，运用比较方法时，应考虑多种可能性，不能只考虑同中之异，异中之同两种比较方法。

关于药物主治功能的比较。药物的四气、五味各别，其主治、归经大异，不可不认真加以比较。这种比较，较气味上的比较更为复杂。李时珍既精医又精药，在药物的主治功能方面，经过比较研究，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订正了许多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

前胡和柴胡，都是治痰气的重要药物，但所人之经、所主之证都不相同。李时珍加以比较，指出其“所人”、“所主”之异。他说：前胡味甘辛，气微平，阳中之阴，降也，乃手足太阴、阳明之药；柴胡，纯阳，上升，为少阴、厥阴之药，陶弘景说二者同功，不对。（《前胡·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 790 页）陶弘景认为前胡与柴胡同功，这也是一个比较性的结论，反映的是他那个时代医药科学的发展水平。历史发展了，医药科学水平提高了，李时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肯定陶氏所说的治证相同的一面，而揭示了二者所人、所主各异的一面，这是对医药学的发展。

同样的道理，也表现在麻黄和葛根这两味药上。本草十剂中说：“轻可去实，麻黄、葛根之属。”即肯定二味药同有“去实”的功效。李时珍对这两味同效的药物，作了进一步的比较，在《葛·发明》中指出：

盖麻黄乃太阳经药，兼入肺经，肺主皮毛。葛根乃阳明经药，兼入脾经，脾主肌肉。所以二味药皆轻扬发散，而所主迥然不同也。

——校点本第二册，第 1278 页

十剂的作者，只比较麻黄、葛根的发散功效，从一个方面将二者对举。李时珍不以此为满足，而着眼于二者入经的特性的比较，故发现其“迥然不同”的另一面。

本草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许多药物名称常常相混，因此在进行气味、主治功效的比较时，不得不先审核名实。如将同名而异实的药加以比较，是不会得到正确结论的。例如消石和朴消，这两种药物在过去十分混乱。

消石，被认为是十分神奇的药物。李时珍引用土宿真君的说法：“消石感海卤之气所生，乃于地至神之物。能寒能热，能滑能滞，能辛能苦，能酸能咸。人地千年，其色不变。七十二石，化而为水，制服草木，柔润五金。”（《消石·发明》校点本第一册，第 653 页）以往本草著作，消石一名芒消；朴消一名消石朴，从中可以炼出芒消与牙消。于是消石与朴消“二名相混，遂致费辩不决”，“诸消，自晋唐以来，诸家皆执名而猜，都无定见”。（《消石·正误》校点本第一册，第 652 页）李时珍经过比较肯定“消有水火两种，

形质虽同，性气迥别。”（同上）《名医别录》将消石“列于朴消之下，误矣”。二者所异何在？李时珍写道：朴消属水，味咸，气寒，其性下走，阴中之阴，折治三焦邪火；消石属火，味辛带苦，微寒，气大温，性上升，水中之火，升散三焦邪火。（校点本第一册，第 653 页）经过这样的科学比较，人们对消石、朴消的异与同，有正确的认识了。

芒消和牙消，虽然都从朴消中提炼而来，同朴消相比亦有性味功用之别。李时珍经过周密比较，在《朴消·发明》中写道：“朴消澄下，消之粗者也，其质重浊。芒消、牙消结于上，消之精者也，其质清明。甜消、风化消，则又芒消、牙消之去气味而甘缓轻爽者也。故朴消止可施于卤莽之人，及傅涂之药；若汤散服饵，必须芒消、牙消为佳。”（校点本第一册，第 646 页）

《本草纲目》的重要贡献之一，在于建立一种超越前人的科学分类方法，这种先进的分类方法，正是以对药物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比较分析为基础。比较方法和分类方法，二者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

当然，比较方法也有它的局限性。正如列宁早已揭示的那样：“任何比较只是拿所比较的事物或概念的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来相比，而暂时地有条件地撇开其他方面。”^①任何事物都有多方面的属性，人们按照实践的需要，只比较了其中的一个或几个方面的属性，随着实践的发展，需要比较的方面是会不断增加的。对药物的比较尤其如此。先前经过李时珍分析比较研究，认为可以归为一类的药物，按照今天的生物分类标准，未必仍应归入一类，昔日认为性味相同的药物，用现代化学的分析，其成分则很不一样。这都是不足为奇的。由于进行比较的参考系不同，所作出的结论，只具有相对真理的性质。

（二）析族区类，以定纲目

我国古代哲学名著《易传》，提出“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的原理，提倡“析族区类”的分类研究方法，这是符合辩证逻辑的方法。李时珍继承发展这种优秀思维传统，运用分类方法特别成功。《本草纲目》的科学体系，是按照科学分类方法精心构造成功的。

分类方法许多学科都可运用。在医药学上的运用，特别引人注目，并得到非常显著的成功。李时珍继承古代药学分类成果，运用分类方法按药物的自然属性，创立了“三界十六部”分类法，建立了《本草纲目》一书的基本构架，按药物的主治功能，发展了“百病主治药”分类法，按药物归经原理，创立了“十二经血气分”分类法。

1. 关于“三界十六部”分类法

李时珍鉴于以往本草著作，存在“水火不分，草木互混”，以致“或木居草部，或虫入木部，水土共居，虫鱼杂处”（《进本草纲目疏》校点本第一册，第 23 页）等分类上的紊乱。他坚持打破沿袭 1000 多年的《神农本草经》所使用的上、中、下三品分类法，改造《证类本草》的十三部分类法；而创立三界十六部分类法。

他首先把近 1900 种药物，按其自然特性，分为无机物界、动物界、植物界三界。

无机物界包括水、火、土、金石四部。

植物界包括草、谷、菜、果、木、服器六部。

动物界包括虫、鳞、介、禽、兽五部，而殿以人部。

三界共计十六部。《本草纲目》不标界名，直以部为总纲。以十六部代替过去的三品分类，在药物分类学上是一次重大发展。

在十六部之下，又按动物、植物、无机物的自然形态，划分 60 类。每部各分若干类，作为小纲。如草部下分山草、芳草、隰草、毒草、蔓草、水草等；木部下分香木、乔木、灌木、寓木、苞木等；禽部下分水禽、原禽、林禽、山禽。

每类动物、植物，还隐然分为若干族，虽未列出族的名称，实际有按族分类的思想。例如菊科、禾本科、百合科、姜科药物基本上集中在一族加以论列。

每族之下，集中论列若干不同药物。例如在兰的后面列有菊科植物：野菊、艾、千年艾、青蒿、白高等。小麦后面列有禾本科植物小麦、大麦、雀麦、稻、粳、粬、秣等。总之，把亲缘关系接近的植物都排列在一起，表明他的分类法中，不只有类的观念，还有族的观念。他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就是“析族区类”，这一思想得到了认真贯彻。用现代生物学分类法来衡量，当然有不尽恰当之处。但其草创之功，十分卓著。

李时珍按照三界、十六部、六十类、若干族的分类体系，对 1892 种药物进行分类，从而建立起自己的药物学科学体系，使本草学面貌一新。

从无机物到有机物，从植物到动物，从低等动物到高等动物再到人类，反映了他初步具有的进化论思想。从核定名实的个体研究着手，进而概括归类，又显示他运用了从特殊到一般的逻辑归纳方法，这都符合人类认识发展的一般规律，值得肯定。

2. 关于“百病主治药”分类法

研究本草是为了治病，对每味药物的气味、主治、附方加以单个分析，目的是让人们每种药物能循名责实，明体达用。根据研究的结果，建立了《本草纲目》的体系，同时对许多重要药物画出精致的图形，便于人们按图查找。但这样毕竟比较分散，往往不便于急用。医生处方往往先考虑病症，再考虑所需的药物。为了实用方便，李时珍发展了陶弘景的主治药分类法，建立了更完善的“百病主治药”分类法。

陶弘景撰《本草经集注》，附有“诸病通用药”一项。他只列了 80 多种病，分别注以寒、热、平三种药。李时珍认为这样归纳本草的研究心得，能为后人提供重要启示。他发展这一思想，按主治功能将药物归类，撰写了“百病主治药”二卷，排在《本草纲目》的前面，作为全书的第三卷、第四卷。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凡例》中阐明编纂宗旨说：“古本百病主治药，略而不切。王氏集要，祝氏证治亦约而不纯。今分病原列之，以便施用，虽繁不紊也。”（校点本第一册，第 34 页）

为了便于施用，又力矫古本“略而不切”之弊。李时珍按病机分类，共列 113 种主病，按内科、外科、儿科、妇科用药。有内服药，也有外用药。药品之下，载有用方。每种药品，注明在《本草纲目》中所属部类。有的药物，还特地注明剂量及服用方法。

例如治血虚的主治药，共列 27 味，草木类药物 13 味，如地黄、麦门冬、泽兰、黄檗、当归、丹参、玄参等；介兽类药物 14 味，如龟版、绿毛鱼、阿胶、牛乳、羊肝、羊胃等。在地黄下面，详细注明用法说：“男子五劳七伤，女子伤中失血。同人参、茯苓熬琼玉膏。酿酒、煮粥皆良。面炒研末 13 酒服。治男女诸虚积冷，同菟丝子丸服。”（《百病主治药·血虚》校点本第一册，第 207 页）按病症归纳主治药的分类方法，其优越性在便于因病寻方，帮助

处方者因病制宜，迅速作出最优选择，以应急需。

“百病主治药”分类法与“三界十六部”分类法各有优点：后者以药为纲，以主治为目，按药论治，一味药治诸种病证，可以困药而一目了然；前者以病为纲，以药为目，同一病证，可用诸药治疗，全盘托出，便于按当时、当地的可能条件进行选择。比如治血虚共列有 27 味药，其中有的易得，有的难觅，有的价昂，有的价贱。处方时，既要根据病证的需要，还要考虑获取药物的实际可能性及患者的经济负担能力。李时珍建立“百病主治药”的分类，用心极深。

3. 关于“药物归经”分类法

李时珍除了以药为纲、以病为纲的分类法，还创立了药物归经分类法。即将药物和病证结合起来，阐明每种药物进入人体，归入哪一经，便于辨证用药。

中医学把人体脏腑功能机制分为十二经。李时珍把药物归经性能也分为六阳经、六阴经。《本草纲目》的许多药物，都注明归经属性。如：

丹皮，治手、足少阴、厥阴四经血分伏火。（校点本第二册，第 854 页）

茺蔚子，味甘、微辛、气温、阴中之阳，足厥阴经药也。（校点本第二册，第 952 页）

黄连，入手少阴心经，为治火之主药。（校点本第二册，第 771 页）

前胡，味甘辛，气微平，阳中之阴，降也。乃手、足太阳、阳明之药。（校点本第二册，第 790 页）

麻黄乃太阳经药，兼入肺经。（校点本第二册，第 1278 页）

以药物归经解释药物功效及主治的思想，首先是以药物自身性味特征为根据，同时继承发展了《内经》以来医家坚信的“五色、五味入五脏”的理论。故李时珍说：“药具五味，备四气”，“五味入胃，各归其本脏。”《校点本第二册，第 839 页）

李时珍用归经理论解释药物的主治功效，更能令人信服。如解释钩藤败火的原理说：

钩藤，手、足厥阴药也。足厥阴主风，手厥阴主火。惊痛眩运，皆肝风相火之病。钩藤通心包干肝木，风静火息，则诸证自除。

——《钩藤·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 1320 页

除了讲药物归经之别，李时珍还强调药物属气、属血的区别。把人气分之药，与人血分之药加以区别的目的，在于使药物主治的范围更加具体明确。李时珍分析大黄的特性说：

大黄，乃足太阳、手足阳明、手足厥阴五经血分之药，凡病在五脏血分者，宜用之。若在气分用之，是谓诛伐无过矣。

——《大黄·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 1117 页

可见，明其归经，又明其血气之分，对一种药物的使用，才能准确无误，以入血分之药，治气分之病，则会南辕北辙，适得其反。

李时珍认为药物虽按归经分类，但不可泥一。由于君臣佐使配伍不同，可以改变药物归经去向。如常山、蜀漆，“得乌梅、鲛鲤甲则入肝，得小麦、

竹叶则入心，得秫米、麻黄则入肺，得龙骨、附子则入肾，得草果、槟榔则入脾。”（《常山·蜀漆·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1151页）

每一种分类方法，都难免存在一定局限性，因为它只突出药物的某一方面的特性或属性，而这些特性或属性，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作为单方使用或在复方中使用，功效大不相同，故只凭分类，不足以全面认识药物的特性与主治。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所谓存乎一心，当然不是指主观想象，而要以客观事实及客观规律为依据。不同的分类，无非便于人们在实践中掌握和运用客观规律，为人类造福。

三、分析与综合

任何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都离不开分析与综合的科学方法。李时珍也不能例外。分析方法的特点在于把整体的东西，分解为若干部分，然后对每一部分作深入研究，从而肯定每个局部的性质、特点、作用。综合方法的特点，是把已经分析过的局部结合为一个整体，从而论断这个整体所固有的功能、特性。综合要以分析为基础，没有透彻的分析，不可能有完满的综合；分析要以综合为依归，先有分析而无综合，则见树不见林，使分析流于烦琐。《本草纲目》中，李时珍既重分析，又重综合，尤其重二者的辩证统一。《本草纲目》科学体系的构思，是对药物进行细致分析的基础上的科学综合。《本草纲目》的诞生，是分析与综合辩证统一的见证。它既使我们对每一味药物有明晰的了解，又使我们对本草学有全面的认识。纲不举则目不张，目不明则纲不实，李时珍深明其中奥理。

（一）首重分析，以知究竟

修订本草，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从何下手呢？李时珍首先分析研究了每一味药物，为全书打下坚实基础。

为了弄清每一味药味，李时珍为自己提出八项任务，一项一项加以分析。这八项任务是：释名、集解、辨疑、正误、修治、气味、主治、发明、附方。为什么要提出八个方面的任务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凡例》中，阐述得十分明白。他说：

诸品首以释名，正名也。次以集解，解其出产，形状，采取也。次以辨疑、正误，辨其可疑，正其谬误也。次以修治，谨炮炙也。次以气味，明性也。次以主治，录功也。次以发明，疏义也。次以附方。著用也。

——校点本第一册，第34页

这八项不是每味药都全有，五项、六项不等。对某一味药物来说，它既是全面分析，同时也进行了综合，使我们对某一味药有了全貌的了解。完成每一味药物的分析，对于全书来说，只完成了一项分析任务。

就八项任务来说，每一项都须要经过细致的分析，才能得出明确的结论。

拿“修治”一项来说，不同的药物有不同的修治方法，这本身是一种分析。同一种药物修治方法不同，其性味各别，这也要作具体分析。以附子为例，李时珍在《附子·修治》中写道：

附子，生用则发散，熟用则峻补。生用者，须如阴治之法，去皮、脐入药。熟用者，以水浸过，炮令发折，去皮脐，乘热切片再炒，令内外俱黄，去火毒入药。

——校点本第二册，第 1160 页

这是对附子的生用、熟用两种修治方法、两种性味功效的分析。通过这种分析，对附子的功效有全面的认识，这又是综合的妙用。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的“发明”一栏，阐述了自己对某些药物性能的独到见解，这些见解大都是他在对该药物进行深入分析时得出的结论。这些分析性质的结论，对于认识一味药物的功效极其重要。

李时珍分析蜂蜜的功效说：“其入药之功有五，清热也，补中也，解毒也，润燥也，止痛也。”蜂蜜为什么具有不同功效？他指出这是由本身的特性：“生则性凉，故能清热。熟则性温，故能补中。甘而和平，故能解毒。柔而润泽，故能润燥。”（《蜂蜜·发明》校点本第四册，第 2219 页）

人参的种类颇繁，有黄参、沙参、丹参、牡蒙、丹参等等。每种参的颜色不同，功用有别。《本草纲目》中一一作了分析，写道：

五参五色配五脏。故人参入脾曰黄参，沙参入肺曰白参，玄参入肾曰黑参，牡蒙入肝曰紫参，丹参入心曰赤参，其苦参则右肾命门之药也。古人合紫参而称苦参，未达此义尔。

——《丹参·释名》校点本第二册，第 758 页

以上可以看出，对于每味药物的气味、主治、修治、发明等等，需要进行分析，才会取得对药物的全面认识。同样，对于每一类病证，也需要进行科学分析，才能取得全面认识。

中医按八纲辨证，每一纲所包括的诸种病证大有分别。若不进行仔细分析，也不可能真正理会八纲辨证的精义。例如实证，《内经》指出：“实者泻之”，“实则泻其子”。同样是实，同样要泻，都必须严加分析，才能投之以适当的药物。李时珍深明其理。

徐之才曾创立“十剂”之说。将众多的药方按对证的需要及性质，分为十类，即宣、通、补、泄、轻、重、涩、滑、燥、湿。李时珍称它为“药之大体”，对之十分重视，载之于《本草纲目》卷端。“十剂”是对众药的全面综合。但每一剂又需作深入分析，才能运用自如。对十剂之中的轻剂，李时珍分析道：

轻可去闭。有表闭、有里闭。……表闭者，风寒伤营，腠理闭塞，阳气怫郁，不能外出，而为发热、恶毒、头痛、脊强诸病，宜轻扬之剂发其汗，

而表自解矣。里闭者，火热郁抑，津液不行，皮肤干闭，而为肌热、烦热、头痛、目肿、昏瞶、疮疡诸病，宜轻扬之剂以解其肌，而火自散也。

——《十剂·轻剂》校点本第一册，第 62 页

同样，用轻扬之剂以治闭证，但有区别。属于表闭之证，宜用利于发汗的轻利之剂；属于里闭之证，宜用利于解肌的轻扬之剂，不可一概而论。利用轻剂时如此，利用重剂何独不然？李时珍指出重剂的使用，应分析四种情况，区别对待。在《十剂·重剂》中写道：

重剂凡四：有惊则气乱，而魂气飞扬，如丧神守者；有怒则气逆，而肝火激烈，病狂善怒者，并铁粉、雄黄之类以平其肝。有神不守舍，而多惊健忘，迷惑不宁者，宜朱砂、紫石英之类以镇其心。有恐则气下，精志失守而畏，如人将捕者，宜慈石、沉香之类以安其肾。

——校点本第一册，第 62 页

同样是利用重剂以镇惊恐，或用以平其肝，或用以镇其心，或用以安其肾，所用方药大不一样。贵在平时多作分析，知其机要，急时才不致误投药饵，有损医治。

李时珍分析了用宣剂治郁塞之病的诸种情况。肯定郁塞之病，是由于“传化失常”造成的，或者由于“郁久生病”，或者由于“病久生郁”，都宜以药物“宣布敷散”。但郁证有气郁、火郁、食郁、痰郁、湿郁之别，每种郁证还有轻微和严重之分，都应细加分析，然后才可对证施治。他用具体分析的方法，剖析了六种郁证不同病情时所宜使用的宣剂，指出：

气郁，有余则香附、抚芎之属以开之；不足则补中益气以运之。

火郁，微则山后、青黛以散之；甚则升阳解肌以发之。

湿郁，微则苍术、白芷之属以燥之；甚则风药以胜之。

痰郁，微则南星、桔皮之属以化之；甚则瓜蒂、藜芦之属以涌之。

血郁，微则桃仁、红花以行之；甚则或吐或利以逐之。

食郁，则山楂、神曲以消之；甚则上涌下利以去之。

——《十剂·宣剂》校点本第一册，第 61 页

均是宣剂，或用以运气，或用以散火，或用以燥湿，或用以化痰，或用以行血，或用以消食，都需作具体分析，不可见郁证即乱投宣剂。

分析方法好似一把思维中的解剖刀。利用它可以把研究对象，分爪切片似地剖成若干细部，便于逐一加以研究。科学分析，就是哲学上的矛盾分析。事物总有差别，差别就是矛盾。对药物的各种差异，病证的各种差异，加以具体分析，也就是分析矛盾，找出不同矛盾的不同解决方法。

（二）注重综合，以明指归

李时珍注重分析方法，也注重综合方法。《本草纲目》是分析和综合辩证统一的产物，其中有些篇章是专门引导人们注重综合问题的。李时珍创立的“三界十六部”的分类法。是综合 1800 多种药物而形成的；他所发展的“百病主治药”的分类法，也是综合了 100 多种病证所用的数以千计的药物而形成的。这些都是他善于在分析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的有力证明。

他特别善于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竭力推广、发展各种用药凡例或用药法式。《本草纲目》的第一卷和第二卷，标名《序例》，集中介绍、注释了许多著名医药学家的综合研究的成果。例如《十剂》、《四时用药例》、《脏腑虚实标本用药凡例》、《陈藏器诸虚用药凡例》、《张子和汗吐下三法》等。李时珍之所以集中介绍和注释这些著名医家的成果，并特意将这些内容列在《本草纲目》的最前面，作为自己的科学著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用心不外两个方面：

第一，利用前人科学研究成果，提高自己的医药思想水平，作重修本草

的理论准备，以使用以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在对每味药物进行分析研究时，从总的理论原则上有所依循，而不致陷于烦琐。

第二，以医药界的前贤为榜样，勉励自己，并昭示后学者。在对每味药物进行具体分析的同时，不可只沉湎于细则，尤须从总体上加以把握，不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如堕烟海而迷失指归。善于综合归纳，才能掌握一般原则或规律。

总之，李时珍的这一思想明显地告诉人们，要注重分析与综合的有机结合，归纳与演绎的辩证统一。二者不可偏废。

李时珍对《神农本草经名例》的注释，充分显示了他对分析与综合的灵活运用。《本经名例》总结了汉代以前千百年医药实践经验，语言过于简练，后人不易理解。李时珍广征博引，逐条加以阐释，其中凝结着他自己长期医药实践的经验。用自己的经验去充实发展了古典文献。

《本经》中有一段话，讲药物之间的关系，说药有“七情”。写道：“有单行者，有相须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恶者，有相反者，有相杀者。凡此七情，合和视之。”李时珍对于古人从大量事实中综合概括出来的“七情”原理，作了精湛的注释。他说：独行者，单方使用，无须辅助；相须者，同类之药，不可相离；相使者，彼可为我之佐使；相恶者，有彼则夺我之能；相畏者，我受彼制伏；相反者，两者不可相合；相杀者，以此制彼之毒。但他进一步指出：“古方多有用相恶、相反者。盖相须、相使同用者，帝道也；相畏、相杀同用者，王道也；相恶相反同用者，霸道也。有经有权，在用者识语尔”。（校点本第一册，第46页）从科学方法上来衡量，这一段注释使用了三重综合法。从千百种药物的相互关系中，概括出“七情”，是第一步的综合；从“七情”中概括出帝道、王道、霸道三大原则，是第二层综合；无论对于帝道、王道、霸道，都要求“有经有权”，灵活运用，这是从哲学原理上作出总结，属于更高的综合。

李时珍对徐之才创立的“十剂”说，作了详细的注释。在注释中，有分析、有综合，尽量将两者辩证统一起来，使注释具有很高的科学性。他对“补剂”的注释，就是在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综合的。

经云：不足者补之。又云：虚则补其母。生姜之辛补肝，炒盐之咸补心，甘草之甘补脾，五味子之酸补肝，黄檗之苦补肾。又如获神之补心气，生地黄之补心血；人参之补脾气，白芍药之补脾血；

黄芪之补肺气，阿胶之补肺血；杜仲之补肾气，熟地黄之补肾血；芎藭之补肝气，当归之补肝血之类，皆补剂，不特人参、羊肉为补也。

——校点本第一册，第61页

引证经典论述，重申“虚则补其母”的原则，这是对施治方法的高度综合概括。指明不同脏腑之病，须用不同药物补之：血虚与气虚不同，补药尤有区别，这是进行了具体分析，使“虚则补其母”的原则得以具体贯彻。最后指出，只要药能对证，那怕是生姜、炒盐、五味子，都是补药，不只有人参、羊肉是补品。这是从药随病使的原则对补剂作了高度概括，在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综合性结论。批判了多食人参、羊肉为补的世俗之见，令人信服。

李时珍特别阐发了《黄帝内经》关于顺天时而用药的原理，标名为《四时用药例》。他首先指出：“顺春升之气，宜用薄荷、荆芥之类辛温之药；顺夏浮之气，宜用香薷、生姜之类辛热之药；顺秋降之气，宜用芍药、乌梅之

类酸温之药；顾冬沉之气，宜用黄芩、知母之类苦寒之药。”其所以如此，这是“所谓顺时气而养天和也”。同时指出：《内经》讲过春季省酸增甘以养脾气，夏季省苦增辛以养肺气，秋季省辛增酸以养肝气，冬季省咸增苦以养心气。为何又同上述原理有些差别？这是“既不伐天和而又防其太过，所以体天地之大德也”。经过正反两方面分析，指明顺天时用药所应注意的两个方面。既要顺时养和，又要防其太过，把两个方面有机结合起来，灵活运用。就是李时珍利用分析综合的方法而获得的“四时用药例”的精神实质。四时用药例，分析时令的变化，药物的功效，药物的配伍，以及人体脏腑机制等方面的基本情况，并将各个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得出一般的结论，然后归纳为总的指导思想，充分体现了李时珍辩证地利用分析综合方法所取得的科学成就。

四、批判继承

《本草纲目》将上下数千年积累的医学、药学成果冶于一炉，正可谓吞吐百家，推陈出新。在研究过程中，李时珍熟练地运用了批判继承的科学方法。为修订本草，他参考了历代本草著作 41 种，医家著作 277 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如蜜蜂之采百花以酿蜜。每个问题的分析，总是从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出发，经过周密思考，反复验证，或淘汰陈说，或加以修正，或自出心裁。既重视批判继承，又着眼于新的创造。

本草学的重要特点之一，在于内容的不断更新。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医药卫生条件不断改善，药物数量在不断增加，人们对药物的认识也日益精细。最初的《神农本草经》，收录药物只 365 味，简单地分为上、中、下三品，每味药物下所作的说明多则几十字，少则几字。梁陶弘景撰《名医别录》新增汉魏以来医家所用药物 365 味，本草总数翻了一番。唐代苏恭等以《别录》为蓝本增订为《唐本草》，又增药 114 种，分为十一部。宋代唐慎微将《唐本草》以后数种本草著作综合而编成《证类本草》，所收药物已达 1000 多味了。李时珍以《证类本草》为底本，增加了新药 374 种，总计药 1892 味（实为 1897 味）。对每味药物产地、形态、修治、气味、主治、附方的认识日益精细，充分表明药物学在批判继承中不断更新、充实、发展。李时珍对医药学文化遗产坚持批判继承的方针和方法，对本草学、医学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推陈出新，发展本草学

在研究每一味药物时，李时珍总是首先参考诸家本草，掌握先行资料，考校诸家异同，然后用自己观察、试验取得的新资料，加以参证。他原原本本地保留了诸家本草的原始资料，不埋没前人研究的成绩和独到贡献；但决不满足于罗列前人陈说，总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充实以新的内容。对前人的见解，正确的加以汲取，不全面的加以补充，错误的加以纠正。《本草纲目》的“集解”一栏，多陈述前人主张；“发明”一栏，多标示自己独到之见；“正误”一栏，多纠正前人谬误之说，同时断以己见。《本草纲目》全书字里行间渗透着李时珍在批判继承中发展本草学的严谨学风和独创精神。

对于每一味药物的气味，李时珍是十分留心的，因为它关系到药物的主

治功效，关系到药物经不同配伍而产生的新功效。例如枸杞一药，从形态到气味有四家不同记述。《本经》只标枸杞之名，未指明是用枸杞之根、茎，还是叶、子，部位不明。《名医别录》略加区别，指明根大寒，子微寒，似乎枸杞是指根。《药性论》说，枸杞甘、平，子、叶皆同，似乎枸杞是指苗。至《本草衍义》，则明言枸杞是梗皮。李时珍根据以上不同记载，认真分析研究，最后得出结论。写道：

窃谓枸杞：苗、叶，味苦甘而气凉；根，味淡气寒；子，味甘气平。气味既殊，则功用当别。此后人发前人未到之处也。

——《枸杞·气味》校点本第三册，第2112页

《本草纲目》全书，大都采用这种格式，先述诸家异同，然后作出自己的判断。“发前人未到之处”，是李时珍为自己提出的科学要求，即不袭前人巢穴，而推陈出新。

关于茜草的药用功能，《名医别录》和日华子的见解恰好相反，一言益精气，一言泄精。李时珍详加分析，指出：“茜草，赤色而气温，味微酸而带寒。赤色入营，气温行滞；味酸入肝而咸走血。手足厥阴血分之药也。专于行血和血。”同时批评二家说：“《名医别录》言其久服益精气、轻身。日华子言其泄精。殊不相合，恐未可凭。”（《茜草·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1311页）

李时珍的批判继承精神，表现在对前人正确的地方，不管是方士、僧人之言，还是民谚俚谣，都加以肯定：如有错误，即使是名家也予以严肃批评。例如对竹笋的性味，一位僧人的观点就比一位著名医家正确，李时珍肯定前者而批评后者。他说：“笋性滑利，多食伤人。僧家谓之‘刮肠篋’，即此义也。丹溪朱氏谓大寒，言其功不言其气，殊悖于理。谓大寒为气，何害于功？”（《慈竹沥·发明》校点本第三册，第2168页）

李时珍注意收集民间验方、单方，予以细心研究，汲取其中有益的成分。《玉函方》中介绍了仙人王子乔服用甘菊长生的验方，说在每年三、六、九、十一月的上寅时，分别采取菊的苗、叶、花、根茎，将四者捣末为丸酒服。服百日，身轻；服一年，发由白变黑；服二年齿落再生；服五年，能活80岁以上。李时珍并不因其为方士的宣传而轻易抛弃。他认真加以研究，肯定菊花保健、抗老的作用，并从理论上加以说明。指出：

昔人谓其能除风热，益肝补阴。盖不知其得金水之精英尤多，能益金水二脏也。补水所以制火，益金所以平木；木平则风息，火降则热除。用治诸风头目，其旨深微。

——《菊花·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931页

据现代医学临床试验的结果，菊花治高血压有很好的疗效，46例中35例血压降到正常。治冠心病也很有效，61例中80%都有效，其中43.3%效果显著。菊花确是延年益寿的珍品。

批判继承方法，是历史科学常用的方法。关键在于对先行资料作客观的科学分析，法古而不泥古，疑古而不沦于历史虚无主义。这种方法之所以能推进科学发展，在于它使人们在科学研究中推故而别致其新，把前人的不同见解，作为自己前进的基石，视为创立新思想、新理论的诱导物。李时珍对

泽泻的研究就是如此。

古方肾气丸中有泽泻。泽泻在此方中居于什么地位，起何作用？前人众说纷坛。有人认为它只起引导作用，即引桂附等归肾经；有的认为它起泻的作用；有人认为它起补的作用，补虚损五劳。李时珍经过深入考察，对三种不同主张加以评断，肯定张仲景用泽泻，是为了“泻膀胱之邪气，非接引也”。他不是简单地作个评断了事，进而从哲学上讲明补和泻对立统一的道理，他说，前贤用补药，必兼泻药。去其邪，补才生效，补泻兼施，乃制方中对立统一的奥理。如果一味施补而不兼泻，就会走向极端，产生偏胜之害。《泽泻·发明》写道：

古人用补药必兼泻邪，邪去刚补药得力，一辟一阖，此乃玄妙。后世不知此理，专一于补。所以久服必致偏胜之害也。

——校点本第二册，第1350页

李时珍惯于通过某一具体药物性能的探讨，悟出一则医药学上的妙理。结合具体问题，分析处方配伍中的哲理，令人倍感亲切，易于接受和理解。医学理论来自实践，又反过来对实践起指导作用。在李时珍的著作中，这种精神表现得很突出。

（二）阐幽发隐，发展医学思想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不只对本草学有许多新贡献，对医学也时时发表创见。他的医学创见，多是从常识中悟出妙理，对古方加以新用，继承先贤研究成果而来。有些古代医学原则，一经他的阐发，别开生面，使人茅塞顿开。

比如，在对证施药上有两句口头禅，叫做“无汗用麻黄，有汗用桂枝”。是使用麻黄汤和桂枝汤的常识。最早由汉代张仲景提出，历代医家普遍应用。至于为什么如此，正如李时珍批评的“历代名医解释，皆随文附会，未有究其精微者”。（校点本第二册，第1009页）李时珍从这一常理中，“究其精微”，得到“与昔人所解不同”的独到心得。他认为：“麻黄汤虽太阳发汗重剂，实为发散肺经火郁之药也。”“桂枝（汤）虽太阳解肌轻剂，实为理脾救肺之药也。”这两条新结论，是他经过反复实践和深入研究而取得的，乃名医妙解，决非平庸之辈所能道出。

无汗用麻黄，是因“寒伤营，营血内塞，不能外通于卫。卫气闭固，津液不行，故无汗发热而增塞”。既然无汗的根源在于卫气闭固。由于皮毛外闭，邪热内攻，无汗而发热，根据肺主皮毛，而辛走肺的原理，看出麻黄汤的实质在于“散肺经火郁”。

有汗用桂枝，是因“风伤卫，卫气外泄，不能内护于营。营气虚弱，津液不固，故有汗发热而恶风”。既然有汗的根源在于营气虚弱，津液不固，原因还在于卫气外泄，不能护营。根据脾主营，肺主卫，泄木以固脾的原理，可以肯定桂枝汤的作用，实质在于“理脾救肺”。

这说明看问题不能只根据有汗、无汗、恶寒、恶风等表面现象，还当从脏腑机制上去找原因。对药剂也不能就药论药，只求表面效果，还须以脏腑病机为纲，从保持人的生理机能内在平衡的整体观念出发，才能正确判断某一方药的实质。李时珍创造性地运用批判继承方法，从古代名医的既成结论出发，独运匠心，苦索精思，终于阐发出“千古未发之秘旨”。（《麻黄·发

明》校点本第二册，第 1009 页)

李时珍对《伤寒论》中的大黄黄连泻心汤所主的脏腑病机，也作出与众不同的新解。成无己在注释此方时，认为是用“大黄黄连之苦寒，以导心下之虚热”，肯定此方功效在泻心的虚热。李时珍从临证经验出发，纠正了这一名家定论。他解释说：“张仲景治心下痞满，按之软者，用大黄黄连泻心汤主之。此亦泻脾胃之湿热，非泻心也。”（《大黄·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 1117 页）他把大黄黄连泻心汤的主治功效订正为泻脾胃湿热，既继承了张仲景传下的宝贵经验，又纠正以往的错误理解。法古而创新的科研精神，值得效法。

李时珍对前人经验的批判继承，还表现在古方话用方面。古人留传下许多治病的单方、验方，是医家的共同财富。运用得当，可生奇效。李时珍留心前人经验，时有新的发明。

他从朱真人《灵验篇》读到一病案：有人患风湿数年，医家令掘一上坑，让患者坐坑内，解衣，以热汤淋之，淋到一定时间，再以竹簟盖上，令其发汗。患者经此发汗，病就好了。这一方法的特点是不用药物，只用热汤通其经络。李时珍借鉴此法，治愈类似患者。他对这一方法作了改进，“治寒湿，加艾煎汤，治风虚，加五枝或五加煎汤淋洗。”（《热汤·发明》校点本第一册，第 407 页）借用古人方法，又不生搬硬套。根据实际需要，灵活变通。这类事例，《本草纲目》中屡见不鲜。

失笑散是一种古方，最初在《和剂局方》中只说明可治妇女产后淤血引起的“心腹痛”；后来《三因方》一书，扩大其适应范围，说可治“小腹气痛”；再后，《儒门事亲》进一步扩大适应范围，说可治男子小肠气痛。李时珍加以研究，并经临证试验，最后总结自己的亲身体会说：“失笑散，不独治妇人心痛、血痛。凡男女老幼，一切心腹、胁肋、小腹痛、疝气；并胎前产后，血气作痛及血崩经溢，百药不效者，俱能奏功。屡用屡验，真近世神方也。”（《寒号虫·发明》校点本第四册，第 2643—2644 页）李时珍扩大古方失笑散的适应证，屡用屡验，但并不是盲目地搬用。他对此方作了深入分析研究，发现其中五灵脂（寒号虫屎）、蒲黄二药，皆足厥阴肝经药，并入血分，故为去风止血良药。从中深感古人见识。十分深奥。

李时珍写了医学著作《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运用批判继承的科学方法，从古代医学著作中汲取科学资料，经过独自运思，对脉学做出了卓越贡献。

他在写作《濒湖脉学》的过程中，参考了 55 种古代医学著作，系统地继承古代脉学方面的科学成果，用他父亲和他自己的实践经验加以充实，对脉学作了创造性发展。他将王叔和《脉经》所列 24 脉，发展为 27 脉，增加了三种脉象。所增三脉，名为长、短、革。长、短乃描述脉的长度变化，这是从实践经验中概括补充的。革脉，是他根据古代文献探索确立的。张仲景《金匱要略》中已列有革脉。由于《脉经》传本有误，革脉长期未被医学界认识。李时珍从古文献中钩沉索隐，证以实践经验，确定这一典型脉象，充实完善了古代脉学。

李时珍的 27 脉，其先后排列次序也与《脉经》的 24 脉不同。《脉经》对 24 种典型脉象的排列次序，内在逻辑系统不易为人们掌握，前一脉同后一脉的内在联系，缺乏理论统率关系。李时珍将 27 脉作了科学整理，以阴阳学说基本理论作指导，参以辨证论治的观点，先立大纲，后别条目，使之井然

有序。他立浮、沉、迟、数四脉为纲，肯定“浮沉迟数，脉之纲领”。使脉之纲领同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纲辨证密切联系。27脉的排列次序，充分体现了阴阳对立统一关系。相邻二脉，是成对的范畴，如浮沉、迟数、滑涩、虚实、长短、洪微、紧缓、芤弦、革牢、濡弱、散细、伏动、促结、代。这样就便于人们从对立面去把握各脉的特点，体察其区别与联系。

《濒湖脉学》是用歌诀形式写成的，这种表述方法也是对《脉诀》的继承与发展。《脉诀》托名王叔和撰，实是五代时高阳生袭《脉经》的内容，以鄙俗的歌词表述而成。宋代哲学家朱熹就曾指出它的鄙陋。他说：“俗闻所传《脉诀》五七言韵语音，词最鄙浅，非叔和本书明甚。……世之高医，以其贗也，遂委弃而羞言之。”（《郭长阳医书跋》）尽管它“鄙浅”，因是以韵语写成，易诵易记，后世仍流传不绝。李时珍对于《脉诀》，汲取形式，扬弃内容，写成韵语式的《濒湖脉学》。将科学的内容同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紧密结合。《脉诀》的可取之处被继承下来，其非科学的内容被批判地扬弃。《濒湖脉学》乃成为一部理想的脉学启蒙著作，数百年来流传广泛，发挥了教科书的作用，此书的启蒙性质及其作用，李时珍在撰写此书时已经明确。《濒湖脉学·自序》标明撰书宗旨说：

宋有俗子，杜撰《脉诀》，鄙陋毗缪，医学习诵，以为权舆，逮臻頹白，脉理竟昧。戴同父幸刊其误，先考月池翁著《四诊发明》八卷，皆精旨奥宝，浅学未能窥造。珍因撮粹撷华，僭撰此书，以便习读，为脉指南。

为使此书成为脉学“指南”，又便于初学者“习读”，采取韵语形式进行表述，可以说是最好的方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李时珍为了使人便于体验掌握，在《濒湖脉学》中，对每一脉都是先作理论上的考证、说明，然后按“体状诗”、“相类诗”、“主病诗”、“分部诗”四层内容撰为歌诀，加以论述。以浮脉为例：

《体状诗》云：“浮脉惟从肉上行，如循榆荚似毛轻。”说明浮脉在肌肉表层即可触及，犹如抚柔软的榆荚或舒缓的羽毛。

《相类诗》云：“浮如木在水中浮，浮大中空乃是芤。拍拍而浮是洪脉，来时虽盛去悠悠。”浮脉如轻漂的木板，同芤脉与洪脉既相类似，又大有区别。

《主病诗》云：“浮脉为阳表病居，迟风数热紧寒拘。浮而有力多风热，无力而浮是血虚。”浮脉象征人体阳气亢奋，常见于外感病在体表之时。浮脉而兼有“迟脉”、“紧脉”时，多为风寒，浮而兼“数脉”，多是风热。浮而无力，那是血虚里证了。

《分部诗》云：“寸浮头痛眩生风，或有风痰聚在胸。关上脾虚肝气旺，尺中澁便不流通。”表明寸、关、尺三部浮脉，分别显示上、中、下三焦的病证。

二十七脉经过具体分析，确定每脉的实质，然后加以科学综合，形成脉学体系。继承前人的科研成果，用自己的实践经验加以充实发展，把脉学知识的普及与提高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李时珍对脉学的创造性贡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濒湖脉学》作了中肯评价。指出：“时珍乃撮举其父言闻《四诊发明》，著为此书，以正《脉诀》之失。……可谓既能博考，又能精研者矣。”“既能博考，又能精研”，这正好表明李时珍对古代科学著作

既有批判继承又有创造发展，这一评价是十分中肯的。

五、历史考证

《本草纲目》的编写，还大量采用了历史考证方法。凡药物的名称、形状、产地、性味、主治功效等，无不逐一加以历史考察，吸取前人的正确意见，纠正存在的谬误。诸家本草、医家著述以及经史百家著作中，凡有关药物、医案的记载，李时珍广为搜集，详加考证。在他看来，诸家本草虽有历史功绩，无不存在一定错误，如不详加订正，将以讹传讹，贻误医疗。所以注意收罗百氏，断以己意，俾后人有所遵循。故对于古史记载，民歌俚谚，以至稗官野史、笔记小说中传下的某些神奇歌谣故事，尽管事属渺茫，只要其中有医理、药理可供考究，他也一一加以分析，通过偶然事件考证其中的医药奥秘。李时珍独具慧眼，成为医学界的有心人，把经史百家、俚谚民谣、稗官野史视为医理药理的零散资料保存库，常以科学方法淘沙提金。因此，《本草纲目》今天反成为文字训诂、历史考古、博物等多学科研究的对象，它犹如一座万花园，奇花异卉，兼容并蓄，蔚为大观。

（一）收罗百氏，断以己意

李时珍研究药物，运用历史考证方法，集古而不泥古。他善于广泛地收集资料，加以比较，从中发现矛盾，然后研究解决。不轻信古人论断，也不轻率地否定前人结论。必以自己的新经验、新认识，予以订正。

大麻，今已成常见药物，其花、其实、其仁都有药用价值。李时珍以前的本草学者，对它的认识分歧很大。《本经》列有麻蕒、麻子二条，说蕒即麻勃，又说麻子入土者杀人。苏恭说，蕒即麻子，非指麻花。苏颂说，蕒、子、花是三种东西。因此疑而不决。李时珍根据三国时吴普本草，肯定麻勃即麻花，味辛无毒；麻蓝一名麻蕒，味辛甘有毒；麻子中仁，无毒，先藏地中者，食之杀人。最后作出结论说：

据此说（即吴普观点）则麻勃是花，麻蕒是实，麻仁是实中仁也。普三国时人，去古未远，说甚分明。《神农本草经》以花为蕒，以藏土为‘入土杀人’，其文皆传写误脱耳。陶氏及唐宋诸家，皆不考究而臆度疑似，可谓疏矣。

——《大麻·正误》校本本第三册，第1444页

胡麻，即芝麻，也是现今常见植物。胡麻开花结角，有四棱、六棱、八棱之别，本国土地肥瘠使然。可是苏恭却以四棱为胡麻，六棱为巨胜，从而引起种种疑误。李时珍经过考订指出：“按《本经》胡麻亦名巨胜，《抱朴子》云，巨胜一名胡麻，以黄麻子及大藜子伪为胡麻，误而又误矣，不可不辨。”（《胡麻·集解》极点本第三册，第1436页）李时珍说，“胡麻之讹，由来久矣。”皆因以往本草家未加考订，一实而数名，以至“承误启疑，而市肆之人从而作伪，危害非浅”。大麻、胡麻等常见之物尚且如此，稀有之物，自不待言。

石决明，是一种不常见的海产药物。陶弘景说它是紫贝，雷^敦说是珍珠母，杨倞注《荀子》说它就是龟脚。光凭历史考证，难以决断。李时珍经过

访查，终于弄清楚，以上说法都是错误的。实际上，它是“长形如小蚌而扁，外皮甚粗，细孔杂杂，内则光耀，背侧一行有孔如芽成者，生于石崖之上，海人泅水，乘其不意，即易得之”。（《石决明·集解》校点本第四册，第2529页）这说明李时珍在进行历史考证时，并不是光凭书本记载，还辅之以实际考察。

李时珍重视对药物性味、疗效的反复考证。对常用药物，也不忽略。大黄一药，《集解》栏列有别录曰、普曰、弘景曰、恭曰、藏器曰、颂曰、时珍曰等7家之言；《气味》栏列有别录曰、普曰、元素曰、果曰、时珍曰、之才曰、权曰等7家之言；《发明》栏列有之才曰、宗奭曰、震亨曰、时珍曰、成无己曰、颂曰等6家之言。黄连一味，《气味》栏列有《别录》等6家之论，《主治》栏列《本经》、《别录》等7家之说，《发明》栏列有元素、成无己等12家言，《附方》栏下引列38家治疗40多种病证的方药。许多药物，大都如此，先考证诸家，再陈述己见。人参一药，人们常见常用。哪些病症宜用，哪些病症不宜用，历代本草家各有所见，各有其偏。李时珍经过全面考察，根据他父亲的经验，作了修正。写道：

洁古谓喘咳勿用者，痰实气壅之喘也；若肾虚气短喘促者，必用也。仲景谓肺寒而咳勿用者，寒束热邪壅郁在肺之咳也；若自汗恶寒而咳者，必用也。东垣谓久病郁热在肺勿用者，乃火郁在年宜发不宜补也，若肺虚火旺气短自汗者，必用也。

——《人参·正误》校点本第二册，第703页

经过历史考证，对人参的主治功效、适应病症有更全面的认识，前人的片面性认识得以纠正，新的实践检验，得以总结流传。颇有承先启后之功。糯米，乃人们日用之物，孟诜、苏颂等医家，或说它性凉，或说它性寒，李时珍予以订正说：

糯米性温，酿酒则热，熬汤尤甚，故脾肺虚寒者宜之。若素有痰热风病及脾病不能转输，食之最能发病成积。孟诜、苏颂或言其性凉、性寒者，谬说也。

——《稻米·发明》校点本第三册，第1464页

蜀椒，又名花椒，现多作川菜调味品。相传用它作主料，和以生地黄，制成“椒红丸”，服之可明目轻身，返老还童。诗曰：“四时去烦劳，五脏调元气。明目腰不痛，轻身心健记。……回老返婴童，康强不思睡。”李时珍根据朱丹溪的分析，予以修正。《蜀椒·发明》中写道：

时珍谓椒红丸虽云补肾，不分水火，未免误人。

大抵北方惟脾胃及命门虚寒有湿郁者相宜，若肺胃素热者，大宜远之。故丹溪朱氏云：椒属火，有下达之能，服之既久，则火自水中生。故世人服椒者，无不被其毒也。

——校点本第三册，第1852页

乌贼鱼，是人们食用的一种海产品。医家张鼎说，此物“久服，绝嗣无子”。经过考证，李时珍指出其错误道：“别录云：令人有子；孟诜亦云久服益精。而张鼎此说，独相背戾，亦误矣。……乌贼所主者，肝伤血闭不止之病，正与《素问》相合，岂有令人绝嗣之理？”（《乌贼鱼·正误》校点

本第四册，第 2472 页)

(二) 通过传奇俚谚考核药理

李时珍坚持考古以决今的精神，扩大史料搜索范围，从野史、传闻、民歌、俚谣中发掘关于药物的记载。集腋成裘，大大丰富了药物学宝库。关于何首乌的来历及特性，李时珍考之古史，有生动故事。后代僧人能嗣，本名何田儿，58 岁无子，夜卧山野，见藤二株，相去三尺，苗蔓相交，交而复解，解而又交。因奇之，掘其根食之，乌发变黑，生数子，父子皆寿 160 岁。其孙名何首乌，传出此方，将夜交藤改名何首乌，实以采药人命名。唐代思想家李翱曾为何首乌其人写有传记。李时珍用此生动故事，说明何首乌一药的主治功能，“益血气，黑髭发，悦颜色。久服长筋骨，益精髓，延年不老。”还说：“嘉靖初，邵应节真人，以七宝美髯丹方上进。世宗肃皇帝服饵有效，连生皇嗣。于是何首乌之方，天下大行矣。”（《何首乌·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 1290 页）他肯定何首乌是滋补良药，功在地黄、天门冬诸药之上。故事传真，令人神往。

李时珍从《澹寮方》中摘取另一故事，来证明鹿茸的功效。据说昔日西蜀药市，曾有一道人叫卖“斑龙丸”。每天大醉高歌，宣传斑龙丸的奇效，歌曰：“尾闾不禁沧海竭，九转灵丹都漫说。惟有斑龙顶上珠，能补玉堂关下穴。”李时珍详述其方，乃用鹿茸、鹿角胶、鹿角霜加阳起石、酸枣仁、柏子仁、当归等制成。对于治疗虚劳之症有效。斑龙即鹿的别名。（《鹿·主治》校点本第四册，第 2848 页）

李时珍还引用俗谚说明穿山甲下乳的功用。《鲛鲤·发明》写道：“穿山甲入厥阴、阳明经。古方鲜用，近世风虐、疮科、通经、下乳，用为要药。盖此物穴山而居，遇水而食，出阴入阳，能窜经络，达于病所故也。……谚曰：穿山甲，王不留，妇人食之乳长流。”（校点本第四册，第 2384 页）

总之，李时珍修本草，不只根据诸家本草著作，考证药物名称、功效、主治，而且广征博引，旁及野史逸闻，民谣古诗。凡有相关莫不广为采集，以为科学考证资料。由于采取了正确的考证方法，往往变平庸为珍宝，化腐朽为神奇。

(三) 透过偶然现象，考究必然之理

李时珍研究古药古方，富有钩沉索隐精神，善于根据野史趣闻中透露的一些神奇药效，跟踪探寻，求其医理药理。在他看来，偶然发生的希奇事件，虽蒙上种种神秘色彩，拨开神秘成分，定能发现其中隐秘着的客观必然性。在封建社会里，民间的奇方妙药，附会以某些神秘色彩，是不足为奇的，无异上古巫医不分的遗痕。予以科学分析，可化成祖国医药学宝库中的珍宝。

关于大豆叶治蛇伤的秘密，就是从《抱朴子》中的一个故事揭开的。据说相国张文蔚庄内有一黄鼠狼洞穴，穴中有四只小鼠狼，一日为大蛇所吞。雌雄鼠狼救子心切，乃于穴外坩土壅穴，等大蛇一出头，无法掉转头来时，鼠狼就当腰把蛇咬断，衔出四只小鼠狼，趁它们还没有断气，就放在洞外，衔大豆叶嚼而傅之，四只小鼠狼终于被救活了。李时珍通过这一故事，在《本草纲目》豆叶《主治》栏下写道：“捣傅蛇咬，频易即瘥。”《发明》栏下写道：“后人以豆叶治蛇咬，盖本于此。”（校点本第三册，第 1506 页）

饴糖能下恶血的效用，李时珍也是从《集异记》的一段神怪记载中悟出。说古有河朔健将，飞矢中目，拔矢而镞留其中，钳之不动，痛困欲绝。忽梦一胡僧，告以秘方，令以米汁，注之可愈。遍讯无人省悟。一日僧人来化缘，正像梦中所见胡僧，向他求教，告曰：只用寒食饴点之。如法治之，至夜疮痒，用力钳即出，旬日之间箭伤痊愈。李时珍根据梦中僧人所传秘方，悟出饴糖的功效，可“止渴去血”，“治唾血、吐血”，“打损瘀血者，熬焦酒服，能下恶血”。还可治误吞钱钗及箭簇不出等。（《饴糖·发明》校点本第三册，第1551页）

染布的蓝淀水可杀虫、治噎疾，也是通过一个偶然事件发现的。李时珍说：“淀乃蓝与石灰作成，其气味与蓝稍有不同，而其止血、拔毒、杀虫之功，似胜于蓝。”他引用《广五行记》中一个故事，说唐代绛州有一僧人，病噎不下食数年。临死，对徒弟们说，我死后可开胸视之，有何物苦我如此。死后，徒众剖其胸，果得一寄生小虫，似鱼而有两头，遍体长肉鳞，放钵中，跳跃不已。投以诸食，均不见食，反被销化为水；投以毒物，亦被销化。恰有一僧作蓝淀，随手以淀水投之，虫即怖惧奔跳，又一会就死而化为水。李时珍肯定蓝淀水有杀虫之功，并指出“世传淀水能治噎疾，盖本于此”。“……今方士或以染缸水饮食治噎膈，皆取其杀虫也。”（《蓝淀·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1089页）

染布水能杀虫，李时珍还引用另一则故事加以证明。“昔有人因醉饮田中水，误吞水蛭。胸腹胀痛，面黄，遍医不效。因宿店中甚渴，误饮此水，大泻数行。平明视之，水蛭无数，其病顿愈也。”（《浸蓝水·发明》校点本第一册，第411页）李时珍分析染布水的医药价值说：“蓝水，染布，皆取蓝及石灰，能杀虫解毒之义。”患者因误饮田中水蛭入腹中，又误饮淀水而杀蛭。李时珍并未因其事出偶然而轻易放过，反从这一误中之误的故事，悟出药理，写入《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还引用了一个楚惠王吞水蛭而巧愈腹疾的故事。史载楚惠王食寒菹，发现其中有一只水蛭，因恐声张起来，监食者将被斩，乃吞之。他正患腹疾，吞蛭之后，腹疾不药而愈。令尹解释说，这是因惠王有仁德，皇天保佑了他。李时珍用王充《论衡》对这一故事的科学解释说：“蛭乃食血之虫。楚王殆有积血之病，故食蛭而病愈也。”李时珍在《水蛭·发明》中引用这一历史记载，说明水蛭在药学上的妙用。“主治”栏中写明水蛭可“逐恶血瘀血”、“破血症积聚”。

李时珍引用《太平御览》里的一则鬼怪故事，证明乌骨鸡的妙用。“夏侯弘行江陵，逢一大鬼引小鬼数百行。弘潜捉末后一小鬼问之，曰：此广州大杀也，持弓戟在荆扬二州杀人。若中心腹者死，余处犹可救。弘曰：治之有方乎？曰：但杀白乌骨鸡薄心即瘥。”据说荆扬二州病心腹痛者甚众，夏侯弘用此方治之，十愈八九。李时珍将乌骨鸡治心腹痛的性能写入“主治”栏下，并说：“中恶用乌鸡，自弘始也。此说虽涉迂怪，然其方则神妙，谓非神传不可也。”（《乌骨鸡·发明》校点本第四册，第2590页）这说明乌骨鸡治心腹痛的功效虽附会以神怪故事，仍不可否认其科学性。李时珍用历史考证方法，透过神奇的偶然性而发现其中的科学内容。他没有因噎废食，把科学的内核同神秘的外壳一起抛弃。

食柏叶可以健身延寿，是取自《抱朴子》的一则神奇记载。秦末农民起义中，秦王宫人毛女，“惊走入山，饥无所食。有一老公教食松柏叶，初时

苦涩，久乃相宜，遂不复饥。冬不寒、夏不热。至汉成帝时，猎者于终南山见一人，无衣服，身生黑毛，跳坑越涧加飞，乃密围获之。去秦二百余载矣。”李时珍对柏叶加以科学分析指出：“柏性后凋而耐久，稟坚凝之质，乃多寿之木，所以可入食，道家以之点汤常饮，元旦以之浸酒辟邪，皆有取于此。”（《柏叶·发明》校点本第三册，第1915页）李时珍肯定柏叶的主治功效有：“轻身益气，令人耐寒暑，去湿痹，止饥，……黑润鬓发。”

莱菔即萝卜，是人们常用蔬菜。它具有治麦面毒的功效，这是李时珍从《洞微志》中引证的，该书说齐州有人病狂，言梦中见一红裳女子引入宫殿中，小姑令歌。每日歌云：“五灵楼阁晓玲珑，天府由来是此中。惆怅闷怀言不尽，一丸萝卜火吾官。”人们不懈此歌意义。后遇一道人点破，这是由于犯大麦毒，少女心神，小姑脾神，用萝卜治之可毁其宫中之毒也。用萝卜和药治之果愈。李时珍分析莱菔性能说：“莱菔根叶同功，生食升气，熟食降气。苏寇二氏止言其下气速，孙真人言久食涩营卫，亦不知其生则噫气，熟则泄气，升降之不同也。”（《莱菔·发明》校点本第三册，第1617页）莱菔“主治”栏下，李时珍肯定它能“消谷和中”，“利关节，理颜色，练五脏恶气，制面毒，行风气，去邪热气”等。他还特别指出，萝卜可“治豆腐积”，引《洞微志》为证。有人好食豆腐，因而中毒，医治不效。忽见卖豆腐人，说其妻误以萝卜汤倾入锅中，豆腐就未制成。此人从中悟出萝卜汤治豆腐之理，于是用萝卜汤治之，果愈。李时珍从这个故事的偶然启示中研究出“物理之妙。”

《本草纲目》还记载了一则天鼠屎（即蝙蝠屎）治目疾的故事。说定海一人患赤眼，食蟹遂成内障，五年，久治无效。忽梦一僧人，以药水洗之，令服羊肝丸。此丸用洗净夜明砂（即天鼠屎）加当归、蝉蜕、木贼为米，和黑羊肝煮烂作成。如法服之，目果复明。李时珍在“主治”栏下，肯定天鼠屎有“治目盲障翳，明日除症”的功效。还指出“夜明砂及蝙蝠，皆厥阴肝经血分药也，故此治目翳盲障，症魅疔惊，……皆厥阴之病也。”（《天鼠屎·发明》校点本第四册，第2639页）

有趣的是，以上李时珍多次引用在梦中得胡僧、女子、道士赐方，果然治愈疑难病症的故事。梦中得到的医方是否真有科学价值？应当说那些假托信人、道士赐方，亦属医家创造。有的学者认为这是梦中的创造思维，是潜意识活动的结果。它对于科学家的发明创造，有着科学价值，在科技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人在清醒时某些信息通道的阻塞，正是由于清醒的意识固执着某一个注意中心，因而对其他的意念活动或意向活动，确实像布置岗哨一样进行着限制”，故对某些问题难于寻求新的解决方案。梦中，有些信息反而易于接通、加工和创造，清醒意识未能解决的问题，豁然得到解决。不过，“梦中创造活动的课题，归根到底还是由清醒意识提出的；梦中创造出来的任何模型，还得通过清醒的意识最后才能完成”。李时珍引述的梦中赐方治病的故事，无不证明这一点。

李时珍修本草，不但十分重视继承历代本草及医家著述，还从经史百家、稗官野史、民间歌谣中博引广收，以考证药物性能，集百家之长，以丰富发展本草知识，从古代文献中考匡理药理之得失，从偶然故事中，研究物理之奥妙，取精用宏，推陈出新，以提高《本草纲目》的科学性。若非娴熟历史考证方法，不能至此。历史考证方法，不只研究历史科学的人应当掌握，研究传统医药学显然也离不开，李时珍已做出榜样，《本草纲目》随在可证。

第九章 李时珍的辩证思维方法

《本草纲目》作为 16 世纪的百科全书，虽然没有专章阐述哲学思想，但在论医、论药的字里行间充满着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李时珍探索医药科学奥妙之所以取得光辉成就，原因之一是他始终坚持了辩证思维方法。

他坚持整体思维方法，充分揭示人同自然之间的密切联系，揭示人体内部脏腑、经络之间的整体关系，揭示辨证同论治的辩证统一原则。

他坚持辩证的发展观，深察古今医理、药理的发展过程，总结古今疾病的异同和药物兴衰、衍变的客观规律性。

他善于用两点论观察分析问题，从病变的当今，预见其未来，肯定药物干治病有利，也指出久服良药存在走向反面的可能性。

他从质与量辩证统一的观点观察方药，从药物量的差异，看整个方剂的质的变化；掌握药物的配伍的份量和药物炮制的火候。

无论病证的变化还是药物的发展，既有常规，又有变异，李时珍时时留心“常”与“变”的辩证统一，执常以迎变，观变而知常。掌握医与药的无穷变化，发挥医家的主观能动性，行使司命卫生的主动权。

《本草纲目》中李时珍对各种思维方法的熟练运用，对古代辩证思想方法的发展，显示了我国 16 世纪民族智慧的精华。

一、天人统一的整体思维方法

整体治疗方法是中医学的基本原则，论医论药，坚持整体观，这是大家所公认的中国医药学理论的显著特征。

中医学不只把人体内部的五脏六腑看作有机联系的整体，而且十分注意人体内部的生理机制同整个自然界的变化密切不可分，强调人同自然界的有机联系；更注意把具体的病变同药物性能联系起来考察，将药物的归经性能同脏腑经络特性统一加以权衡。中医学从不孤立地对待生理、病理、药理。

李时珍创造性地运用了传统医药学中的整体思维方法，论病必同人体素质、自然环境统一，从水谷传输的畅阻观察人体血气的盛衰，预见病变的传变。论药必同疾病的性状、人体抗病能力的强弱相联系，从脏腑的虚实，决定治法的攻养、补泻。

李时珍坚持的朴素辩证法的整体观，实乃传统哲学中朴素唯物主义天人统一观的体现。天时、地理、生理、病理、药理构成李时珍观察分析问题时全面考察的诸方面。李时珍认为，外感性疾病的发生多是由于人体内在生理机能受外界邪气侵袭而引起的内在阴阳平衡的破坏；治病的目的就是采取药石措施，调整生理机能，达到人体适应自然变化的新的动态平衡。

（一）观水谷之传输，定血气之盛衰

中医把医疗的对象看作有机联系的整体，这个整体的中心环节是脏腑。体表一切器官的变化，无不同五脏六腑的变化有直接、间接联系。中医分析

脏腑机能是否正常、和谐，并不需要对脏腑进行具体解剖，只须观察人们的气色（或气血）即可知其究竟。察色、按脉、闻其声音就知疾病的部位，确定哪一脏腑存在问题。因为形于外表的气血是由内在生理机制所决定。五脏六腑某一部位机能失调，必然对体表发生影响。这是几千年来中医观察分析得出的普通结论。中医学的整体观蕴含着古代原始系统论思想。

脏腑的主要机能，从中医学上看，在于传输水谷之气。要维持生命，除了自然界的空气，全靠进饮食，中医谓之水谷。饮食入胃后，五脏六腑都要运转起来，为之传输。某一脏腑出现机能障碍，水谷的传化输送必然受到阻碍，从人们的气血上可以显露出来。正如一架复杂的机器，只要内部某一部件失灵，整部机器的运转就会发生阻碍一样。

李时珍从人体血液形成的生理过程，分析了水谷传输的具体途径。他在《人血·集解》中写道：

血犹水也。水谷入于中焦，泌别熏蒸，化其精微。上注于肺，流溢于中，布散于外。中焦受汁，变化而赤，行于坠道，以奉生身，是之谓血，命曰营气，异名同类。清者为营，浊者为卫。营行于阴，卫行于阳。气主煦之，血主濡之。

——校点本第四册，第 2955 页

这是通过水谷化为血气的过程，把上中下三焦的功能联系起来，通过卫气营血的关系，又将体内与体表联结在一起。因此，他总结说：

血体属水，以火为用。故曰气者血之帅也。气升则升，气降则降；气热则行，气寒则凝；火活则红，火死则黑。邪犯阳经则上逆，邪犯阴经则下流。盖人身之血，皆主于脾，摄于心，藏于肝，布于肺，而施化于肾也。

——同上

讲到气与血的关系，首先涉及五脏，实际上同六腑也分不开，同经络更密切不可分。中医学的整体观浸透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李时珍正是应用古代原始系统论思想来观察分析一切生理、病理现象。

水谷入胃，分解为精气与浊气。精气的传输靠五脏六腑的全部机能；浊气之排除同样靠整体的作用。李时珍在《尿·释名》中分析了尿的排泄过程：

尿，方家谓之轮回酒、還元汤，隐语也。饮入于胃，游移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道者，阑门也，主分泌水谷。糟粕入于大肠，水汁渗入膀胱。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之府，气化则能出矣。《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精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故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

——校点本第四册，第 2941 页

水谷入胃变成精气和尿，是一个复杂的生理过程。李时珍用整体思维方法分析了胃、脾、膀胱等不同脏腑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他不是孤立地看问题，而是把任何局部的变化同整体联系起来考察。从一滴尿的排泄，看出它离不开人体生理机能的协调作用。李时珍说，人体脏腑机能的整体性作用，充分显示了“造化自然之微妙”。（校点本第三册，第 1547 页）

李时珍认为，重视脏腑机能的整体作用，这是全局；同时还应承认脏与

腑之间、腑与腑之间有着特殊的联系，这是局部。整体是个大系统，局部构成子系统。单了解五脏六腑的整体作用，不知某脏某腑的特殊关系，这仍然不能说是透彻地掌握了整体观。例如有人患赤眼，当治肝抑当治脾？这就是一个特殊问题。李时珍引《医余录》中的医案加以具体分析说：

有人患赤眼肿病，脾虚不能饮食，肝脉盛，脾脉弱。用凉药治肝则脾愈虚，用暖药治脾则肝愈盛。但于温平药中倍加肉桂，杀肝而益脾，故一治两得之。传云：木得桂而枯是也。……人所不知者，今为拈出。

——《桂·发明》校点本第三册，第1929页

温药中用肉桂，杀肝益脾而治赤眼，这是从整体出发全面考虑的结果。这一医案考虑了杀肝益脾的生理关系、脾弱与眼病的病理关系和温药加肉桂的药理关系，同时把三者联系起来权衡得失。可见医病犹如打仗，声东击西是整体战术，围魏救赵也是整体战术。有整体思想作指导，则无往而不胜，左右逢其源。

远志，是入肾经的药物，却能治善忘之心病。原因何在？李时珍从整体上予以正确分析。指出：“精与志，皆肾经之所藏也。肾精不足，则志气衰，不能上通于心，故迷惑善忘。”这说明心与肾的密切关系。而远志的特点：“人足少阴肾经，非心经药也。其功专于强志益精，故治善忘。”（《远志·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749页）把药物的特性与脏腑机制的特点结合考虑，表面上看，善忘是脑的功能衰退的表征，治肾却能抓住治善忘的症结，这是从整体着眼观察问题的奥妙。

（二）察脏腑之虚实，论方药之补泻

李时珍明确主张辨证施治必先考察脏腑的虚实寒热，再论方药的补泻攻养。在考察方药的补泻攻养时，又必须紧密联系药性的升降沉浮，气分、血分，还要考虑四时用药的一般法则，以及春得夏病、秋得冬病的特殊情况。在认识药物归经的一般特性之后，还要考虑因配伍不同而发生归经的改变。

同一药物对某些患者可能是补剂，而对另一些患者则可能是泻剂，应根据病情而定。同是补剂，此人用此方，彼人用彼方，也不可一概而论。从脏腑虚实出发而进行整体考察，在《十剂·补剂》中李时珍论述很清楚。他说：茯神补心气，人参补脾气，黄芪补肺气，杜仲补肾气，穹莠补肝气，皆是补剂，“不特人参，羊肉为补也”。（校点本第一册，第61页）人参是一种常用的补品，对于“气壮神强”、“火郁内实”的人，千万“不可用”（校点本第二册，第703页），这都是从整体考察而得出的结论。

有些药物在归经功效上，诸家本草往往众说纷纭。李时珍常从人体脏腑机能的整体效用给予合理解释，折衷诸家之说。韭菜，人们常食，对脏腑的作用诸说不一。孙思邈说：“韭味酸，肝病宜食之”。《素问》说：“心病宜食韭”。《食疗本草》认为：韭“归肾”。李时珍首先肯定：“韭，叶热根温，功用相同。生则辛而散血，热则甘而补中。”同时指出上述三家说法，“文虽异而理则相贯。盖心乃肝之子，肾乃肝之母。母能令子实，虚则补其母也。”（《韭·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1577页）他认为韭对心、肾、肝，作用虽有三种说法，“理则相贯”。这个“理”正是按整体思维方法分

析出来的。若按形而上学观点看问题，心是心，肝是肝，肾是肾，何得相贯？

对药物的性味及功效，李时珍总是揭示它对不同脏腑具有不同的作用，建立一药多用的理论基础。例如何首乌，他认为不寒而燥，为滋补良药，“功在地黄、天门冬诸药之上”。原因在于它对肝与肾有不同作用，“此物气温、味苦涩。苦补肾，温补肝，涩能收敛精气。所以能养血益肝，固精益肾，健筋骨，乌髭发。”（《何首乌·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1290页）

总之，中医学治病的基本原则无非是通过药石的效力，调整人体内部失调的脏腑机能，使之重新归于阴阳和平。或补或泻，总要以脏腑的虚实为前提，然后对证施治。譬如咳逆这一种症状，发生在不同人身上，有不同的原因。李时珍指出：“咳逆，有伤寒吐下后，及久病产后，老人虚人，阴气大亏，阳气暴逆，自下焦逆至上焦而不能出者；有伤寒失下，及平人痰气抑遏而然者。当视其虚实、阴阳，或温或补，或泄热，或降气，或吐或下可也”。（《柿蒂·发明》校点本第三册，第1781页）

对于体质不同的患者，同一药物有人用之得利，有人用之受害，在医学上屡见不鲜。因药性对不同体质的人会发生不同的疗效。丁香温辛，无毒，主温脾胃，止霍乱拥胀风毒诸肿。但李时珍指出：“气血盛者勿服。”“若不分气寒热虚实经络，一概骤用，其杀人也必矣。”（《丁香·发明》校点本第三册，第1942页）结合人体脏腑虚实，进行全面考虑，决定投药的方针，正是整体思维方法的具体运用。

总之，整体观是李时珍经常运用的一种思维方法。把脏腑看作统一的整体，以整体机能是否协调来判别人体血气的盛衰；根据血气之盛衰，确定七方、十剂的运用；先察脏腑虚实再确定药物的取舍。生理、病理、药理三者结合，综合权衡，准确辨证，精心施治，慎重投药，则可药到病除，此乃整体思维方法的妙用。

二、以发展的观点分析问题

“天地之造化无穷，人、物之变化亦无穷。”这是李时珍所阐述的宇宙发展观。李时珍博闻广识，学淹古今，继承《内》、《难》以来祖国医学辩证法思想，融会贯通，善于用发展观点分析问题。

在他看来，宇宙间的一切事物无不处于永无止境的运动变化之中。他结合医药历史与实践，阐述宇宙变化无穷的观点。指出：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都是不断进化的，随着人类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的日益改进，社会上的病证有发展，医药条件在改善，医药学知识随之不断更新。他坚决反对形而上学不变论，在医药学研究中，把古代辩证法思想推向新的水平。

（一）营养卫生条件日益进步

李时珍结合人类社会进化的历史，分析营养状况及医药卫生条件改进的历史，肯定宇宙间的事物千变万化，未始有极；痛斥某些“肤学之士”抱残守缺，“恃一隅之见”，而鄙弃一切新事物。他写道：

天地之造化无穷，人物之变化亦无穷。贾谊赋所谓：“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则；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搏，化为异物兮，又

何足患？”此亦言变化皆由一气也。肤学之士，岂可恃一隅之见而概指古今六合无穷之事物为迂怪邪！

——《方民》校点本第四册，第 2975 页

他引用贾谊《鹏鸟赋》中的朴素辩证法思想，阐明宇宙万物本由元气所化生。阴阳二气合散消息，千变万化，乃生物生人。人同物一样，也不会永恒不变，而会不足为怪地“化为异物”。人们对古今六合无穷变化之事物，只能承认它、研究它、主宰它，而不可少见多怪，拒不承认而加以攻击诋毁。李时珍用极精练的语言，坚持了宇宙发展观，同形而上学不变论划清思想界限。

李时珍用草木禽兽变为化石的事例，证明一切事物“化为异物”毫不奇怪。他说：“石者，气之核，土之骨也。……气之凝也，则结而为丹青；气之化也，则液而为矾汞。”万物的变化，或有情变无情，或无形变有形。“飞走含灵之为石，是有情而成无情也；雷震星陨之为石，是无形而成有形也。大块资生，鸿钧炉^铸，金石虽若顽物，而造化无穷焉。”（《金石部前言》校点本第一册，第 455 页）他指出，宇宙间事物的变化有三态，即气体、液体、固体。或由无形之气化为有形之物，或由有生命的动植物变为无生命的化石。总之造化是无穷的。

李时珍指出：人和动物由于内在生理机能的障碍，体中也会结石而产生无机物，如牛黄、狗宝、石淋之类。老树、鱼虾可以化为石，考古学称为“化石”；人体及生物内脏器官生病，所含液体之物可化而为石，医学上谓之“结石”。李时珍以此证明万物和人类都有非常的变化。

李时珍进一步用发展的观点分析人类社会，认为历史不断进化，由野蛮进入文明：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是一个无限发展的过程。以人类食物的进化为例，在谷部《前言》中他写道：

太古，民无粒食，茹毛饮血。神农氏出，始尝草别谷，以教民耕艺；又尝草别药，以救民疾夭。轩辕氏出，教以烹饪，制为方剂，而后民始得遂养生之道。《周官》有五谷、六谷、九谷之名，诗人有八谷、百谷之韵，谷之类可谓繁矣。……职方氏辨九州之谷，地官氏辨土宜稂种之种，以教稼穡树艺，皆所以重民天也。

——校点本第三册，第 1433 页

由原始人类的茹毛饮血，进步为农业社会的“粒食”（以粮食为食物）；粮食作物由简单的五谷进步到百谷繁茂，表明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由远古的尝草别药，进步到制为方剂，医药卫生条件也在不断进步；人类社会从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原始群居生活，进步到百官为治的社会组织制度，也是不断发展的。李时珍粗略描述了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过程，基本上符合社会发展规律，这种观察问题的方法是相当正确的。

他还用发展的眼光来分析古代医药发展过程。上古只知独用某种药物治某种疾病，是谓单方。先是发现一些动物性药物，而后不断发现种种植物性药物；起初是动物性药物居多（如《山海经》的记载），后来植物性药物超过动物性药物（如《神农本草经》的记载）。故药物学著作统称本草。由单方发展到配制方剂，更是医药学上的重大进步。李时珍认为方药的发展先是用单药，进而制为方剂，这一分析符合医药发展的历史进程。

李时珍引用《内经》的观点，说明医疗措施随着不同时代卫生条件的进

步而不断发展；随着医疗手段日益丰富多样，医学理论也日益精湛。他在《神农本草经名例》中说：

《素问》云：上古作汤液，故为而弗服。中古道德稍衰，邪气时至，服之万全。当今之世，必备毒药攻其中，砭石、针艾治其外。又曰：中古治病，至而治之，汤液十日不已，治以革苏菱枝，本末为助，标本已得，邪气乃服。

——校点本第一册，第 50 页

他所传述的《素问·移精变气论》思想，说明上古之人，居山野之间，生活粗野，抵抗力强，故汤液不服，祝由可治病；中古之世，生活得到改善，人们抗病率反而降低，往往汤液十日而不愈；后世，生活日益改善，饮食更加复杂，病变亦更深层，故须毒药、砭石、针灸等多种治疗手段相互配合，才更有效。这一论述包含了丰富的哲理，物质文明愈进步，人们的生活条件愈改善，这当然是幸福；但同时也带来不幸的因素，社会交往活动频繁，传染病随之丛生。不过坏事也可转化为好事。人们的抵抗力虽有所减弱，但战胜疾病的医疗手段和药物却更完备。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可能不自觉地破坏生态环境而造成恶果；人们在不断受到自然界的惩罚的同时，又逐步变得更聪明，而终究会战胜疾病而前进。

随着人类交往频繁，常引起新的病证，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些新病证的出现，引起李时珍的注意，他说：

杨梅疮，古方不载，亦无患者；近时起于岭表，传及四方。盖岭表风土卑炎，岚瘴熏蒸，饮啖辛热，男女淫猥。温热之邪，积蓄既深，发为毒疮，遂致互相传染，自南而北，遍及海宇。然皆淫邪之人病

——《土茯苓·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 1296 页

医药发展史伴随着疾病发展史。李时珍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认为许多疾病并不是从古就有的。文明愈发达，新的病症，特别是职业病会层出不穷。近代学者章太炎针对这一社会状况提出所谓“俱分进化论”，说物质文明愈进步，人们的社会道德愈堕落。“以生计言，则乐一进化，苦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之随形”。（章太炎《俱分进化论》）进而认为社会的进化，不能给人类带来幸福与快乐。这当然是片面的悲观主义的看法。但单从医疗卫生角度考察，文明愈进步，交通愈发达，人们的交际日繁，为传染病的预防造成了不利的条件，这确实不容忽视。

古今病证不同，常用的药物也随之而异。李时珍举梨为例说：在古代，很少知道梨子的药用。《名医别录》只讲梨之害，不讲梨之用。陶弘景甚至认为梨不能入药。李时珍从常用药依时疾变化而异的角度，论述这一问题说：“盖古人论病，多主风寒，用药皆是桂附，故不知梨有治风热、润肺凉心、消痰降火、解毒之功也。今人痰病、火病，十居六七，梨之有益，盖不为少，但不宜过食耳。”（《梨·发明》校点本第三册，第 1764 页）

不难看出，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从宇宙自然的变化无穷，论及人类社会不断进化；由人类物质文明的进步，论及人们生活卫生条件之改变；由人类社会交往的频繁，论及新的病证的出现，以及治疗方法、常用药物的

日新月异，镌刻出一幅人类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不断前进的历史画卷。用这种观点来研究疾病、医药变化的客观规律，同形而上学观点大异其趣。

（二）古今药物兴废不同

李时珍在“古今六合变化无穷”的思想指导下，坚持发展观，论述本草学的历史演变。他指出古今药物的品种由少而多、由简到繁；人们对药物性味的认识由片面到全面、由肤浅到深刻；至于药物的产地，也随时代不同而不尽相同。本草学代有发展不足为怪，历数百年而不重修本草则不可思议。这是他立志重修本草的基本指导思想。重修本草的崇高理想，正是他前进的动力。

李时珍举出许多具体事例，阐明“古今药物兴废不同”的道理。莎草、香附子是一种药用植物，叶名莎草、根名香附子。根、苗、花皆四时常用药。可是在李时珍之前，对其功用缺乏全面研究，少有具体分析。李时珍经过深入研究，详细描述其形态及气味、主治，指出：“香附之气平而不寒，香而能窜，其味多辛能散，微苦能降，微甘能和，乃足厥阴肝、手少阳三焦气分主药，而兼通十二经气分。”“此乃近时日用要药，而陶（弘景）氏不识，诸注亦略。乃知古今药物兴废不同。如此，则本草诸药，亦不可以今之不识，便废弃不用；安知异时不为要药如香附者乎？”（《莎草·香附子·集解》第二册，第888页）

牵牛子的情况亦与附子相仿。医家李杲根据“张仲景治七种湿病，无一药犯牵牛者”，乃断言：“牵牛非神农药也”。李时珍批评这种观点说：自宋以后，北人常用牵牛，“然东汉时，此药未入本草，故仲景不知，假使知之，必有用法，不应捐弃，况仲景未用之药亦多矣。执此而论，盖矫枉过中矣”。宋以后常用之药中没有记载的不止牵牛子一味。李时珍认为，不应因古人未曾言及，我们今天也不对其性味功效作认真研究。刘守真、张子和把牵牛列为“通用下药”，李杲发议论“极力辟之”，甚至说它非神农药，确是矫枉过中的行为。（《牵牛子·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1257页）

李时珍概括自己的临证经验，说明诸家本草未用之药，近世用之确有神效。《蚕茧·发明》写道：“蚕茧，方书多用，而诸家本草并不言及，诚缺文也。近世用治痈疽代针，用一枚即出一头，二枚即出二头，神效无比。”（校点本第四册，第2851—2252页）方书中传下的一味单方，竟然补诸家本草之缺，因此对方书不当歧视，而应肯定其对医药的贡献。李时珍的这一思想是正确的。

古方罕用而后世成为要药的还有山楂、女贞、玳瑁等多种。李时珍分析各种药物古方之所以罕用，原因不尽相同。有的是由于名称不统一：如山楂古称赤爪，又名棠*实不一，其功效不显。李时珍说：山楂，“古方罕用。故唐本虽有赤爪，后人不知即此也。自丹溪朱氏始著山楂之功，而后世遂为要药。”（《山楂·发明》校点本第三册，第1774页）足见一种药物能否得到普遍使用，有赖于著名医药家论述其性状，以便人们遵循。女贞子，因有《典术》论证其功，乃得称为上品。李时珍说：“女贞实乃上品无毒妙药，而古方罕知用者何哉？《典术》云：女贞木乃少阴之精，故冬不落叶。观此，则其益肾之功，尤可推矣。”（《女贞·发明》校点本第三册，第2102页）有些药物之所以罕用，实由于罕见：如玳瑁，产海洋深处，大者难得。苏颂

说：“人药须用生者”，更难得到，因此医家罕用。李时珍说：“玳瑁解毒消热之功，同于犀角。古方不用。至宋时至宝丹始用也。”（《玳瑁·发明》校点本第四册，第2499页）以上都说明，古今药物多有变迁，原因亦有多种，昔日罕见、罕用之药，后世成为常见、常用之药，毫不奇怪。考察药物的发展，应持历史主义观点。

豌豆，今天成了日用食粮。唐、宋诸本草都未见列入。李时珍写《豌豆·发明》阐发它的药用价值说：“豌豆属土，故其所主病，多系脾胃。元时饮膳，每用此豆捣去皮，同羊肉治食，云补中益气。今为日用之物，而唐宋本草见遗，可谓缺典矣。”（校点本第三册，第1518页）李时珍并不因为豌豆是日用之物，就忽视对它的医药价值的研究。其实，愈是日用之物，对身体营养、健康影响愈大，医家更应悉心研究。李时珍基于此种认识，将今日所用谷物、蔬菜、肉食、果品一一列入本草，详加研究。不少地方，发前人之所未发。

李时珍用发展的观点看待历代药物学家对本草学的贡献，指出许多药物的药性、形态、主治功用的认识，都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不断深入研究，从片面到全面，逐步丰富起来的。《术·集解》指出：“昔人用术，不分赤白，自宋以来，始言苍术苦辛气烈，白术苦甘气和，各自施用，亦颇有理。”（校点本第二册，第734页）这说明术虽是自古以来常用药，对其性味的认识，也是不断深化的。白鲜皮，曾是治风痹的要药，后代只用它治疮科，说明对同一药物性味主治的认识，不同时代各有偏重。李时珍在《白鲜·发明》中写道：“白鲜皮，气寒善行，味苦性燥，足太阴、阳明经去湿药也。兼入手太阴、阳明，为诸黄风痹要药，世医止施之疮科，浅矣。”（校点本第二册，第803页）同样，土茯苓可健脾胃，去风湿，古人却不曾认识。李时珍将其增入本草并作了详细说明，指出：“土茯苓，气平味甘而淡，为阳明本草。能健脾胃，去风湿。脾胃健则营卫从，风湿去则筋骨利，故诸证多愈，此亦得古人未言之妙也。”（《土茯苓·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1296页）此药陶弘景命之为禹余粮，陈藏器名之为草禹余粮，苏颂名之刺猪苓，都因不明其主治，未正式列入本草。李时珍为之定名，详解其性味、主治，更收集了六项方剂，列入“附方”，使人们明其体而达其用。他用自己的新贡献，有力他说明了药物学的内容在不断发展。对古今常用方剂升麻葛根汤的疗效，李时珍也用自己的临证经验，增加了新的解释。他说：“升麻葛根汤，乃发散阳明风寒药也。时珍用治阳气郁遏及元气下陷诸病，时行赤眼，每有殊效，神而明之，方可执泥乎？”（《当归·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797页）

李时珍不只用发展的观点分析药物品种、性味、主治的古今变化，而且对同一药物的主要产地也注视其古今不同。李时珍指出：“黄连，汉末李当之本草，惟取蜀郡黄肥而坚者为善。唐时以澧州者为胜。今虽吴蜀皆有，惟以雅州、眉州者为良，药物之兴废不同如此。”（《黄连·集解》校点本第二册，第771页）

正由于药物古今兴废多有不同，故本草著作历代多次重修。以往重修的本草，以唐代陈藏器的《本草拾遗》最为李时珍所敬佩。他评论道：“藏器，四明人。其所著述，博极群书，精核物类；订绳谬误，搜罗幽隐，自本草以来，一人而已。”陈藏器对本草学发展作出卓越贡献，可是不少肤浅之上，反诮其僻怪，对他的著作多有删削。李时珍批评说：“肤谏之士，不察其该详，惟诮其僻怪；宋人亦多删削，岂知天地品物无穷，古今隐显亦异，用舍

有时，名称或变，岂可以一隅之见，而遽讥多闻哉。”（校点本第一册，第5页）这是李时珍对古今药物变化发展的基本看法，也是他坚持发展观点的生动体现。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新增了数百种药物，对许多药物的性味、主治，根据自己的新认识，作了详细阐述。由于他以正确的发展观作指导，故所著《本草纲目》能超越前代，树立新的典范。

三、相反相成的矛盾分析法

祖国医学中包含着深刻的阴阳对立统一学说。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最善于运用对立统一的法则观察分析问题。他用充分的事实阐明不同的药物，正因其性质相反，在同一方剂中，可发挥相反相成的作用。人们正是利用不同药物的对立性，促其“相反而立功”。李时珍更用丰富的临证经验和医疗史实，阐述了在使用某些药物时，由于忽视对立统一法则，因其有一定的疗效就长期使用，病愈仍不停止，久之发生偏胜现象，良药转化为毒药，反致人于死命。他运用对立面相互转化的原理，分析了良转化为毒、利转化为害、福转化为祸的种种事实。

对立统一法则，人们经常讲、经常用，哲学家们往往讲得比较抽象、干枯。李时珍结合药物实践经验，运用得十分成功，讲得生动、具体。可以说古代哲学中的对立统一法则，被李时珍讲活了，用活了。李时珍列举大量生动事例，说明人们在形而上学思想支配下，为了长生、健康，或眼前的舒适、愉快，长期服用某些药物，不知不觉走上了慢性自杀的道路。某些庸医由于不明白矛盾转化的原理，不顾具体情况，妄用某种药物，一时受人欢迎，实乃驱人于死亡之途。

中医处方治病的基本准则是逆病症用药，即治热以寒，治寒以热，是为“正治”。在特殊情况下，当病状显示与病因不一致时，采用“反治”原则，即热因热用、寒因寒用，其根本宗旨是“伏其所主”，针对矛盾的主要方面，运用对立统一法则，采取医疗措施。“正治”的目的在于使热病因用了寒药而去其热，寒病因用了热药而去其寒。“反治”的目的是顺从病人表现出来的假象（即症状与疾病性质相反者）用药，表面上看来是“热”病用热药，“寒”病用寒药，实质上仍是去热病之热，去寒病之寒，只是由于病状反常，治疗方法随之反常罢了。治热以寒、治寒以热，是利用相反相成的原理，以恢复人体生理机能的平衡状态。医疗中贯彻的这一基本准则，李时珍“约取《素问》之粹言”，作了明确表述，写道：

气味有厚薄，性用有燥静，治体有多少，力化有深浅。正者正治，反者反治。用热远热，用寒远寒，

用凉远凉，用温远温。……治热以寒，温而行之；治寒以热，凉而行之；治温以清，冷而行之；治清以温，热而行之。……气之胜也，微者随之，甚者制之；气之复也，和者平之，暴者弃之。高者仰之，下者举之；有余折之，不足补之；坚者削之，客者除之；劳者温之，结者散之，留者行之，燥者濡之，急者缓之。……

——校点本第一册，第50页

李时珍根据《素问》以来中医治疗中的这些基本准则，针对各种病证，详细阐述了处方用药，无非是按对立统一方法处理问题的过程。凡是符合相反相成的准则者，则药到病除；违反此一原则，则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

关于仙茅，由于许真君书中说它“久服长生”，不少人妄意久服，反受其害。原因何在？李时珍指出：“仙茅，盖亦性热，补三焦命门药也。”它不是任何人服了都可得益，应作具体分析。“阳弱精寒，禀赋素怯者宜之。若体壮相火炽盛者服之，反能助火。”

天门冬，与滋补方同用，对某些人很有益。脾胃虚寒之人服之反而致病。李时珍在《天门冬·发明》中阐发这一道理：“天门冬，清金降火，溢水之上源，故能下通肾气，入滋补方合群药用之有效。若脾胃寒虚人，单饵既久，心病肠滑，反成瘤疾。”（校点本第二册，第1284页）“合群药用之”，取其相反相成，生滋补之效；“单饵久服”，则必然产生偏胜之害，因其违反对立统一法则。

冬天，不少人喜欢吃狗肉，取其性温，可补脾胃。李时珍却警告说：“脾胃属土，喜暖恶寒。犬性温暖，能治脾胃虚寒之疾。脾胃温和，而腰肾受荫矣。若素常气壮多火之人，则宜忌之。”（《狗肉·发明》校点本第四册，第2715页）这同服仙茅的道理相似，气壮多火之人，再加性暖之物，超出常人生理机能所能适应的限度，欲得利而反遭害。

黄檗，是一味补品，人所共知。《名医别录》说它“久服通神”；名医张元素说它能“泻膀胱相火，补肾水不足，坚肾壮骨髓”。李时珍说它“得知母，滋阴降火；得苍术，除湿清热，为治屡要药”。有些人违犯相反相成的规律，妄用之补阴，结果反受其害。李时珍揭示其中道理说：知母佐黄檗，可产生金水相生的奇效，为补阴要药。然而补阴太过，则“真阳暗损”，阴阳失调，必生他病。这说明违反对立统一原则，必受自然法则的惩罚。对这一原理，李时珍体会是何等深刻。（《槩木·发明》校点本第三册，第1922页）

茈胡，又名柴胡，本经列为上品，言其“久服轻身，明日益精”。医家大明亦称可“补五劳七伤，除烦止惊，益气力，消痰止嗽，润心肺，添精髓”。李时珍根据对立统一原理，详加分析，指出，此虽良药，并非人人可用。他说：“劳有五劳，病在五脏。若劳在肝胆心，及包络有热，或少阴经寒热者，则柴胡乃手足厥阴、少阳必用之药；劳在脾胃有热，或阳气下陷，则柴胡乃清气退热必用之药。惟劳在肺肾者，不可用耳。”（《茈胡·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787页）李时珍坚持了一分为二的原则，对具体病证作具体分析，总之要求药物与病证相当，阐明虽是良药亦非人人可妄意服用。与病相宜者均是良药，不相宜者则都可为害。

关于梨的药用价值，古代颇有争论。梨名玉乳，又名蜜父。朱震亨曰：“梨者，利也。其性下行利也。”有润肺凉心，消痰降火，利大小便的疗效。可是陶弘景曾说，梨种殊多，并皆冷利，多食伤人，故俗人谓之快果，不入药用。李时珍不同意陶说，认为他“只言其害，不著其功”。他引用《类编》中故事，证明梨的神效。“一士之状若有疾，厌厌无聊，往谒杨吉老（1060—1130）诊之。杨曰：君热症已极，气血销铄，此去三年，当以疽死。士人不乐而去。闻茅山有道士医术通神，而不欲自鸣。乃医仆衣，诣山拜之，愿执薪水之役。道士留置弟子中。久之以实白道士。道士诊之，笑曰：汝便下山，但日日吃好梨一颗。如生梨已尽，则取干者泡汤，食渣饮汁，疾自当平。士人如其戒，经一岁复见吉老。见其颜貌腴泽，脉息和平，惊曰：君必遇异人，不然岂有痊理？士人备告吉老。吉老具衣冠望茅山设拜，自咎其学之未至。”（《梨·发明》校点本第三册，第1764页）李时珍评论说：“梨之有

益，盖不为少，但不宜过食耳。”这一评论包含了两层道理：（1）贯彻一分为二的原则，分析梨的功用，否定了梨“不入药用”的片面观点；（2）梨之医疗效果，在于用量适度，少食可以降火，古有明证。这样分析问题，深得矛盾分析方法的精义。李时珍以大量生动事例，揭示物极必反的法则。指出许多药物，因用之不节，超出病变发展的需要，产生偏胜之害，导致生理机能的整体平衡性受到破坏，甚至发展为不治之疾。究其原由，是由于违反对立统一的矛盾法则，遭到客观自然法则的惩罚。

李时珍分析了《容斋随笔》中的一则故事。洪文安在金陵，秋暑减食，遵医者汤某处方服^石石丸，果然饮食日进。于是加意服之。十个月后，猛然发病，衄血斗余。从此经常吐血不止，以致精液皆竭，直至死亡。有人认为，此乃医家的错误，当日就不应服用^石石丸。李时珍不赞同这种看法，他说：“洪文安之病，未必是^石石毒发。盖亦因其健啖自恃，厚味房劳，纵恣无忌，以致精竭而死。夫因减食而服石，食既进则病去，药当止矣，而犹服之不已，恃药妄作，是果药之罪与？”（《^石石·发明》校点本第一册，第604页）这一分析是切中要害的。起初减食是由于人体内部生理机能失调所造成；投以^石石丸，饮食日进，说明失调的机能因服药而恢复；这时停止服石，就可保持内在机能新的平衡了。继续服用，发生偏胜；加以恣意妄作。导致物极必反，精尽而死，确非医家的过错。

李时珍反复告诫人们，任何药物病愈即当停止，不可过剂。他以葶苈愈胀为例指出：“肺中水气臌满急者，非此不能除。但水去则止，不可过剂尔。既不久服，何至杀人？《淮南子》云：大戟去水，草茵愈胀。用之不节，乃反成病，亦在用之有节。”（《葶苈·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1067页）朱震亨说，“葶苈属火，性急，善逐水”：“且杀人甚捷”。李时珍所谓“既不久服，何至杀人？”是针对朱氏观点而发。任何药物，如按性味、主治适当施用，是不至杀人的；用之下当，物极必反，必至杀人，上品良药亦不例外。

艾在《本经》列入上品，无毒，不杀人，可灸百病。李时珍的父亲曾写《蕪艾传》一卷，称赞其功效云：“产于山阳，采以端午，治病灸疾，功非小补”。若“久服不辍”，必至为害。故李时珍写道：“夫药以治病，中病则止。若素有虚寒痼冷妇人湿郁滞漏之人，以艾和归、附诸药治其病，夫何不可？而乃妄意求嗣，服艾不辍，助以辛热，药性久偏，致使火燥，是谁之咎与？干艾何尤？”（《艾·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937页）不识物极必反的法则，“药性久偏”，终至良药酿灾，实乃咎由自取。

良药偏胜成灾，莫若泽泻。此药《本经》列入上品，气味甘、寒、无毒。说它能“养五脏，益气力”，“久服，耳目聪明，不饥延年，轻身、面生光”。后世对其特效曾有争论。陶弘景《名医别录》说，其叶及实，均具有强阴气的作用，“久服令人无子”，即可破坏生育能力。名医大明说它可补女人血海，服之“令人有子”，即可促进生育。李时珍认为，一说有子，一说无子，两种说法，针锋相对，其实从矛盾法则看来，各有一定道理。他在《泽泻实·发明》中说道：泽泻与补药同用，可逐除下焦温热邪垢，邪气逐出，阴强海净，

则有子；若久服泽泻，肾气大泄，血海反寒，则无子。不可“执一”而论。

《校点本第二册，第 1351 页）所谓“执一”之人，是用形而上学观点看问题，各执一偏，而不知矛盾转化的普遍法则。李时珍就此分析了古人用补药必兼泻邪的对立统一原理说。“古人用补药必兼泻邪，邪去则补药得力。一辟一阖，此乃玄妙。后世不知此理，专一于补，所以久服必至偏胜之害也。”（《泽泻根·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 1350 页）

赤小豆，本可利小便，“消胀、治痢”。可是有的人吃了却“肌瘦身重”，这是什么缘故呢？李时珍分析其中物极必反的道理说：“赤小豆，小而色赤，心之谷也。其性下行，通乎小肠，能入阴分，治有形之病。故行津液，利小便，消胀除肿止吐，而治下痢肠澼。……久服，则降令太过，津血透泄，所以令人肌瘦身重。”（《赤小豆·发明》校点本第三册，第 1510 页）

根据物极必反的矛盾转化思想，从消极方面着眼，警告医家和病者用药宜控制剂量，不可太过，以免造成偏胜之害。从积极方面着眼，正确运用这一原则，治疗疾病，乃神医妙术。李时珍引用了《后汉书》所载名医华佗运用物极必反法则为人治病的一则生动故事。有一老妇人，患寒热注病多年，华佗采用了非常特殊的治疗方法。冬月，令病者坐石槽中：待平旦之时，用冷水灌其身，规定灌 100 次。才灌了 70 次，患者全身冷颤欲死，灌者害怕发生意外，要求停止，华佗不同意。灌到 80 次。果然患者身上热气蒸出，上冒二三尺高。灌满百次，用火温床。卧其上，厚被之，不久汗出，以粉扑之，终于痊愈。此等医术，令人敬佩。李时珍还记述了《南史》中同样一个病例，然后评论为何须在冬月平旦浇以冷水呢？

二人所病，皆伏火之证。《素问》所谓诸禁鼓慄，皆属于火。治法，‘火郁则发之也’。而二子于冬月平旦浇以冷水者，冬至后阳气在内也；平旦亦阳气方盛时也。折之以寒，使热气郁遏至极，激发而汗解，乃物不极不反，是亦‘发之’之意。《素问》所谓逆者正治，从者反治，逆而从之，从而逆之，疏通道路，令气调和者也。

——《新汲水·发明》校点本第一册，第 399—400 页

李时珍的这一分析，坚持了辩证思维方法。火郁必发，但物不极不反，冬月平旦浇以冷水，是利用阴阳矛盾双方发生激烈斗争，促使矛盾的主要方面发生转化。若非国医妙手，是不敢坚持此种治疗方法的。说明坚持彻底的辩证法思想的医家，无所畏惧，敢于创造条件，促成矛盾的转化，造福于人民。医家之于疾病，或逆者正治，或从者反治，手段虽有不同，目的都是一个，即“疏通道路，令气调和”。一旦阴阳调和，则暂时失去平衡的生理机能自会恢复正常。

古代哲学中的矛盾学说，在《老子》、《庄子》中主要注重其消极方面，即主静、不争、贵柔、守雌，害怕矛盾的转化；《易传》、《韩非子》则主张阴阳相激，水火相射，冰炭不同器，矛盾不两立，注重矛盾的斗争和转化。

《内经》以来，古代医学家们主张调和阴阳，但并不害怕矛盾转化，遣方、投药，无不立足于促进阴阳转化，达到阴阳调和的目的，这正是坚持了好的思维传统。不难看出，李时珍是坚持并发扬这一思维传统的佼佼者。

四、质和量相统一的度量分析法

关于事物的质和量的辩证统一关系问题，在我国医药学中从来受到重视。李时珍继承这一优良思想传统，在自己的药物实践中，灵活运用，做出了独到的贡献。

李时珍强调，每一方剂中，君臣佐使的配伍，不只要认真考虑药物的品种，尤其要注意其中不同品种的量的区别。同一处方，药物品种虽同，每味药物的分量不同，其疗效就大有区别；而且强调，同一处方治同一病症，其剂量应随季节的变化和患者身体的素质不同而增减。

服药是为了除病，病除药即止，不可久服过量。医家应充分考虑到药物的分量与除病的需要之间的平衡关系。药物使用过量，反会造成人体生理机能的平衡性的破坏。这同样存在质与量的关系问题，李时珍再三提醒人们要严加注意。

治病当分轻重缓急，循序渐进。不同的方剂只能调节生理机能受到破坏的某些部分，从生理机能的局部恢复正常到人体全面恢复正常，也存在一个量的积累到质的变化的过程。不论主次，不分先后，见病投药，是不会有好效果的。

总之，李时珍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分析医药中的质与量的辩证统一问题。药物中的“量”的问题，不只表现为药物的斤两钱分的重量问题，可能表现为药物炮制中的时间定量问题，也可能表现为方剂的更换次数问题，以及病变的部位深浅和投药的次第问题。在中国医药学上对质量转化关系的分析，是十分精细的。李时珍对此异常精通。《本草纲目》中保留的这一方面的资料较多，附方中很大部分都涉及质与量的关系问题，值得深入发掘。

首先，方剂配伍重分量。

李时珍引证《千金要方》中的加减“三黄丸”作为典型，分析其中的药物剂量的变化，说明组成同一处方的几种药物，在不同季节应当使用不同的分量，才能达到治疗效果。

加减“三黄丸”，由黄芩、大黄、黄连三味药物组成，孙思邈指出它的功效是：“疗男子五劳七伤，消渴不生肌肉；妇人带下，手足寒热；泻五脏火。”这三味药的配方因季节变化而改变其剂量比例。大体说来，春三月，黄芩四两，大黄三两，黄连四两。夏三月，黄芩六两，大黄一两，黄连三两。秋三月，黄芩六两，大黄二两，黄连三两。冬三月，黄芩三两，大黄五两，黄连二两。（《黄芩·附方》校点本第二册，第782页）这一典型方剂的剂量变化，说明了两个基本事实：第一，三黄丸的质应由三种药物的不同配伍来决定；第二，三黄丸的质量还要随治病的需要而定，要根据人体同自然环境的统一来考虑，不同季节三黄的剂量也不同。这正表明“三黄丸”的名称同一，药物品类相同，由于剂量有别，而质量不一。因此，衡量一副药的质量，不只看它由哪些药物配伍而成，尤当着眼于其中每味药物分量所占的比例。药物品种不一，性质随之有异；诸药分量比例不同，其质亦有区别。

关于中药的数，有时是以模糊数学的方式采用轻重、缓急、多少、洪微等词汇加以描述。例如“巴豆”这种药物，固然可以用七颗、八颗、一两、二两来显示它的数量，当其用雌雄之别、生熟之别来标示其药效时，其中也含有量的区别。《本草纲目》论述巴豆的功效说：“巴豆气热味辛，生猛熟缓。能吐能下，能止能行，可升可降药也。”又说：“（巴豆）紧小者是雌，有棱及两头尖者是雄。雄者峻利，雌者稍缓也。用之得宜，皆有功力；用之失宜，参术亦能为害，况巴豆乎？”（校点本第三册，第2052页）李时珍在

分析了巴豆生猛、熟缓、雄峻雌缓之后，提出峻用与微用的关系。生熟、雌雄之别，是用量的区分来说明药性的质的差异。峻用、微用，则是用量的差异来说明药与病之间的关系，不同的病证要求对同一药物考虑其量的不同。李时珍说：“巴豆，峻用则有勘乱劫病之功，微用亦有抚缓调中之妙。譬之肖（何）、曹（参）、绛（侯）、灌（婴），乃勇猛武夫，用之为相，亦能辅治太平。……妙在配合得宜，药病相对尔。”（校点本第三册，第2054页）猛缓、峻微这些词，用以表述量的规定比较模糊，使用中则有较大的适应性，显示了人们认识的灵活性，参和常用的计量标准，同样，可以揭示药物质的差异。

其次，对症投药守节度。

遣方投药，要“量人大小”，不可过度。这是普通人都知道的，医家尤当注意。同样的病症，同样的配方，老年人，壮年人、幼儿用量是不同的。量的变化因人而异，同前述因季节而异的原则相辅而行。既考虑季节变化，又考虑人体素质的不同，符合从实际出发的辩证思维法则。李时珍对此同样十分精通。《濒湖集简方》载有治疗老小滑泻的一个方剂，写道：“白术半斤，黄土炒过，山药四两炒，为末，饭丸。量人大小，米汤服。或加入参三钱。”（《术·附方》校点本第二册，第737页）“量人大小”，服量不同，此其一；因人而异，酌加人参，此其二。前者讲量的差别，后者讲质的差异。白术与山药，一用半斤，一用四两，是按分量决定药质。类似的附方在《本草纲目》中，不为罕见。

服药除病，不可过量，这是人所必知的通常节度。用药过度，物极必反，危害极大：良药久服，亦必成灾，不可不慎。如麝香，有的医家说，风病必先用之；朱丹溪则说，风病血病必不可用。李时珍从质量相互转化的关系加以分析，认为以上二说“皆非通论”。他说：“盖麝香走窜，能通诸窍之不利，开经络之壅遏，若诸风、诸气、诸血、惊痫、癥瘕诸病，经络壅闭，孔窍不利者，安得不用为引导以开之、通之耶？非不可用也，但不可过耳。”（《麝脐香·发明》校点本第四册，第2869页）“过”与“不过”，这也是模糊的语言，其分寸在于医家临证斟酌。要根据季节、体质、病变之浅深、新久，综合考虑加以抉择。

《本草纲目》指出，有些药物明知它有毒，仍不得不用，关键在于使用的分量适应病证的需要。在节度之内，不到杀人之量，不会造成杀人。李时珍说：“硃砂，大热有毒之物，噎膈反胃，积块内癥病，用之则有神效。盖此疾皆起于七情饮食所致，痰气郁结，遂成有形，妨碍道路，吐食痛胀。非此物消化，岂能去之？”有人说，此药服之可“化人心为血”，李时珍说，这是“甚言其不可多服矣”。（《硃砂·发明》校点本第一册，第656页）他还引用《丹房镜源》的观点加以申述：“有沉冷之疾，则可服之，疾减便止。多用则成拥塞痲肿。”（同上）这里强调的“不可多服”，是模糊的数量概念，其分寸之掌握，在于医家的精湛技艺。

治病必须考虑病变的“表里时日”，投药要循序渐进。这是又一种节度观念。早在春秋时期，医家已认识外邪侵犯人体致病，有由表及里，由浅入深逐步发展的规律。《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战国时名医扁鹊过齐，说齐桓侯“疾在腠理”，桓侯不信；过几天又说：“疾在血脉”，仍不信；再过几天指出：“疾在肠胃间”，桓侯反不悦；最后病变深化，“疾在骨髓”，无法施治，桓侯终于病死。李时珍强调医者治病必须“顾表里，循次第”，

他转述另一个生动故事来说明这一道理。梁武帝时，属官范云得时疫热疾，召名医徐文伯诊之，范云催促医生，务期速愈，以便参加武帝的九锡盛典。文伯说，速愈倒办得到，只怕两年后会一病不起。范云不听警告，说能再活二年已不错了。只要能参加九锡盛典，在所不惜。文伯从命，施以速愈之术。以火锻地，布桃柏叶于上，让范云卧其间，不一会，全身汗出，病就好了。过了两年，果然发病不治而死。李时珍分析说：“取汗先期，尚能促寿。况不顾表里时日，便欲速愈者乎？夫桃叶发汗妙法也，犹有此戒，可不慎与？”（《桃叶·发明》校点本第三册，第1748页）这说明治病的目的在恢复生理机能的稳定平衡，达到这一目的，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如果不顾机能恢复的阶段性的，急躁从事，结果将欲速不达，适得其反。急躁求速，实是对生理机能造成新的破坏。这种破坏一时不易为人所察觉，反以为得计。当这种新的破坏由微之著，发展到一定时期，就将无可救药，范云的悲剧正是如此。李时珍对医药学中质与量的辩证关系的这种分析方法，异常深刻。

最后，药物炮制慎火候。

冶炼钢铁，要注意火候：炮制药物，同样要注意火候。火候不到家，钢铁的质量就不符合要求；煎药不讲“火候”，同样难于保证药剂的质量。这本来是很容易认识的道理。正因其易于认识，也更易于忽略。李时珍对药物炮制的火候问题，再三致意。

药物的浸泡要讲时日，焙炙要讲次数。有些药物的炮制过程须用酒、小便、米泔水、清水等浸泡，浸泡的日数因季节而异。《本草纲目》所载治风湿的“苍术散”的炮制方法是：苍术一斤，粟米泔浸过，竹刀刮去皮，半斤以无灰酒浸，半斤以童子小便浸，春五、夏三、秋七、冬十日。取出，净地上掘一坑，炭火锻赤，去炭，将浸药酒，小便倾入坑内，却放术在中，以瓦器盖定，泥封一宿，取出为末。每服一钱，空心温酒或盐汤下。”（《术·附方》校点本第二册，第740页）这里用童子小便浸泡、四季浸泡的日数不同，泥封须经一宿，这都是用浸泡和泥封时间的长短决定药物的质量，坩坑火锻达到“赤”的程度，亦与苍术散的质量有关。《本草纲目》另载有滋阴降火、开胃进食、强筋骨、去湿热的“坎离丸”，它的炮制过程，火候标准更复杂。此丸由两味药组成，一是白苍术，二是川槿皮。二者炮制过程不同。”白苍术刮净一斤，分作四份，一份川椒一两炒，一份破故纸一两炒，一份五味子一两炒，一份川穹一两炒，只取术研末。川槿皮四斤，分作四份，一斤酥炙，一斤人乳汁炙，一斤童尿炙，一斤米泔炙，各12次，研末，和匀，炼蜜丸梧子大。每服30丸，早用酒，午用茶，晚用白汤下。”（校点本第三册，第741页）其中包含种种量的规定：有各用几斤的比例区别；分成几份炒炙，佐药有别；炙的次数不同，成丸大小有定，每次服用粒数也有规定。在这里量同质的辩证关系，通过炮制过程中诸环节的火候的掌握表现出来。

关于药物熬制要注意文武火候的问题，李时珍多次谈到。《本草纲目》引用《集简方》的记载，治脾胃虚损的“参术膏”的熬制过程是这样：“白术一斤，人参四两，切片，以流水15碗浸一夜：桑柴文、武火煎取浓汁熬膏，入炼蜜收之。”（校点本第二册，第735页）许多中草药气味易于挥发，煎熬过程中掌握文火、武火的人候十分重要。大体先用“武火”，后用“文火”。“文”、“武”这类词，也是一种模糊语言，反映模糊数学观念，它并未规定高于多少温度算“武火”，低于多少温度算“文火”，其奥妙在于实践经验中灵活掌握。参术膏的熬制正是如此。

药物的干燥方式与焙晒时间的长短也是影响药质的因素。对此，《神农本草经》早已作为重要问题加以论述。当时只提出有“阴干”、“暴干”之别，乃自然干燥方法。还提出某些药物不宜在烈日下曝晒，这已给后来的炮制过程注重“火候”作了启示。陶弘景《名医别录》明确指出，有些药物、制丸散时，“若逢阴雨，微火烘之，既燥，停冷捣之。”又说：“凡煮汤，欲微火令小沸。”这些著作对煎药的火候问题都未作系统论述。

李时珍总结历代医家经验，对于煎熬汤药的“火候”问题作了详细论述，其中渗透着重视质量统一的辩证思维方法。

凡煎药并忌钢铁器，直用银器瓦罐，洗净封固，令小心者看守，须识火候。不可太过、不及。火用木炭、芦苇为佳……若发汗药，必用紧火、热服。攻下药，亦用紧火煎熬，下消黄再煎，温服。补中药，宜慢火，温服。阴寒急病，亦宜紧火，急煎服之。

——校点本第一册，第56页

这里强调煎药须分“紧火”、“慢火”、“急煎”、“再煎”，不可“太过”、“不及”，都是用模糊的语言作量的规定，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取火煎药最好用木炭、芦苇、桔竹，它关系到火候与药物质量的关系。因为这类燃料火力不猛，易于控制文武火候。李时珍说：“凡服汤药，虽品物专精，修治如法，而煎药者卤莽造次，水火不良，火候失度，则药亦无功。观夫茶味之美恶，饭味之甘饴，皆系于水火烹饪之得失，即可推矣。是以煎药须用老成人，以深罐密封，新水活火，先武后文。如法服之，未有不效者。火用陈芦、桔竹，取其不强，不损药力也。”（校点本第一册，第419页）由烹饪之得失，决定茶饭之美恶，类此而知“先武后文”煎制得法，药方有效：“火候失度，则药亦无功。”足见火候同药效之间存在量同质的相互关系。用陈芦、桔竹取火，之所以不损药力，正是利用其武火、文火易于控制调节。取火物的质量，影响火力和药物的质量，如此论述，饱含朴素辩证法的质量观。

李时珍在论述处方配药、因人施药、焙制方药问题时，处处考虑到量和质的辩证关系，坚持质与量辩证统一的分析方法，对传统哲学中质量相互转化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作了生动地运用与发挥。

五、执常御变的常变统一思想

“常”和“变”是李时珍经常运用的哲学范畴。中国哲学史上，“常”，反映事物的常规性，即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变”，反映事物的变动性，即事物发展的特殊表现。李时珍不管论病、论药，经常考虑一般的、普通的原则，在特殊条件下如何具体运用。坚持辩证的思维方法，反对不知权变的形而上学。

李时珍告诫人们，随着社会的进化，人们的生活环境，医药卫生条件多有不同，医学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发展；药物也古今多异，绝不可以一般原理原则，硬套千变万化的病变，用一种药方普治百病；患者或生豪富之家，或生贫贱之家，虽同病亦须异治；人们的脏腑总有偏胜，就病施药不可一概而论。医家的医术高明与否，全看能否执“常”以应“变”。

就药物而言，五味四气是固定不变的，但不同药物相反相成，千变万化，未可执一；同一药物，有人用之如神，有人用之无效。常中有变，变中有常，药理奥妙，运于一心。患者虚实有别，用药亦当有异。药物归经各遵其常，但可随配伍不同而改变其归经，此又常中有变。医家若不精通“常”与“变”的辩证关系，犹如盲人骑瞎马。李时珍论医、论药，常能医药结合，知其常而窥其变，从偶然中发现必然，掌握必然以驾驭偶然，真所谓常谈中见妙理，死法中知活法。格物以穷理，通权而达变，后之名医国手无不为之折服。

“逆者正治，从者反治”，一逆一从，或正或反，这就有常有变。正治，逆病证用药，是常；反治，从病症用药，是变。所以李时珍说：“虽然岁有四时，病有四时，或春得秋病，或夏得冬病，神而明之，机而行之，变通权宜，又不可泥一也。”（《四时用药例》校点本第一册，第74页）主张坚持辩证的常变观，克服“泥一”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

同一病证的患者，年龄有少、壮、老之别，血气有盛、衰之分，对证投药当区别对待。李时珍引用张仲景的思想予以阐述道：

凡人少、长、老，其血气有盛、壮、衰三等。故歧伯曰：少火之气壮，壮火之气衰，盖少火生气，壮火散气，况衰火乎？故治法亦当分三等。其少日服饵之药，于壮，老二时皆须别处，决不可忽。

——校点本第一册，第52页

“血气”有盛衰之分，“治法”当少壮有别，这是一般原则，通权达变，全在医家临证具体运用。李时珍结合自己的丰富经验，对以上原理，体会良深。关于常山蜀漆的应用，即是一例。

常山、蜀漆，有劫痰、截疟之功，为治疟要药。李时珍认为，尽管是常用要药，使用时也不可掉以轻心。因为同样是疟，病原却大有区别。“有六经疟，五脏疟，痰湿，食积，瘴疫鬼邪诸症。”但就总体而言，“无痰不作疟”。常山、蜀漆于“驱逐痰水”正有特效。“用之得宜，神效立见；用失其法，真气必伤。”李时珍认为应用常山蜀漆劫痰截疟，须在发发表邪及提出阳气之后，“须分阴阳虚实，不可一概而论也”。（《常山·蜀漆·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1151页）这一论述表明：常山、蜀漆可截疟，此乃药之常性；但疟有诸类，患者有阴阳虚实之别，此事之“变”。常变结合，因人施治，这才符合辩证法原则。

患者有贫富差别，生活条件大异，致病原因诸多不同，病当因人而治。李时珍引用张仲景的论述来阐明这一思想说：“土地高下不同，物性刚柔食居亦异。是故黄帝兴四方之问，歧伯举四治之能。且如贵豪之家，形乐志苦者也；衣食足则形乐而外实，思虑多则志苦而内虚，故病生于脉，与贫下异，当因人而治，后世医者，委此不行，所失甚矣。”（校点本第一册，第52页）

人们的脏腑禀赋不齐，身体素质不同，一般常理，在有些人难免出现例外。附子乃毒药，非危病不可用。有的人只服用少量，即发热不堪；可是也有人长期服用而健康异常。李时珍举了两个具体事例，证明这种例外性。一是荆府都昌王，“体瘦而冷，无他病。日以附子煎汤饮，兼咀硫黄，如此数岁”。二是蕲州卫张百户，“平生服鹿茸、附子药，至80余，健康倍常”。根据这些特殊事例，李时珍得出结论说：“若此数人，皆脏腑禀赋之偏，服之有益无害，不可以常理概论也。”（《附子·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1162

页)

一剂方药不能治众人之病，众病不可以一理概论。常其所常，变其所变，常与变的辩证统一，乃神医妙术之绝奥，故李时珍十分推崇寇宗爽的论述。

宗爽曰：人有贵贱少长，病当别论；病有新久虚实，理当别药。盖人心如面，各各不同。惟其心不同，脏腑亦异。欲以一药通治众人之病，其可得乎？

——校点本第一册，第 52 页

“病当别论”，“理当别药”，强调对具体病证作具体分析，区别对待。既坚持一般原则原理，又区别特殊情况，这叫守“常”而迎“变”。企图“一药通治众人之病”，是不通常变的庸医。

苦参、黄檗，皆能补肾，在于二药之苦能燥湿，寒可除热，这是一般的原理。但运用之时，尤须斟酌情况。若不看患者的特殊情况，一概而论，是会害人的。李时珍指出：苦参、黄檗补肾，“惟肾水弱而相火胜者，用之相应；若火衰精冷，真元不足及年高之人，不可用也。”这就说明常中有变。运用苦参黄檗，本意在于补；如不通常变原理，本求滋补延寿，反致促其夭亡。根本原因正如《素问》说：“五味入胃，各归其所喜攻，久而增气，物化之常也；气增而久，天之由也。”李时珍引用王冰的观点，进一步阐发道：“久服黄连、苦参而反热者，此其类也。气增不已，则脏气有偏胜，偏胜则脏气有偏绝，故有暴夭。”（《苦参·发明》校点本第二册，799页）本为滋补，反遭“暴夭”，岂不可悲？

十剂之中，有所谓“燥剂”，其功效在于去湿。李时珍首先分析了湿的类型，指出“湿有外感，有内伤”。因此，逐湿采用的燥剂，可分以下数种。“风药可以胜湿，燥药可以除湿，淡药可以渗湿……湿而有热，苦寒之剂燥之；湿而有寒，辛热之剂燥之。”（校点本第一册，第 63 页）这就是关于燥剂的“常”与“变”的诸种关系。各项具体措施必须建立在具体分析的基础上，因人而异。人们只有对同类病证有广泛的认识，才能从中概括出一般规律。“十剂”、“四时用药例”，都是属于药理之“常”。《本草纲目》中所列的经方、时方、验方等，是在“常”理指导下的具体运用。名医辨证论治，正是执常以应万“变”，万变不失其“常”，坚持一般与特殊相结合的思维方法。

李时珍用常变统一思想论药，指出药理有常，用之则千变万化。药有五味、四气，这是药物的“本性”，它是一定不变的，是为“常”。不同配伍，可以产生千变万化的方剂，这就是它的“变”。七方、十剂固然有其常则，对于人体的功效或补或泻，因人而异，更不可执一。故李时珍说：“甘缓、酸收、苦燥、辛散、咸软、淡渗，五味之本性，一定而不变更也；其或补或泻，则因五脏、四时而迭相施用者也。温凉寒热，四气之本性；其于五脏补泻，亦迭相施用也。”（《五脏五味补泻》校点本第一册，第 78 页）

《神农本草经》谓药有“七情”，不只相须、相使者可以同时使用，相畏、相杀者，相恶、相反者也可同时使用。李时珍指出药物的配伍，“有经有权，在用者识悟尔”。（校点本第一册，第 66 页）如果医家对相畏、相杀、相反的药物，一概拒绝配合使用，那就是株守常格而不识权变的庸医。李时珍引用陶弘景的话论述这一思想说：“凡检旧方用药，亦有相恶相反者。如仙方甘草丸有防己、细辛，俗方玉石散用栝蒌、干姜之类，服之乃不为害。……”

半夏有毒，须用生姜，取其相畏相制也。”“牛黄恶龙骨，而龙骨得牛黄更良，此有以制伏故也。”（校点本第一册，第46页）这都是“有经有权”的典型方剂。坚持这种观点论药。可谓得其枢要。

某些药物治某些疾病有特效，人们因其有特效而忽略其适应范围，结果往往出乱子。

紫草，味甘咸而气寒，其功效长于凉血、活血、利大小肠，人心包络及肝经血分，是治痘疹的良药，这是它的一般性。但在投用的时候务须慎重考虑其特殊条件。李时珍说得明白：“痘疹欲出未出，血热毒甚，大便闲涩者宜用之：已出而便闭者，亦可用。若已出而红活，及白陷，大便利者，切宜忌之。……今人不达此理，一概用之，非矣。”（《紫草·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763页）只知紫草治痘疹的共性，不顾患者痘疹已出未出，大便或闭或利的特殊情况，死守教条，违背通权达变的原则，是容易坏事的。

石膏，气味辛，微寒。主治中风寒热、头痛身热，三焦大热，肺热胃热，中暑潮热等。其性之常，在于祛热。然而临床用之祛热，则或效或不效，其中大有文章。《名医别录》载，睦州杨家女，病骨蒸，内热外寒，众医不治，某医用白虎汤（以石膏为主药），一剂而热除。广济林某年50，病痰咳发热，某医家嘱用石膏，热未除而咳益频，终至不起。李时珍根据这一正一反两个医案总结道：白虎汤祛热，“此皆少壮肺胃火盛，能食而病者言也；若衰暮及气虚血虚胃弱者，恐非所宜”。林某服之病至不起，“此盖用药者之音也”。（《石膏·发明》校点本第一册，第545页）只知石膏能去热，不问患者年岁少壮，胃气盛衰，一概用之，正是知常不知变的瞽瞍者。

二贤散，由桔皮、甘草、盐花合成，朱丹溪变更为润下丸。治一切痰气有特验。如果只知二贤散治痰气的常理，而不达其变，不免受害。李时珍指出：此剂“惟气实人服之相宜，气不足者不宜用之也。”（《黄桔皮·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1788页）这说明欲知药物对患者当用不当用，须先别患者气之虚实，此之谓常变结合。二贤散如此，他剂何独不然。

在药物归经问题上，也存在常变妙理。李时珍对药物归经理论的重大发展，就在于论述了药物的归经可随不同的配伍而改变。常山、蜀漆（即常山苗）乃劫痰截疟要药。李时珍指出：它的归经特性，可随佐使而改变，“得乌梅、鲮鲤甲则入肝；得小麦、竹叶则入心；得秫米、麻黄则入肺；得龙骨、附子则入肾；得草果、槟榔则入脾。”（《常山·蜀漆·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1151页）不知常山、蜀漆因配伍不同而归经有别，只知其有截疟之功，是知常不知变。如此投药，为名医所不取。

庸医不通常和变，认为一药可以通治百病。李对珍对此作了正确批评。如育礞石，气平味咸，其性下行，乃厥阴之药，治痰气有特效。痰之产生，由于肝经风木太过，来剋脾土，气不运化。积滞生痰，壅塞上中二焦，变生风热情病，故宜用此药，“使木平气下，痰积通利，诸证自除。”礞石虽有祛痰而除诸证的良效，并非能治百病，李时珍指出，“止可用之救急，气弱脾虚者不宜久服。……而王隐君则谓，痰为百病。不论虚实寒热，概用滚痰丸（按：以礞石为主药）通治百病，岂理也哉？”（《礞石·发明》校点本第一册，第612页）不分虚实寒热，企图用一药治百病，这是既不知常又不知变的典型的形而上学思想。

蜂蜜也是一种良药。它不冷不燥，生用凉，熟用温，得中和之气，故十二脏腑之病，无不相宜。如果只知其利，不明其弊，也会受害。李时珍根据

临证经验指出：“但多食亦生湿热虫^醫，小儿尤当戒之。”（校点本第四册，第2218页）不少人溺爱幼儿，多喂蜂蜜，结果影响幼儿健康，这是知常而不知变的恶果。由此可见，愈是人们习以为常的药物，尤当特别留意。久服良药，亦生弊端，暗受其害，还莫明其妙。李时珍对人们常见常用的一些药物留心研究，往往参其常变，发前人之未发。他不为前人阐明的常理所感，更不泥于一家之言，严防对病症、药物一概而论。在常理之中悟出特例，于概论之下别其分寸，既知常又知变，坚持了朴素辩证法思想，故能对祖国药学的发展作出独到的贡献。

第十章 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

创作光辉的科学著作，没有正确的认识路线作指导，是不会取得成功的。李时珍撰写《本草纲目》在认识上得益于传统哲学唯物主义经验论。传统哲学中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原则，是李时珍研究医学、药理学，从事科学创造的思想武器，它指导李时珍在攀登祖国医学科学高峰的险途中不致迷失方向，进而取得辉煌的胜利。

传统哲学中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原则，指引李时珍在药理学研究过程中循名责实，明体达用，注重实践，勤干调查，遇物必格物穷理，审其虚实，坚持知行统一的原则、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用科学的方法，探讨病理、医理、药理，征服疾病，拯救急难。

李时珍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论原则，有力地批判了当时盛行的陆王心学的主观唯心主义认识论，对古代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贡献也很突出。

一、一切从实际出发

李时珍研究医药注重从实际出发，讲求名实统一，循名责实。“名”和“实”是传统哲学中一对认识论范畴。“实”，指客观存在的事物，它是第一性的；“名”，是关于客观事物的概念，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它是第二性的。循名责实是认识论中的唯物主义路线，它要求名与实一定要相符合，即名副其实，反对名实割裂，名不副实。

（一）正名核实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辟有“正名”一栏，力图以唯物主义认识论原则，审核各种药物的名称，考察历代本草著作中关于这种药物的产地、外形、药性、功效的记载与实际药物是否一致。其所以把“正名”列为研究项目，是因为他发现古代药理学著作中的药物名称，往往同现有药物不相符合，或名同而实异，或同实而异名，在医疗实践中常造成错误。李时珍把正名核实作为重要问题，认真加以考虑，认为“正名”是编好一部本草著作的基础，应将自己的注意力首先集中在这方面，容不得半点差错。李时珍论及核定药物名实的重要性时指出：

生产有南北，节气有早晚，根苗异收采，制造异法度。故市之地黄以锅煮熟，大黄用火焙干，松黄和蒲黄，樟脑杂龙脑，皆失制作伪者也。孔志约云：动

植形生，因地舛性；春秋节变，感气殊功。离其本土，则质同而效异，乖于采取，则物是而时非。名实既虚，寒温多谬，施于君父，逆莫大焉。

——《神农本草经名例》校点本第一册，第47页

所谓“名实既虚，寒温多谬”，就是说名实不相副，质量、效用大有差异。要使名实相副，须注意三个方面：（1）产地相符；（2）药物的季节相符；（3）药物的炮制方法相符。如此才能保证药物的性味与其名称一致，否则会同名而异效，物是而时非，是伪药。

李时珍指出，常见的药物兰草和兰花，本是两种不同的植物。宋代著名药物学家寇宗奭编《本草衍义》时，就未弄清，把二者混为一体。李时珍对寇氏有很高的评价，说他“以《补注》及《图经》二书，参考事实，核其情理，援引辩证，发明良多”。但对他关于兰草的错误则不可原谅。

李时珍指出寇氏所说的兰，“乃近世所谓兰花，非古之兰草也。兰有数种，兰草、泽兰，生水旁，山兰，即兰草之生山中者也。”（《兰草·正误》校点本第二册，第904页）寇氏的错误，在于未辨同名异实。同样的错误在白蜡这一药物上也存在。有虫造白蜡，还有白色蜜蜡。蜜蜡本身有白黄两种。寇氏本草认为“新蜡则白，随久则黄”。谓同一药物时久则变色，乃有黄白之分。李时珍正其误说：“蜡乃蜜脾底也。取蜜后炼过，滤入水中，候凝取之，色黄者俗名黄蜡，煮炼极净，色白者为白蜡。非新则白，久则黄也。与今时所用虫造白蜡不同。”（《蜜蜡·集解》校点本第四册，第2221页）

宋代唐慎微编的《证类本草》，李时珍认为是最完备的。其中关于酸草的认识就有错误。酸草和酸浆是两种不同的药。唐慎微以三叶酸草附于酸浆之后，李时珍指出，“盖不知其名同物异也。”（《酸浆·集解》校点本第二册，第1049页）

蟾蜍和蛤蟆是不同的动物，在药物著作中也易弄错。李时珍说：蟾蜍，锐头蟠腹，促眉浊声，土形，有大如盘者、穴居土中，食虫，背无黑点，行动迟缓。蛤蟆，生在陂泽中，背有黑点，身小，能跳接百虫，举动极急。指出：“古今诸方所用蛤蟆，多是蟾蜍，读者当审用之，不可因名迷实。”（《蟾蜍·发明》校点本第四册，第2337页）

李时珍把只看名称不顾实物是否与名相符称作“因名迷实”的错误，这是从唯物主义反映论原则出发的正确评论。

在本草中除了名同实异的情况，更多的存在一物数名的情况，如不认真考察，容易发生同实异名的混乱。例如斑蝥这种生物，在不同的季节以不同的植物为生，因而体态有异。它是一物还是数物，唐宋以来聚讼纷纭，言人人殊。李时珍予以澄清道：“按《太平御览》引《神农本草经》云：春食芫花为芫青，夏食葛花为亭长，秋食豆花为斑蝥，冬入地中为地胆，其说甚明，而唐宋校正者反失收取，更致纷纭，何哉？陶氏之王不留行虫，雷氏之赤头，方药未有用者，要皆此类，固可理推。”（《斑蝥·集解》校点本第四册，第2269页）

李时珍以前的本草著作中，有将名相近而实异的药物误为同实异名。沉香和檀香是同物还是异物，就有过争论。李时珍在《沉香·正误》中指出：“按李珣《海药本草》谓沉者为沉香，浮者为檀香。梁元帝《金楼子》谓一木五香，根为檀，节为沉，花为鸡舌，胶为薰陆，叶为藿香。并误也，五香各是一种。”（《沉香·正误》校点本第三册，第1938页）

李时珍进而考证，“一本五香”的药物是存在的，但檀香并不包括在“五香”之中，他说：“所谓五香一本者，即前苏恭所言，沉、栈、青桂、马蹄、鸡骨者是矣。”（同上）

同上述情况类似，川消、土消、盐消、朴消是一种药物，还是几种药物，也曾发生混乱。李时珍写《消石·正误》作了详细订正。《朴消·集解》中简单概述道：“消有三品：生西蜀者，俗称川消，最胜；生河东者，俗称盐消，次之；生河北、青齐者，俗称土消。皆生于斥卤之地，彼人刮扫煎汁，经宿结成，状如盐末。……陶弘景及唐宋诸人，皆不知诸消是一物，但有精粗之异。因名迷实，谬乱猜度，殊无指归。”（《朴消·集解》校点本第一册，第644页）

坚持正名核实的正确原则，纠正“因名迷实，谬乱猜度”的错误态度，这是李时珍坚持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立场。李时珍结合药物学中许多生物事例，说明在分析问题时，坚持循名责实的正确原则十分重要。

（二）明体达用

同名实问题相关联，李时珍在“体”、“用”问题上同样坚持了正确的思想原则，主张体用统一，明体达用。

“体”、“用”也是中国传统哲学中一对重要范畴。“体”指客观存在的实体；“用”指客观实体的效用。在药物学上，研究每一种药物，实质上就是弄清它的体与用的关系。任何药物，必须先明其体，而后乃能达其用。

李时珍在谈到《本草纲目》的编纂宗旨时，着重突出两点：一是正纲目，二是备体详用。他写道：“每药标一总名，正大纲也，大书气味，主治，正小纲也。分注释名、集解、发明，详其目也。而辨疑、正误、附录附之，备其体也；单方又附于其末，详其用也。”（《神农本草经名例》校点本第一册，第45页）可能有人曾建议李时珍从《本草纲目》中删去附方部分。李时珍未加采纳，并解释道：“诸品首以释名，正名也。……次以气味，明性也。次以主治，录功也。次以发明，疏义也。次以附方，著用也。或欲去方，是有体无用矣。”（《本草纲目·凡例》校点本第一册，第33—34页）

为了使每一味药体用兼备，李时珍尽可能根据有关方书，加上自己的实践经验，列出每味药的主治病症及所用附方，增强这一科学著作的实用价值。例如人参一味，所主治的病症就有一切虚证、吐血、下血、血淋、血崩等，其附方达63方。丹砂，主治“身体五脏百病、养精神、安魂魄、益气明目、杀精魅邪恶鬼”。附方旧方8，新方27。消石，主治“五脏积聚，胃胀闭，涤去蓄积饮食，推陈致新，消邪气”。附方：旧四、新十。总之，每味药都是先明主治，后列附方，有体有用，以用证体。有的药物，主治已明，尚未收集到附方，则缺如，以待后人验证补充。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对药物学的一个重大发展，在于按药物归经划分药性。有时一种药物的药性往往可以归入不同脏腑，李时珍提出“一体二用”的主张，特别加以阐述，引起人们的注意。如桔皮有青皮、陈皮之分，人脏亦有区别。他写道：“陈皮，浮而升，入脾肺气分；青皮，沉而降，入肝胆气分。一体二用，物理自然也。”（《青桔皮·发明》校点本第三册，第1790页）先将青皮、陈皮的性味加以区分，然后从哲学的高度加以总结，肯定“一体二用，物理自然”，这一原则更具有普遍性。许多药物往往具有“一体二

用”的特点，医学家应深入考究，不可疏忽大意。

一体二用，特别表现在同一药物的生用、熟用上。巴豆一味，生猛熟缓，能升能降，以往医家，大有争论。《名医别录》认为“生温熟寒，有大毒”。张元素认为：“性热味苦，气薄味厚，体重而沉降，阴也。”李果认为：“性熟味辛，有大毒，浮也，阳中阳也。”李时珍按“一体二用”的原则，对这一争论作出新的判断。他写道：“巴豆，气热味辛，生猛熟缓。能吐能下，能止能行，是可升可降药也。《别录》言其熟则性寒，张氏言其降，李氏言其浮，皆泥于一偏矣。盖此物不去膜则伤胃，不去心则作呕，以沉香水浸则能升能降，与大黄同用，泻入反缓，为其性相畏也。”（《巴豆·气味》校点本第三册，第2053页）

在体用关系问题上，明其体，固能知其用；明其用亦更能知其体。医学家、药物学家对药理学的发展，有的在于发现某些新的药物，有的在于对原有的药物探索出新的效用，用新的经验去充实原有的本草学。李时珍为了用新的医药知识去丰富本草学，非常重视前人所积累的经验。“发明”栏、“集解”栏内，尽力发掘前人提供的知识，对每一味药物的体与用都有深入的认识。例如在《熟地黄·发明》中他说道：“按王硕《易简》云：男子多阴虚，宜用熟地黄；女子多血热，宜用生地黄。又云：生地黄能生精血，天门冬引入所生之处；熟地黄能补精血，用麦门冬引入所生之处。虞博《医学正传》云：生地黄生血，而胃气弱者服之，恐防食；熟地黄补血，而痰饮多者服之，思泥膈。或云：生地黄酒炒则防胃，熟地黄姜汁炒则不泥膈，此皆得用地黄之精微者也。”（校点本第二册，第1022页）博学多闻的李时珍，善于从历代本草、医学著作以及经史百家著作中，发掘零散的知识，集腋成裘，灿然成章，条分缕析，阐入精微。上述对地黄一味，生熟两用，剖析透彻，无异阐述体用问题的哲学文章。

李时珍是一位潜心科学研究的有心人。他常常从经史百家著作中偶一闪现的历史故事中，深入体察某些药物的性能。这是他“以用证体”的一种研究方法。他从苏鹗《杜阳编》中看到一個有趣的故事。说：“范纯佑女丧夫，发狂。闭之室中。夜断窗棂，登桃树上，食桃花几尽。及旦，家人接下，自是遂愈也。”对于这样一个故事，常人或以传奇观之。李时珍不然，他从桃花愈狂女的故事中细心探索桃花的药用价值，对其医病原理作了科学分析：

珍按：此亦惊怒伤肝，痰夹败血，遂致发狂。偶得桃花，利痰饮、散滞血之功，与张仲景治积热发狂用承气汤，畜血发狂用桃仁承气汤之意相同。

——《桃花·发明》校点本第三册，第1746页

通过偶然发现的桃花妙用，进而丰富、充实对桃花这一实体的认识。结合张仲景的治狂方药的分析，使对桃花的使用认识更加深刻。

李时珍发明甘蔗的妙用，也是有悟于生动出奇的故事。这个故事是李时珍从一部《野史》中看到的。说古时有卢绛中其人，“病痞疾”。“忽梦白衣妇人云：食蔗可愈。及旦，买蔗数挺食之，翌日疾愈。”李时珍根据这一情节，从药理学上加以研究，断定：“蔗，脾之果也。其浆甘寒，能泻火热。”梦中白衣妇人居然言而有中治好了“痞疾”，“此亦助脾和中之验”。（《甘蔗·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1889页）李时珍没有被这个故事的神秘外衣所迷惑，也没有因其荒诞而一笑了之，忽视其合理内容。他用自己的药理学知

识和医疗实践经验，对其包含的合理内容予以科学解释，达到“以用证体”的目的。

名实问题同体用问题，在本草学中是密切相关的，名实既乖，体用必虚。李时珍十分注意这种情况。例如唐初甄权修《药性本草》认为鹿角白胶就是黄明胶，二者异名而同实。宋代唐慎微《证类本草》，不但沿袭错误，反采集有关黄明胶诸方附于其下，表明体用结合，实际上反使错误加剧。李时珍纠正道：

按《本经》，白胶，一名鹿角胶，煮鹿角作之；阿胶，一名傅致胶，煮牛皮作之，其说甚明。黄明胶即今水胶，乃牛皮所作，其色黄明，非白胶也，但非阿井水所作耳。甄权以黄明为鹿角白胶，唐慎微又采黄明诸方附之，并误矣。今其正误。

——《黄明胶·正误》校点本第四册，第2797页

不难看出，对药若不正名核实，就会造成体用大错；医家沿袭施用，必然造成医疗上的损失。将牛皮做的黄明胶混同于用鹿角作的白胶，由名称的混乱导致附方混乱，结果造成疗效的失误，足以说明审名核实在本草认识上的极端重要性。李时珍一再强调，不可“因名迷实”，注重明体达用，这的确坚持了认识论上的根本原则。结合药物实际情况，足以看出李时珍所继承发扬的是传统哲学中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

二、遇事必究其理

李时珍有强烈的格物穷理精神。他从事医学、药物学研究，之所以取得辉煌成就，其奥秘在于他遇事必究其理，其格物穷理精神异于常人。

格物穷理是我国古代哲学中重要的认识论原则。唯物主义者主张格物穷理，唯心主义者同样主张格物穷理，但二者的认识路线则是根本对立的。唯物主义者认为，一切物理都包含在万事万物之中，离开客观存在的事物无所谓物理，不存在离开客观物质的虚托孤立的理。理就是客观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性；穷理就是通过人们的认识活动，去揭示事物之间的本质联系，发现其规律。格物的过程，首先要使人们的感官接触客观事物，进一步在实践中变革客观事物，从而揭露事物的本质与规律。唯心主义者则不然，他们认为“理”先于客观事物而存在，可以脱离客观事物而独立；或者认为未有宇宙之先，“理”已存在，宇宙万物乃由它所派生；或者认为“理”就是人心，有了心才有理，离开了心，“理”就不存在了。他们认为“穷理”只须在心上用力，就能把握理，这就是他们的格物观。两种格物穷理的哲学路线，宋明时期争论不休。李时珍主张的格物穷理，属于唯物主义路线。他坚决主张从客观存在的事物中去探索事物本质及其运动变化的规律性。他认定物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心中固有的，而靠人们花力气从事物中发掘出来。

李时珍反复表明，他决心重修本草，目的就在于格药物之理。格物穷理对于一个医药家是异常重要的，缺乏格物穷理精神的医家，很可能是个庸医，在医疗实践中，少有不出乱子的。具有格物穷理精神的人，才能参天人之奥妙，通岐黄之精微。

（一）司命卫生者，首当知物理

李时珍强调论医研药，事关司命卫生，不可不“知物理”。格物知理，是他重修《本草纲目》的初衷，也是他从事科学实践的归宿。在《本草纲目·果部》序论中，他强调格物穷理的重要性，写道：

木实日果，草实日蕪。熟则可食，干则可脯。

丰俭可以济时，疾苦可以备药。辅助粒食，以养民生。故《素问》云：“五果为助。”五果者，以五味、五色应五脏，李、杏、桃、栗、枣是矣。……观此，则果蕪之上产常异，性味良、毒，岂可纵嗜欲而不知物理乎？

——校点本第三册，第 1725 页

这是说各种果物，无不自具物理，待人们认真研究，如果只“纵嗜欲”，“不知物理”，而想靠他“养民生”，“治疾苦”，很可能适得其反，自食恶果。

为了引起人们重视研究木部药物的物理，李时珍在《本草纲目》木部的开篇，用韵文写了一段精粹议论。申述“坚脆美恶，各具太极（即理）”。他说：“木乃植物，五行之一。性有土宜，山谷原隰。肇由气化，爰受形质。乔条苞灌，根叶花实。坚脆美恶，各具太极（即理）。”（校点本第三册，第 1911 页）这阐明木类药物，虽然都是元气化生，因其生长的地理条件有山、谷、原、隰之别，其形态有乔、条、苞、灌之分，用作药材，更有根、叶、花、实之别，色香多异，气味各殊，是寒是温，有毒无毒，都有待于认真考究。总之，“各具太极（理）”，非精心格物，不可得知。

李时珍在《山楂·发明》中讲了他研究羊杓子治黄肿痛的故事，以表明他格物理的精神。他的邻居有一小儿，“因积食。黄肿，腹胀如鼓”。有一天，偶然到羊杓树下，取食致饱，回家大吐痰水，从此病就好了。李时珍研究这一现象，认定其中必有“物理”，得到结论说：“羊杓乃山楂同类，医家不用而此效，则其功应相同矣。”不仅认识了羊杓的功效，同时更加深了对山楂的认识。他说，山楂“凡脾弱食物不克化，胸腹酸刺胀闷者，于每食后嚼二三枚，绝佳。但不可多用，恐反克代也。”（校点本第三册，第 1774 页）他还根据《物类相感志》的记载：“煮老鸡，硬肉，入山楂数颗即易烂”，进一步得出结论说，山楂“消肉积之功，盖可推矣”。（同上）由羊杓治病的偶然发现，而引起对山楂性味的进一步认识，由山楂“消肉积之功”，深入考究，益加肯定羊杓之治“积食黄肿”，绝非偶然。这些都是李时珍格物穷理精神的生动体现。

李时珍从蜀医张肱巧治“消渴”的事迹中，深深敬佩古代名医的格物穷理精神。病人揭颖臣患“消渴”，日饮水数斗，饭亦倍常，小便频数。众医生按治“消渴”的办法医治，“服消渴药逾年，疾愈甚”，自以为必死。名医张肱诊后，投了一副药，就把病治好了。问其故，他说，“颖臣脾脉极盛，而肾气不衰，每由果实、酒物过度，积热在脾，所以食多而饮水。水既多，溺不得不多，非消非渴也”。原来以往医学家只看某些表面现象，先人为主，把病证弄错了，治了一年多，愈服药愈糟。张肱看准证候，故能一药而愈。李时珍从《苏东坡集》中看到这一事迹后，反复思考，深有感慨地说：“古人重格物，若肱盖得此理矣”。（《枳椇·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 1846 页）

李时珍在实践中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注重格物穷理，对医学、药理学做出独到贡献，事例很多。《本草纲目》记述了一个生动的病案：“一人素饮

酒，因寒月哭母受冷，遂病寒中，食无姜、蒜，不能一啜。至夏酷暑，又多饮水，兼怀怫郁。因病右腰一点胀痛，牵引右肋，上至胸口，则必欲卧。发则大便里急后重，频登圜，小便长而数；或吞酸，或吐水，或作泻，或阳萎，或厥逆，或得酒少止，或热稍止。但受寒食寒，或劳役，或入房，或怒或饥，即时举发。”针对这一症状，按一般治疗方法，服用温脾、胜湿、滋补、消导诸种药剂，都少效验，或稍微好转，随之又发作。李时珍认真诊视，深入思考，终于投一剂而“诸症如扫”。他总结自己的心得说：

时珍思之，此乃饥饱劳逸，内伤元气，清阳陷遏，不能上升所致。遂用升麻葛根汤和四君子汤，加柴胡、苍术，黄芪煎服。服后仍饮酒一二杯助之。其药入腹，则觉清气上行，胸膈爽快，手足和暖，头目清明，神采迅发，诸症如扫。

——《士当归·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797页

李时珍医案多数没有保留下来。这一医案记述相当完整，对疾病的起因、发展、各种症状、医疗过程，以及最后辨证结果、处方原则、治疗效果，都一一叙述清楚。由此人们可对李时珍在医疗实践中整个格物穷理的过程有完整的了解。后代医学家若遇清阳郁遏之症，则可引为借鉴，举一反三，更应效法他的格物精神。

（二）格物穷理，力戒主观

辨证处方，最忌先人为主，根据一点表面现象就下结论。李时珍结合自家的临证经验，常对前人留下的医案进行深入的思考，得出独到体会。周密《野语》记载一则医案说：“临川周推官，平生孱弱，多服丹砂、乌、附药，晚年发背疽。”经不少医家诊治，都认为患者服丹石过多，应投以解毒药。表面看来，这一治疗原则是符合常理的。可是久治无效。后来另一位老中医诊脉说，这是属于阴极证，“正当多服伏火丹砂及三建汤”。先用小剂试验，继用大剂，三日后用膏敷贴，半月而疮平，先后服三建汤150服，把病治好了。根据这一记载，李时珍深思这位老中医的结论为什么同“前诸说异”呢？领会其中道理说：“盖人之脏腑，禀受殊方，在智者辨阴阳脉症，不以先入为主。非妙入精微者，不能企止。（《丹砂·发明》校点本第一册，第521页）李时珍的体会对人们的启发很大。从认识原则上说来，就是要克服主观成见，遇事从实际出发，深致格物之功，才能“妙入精微”，不落常套。

照常理讲，丹砂不可久服。周推官多服丹砂，晚年发背疽，医家“悉归罪服丹石”，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但忽视患者脏腑之禀赋有差异，一概而论，不能不事与愿违。李时珍着重指出，药物的五味、四气本性是“一定不变”的，由于患者“五脏有异”，患病的“四时”不同，应当全面考虑灵活运用。他说：“甘缓、酸收、苦燥、辛散、咸敛、淡渗，五味之本性，一定而不变者也。其成补或泻，则因五脏、四时而迭相施用者也。温凉寒热，四气之本性也，其于五脏补、泻、迹迭相施用也。”（校点本第一册，第75页）不考虑五脏、四时差异，只凭四气、五味的常理处方治病，违反格物穷理的基本原则，不免犯主观主义错误。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一再告诫人们，努力克服主观主义，遇事“不可一律论”，不只对病症不可一律论，就是每一种药物本身，根、茎、花、实，单使、兼用、两用、全用，也大有区别，都应细心格物。他写道：

本草有单使一件者，如羌活之根，木通之茎，款冬之花，葶苈之实，……胡桐之泪，龙胆之膏是也。有兼用者，远志、小草、蜀漆、常山之类是也。

有全用者，枸杞、柑菊之类是也。有一物两用者，当归头、尾，麻黄根、节，赤白茯苓，牛膝春夏用苗、秋冬用根之类是也。羽毛、鳞介、玉石、水火之属，往往皆然，不可一律论也。

——校点本第一册，第46页

（三）药物变化无穷，物理亦无穷

李时珍指出，同一种药物，人们对它的性质、效用的认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还有很大的不同。古今药物变化无穷，格物亦无穷，时代愈变迁，愈加显示格物穷理的重要性。《忍冬·发明》写道：“（忍冬）昔人称其治风、除胀、解痢、逐尸为要药，而后世不复知用；后世称其消肿、散毒、治疮为要药，而昔人并未言及，乃知古今之理，万变不同，未可一辄论也。”（校点本第二册，第1235页）昔人从当时医疗实践中格物穷理而得到的结论，在当时十分重要；后来医药卫生条件发展了，新的药物和医疗方法代替了旧的药物和医疗方法，故过去的结论虽未必错，也可能不再重要，久之“不复知用”。后人在新的条件下，格物穷理，发展、丰富了古人的认识，所以出现了许多新的药物，或认识同一药物新的效用，这些方面古人“并未言及”。这两种情况都是大量存在的。李时珍发出“古今之理，万变不同，未可一辄论”的忠告，是他长期医药实践格物穷理而得出的千古名言。它符合唯物主义认识论原则，渗透着深刻的辩证法思想。

李时珍从归经入脏之别，来规定药物的特性，这是他对本草学的重要发展。但他又叮咛人们对于药物入脏性别，也“不可一概论之”，要依其炮制方法、所用佐使而定。他以常山、蜀漆为例，反复申述道：

常山、蜀漆，生用上行必吐，酒蒸炒熟用则气稍缓，少用则不致吐也。得甘草则吐，得大黄则利，

得乌梅、鲮鲤甲则入肝，得小麦、竹叶则入心，得秫米、麻黄则入肺，得龙骨、附子则入肾，得草果、槟榔则入脾。

——《常山·蜀漆·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1151页

他的这些结论，都是从前人及本人长期实践经验中，深入格物，求其妙理，总结归纳出来的。是他克服了形而上学的一得之见而取得的认识成果，反映了他那个时代医药知识发展的新水平。

李时珍指出，有时同一药物，疗效有差异，究其原因，并非生用熟用不同而引起，也不是炮制方法、佐使有异而引起，实由于药物的根、茎、花、实、苗、皮、骨、肉、部位不同而效果迥异。麻黄的同药异效情况，值得深思。“麻黄，发汗之气，驶不能御；而根节止汗，效如影响。物理之妙，不可测度如此。”（《麻黄·根节·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1011页）麻黄能发汗，其根节却能止汗。李时珍慨叹“物理之妙，不可测度”，是指对那些惯于持“一辄之论”，而不善于精思格物的人来说，这些现象是不可测度的。对于一个唯物主义科学家来说，正要花最大精力，努力去测度其中的“物理之妙”。

李时珍用心研究了常用补药龟甲和鹿茸，对其一以补阴，一以补阳的奥

秘，颇有神悟。他介绍自己格物的心得说：“龟、鹿，皆灵而有寿。龟首常藏向腹，能通任脉，故取甲以补心、补肾、补血，皆以养阳也；鹿鼻常反向尾，能通督脉，故取其角以补命、补精、补气，皆以养阴也。乃物理之玄微，神工之能事，观龟甲所主诸病，自可心解也。”（《龟甲·发明》校点本第四册，第2493页）可见李时珍揭示“物理之玄微”，是认真研究每种药物所主诸病，“心解”而得。千百种药物的“物理之玄微”，并不是仅由个别天才医学家独自“心解”而来，全靠千百医药家长期格物穷理，不断探索，积累而成。后代学者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根据已经积累的资料，认真进行总结，不断加以提高，日益揭示其规律性。

《名医别录》等古代医药著作，常常记载一些奇怪的病例、医案，有人以为这是该书的缺点。李时珍不那样看。他认为许多事情之怪，往往包含一定妙理，靠后来的人们去加以揭示、解释。例如《名医别录》记载有这样一个医案：“汉上张忠诚女18岁，误吞金（戒）子一只，胸隔痛不能忍，忧惶无措。”巧遇一位银匠，他只炒了三钱药末，请患者用米汤吞下，金戒子就从大便中排出了。这位银匠所用的并不是什么名贵药物，“乃羊胫灰一物耳”。即用羊胫骨炒后制成的粉末。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写道：“羊胫骨灰可以磨镜，羊头骨可以消铁，故误吞铜铁者用之，取其相制也。……皆巧哲格物穷理之妙也。”（《羊胫骨·发明》校点本第四册，第2743页）可见李时珍处处留心学习古今贤哲的“格物穷理”精神，在常人未曾注意的地方，去考究妙理，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他讥笑那些“肤学之士”，不肯格物穷理，反而“恃一隅之见，而概括古今六合无穷变化之事为迂怪”。（《人傀》校点本第四册，第2975页）抱着这种态度的人，希望在科学上做出贡献，显然是不可能的。李时珍从认识论上得出结论说：“《尔雅》、《说文》所载，后世未能悉知；后世所知者，古书复未尽载。可见格物无穷也。”（校点本第四册，第2899页）“格物穷理”的观点，符合认识发展的辩证法。人类就是一代又一代，对于“无穷变化之事物”进行“无穷”的格物穷理，从而把人类的科学文化一步步推进到新的发展水平。

（四）不格物理，危害极大

李时珍凭自己丰富的医药实践经验，常用许多生动事例，来阐明不格物理对医药实践的危害。不少沉痛教训是在不知不觉中造成的，往往贪一时之快，而铸成难以挽回的错误，令人触目惊心。

槟榔这种果实，南方人经常喜欢吃它。人们只知吃了它可以祛瘴，而不知食之有害。是“狃于近利而暗于远患”。《本草纲目》写道：“夫岭南地热，四时出汗，人多黄瘡，食之则脏器流泄。一旦病瘴，不敢发散攻下。岂气候所致？槟榔亦为患，殆未思尔。又东阳卢和云：闽广人常服槟榔，云能祛瘴。有瘴服之可也；无瘴服之，宁不损正气而有开门延寇之祸乎？”（《槟榔子·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1832页）不格物理而“狃于近利”，嗜欲佳肴美果，无意中干了“开门延寇”的蠢事。

竹笋，是一种美好的食物，并有诸种药效。常食却大有害处。许多人不明其理，暗受其害。李时珍引用赞宁《竹笋》中话说：“笋虽甘美而滑利大肠，无益于脾。俗谓之刮肠”。进一步，李时珍批评某些俗医用笋汤发痘的作法。他说：

时珍常见俗医治痘，往往劝饮笋汤，云能发痘。

盖不知痘疮不宜大肠滑利，而笋有刮肠之名，则暗受其害者，不知若干人也。戒之哉！戒之哉！

——《竹笋·发明》校点本第三册，第1685页

笋汤发痘，看来不止一位医生这么用，可能是流传较广的单方。众人用之，而下格物穷理，因而“暗受其害者”甚多。

香薷，本是夏天解表良药，可是有些人“不拘有病无病，概用代茶，谓能辟暑”。李时珍严厉地呵斥说：“真痴前说梦也”。《本草纲目》科学地分析了服用香薷对某些伤暑之人危害极大。

若饮食不节，劳役作丧之人，伤暑大热大渴，汗泄如雨，烦躁喘促，或泻或吐者，乃劳倦内伤之证，必用东垣清暑益气汤，人参白虎汤之类，以泻火益元可也。若用香薷之药，是重虚其表，而又继之以热矣。

——《香薷·发明》校点本第一册，第910页

本来香薷饮是治暑病的首药，世医无不遵循；然必须格物穷理，因人而治，一概套用，将适得其反。

猪肾，许多人认为是补品，以往医家对此就有不同看法。《名医别录》说它能“理肾气，通膀胱”。孟洗则认为，“久食令人肾虚”。李时珍想：“两相矛盾如此，何哉？”他根据这种矛盾的说法，深入格物穷理，得出结论说：“猪肾性寒，不能补命门精气。方药所用，借其导引而已。……肾有虚热者宜食之；若肾气虚寒者，非所宜矣。今人下达此意，往往食猪肾为补，不可不审。”（《豕肾·发明》校点本第四册，第2691页）可见一种补品，对某些人说来很有益，对另一些人则可能有害。若不格物理，一概当作补品，岂不蹈“开门延寇”的覆辙吗？

李时珍对每种药物的性味，每一医案的结论，乃至野史小说中的一则医药故事，都善于从中发现矛盾，提出疑难。既不人云亦云，也不听之任之，而是追根寻源，格物穷理，弄个明白。他深信古今六合之事物变化无穷，格物亦无穷，遇事绝不可一概而论。

三、力戒虚浮武断

李时珍坚持并发扬唯物主义认识路线，特别表现在对待“虚”和“实”的态度上。务实诚，疾虚妄，是古代思想家孙武、墨翟、荀况等大力倡导的原则，王充写《论衡》标为宗纲。历代唯物主义思想家，对这一认识论的关键问题，都发表过精湛的见解。“实”就是人们的认识要反映客观实际，注重实事求是，事当经实验，言要有实证；疾“虚”就是要反对人们的认识落入虚幻，故弄玄虚，摒弃华而下实的虚浮之谈。李时珍在研究本草过程中，严格遵循务实疾虚的认识原则，遇事以务实为宗旨，尽可能采集实物，亲自实践，取得切实的结论，反对浮夸学风，痛斥虚妄言论。诸家本草所记药物及其性味，无不有虚有实，真真假假，并非每个结论都绝对正确，有根有据。李时珍严格要求自己，凡非自己深信不疑的东西，未经亲自实验，决不轻易相信；凡未经亲自调查实验的东西，就老老实实存疑待考；对某些异常希奇的药物，一时无法实验考证者，干脆存而不论。坚持可贵的诚实作风。决不

信假为真，人云亦云，不懂装懂，他的身上体现了严肃的科学精神，为发扬祖国哲学的求实学风树立了典范。

（一）务实力本，力戒虚浮

李时珍深深懂得，对每味药物的性味，论断是否真实，在医疗中直接关系到患者的生命、健康。医药学家重修本草的神圣职责，就是要认真订正每一味药物的产地、形态、性味、主治、炮制方法、采取时节等等。在每个问题上，都要抱着务实的精神，实事求是，来不得半点虚夸。

李时珍的家乡蕲州，出产四种著名的药物，蕲艾、蕲竹、蕲蛇、蕲龟。对四种药物的分析，能否不加虚夸，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他父亲写了《蕲艾传》，他本人写了《蕲蛇传》，对蕲艾、蕲蛇作过专门研究。对蕲蛇的描述，生动具体，介绍是真实可靠的。关于蕲竹，在唐代就很受重视，用它制成的竹席，据说睡了可以不患风湿病。唐代诗人刘禹锡和韩愈都曾写了诗赞美这种席子。李时珍并不因是家乡特产就故神其说，《本草纲目》对于蕲竹并无专门论述。至于蕲龟，俗称“绿毛龟”，被人们说得神乎其神。蕲蛇和蕲龟被列为上贡的方物，专供皇室和大贵族享用。许多劳动人民为了交纳这种方药，被弄得倾家荡产，家破人亡。李时珍写《本草纲目》并没有被这些风传俚语所迷惑。他对蕲龟作了历史考察和实物考察，写下了自己的结论：“绿毛龟，出南阳之内乡及唐县。今惟蕲州以充方药。养鬻者取自溪涧，畜水缸中，饲以鱼虾。冬则除水，久久生毛，长四五寸。……《南齐书》载有献青毛神龟者，即此也。”在考察了绿毛龟的特点之后，李时珍如实地指出：“此龟古方无用者，近世滋补方往往用之，大抵与龟甲同功。”（《绿毛龟·集解》校点本第四册，第2500页）“大抵与龟甲同功”，这个结论是李时珍经过实地考察、试验而得出的，打破了人们对“青毛神龟”的神秘感，平实而客观，坚决反对木士的故弄玄虚。笔者曾在李时珍的家乡蕲州镇见到这种绿毛龟，龟甲上所生绿毛，实际上是一种寄生的藻类。龟的形态并不特殊。

蛇胆，是一种重要的药物。《岭表录异》关于取蛇胆的故事说得十分离奇。说雷州有养蛇户，尝剖蛇取出胆，胆有鸭蛋大。取胆之后，再将肝纳入蛇腹，用线缝好，放走它。甚至说，被取胆的蛇，下次再捕它时，它远远地露出腹上的伤痕，表明腹中已无胆了，以免被再捕。李时珍用生活常识，揭露这种奇谈，他说：“南人嗜蛇，至于发穴搜取。能容蚘之再活、露腹乎？”（《蚘蛇·胆》校点本第四册，第2398页）

牛黄和龙胆，这两味药过去认为不能同时使用，因二者“相恶”。这种说法是否可信呢？李时珍进行了历史考察，结合实践经验，对不实之词作了订正说：“《别录》言牛黄恶龙胆。而钱乙治小儿急惊疳病、凉惊丸、麝香丸皆两用之，何哉？龙胆治惊痫癰毒杀虫，与牛黄主治相近，亦肝经药也，不应相恶如此。”（《牛黄·气味》校点本第四册，第2800页）

蟾蜍，并不是十分罕见的动物。《抱朴子》把它说得很神奇：能活千岁，头上有角，腹下有丹书，名曰肉芝；能食山精，食之可以成仙。《峒崙神书》记载了取“蟾宝”的特殊方法，说取大蟾蜍一只，用铁钉四颗钉上四足，四下用炭火烤之，从早炙到午，然后去火，放水一盞在前面，就会吐出金光闪闪的蟾宝，有皂荚子大。人若吞此蟾宝可越江湖如履平地。李时珍用十分简单的常识，驳斥了方士这些虚妄之言。他说：“纵有此术，谁敢吞之？方技

诳说，未足深信。”（《蟾蜍·集解》校点本第四册，第2336页）

以上所述的一些虚夸之词，奇怪之论，记载于医药书上，流传于世俗之间，起着混淆视听、妨碍医药研究的不良影响。李时珍本着务实精神，一一予以剖析、订正，大大提高了本草研究的科学性。对于端正人们思想认识，培养药物工作者的求实作风，有着重要启示。

（二）未经试验者，不作定论

对于流行的虚浮之说进行科学分析、批判，这是一种求是精神。对于一些自己不敢深信而又未能加以试验的东西，李时珍公开说明，未作定论，只存疑待考，绝不肯自欺欺人，这同样是一种求实精神的表现。李时珍对前人论断，不作轻率的肯定，随声附和，也不作轻率的否定，无原则地标新立异。他在修订本草过程中，坚持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留下不少可贵的记录。

务成子曾经发明一种奇妙的药丸，名萤火丸，说这种药丸带在身上，可以避邪，甚至箭矢射来都不能近身。《神仙感应篇》把它的威力描写得活灵活现，说：“汉寇将军、武威太守刘子南，从道士尹公受得此方。永平十二年，于北界与虏战败绩，士卒略尽。子南被围，矢如雨下，至子南马数尺，矢辄坠地。虏以为神，乃解去。”这种药丸是用萤火、鬼箭、蒺藜、雄黄等配制而成。后来庞安常的《伤寒总病论》中，也极力称赞其神效，还说：“曾试用之。一家五十余口，俱染疫疾，惟四人带此者不病也。”甚至许叔微的《伤寒歌》亦表称赞。对于这样一种药物，李时珍虽然十分感兴趣，但依然不敢轻易相信。他在《萤火·发明》中只得作出客观交代。他说：“予亦恒欲试之，困循未暇耳。”（校点本第四册，第2318页）这“欲试，未暇”几个字，反映了两重思想，首先，对《感应篇》的宣扬，庞安常的试验、许叔微的推许，都置于可疑之列，未足轻信；其次，一切正确的结论，务须经过自己的亲自试验。这种态度是谨慎的科学态度，坚持了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

谚曰：“黄芩无假，阿魏无真。”阿魏这种药物，多半有假。李时珍说，阿魏有两种，草者出西域，木者出南洋。木本者，树下甚高，取其脂汁即是阿魏。但这种脂汁毒性最烈，人不敢近，采取时十分困难。有人说：“每采时，以羊系于树下，自远射之。脂之毒着羊，羊毙即为阿魏。”李时珍对于阿魏的这种采集方法，未敢深信，在《阿魏·集解》里如实地写道：“系羊射脂之说，俗亦相传，但无实据。”（校点本第三册，第1970页）由于木本阿魏是一种外来药物，本土无产，故对它的具体采集方法，非亲眼得见，只好存疑待考。申明“但无实据”，表明客观条件限制，世俗相传的说法，必须慎重看待。

有的药物在过去的本草著作中尽管有着详细记载，究竟实物是否与记载相副，李时珍未经亲自实地考察，总不放心，明白申明自己对此尚“无知”，免得以讹传讹。剪草这种药物，李时珍的态度就是如此。他在《剪草·集解》中申明说：“许叔微《本事方》言：剪草状如茜草，不如细辛。婺、台二州皆有之，惟婺州者可用。其说殊详。今遍访问，无知者。或云：即茜草也。未有的据。”（校点本第二册，第1312页）经过普遍访问，仍无知者，找不到确实的证据来证明前人的说法，只好表示存疑，留待后人访问证实。

硝石这种常用药物国内多产，可是昇玄子《伏汞图》中记述的硝石，却

同一般记述大有差异，说：“硝石生鸟场，其色青白，用白石英灸热点上，便消入石中为真。其石出处，气极秽恶，飞鸟不能过其上。人或身衣过之，身上诸虫悉化为水。……以形如鹅管者佳。”这种与常见消石大不相同的记载，李时珍不是简单他说他违背常识，而是从另一角度来加以思考，提出新的解释。他说：“谨按昇玄子所说，似与今之硝石不同。而姚宽《西溪丛语》以其说为真正硝石。岂外国所产与中国异耶？抑别一种耶？当俟博物者订正。”（《硝石·集解》校点本一册，第650页）

人们的认识，或受历史的局限，或受生活经验的局限，还有地域环境的局限，不可能对任何事物都了解得清楚。中国常见的东西，异国未必常见；异国常见的东西，中国未必都有。同一种药物，在不同地区名称未必尽同；国度不同，同一名称未必都指同一实物，这也是常有的现象。昇玄子所描述的“硝石”，其产地与形态，显然同一般硝石有异，李时珍认为，或许外国硝石与中国不同，或者名为“硝石”实际上同中国硝石不是同一种药物，只能留待博物者订正。这里，不只是留下了有待研究的课题，更可贵的是留下了他那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三）无法考订者，存而不论

李时珍经常碰到古书上记载的一些药物，只有名称而无形态、气味的记述，效用却很神奇，实乃千古难解之迷。对于这类记载，不可信其有，不可断其无，根本无法考订。凡是遇到本草著作中的这类药物，李时珍只好存而不论。这种认识上的科学态度也是可贵的。

刘郁《西使记》记载一种药，名叫撒八儿（可能是译音），据说它产于西海，“乃玳瑁遗精，蛟鱼吞食吐出，年深结成者，其价如金。”此物是否玳瑁遗精？是否经过蛟鱼吞吐？多少年能结成？都是无法考证的。所以李时珍不将它列入药物，只附于玳瑁之后，写道：

窃谓此物贵重如此，必有功用。亦不知果是玳瑁遗精否？亦无所询证。姑附于此，以俟博识。

——《玳瑁》附录校点本第四册，第2500页

崔昉的本草书中，提到一种药物名叫金牙石，说“金牙石，阳石也。生川陕山中，似蜜栗子，有金点形者妙。”《圣济经》治疗风火方中，也用了金牙石，同时还用了银牙石。《本草纲目》中，只列有金牙石，银牙石没有列入。因为什么是银牙石，对其气味、主治一概不知，很难考察。李时珍如实写道：“银牙石恐即金牙石之白色者耳。方书并无言及者，姑阙。”（《金牙石·集解》校点本第一册，第615页）《本草纲目》中列有“附录诸石”一项，也未列“银牙石”。

刘守真《宣明方》中有治远年近日一切目疾方，其中列了不少稀奇药物，有太阳石、太阳石、碧霞石、猪牙石、河济石等，共用29种药，还要用熊胆一斤，白沙蜜2斤，并华水9碗同熬，滤尽收点。李时珍对猪牙石只说：“出西番，文理如象牙，枣红色。”对碧霞石只说，“明目，去翳障”。然后申明：“此方所用太阳石、太阳石等，多无考证，姑附于此。”（《石部·附录诸石》校点本第一册，第682—684页）《本草纲目·石部》附录有27种

石类罕见药物，李时珍申明道：“别录有名未用诸石，及诸家所列而不详，难以类附者，通附于此。”

《本草纲目》附录诸石中，有一奇药名叫朵梯牙。李时珍写道：周定王《普济方》，说用朵梯牙等药为末，每日点眼，可以去翳。”所谓朵梯牙、碗糖霜、安咱芦、可铁刺、阿飞勇，皆不知何物也。附录于此以俟。”

一些动物体内的结石，往往成为药物。牛的胆结石称为牛黄，狗的肾结石称为狗宝。据古书记载，马的肾结石，其色如墨，谓之马墨，对此，李时珍推测马墨是会有功用的，但无法实际调查，故在《马·肾》中如实写道：“按熊太古《冀越集》云：‘马有墨在肾，牛有黄在胆，造物之所钟也。’此亦牛黄、狗宝之类，当有功用。惜乎前人不知，漫记于此以俟。”（校点本第四册，第2271页）

对于无法考察的东西，既不贸然断其虚，也不盲目定为实，自己一时无法考察落实，相信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会日益进步，将来会予以澄清。核定虚实认识的过程，不是一条平坦、笔直的大道，中间有许多曲折。孔子讲过：“知之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李时珍正是本着这种精神行事的。《本草纲目》把没有深入认识的药物列为附录，就是基于这种态度。这也是李时珍坚信个人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和人类认识能力的无限性的科学见证。

四、注重实践经验

《本草纲目》是我国长期医药实践经验的总结，既有李时珍的亲身实践经验，也包含李时珍以前的医学家的实践经验。李时珍深深懂得，离开前人的实践经验，不可能全面地认识药物。要核证药物的名实，考究药物的气味，断定药物的主治功效，无论自己或前人都不能从书本到书本，要凭实际观察，亲自尝试，处方应用，以观疗效。实践经验是药物学知识的基本来源和可靠基础。

（一）进行实地考察，获取药物知识

李时珍编写《本草纲目》过程中，大量的功夫花在采药上。从1567年起，数年间外出访药，广泛收集药物学的第一手资料，足迹遍于湖广、江西、安徽、江苏、河南诸省，跋山涉水，历尽千辛万苦，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去采集药物标本。他把亲身实地考察，作为编写本草的第一步扎实功夫。亲身调查访问，采集、观察活生生的动物、植物，获取生动具体的感性知识，为日后的编修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李时珍向农夫、渔民、樵夫、药农、牧人、车夫、矿工、猎人以及医生、药材商人、造药工人、药材保管人，虚心求教，拜他们为师，从他们那里广泛了解各种动物的形色特征、生活习性、肉体气味；了解各种植物的生长环境，根茎花叶的形态、生长规律、栽培方法，采收季节，花叶子仁的气味等等；了解各种药物的采集、炮制和保存方法等。他向老铃医、老道人以及疾病患者收集各种单方、验方、祖传秘方。

李时珍对白花蛇的调查是一个典型事例。他仿效其父亲写《人参传》的作法，写了《白花蛇传》，其中凝结着他观察研究白花蛇的丰富的实践知识，可惜此书已佚。只从《本草纲目》中，窥其大概。

李时珍说，“花蛇，湖、蜀皆有。今惟以蕲蛇擅名。然蕲地亦不多得，市肆所货、官司所取者，皆自江南兴国州诸山中来。”这里简单地描述了花蛇兴衰的历史。据今所知，这段历史是异常惨痛的。蕲蛇出自李时珍的家乡，他对这一惨痛历史当然了解最详。

蕲蛇是花蛇中最名贵的一种，因其药用价值高，皇家和官府强迫人民捕来上贡。年年捕杀，蕲蛇日益稀少，以致濒于灭种。明代有一首民谣反映了劳动人民被迫捕缴蕲蛇的苦楚。唱道：

白花蛇，
谁叫尔能避风邪！
上司索尔急如火，
州中大夫只逼我，
一时不得皮肉破。
积骨如巴陵，
杀尔种类绝，
花蛇不生祸始灭。

——王廷相《蕲民谣·蕲蛇》

一种名贵药物，没有给产地人民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反而使当地民众遭受无穷痛苦；稀有动物不是受到保护，反遭绝种之灾。

李时珍对花蛇的历史与现状进行深入调查访问，亲自观察。在《白花蛇集解》中，记载了花蛇的体形特征，生活习性，捕捉的方法，如何解剖、炮制，如何辨别真伪。（《本草纲目》校点本第四册，第2401页）从这一记载中，我们不难发现李时珍的亲身实践态度和科学求实精神（见本书第七章《长于散文，为药立传》）。

九仙子是过去本草书中没有记载的药物。李时珍通过访问，并到均州太和山（即今湖北武当山）亲自采集。《本草纲目》对它的形态及采取季节都有详细描述。写道：“九仙子，出均州太和山。一根连缀九枚，大者如半夏，白色。二月生苗，蔓高六七尺，茎细而光。叶如乌柏叶，而短扁不团。每叶桠生子枝，或一或二，袅袅下垂。六七月开碎青黄色花。随即结实，片子丛簇，如谷精草子状。九月采根。”（《九仙子·释名》校点本第二册，第1301页）传说李时珍同他的门徒庞宪在采集九仙子的时候，被太和山上的道士发现，几乎遭毒打。在封建社会里，独自进行科学研究，会遇到多少困难。

不少药物在不同的本草书中，记载往往互相矛盾，莫衷一是。对此，李时珍一一访问、调查，采集观察，弄个明白。例如白桐究竟结子还是不结子，说法不一。陶弘景在《神农本草注》中说，桐有四种，以无子者为青桐、冈桐，有子者为梧桐、白梧。寇宗奭在《本草衍义》中说白桐、冈桐均无子。贾思勰《齐民要术》则说：有实而皮青者为梧桐，华而不实者为白桐。白桐冬结似子者，乃是明年之花房，非子也。李时珍经过实际调查，得出结论，明确地写道：“以今访问，互有是与否。盖白桐即泡桐也。二月开花，如牵牛花而白。结实大如巨枣，长寸余。壳内有子片，轻虚如榆荚、葵实之状，老则壳裂，随风飘扬。”（《桐·集解》校点本第二册，第1998页）

（二）亲自临证实验，考察药物特性

药物的形态、生长季节、采制方法，可以通过调查访问作出判断。对于药物的性味、主治、疗效，则不可能单凭访问来解决，必须依靠临证试验，方能定夺。李时珍通过自己的临证经验，总结、积累大量宝贵资料，写进了《本草纲目》，不只对医药学有贡献，为我们今天研究李时珍的认识论思想，也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茺蔚子对治疗妇女血气诸病有妙用，以前医家多不知道。李时珍通过多次临证试验，取得了实际疗效。在《本草纲目》的《茺蔚·发明》中，他写道：“茺蔚子，味甘，微辛，气温，阴中之阳，足厥阴经药也。白花者入气分，紫花者入血分。治妇女经血不调，胎产一切血气诸病妙品也。而医方鲜知用。时珍常以之同四物、香附诸药治人，获效甚多。”（校点本第二册，第952页）

生姜、胡椒，人多嗜之。久食，会损害目力，人多不知。李时珍根据亲身经验，得出了这一结论。他说：“食姜久，积热患目，珍屡试有准。凡病痔人多食兼酒，立发甚速。痈疮人多食则生恶肉。此皆昔人所未言者也。”（《生姜·气味》校点本第三册，第1621页）

“胡椒，大辛热，纯阳之物。……时珍自少嗜之，岁岁病目，而不疑及也。后渐知其弊，遂痛绝之，目病亦止。”（《胡椒·发明》校点本第三册，第1859页）

骨碎补，即石毛姜，“开元皇帝以其主伤折，补骨碎，故命此名”。发现它能治久泄，这是李时珍经过临证试验而得出的结论。他说：“骨碎补，足少阴药也。故能入骨、治牙及泄痢。昔有魏刺史子久泄，诸医不效，垂殆。予用此药入猪肾中煨熟与食，顿住。盖肾主大小便，久泄属肾虚，不可专从脾胃也。”（《骨碎补·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1386页）

以上临证病例，充分显示李时珍既明医，又知药，并有着一种十分可贵的独立思考、大胆实验的精神，故能通过成功的医疗实践，对药物的性能作出新的判断，充实、丰富本草学。

古人曾知牡丹皮能治相火，后人久已不用，几乎失传。李时珍经过试验，乃发现这一“千古秘奥。”他在《本草纲目·牡丹·发明》中写道。

牡丹皮，治手足少阴、厥阴四经血分伏火。盖伏火即阴火也，阴火即相火也。古今惟以此治相火，故仲景肾气丸用之。后人乃专以黄檗治相火，不知牡丹之功更胜也。此乃千古秘奥，人所不知，今为拈出。

——校点本第二册，第854页

李时珍之所以能打破“专以黄檗治相火”的常规，发现“牡丹之功更胜”，并非简单地从书上得来，而是从多次临证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张仲景的“肾气丸”可能予他以启发。由此看出，他善于从古代文献中领会深刻道理，付诸实践。关于芎藭疗湿泻的道理，他也是先从《左传》的记载中领悟出来，再从医疗实践中多次取得成功的。《芎藭·发明》写道：

芎藭，血中气药也。肝苦急，以辛补之，故血虚者宜之；辛以散之，故气郁者宜之。《左传》言麦麴、麴劳禦湿，治河鱼腹疾。予治湿泻，每加二味，其应如响也。……此皆医学妙旨，园机之士，始可语之。

——校点本第二册，第839页

根据古代记载，在新的条件下，加以创造性运用，经过实践，有所发明。李时珍总结自己的体会说：“善观书者，先求之理，毋徒泥其文，学者其可拘乎？”（校点本第二册，第782页）

（三）吸取前人经验，充实本草

李时珍对他父亲在药物学上的实践经验十分珍惜。关于他父亲用藜芦（山葱）汤治中风的经验，他在《本草纲目》中作了生动地描述：

我朝荆和王妃刘氏，年70，病中风，不省人事，牙关紧闭，群臣束手。先君太医院吏目月池翁诊视，药不能入，自午至子。不获已，打击一齿，浓煎藜芦汤灌之。少顷，噫气一声，遂吐痰而苏。调理而

安。“药弗瞑眩，厥疾弗廖”，诚然。

——《藜芦·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1156页

月池翁的大胆实践精神，跃然纸上。继承父业的李时珍，何等神往。他身体力行，终于在医学、药物学上都作出光辉的贡献。这正是李氏医药世家一脉相承的实践精神。李时珍将他父亲的实践经验，转化为自己的经验，最典型的事例是关于人参的研究。他父亲曾经写过《人参传》（可惜此书亦亡），可称研究人参的专家。《人参传》和他父亲的另一专著《蕲艾传》，都对李时珍起过巨大的教育鼓舞作用。他父亲的科学精神，为他研究药物学做出了榜样。李时珍把《人参传》的部分内容凝炼在《本草纲目》中。《人参·发明》写道：

言闻曰：人参生用气凉，熟用气温。味甘补阳，微苦补阴。气主生物，本乎天，味主成物，本乎地。气味生成，阴阳之造化也。凉者，高秋清肃之气，天之阴也，其性降；温者，阳春生发之气，其性升。甘者，湿土化成之味，地之阳也，其性浮；微苦者，火土相生之味，地之阴也，其性沉。人参气味俱薄，气之薄者，生降熟升；味之薄者，生升熟降。如土虚火旺之病，则宜生参；凉薄之气，以泻火而补土，是纯用其气也。脾虚肺怯之病，则宜熟参；甘温之味，以补土而生金，是纯用其味。

——校点本第二册，第702页

关于人参气味的分析，一体二用的揭示，语言精练，逻辑谨严，说理透彻，渗透着浓郁的朴素唯物主义、辩证法思想，既生动，又深刻。

《本草纲目》不止对人参的气味有深刻论述，在临证上，哪种情况当用，哪种情况下不当用，更论列周详。《人参·正误》中是这样剖析的：

言闻曰：夫人参能补元阳，生阴血，而泻阴火。

……夫火与元气不两立，元气盛则邪火退。……凡面白、面黄、面青黧悴者，皆脾肺肾气不足，可用也；面赤、面黑者，气壮神强，不可用也。脉之浮而芤濡虚大迟缓无力，沉而迟涩弱细结代无力者，皆虚而不足，可用也；若弦长紧实滑数有力者，皆火郁内实，不可用也。

——校点本第二册，第703页

正如李时珍说的，“如此详审，则人参之可用、不可用，思过半矣。”（同上）其所以如此详审，绝不是凭空得来，而是长期实践经验的概括

总结。

月池翁花了很大精力，写成《蕲艾传》。总结了研究、应用蕲艾而取得的宝贵经验。蕲艾是李时珍家乡的一种特产，用它治病，比别的艾疗效更显著。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了他父亲的贡献。《本草纲目》一书，可说是汇集了李时珍一家四代人的医药实践经验，是他家四代人心血的结晶。

（四）灵活运用古方，发展方药

李时珍在医药实践中，十分重视历史上著名医药学家所积累的经验。他沿着前人已经开辟的道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灵活运用，作出新的发展，体现推陈出新、后来居上的精神。随着社会物质生活、医药卫生条件的日益改善，医药知识更加丰富，应当在灵活运用原有经验基础上用新的知识，充实祖国医药学宝库。李时珍是这样认识的，并努力这样做。

李时珍治疗一位劳动者的中满腹胀，曾灵活运用著名道人张三丰传下的伐木丸，取得很好疗效。《绿矾·发明》记道：

按张三丰《仙传方》载伐木丸云：此方乃上清金蓬头祖师所传。治脾土衰弱，肝木气盛，木来克土，病心腹中满，或黄肿如土色，服此方能助土益元。

……时珍尝以此方加平胃散，治一贱役中满腹胀，果有效验。

——校点本第一册，第 678 页

李时珍参照伐木丸的处方，同时加入平胃散，将二方结合，“果有效验”。利用伐木丸，是因为心腹中满这一病症基本相似；加入平胃散，是因为患者的体质、患病季节有异。借助于前人的实践经验，创造新的经验以启发后来者，人类的认识正是这样一代一代不断发展前进的。李时珍运用伐木丸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就进一步追根寻源，探究伐木丸的来历。他认为：“其源则自张仲景用矾石硝石治女痲黄胆方中变化而来。”

（同上）结合实践，勇于探索，这种精神难能可贵。

参考古方进行大胆实验的精神，在黑豆解毒问题上也有突出表现。《黑大豆·发明》中，李时珍谈了自己进行试验的经过。“按《养老书》云：李守愚每晨水吞黑豆二十七枚，谓之五脏谷，到老不衰。……又按古方称大豆解百毒药。予每试之大不然，又加甘草，其验乃奇。如此之事，不可不知。（校点本第三册，第 1501 页）《养老书》和古方都说黑豆能消胀、解毒，李时珍却“每试之大不然”，是不是就此作结论，推翻古方呢？他没有罢休，坚持继续试验，结果用新的实践经验，充实了古方，“加甘草，其验乃奇”。实际上这一经验不只是发展、充实了古方，还启发人们去思考一个新问题，即甘草在医方中的效用。它在药方中，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加甘草和不加甘草，疗效显然有别。它引人深思，在有些方剂中，甘草的作用似乎与化学变化过程中接触剂的效用相似。一般说，在医药实践中，结果可能是多方面的，或者达到预期的效果，或者推翻原有的设想，或者修订原有的结论，甚至发现耐人寻味的新问题。李时珍用他的实际行动向人们证实：科学实验同生产实践一样，是推动人们的认识不断前进的巨大力量。

李时珍应用古方进行医疗实验，并不是将古方原封不动地生搬硬套，而是有新的发展。利用伐木丸时加了平胃散，试验黑豆的疗效时加了甘草。李时珍由此得出一种方法论上的结论，叫做“加减法”。即以古方为基础，或者加入新的成分，或者减去某些成分，进行创造性地试验。《本草纲目》的《磁石·发明》项下，李时珍写下了他在使用羌活胜风汤时运用“加减法”

的事例：

慈石法水，色黑而入肾，故治肾家诸病而通耳明目。一士子频病目，渐觉昏暗生翳。时珍用东垣羌活胜风汤加减法与服，而以慈朱丸佐之，两目遂如故。盖慈石入肾，镇养真精，使神水不外溢，朱砂入心，镇养心血，使邪火不上侵；而佐以神曲，消化滞气，生熟并用，温养脾胃生发之气，乃道家黄婆媒合婴姁之理。制方者宜窥造化之奥乎？

——校点本第一册，第 584—585 页

这是一则完整的医案，对患者症状，古方的参考，加减法的运用，每种药物的疗效所在，以及处方原理的探讨，都作了明确的叙述。这一医案也就是李时珍在进行一次成功的实验之后，从认识论上所作的深刻总结，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充分的说服力。

李时珍通过自己的医疗实践，经常修正古人的认识，使人们对某些古方、药物的认识更臻完善。例如石南叶，在古方中本是要药，因甄权在其《药性论》中断定食它“令人阴萎”，于是就无人敢用了。李时珍用自己研究的结果予以澄清。指出阴萎病状绝不是由石南叶的药性造成的：

（石南叶）古方为治风痹肾弱要药，今人绝不知用，识者亦少。盖甄氏《药性论》有令人阴萎之说也。殊不知服此药者，能令肾强，嗜欲之人，借此放纵，以致萎弱。归咎于药，良可慨也。

——《石南叶·发明》校点本第三册，第 2120 页

对蕨的性质的认识，也存在类似情况。蕨是一种常见的植物，荒年人们可用它度日。著名医药家陈藏器则认为，此物“多食消阳气。故令人睡、弱人脚”。还引用史实说，“夷齐食蕨而夭。”从而断定它“固非良物”。李时珍认为：“陈公之言，可谓迂哉。”他说：“蕨之无益，为其性冷而滑，能利水道，泄阳气。降而不升，耗人真元也。”（《蕨·发明》校点本第三册，第 1669 页）夷齐的夭亡，是因遭亡国之忧，饥饿而死。不应归咎于蕨。

以上事例说明，李时珍对于任何药物的性能，都通过实验进行深入考察，如实反映；不单凭表面现象，将未经实践检验的说法，用来说明药物的性能。

李时珍大胆地修正前人的错误或片面论断，绝不是出自狂妄、武断，而是立足于亲身反复实验，取得真知的见的基础之上，故有着雄辩的说服力。

五、坚持知行结合

李时珍特别注重知行结合。在中国哲学史上，提倡知行结合，反对脱离实际的性理空谈，有着优良传统。李时珍在科学实践中，继承发扬这一优良传统，为发展祖国医药学做出了独到贡献。《本草纲目》的撰写过程，是知行结合的光辉典范。李时珍在辨证论治、研究医药等方面，处处体现知行结合精神。中医学中讲知行结合，就是要求以医学、药学理论为指导，发挥人为主观能动性，通过药物的不同配伍，特定的炮制手段，改变方剂、药物的性味及疗效，以适应辨证论治的要求。知行统一是李时珍精通医理、药理，取得成功的关键。

（一）理论指导实践，妙手起沉疴

历代著名医学家都是知行结合的典范。他们把论医同论药结合起来，用理论指导实践，治疗各种疾病，在我国医药学史上树立了知行统一的光辉榜样。张仲景、陶弘景、孙思邈等大医学家，都是结合医疗实践，探讨病理、药理，把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同时，又将自己研究的医理、药理，用于指导临证治疗，让理论回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因此，他们都是医学家兼药物学家。他们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写出著名的医学著作，同时也写了本草著作、方药著作。李时珍步前贤的后尘，掌握精湛医术，阅读诸家本草，既精医，又通药，强调医药结合的重要性。他写《本草纲目》，特别注重知行统一，体用结合，每味药物后面列上“附方”，表明该药的实际应用。在“发明”一栏，除详述该药的治疗原理，还特别引述名家医案。用“附方”和“医案”来印证药性、药理。将医与药紧密联系起来，启发人们认识药物，掌握理论，指导实践。

《本草纲目》第一、二卷称为“序例”，主要强调研究本草科学知识要结合实际应用。其中《十剂》、《标本阴阳》、《四时用药例》、《五脏六腑用药气味补泻》、《脏腑虚实标本用药式》、《引经报使》、《李东垣随证用药凡例》、《陈藏器诸虚用药凡例》等，都论述医和药是如何结合的。第三卷、第四卷题名《主治》，专门研究“百病主治药”，将方药同疾病紧密联系起来，以病证为纲，以方药为目。病证之下，按辨证的需要，列出主治药物；方药之下，注明功效适应证、用法、剂量，对临床辨证处方具有重要参考指导作用。李时珍注重提高本草学的科学性，同时注意阐述其临证实用价值，这是他从事药学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在继承和发扬知行结合哲学传统的基础上，将医药理论同辨证处方的实际应用结合起来，这是《本草纲目》的一个重要特点。

李时珍将总结历代著名医家的多种用药凡例、用药式，放在首要地位，目的不是为了用这些既成凡例、药式束缚人们的思想，让人们不假思索，照别人的凡例、药式遣方施药；相反，正是要求人们更好地领会、掌握辨证用药的基本规律，临证可以灵活运用；遵守客观规律，更利于发挥主观能动性。实际上，各种用药凡例、用药式，是祖国医学长期发展所积累的有效经验，可说是历代医家集体智慧的结晶。它是长期医疗实践中知行统一的范例，具有普遍有效性；然而医家灵活运用凡例、药式的过程，依然是一个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知和行相统一的过程。例如药性的升降沉浮，固然有普遍的规律。在《升降沉浮》中，李时珍写道：“味薄者升，甘平、辛平、干微温、微苦平之药是也。气薄者降：甘寒、甘凉、甘淡寒凉、酸温、酸平、咸平之药是也。气厚者浮：甘热、辛热之药是也。味厚者沉：苦寒、咸寒之药是也。”掌握这些关于药性沉浮升降的基本准则当然很重要，但仅仅一般地了解它是很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在于结合实际灵活运用。李时珍说：

酸、咸无升，甘、辛无降，寒无浮、热无沉，其性然也。而升者引之以咸寒，则沉而直达下焦；

沉者引之以酒，则浮而上至巅顶。此非窥天地之奥而达造化之权者，不能至此。一物之中，有根升梢降，生升熟降，是升降在物亦在人也。

——校点本第一册，第73页

“升降在物亦在人”，这是李时珍认识论中的一个光辉命题，它肯定人们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客观规律，去改变药物的性能。

如此乃能成为一个“窥天地之奥而达造化之权”的高明医家。

辨证论治的结论，最后见于处方。正确的处方，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知与行统一的产物。处方的一般原则，《内经》已有论述：“气有多少，形有盛衰，治有缓急，方有大小。”（《至真要大论》）方分七类，有大方、小方、缓方、急方、奇方、偶方、复方。还规定“近者奇之，远者偶之”；“汗者不以奇，下者不以偶”；“奇之不去则偶之，是谓重方；偶之不去，则反佐以取之，所谓寒热温凉，反从其病也。”（同上）这里提出的奇之、偶之、反治、从治、反佐，都是一些基本原则，如何具体处方，还得靠各人的临证经验，所以李时珍在《七方》中指出：

逆者正治，从者反治。反佐，即从治也，谓热在下而上有寒邪拒格，则寒药中入热药为佐，下膈之后，热气既散，寒性随发也；寒在下而上有浮火拒格，则热药中入寒药为佐，下膈之后，寒气既下，

热性随发也。此寒因热用，热因寒用之妙也。

——校点本第一册，第 58 页

李时珍强调，在实践中要“神而明之，机而行之”。“神而明之”，就是要人们认真掌握基本准则，知之必须明白透彻，不可一知半解；“机而行之”，即要求灵活运用，达到理论与实践，知与行的高度统一，得心应手，获取神效。

李时珍介绍了自己“神而明之”，“机而行之”，药到病除的一则临床经验。“一锦衣夏月饮酒达旦，病水泄。数日不止，水谷直出。服分利消导升提诸药则反剧。时珍诊之，脉浮而缓，大肠下弩，复发痔血。此因肉食生冷茶水过杂，抑遏阳气在下，木盛土衰。《素问》所谓久风成飧泄也。法当升之、扬之。遂以小续命汤投之，一服而愈。昔仲景治伤寒六七日，大下后，脉沉迟，手足厥逆，咽喉不利，唾脓血，泄利不止者，用麻黄汤平其肝肺，兼升发之，即斯理也。神而明之，此类是矣。”（《麻黄·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 1009 页）

《本草纲目》中还保存了李时珍参考古方，神而明之，治愈一妇女浮肿哮喘的医案。患者自腰以下浮肿，面目亦肿，喘急欲死，不能伏枕，大便溏泄，小便短少，服药无效。李时珍诊视的结论是：“脉沉而大”，沉主水，大主盛，断定乃“病后冒风所致，是名风水也”。首先用千金神秘汤加麻黄，一服之后，喘定十之五，再以胃苓汤吞深师薰术丸，二日小便多了，肿消十之七，调理数日而恢复健康。李时珍深有体会地说：“益见古人方皆有至理，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香薷·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 910 页）不难想象，这样医药结合，知行结合，“神而明之，机而行之”，一药而起沉疴的病例，在李时珍一生中不知有多少。

《本草纲目》还记载了一件知行不统一，有病妄投药，导致丧命的事例。蕲州郝知府对医药一知半解，“自负知医”，不懂装懂，有病不求医，妄投汤药。结果自作自受，命归黄泉！李时珍无限感慨到：“吾蕲州郝知府，自负知医，因病风癖，服草乌头、木鳖子药过多，甫入腹而麻痹，遂至不救。可不慎乎！”（《乌头·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 1179 页）这种人可悲在对医理并不精通，不求“神而明之”，知行统一，却无知妄行。结果事与愿违，受到无情的惩罚。

（二）升降随人工，炮制变药性

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在药物的炮制上，表现十分突出。药物升降浮沉的特性，可以通过炮制手段加以改变，这是人们从长期实践中获得的认识。随着医药实践活动的不断发展，人们对药物炮制理论、炮制方法、炮制质量的认识也日益深入、全面、系统。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对以往的炮制理论和经验进行了全面总结，并作出重要发展。近 400 味药物，写有“修治”一栏，全面介绍了前人的实践经验，其中自己的亲身经验有 170 多条。在他看来，了解药物的产地、形态、生长规律、采集季节，名实统一，十分重要。但这还远远不够，循名责实，不能单凭药物的外部形态。要充分认识药物的性能，还须同炮制过程联系起来全面考察。不少药物，一体多用，名称虽同，由于炮制方法有别，性用大有差异。不熟知药物炮制理论及方法，绝不能成为一个本草学家。对药物进行不同方法的炮制，根本目的是使一种药物产生多种疗效，以适应治疗各种疾病的不同需要。

李时珍以香附子为例，指出：“生，则上行胸膈，外达皮肤；熟，则下走肝肾，外彻腰足；炒黑，则止血。”不特如此，由于炒的时候，所用辅料不同，性效亦大异。”得童溲浸炒则入血分而补虚，盐水浸炒则入血分而润燥，青盐炒则补肾气，酒浸炒则行经络，醋浸炒则消积聚，姜汁炒则化痰饮。”（《香附子·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 890 页）根据行经、补肾、消积、化痰等医疗上的不同需要，对香附子进行不同的浸炒，这是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改变药物性能的表现。李时珍从哲学上加以概括，谓之“升降在物亦在人”。

同样的原理，适用于黄连。黄连是治火的主药，人体五脏六腑皆有火，用黄连治不同部位的火，则要求不同的炮制方法。李时珍对黄连的修治作了深入的论述。

五脏六腑皆有火，平则治，动则病。故有君火相火之说，其实一气而已。黄连入手少阴心经，为治火之主药。治本脏之火则生用之，治肝胆之虚火，则以醋浸炒；治上焦之火，则以酒炒；治中焦之火，则以姜汁炒；治下焦之火，则以盐水或朴消研细调水和炒。……诸法不独为之引导，盖辛热能制其苦寒，咸寒能制其燥性，在用者详酌之。

——《黄连·修治》校点本第二册，第 771 页

李时珍指出用不同的辅料进行浸炒，不尽是为引导而已，同时是为了抑制其苦、燥之性，即通过化学变化，改原黄连的原有性能。对黄连的不同炮制，是为了适应辨证论治的要求。李时珍把医、药、炮制方法紧密结合起来全面考虑，而不是孤立地讲医、讲药、讲炮制手段。他启示人们，必须把医、药理论同炮制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医药学家。李时珍从黄连炮制中概括出：“辛热能制其苦寒，咸寒能制其燥性”的炮制原理，这是对长期炮制经验的总结。说明理论来自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炮制原理本身是知行结合的产物。你要认识药物的性能，掌握炮制的规律性。就必须投身于行医、制药的实践中去。李时珍十分强调知与行的结合，目的即在于此。非此，不足以认识医药的精微。一个高明的本草学家，不只是告诉人们怎样炮制药物，更要能从原理上告诉人们为什么要如此炮制，使后人能用理论指导实践，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李时珍关于黄连炮制方法及炮制原理的论述，更有典型示范的意义，对祖国炮制学的建立无疑是一个贡献。当然，李时珍对炮制学的贡献远不止此。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修治”栏下共载了60多种有毒药物的炮制方法，其中有植物类毒药，也有动物类毒药，还有矿物药。历代本草对毒药的炮制尤为重视，要求极严，因偶有不慎就会引起中毒，危及生命、健康。对毒药的作用，要一分为二。使用得当，炮制得法，毒药可以对治疗疾病起特殊效用，许多病常常要“以毒攻毒”。但是，如果炮制不得法，使用不当，必遭危害。李时珍对毒药的炮制进行了认真的实验、研究，发明创造了多种毒药的炮制工艺及炮制理论。如附子用煮，常山用蒸，赤铜屑用煨，半夏用发酵，硃砂用水飞，南星用火炮，等等。不同的毒药，以特殊方法制之，都可以达到取其利而避其害的目的。充分掌握毒药的炮制规律，发挥主观能动性，使毒药为人所利用。一种毒药，由于选用不同的辅料，通过不同的炮制手段，可以使它发挥多种效用，以适应辨证施治的要求。天南星是一种毒性强的植物性药物，李时珍根据“药随人使”的原则，指出它可以在多方面发生作用。生用可治风痰，熟用可治风热之痰；以生姜渣和黄泥煨，可治脾虚多痰：“得防风则不麻，得牛胆则不燥，得火炮则不毒”。（《天南星·修治·气味》校点本第二册，第1186页）这里除强调药物“异制则异用”的原则外，还明确肯定通过炮制手段，有毒可以变无毒。中国古典哲学中人定胜天的唯物主义思想，在这里得到生动地体现。

（三）知君知使，奇效无比

在医疗实践中，人们的主观能动作用，充分表现在辨证论治上。辨证之后，可以采取多种手段进行治疗，针灸、按摩、气功疗法等，都是行之有效的中医治疗手段。多数情况，采用服汤药的办法。方药的配伍，则独运匠心。

《本草纲目》中的附方，共15000多个，其中600多方是李时珍自己的临证处方。清人蔡烈先将书中全部附方按病分类，编排而成《本草万方针线》，具有很大实用价值。李时珍所贡献的600多方中，单味者占80%以上，复方只占少数。说明李时珍处方治病，力求简易，对单方、验方特别看重。

中医复方，注重药物的配伍，自《内经》以来，总结出君、臣、佐、使配伍原则。《素问·至真要大论》指出：“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按“君臣佐使，以相宣摄”（《本经名例》）的原则，拟制的配方，《内经》保留了12方，共用药25味；《伤寒论》为113方（实为112方），共用药93味；《金匱要略》为263方，共用药202味。后人将《伤寒论》113方归纳为桂枝汤、麻黄汤、葛根汤、柴胡汤、四逆汤、承气汤、理中汤、白虎汤等12大类，使人们对配方中君臣佐使关系更加易于掌握。把握了各类主方的君臣佐使相互配伍的关系，然后因病增减，随机应变，可治疗同类和相近的疾病。李时珍在《蜀椒·发明》中介绍了自己利用平胃散增加适当药物治愈一个“百药不效”的病例：“一妇年70余，病泻五年，百药不效。予以感应丸50丸投之，大便二日不行。再以平胃散加椒红、茴香、枣肉为丸与服，遂瘳。每因怒食举发，服之即止。此除湿消食，温脾补肾之验也”。（校点本第三册，第1852页）平胃散是治脾胃病的主方，加上椒红等佐使药物，更有神效。

李时珍认为有君有使，平凡的药物可生奇特疗效。赵继宗《儒医精要》云：“麦门冬以地黄为使，服之令人头不白，补髓，通肾气，定喘促。”李时珍对这一名医论断作了透彻的解说，指出平常的麦门冬，为何能有此奇效

呢？“盖有君而有使也。若有君无使，是独引无功矣。”（《麦门冬·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1034页）李时珍从麦门冬用地黄为使疗效显著的事例，加上自己平时积累的实践经验，进一步概括出：有君有使，奇效无比；“有君无使，独行无功”的普遍原则。这是李时珍知行结合，发展医药理论的又一印证。

李时珍列举许多常见药物以阐明“随佐使而见功”的配伍原则。他在《芍药·气味》中说：芍药“同白术补脾，同芎藭泄肝，同人参补气，同当归补血，以酒炒补阴，同甘草止腹痛，同黄连止泻利，同防风防痘疹，同姜、枣温经散湿。”（校点本第二册，第850页）在《黄芩·气味》中阐明黄芩异佐则异效说：“得酒，上行；得猪胆汁，除肝胆火；得柴胡，退寒热；得芍药，治下痢；得桑白皮，泻肺火；得白术，安胎。”（校点本第二册，第780页）

李时珍根据药物“随佐使而见功”的基本原则，分析了桔皮的特点，指出“其治百病，总是取其理气燥湿之功。同补药则补，同泻药则泻，同升药则升，同降药则降。……但随所配而补泻升降也。”（《桔皮·发明》校点本第三册，第1788页）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许多常见的药物，如紫苏、升麻、香附、大黄、仙鹤草等等，都——分析了它们“异佐殊功”的情况。

总之，正如李时珍指出的，一般说来，“酸咸无升，甘辛无降”，“其性然也”。但是，人们对于药物的性味变化，并不是无能为力的，可以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根据辨证论治的需要，在一定条件下，改变药性，升者可以引之而降，降者可以引之而升。故曰：“升降在物亦在人也。”（校点本第一册，第73页）李时珍在实践中认识了药性变化的奥妙，不愧为医中之圣。《本草纲目》正是这种理论同实践结合的典范。

第十一章唯物主义自然哲学

李时珍的成长过程中，所受哲学教育是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传统哲学思想。他用古代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作为自己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基本思想武器。《本草纲目》的字里行间，闪耀着古代自然哲学的思想光芒。李时珍从墨子、荀子、王充、刘禹锡、柳宗元、张载等思想家的著作中，学习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用以批判有关医学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谬论，扫除科学研究中的思想障碍。

李时珍生活的年代，以王阳明为代表的主观唯心主义心学统治着思想界。不少人醉心于“致良知”、“心即理”、“知行合一”等性理空谈，成天讲的是所谓“惟精惟一”之道，而置社会实际于脑后。李时珍没有被那种唯心主义空谈所迷惑，一心务实，从一草一木的认识开始。他肯定宇宙万物都独立于人们的意识之外而存在。他坚持中国传统哲学的气一元论，认为太初只是一气，由气化生万物，人也由气所化生。人们之所以生病，并非鬼神作祟，而是由于客观存在的“邪气”干扰了人们的生理机能的正常作用。治病的目的就在于培植人体的正气，抗击邪气的侵扰，使人体生理机能恢复正常的平衡状态。

他认为各种动物、植物，乃至金石等物，无一不是气化的产物。由于各种动植物，得气有良和不良，故有的有毒，有的无毒，研究本草就是要分其品类，知其良毒。各种药物虽是一气所生，有着物质的统一性，也存在着千差万别的差别性。各种药物既相互依存，又彼此制约。人们的研究工作，就是要发现它们的性能及其相互依存与制约的关系。掌握其客观规律，乃可得其利而远其害。

万物是客观存在的，又可以为人所利用，但只有充分认识它们的相互关系，掌握其内在规律性，才能改造它们。对药物来说，只有首先认识药物的特性，才能分别加以炮制；气味不同的药物，才可按人的意志加以配伍，用以制伏人类的病害。在这方面，李时珍对古代“制天命而用之”的唯物主义思想作了重要发展。

李时珍从元气化生万物的思想出发，肯定阴阳调摄、五行胜复、物性相别的相互关系，最后达到天人统一、人定胜天的结论，处处表现出对传统哲学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因此可以说，《本草纲目》不仅在医学上树立了丰碑，同时对古代自然哲学的发展，也有其独特的历史贡献。

一、万物化生本于元气

李时珍运用古代荀况、王充等唯物主义哲学家所坚持的元气学说，作为自己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基石。用元气学说解释天上风云雨露的变化，地上飞潜动植的生长发育，以及金石水火的相互关系。在他看来，宇宙万物无非一气所生；人的生命，存于一气；疾病也是气的反常变化造成的；研究医药，就是研究利用何种气味的药物，可以扶正气，抑邪气。

（一）元气化主人、物

李时珍认为万物之所以有精有粗，有柔有刚，或动或静，有情变无情，无形变有形，都是元气凝结、变化的结果，绝无超自然的神灵主宰。他用气的变化来解释万物的生成变化。指出：

石者，气之核，土之骨也。大则为岩声，细则为沙尘。其精为金为玉，其毒为^石为砒。气之凝也，则结而为丹青；气之化也，则液而为矾汞。其变也，自柔而刚，乳卤成石是也；或自动而静，草木成石是也。飞走含灵之为石，自有情而之无情也；雷震星陨之为石，自无形而成有形也。

——《金石部前言》校点本第一册，第 455 页

这里总论各种金石都是由气生成。沙尘、金玉同是一气；气可凝为固体的丹青，可成液态的矾汞，柔软的乳卤，又可凝结成刚坚之石。草木和动物变为坚固的化石，是由有生命的东西变为无机物；各种陨石，无非是由无形的气变成的有形之物。他始终不渝地坚持气一元论，肯定宇宙万物没有不是由气构成的。李时珍是一个彻底的气一元论者。李时珍肯定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同时又肯定由于禀气不同，物质的存在形式具有多样性。有矿物，有植物，有动物。植物之中有草有木；一种草木，有根于枝叶花实之别，其形色、其气味、其性用都有区别。他在《草部前言》中写道：

天地造化而草木生焉，刚交于柔而成根茎，柔交于刚而成枝干，叶萼属阳，华实属阴，由是草中有木，木中有草。得气之粹者为良，得气之戾者为毒，故有五行焉（金木水火土），五气焉（香臭臊腥膻），五色焉（青赤黄白黑），五味焉（酸苦甘辛咸），五性焉（寒热温凉平），五用焉（升降浮沉中）。

——校点本第二册，第 687 页

从药物学观点来看，一切草木，或良或毒，皆可供药用，良、毒的区分，是由于“得气之粹”或“得气之戾”，并非上帝有意安排。五行、五色、五气、五味有别，其性、其用亦异。本草学的研究就是通过不同草木形色气味的区别，确定其性味与功用，然后才能处方制剂，对证施治。他说：“炎农尝而辨之，轩歧述而著之，汉魏唐宋明贤良医代有增益……苟不察精微，审其善恶，其何以权七方，衡十剂而寄死生耶？”（同上）

李时珍沿用气的概念来论述宇宙万物的物质统一性，更沿用“化生”的观点，来论述万物自我衍化，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有情到无情。各种生物由于自我“化生”，才能不断繁衍后代。他坚持了唯物主义无神论，对造物主有意创造万物的唯心主义目的论作了彻底否定。他阐述了万物自然“化生”的观点。指出：“太初之时，天地絪縕，一气生人，乃有男女。男女媾精，乃自化生。如草木之始生子，一气而后有根及子，为种相继也。人之变化，有出常理之外者，亦司命之师所当知，博雅之士所当识。”（《人傀》校点本第四册，第 2970 页）他肯定人同万物一样，是自然化生，绝非上帝创造。更指出，人类的变化，既有“常理”，又有超出“常理”之外的特殊情况。常理，指客观规律性，这是对荀况“天行有常”思想的直接继承。超出常理的特异变化。是讲人的生理、病理上的种种变异。“气化”有常，有变，就形成了千奇百怪的物质世界，人们应当承认这一客观事实，对它们

一一进行仔细研究。

李时珍继承并发展了中国医学中的“形气转化”思想。把自《黄帝内经》以来，许多医学家、药物学家所坚持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贯彻到底，肯定宇宙万物统一于“气”，由“气”化生万物，有不同的形与质，因而产生色、气、性、味、用等各种区别。今天看来，这种观点十分简朴。在古代，这正是坚持了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基础。把医学、药物学研究引上了正确道路，排斥了唯心主义思想的毒害。由于有正确的自然观作基础，李时珍在科学研究中才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二）六淫导致疾病

李时珍用气一元论解释疾病产生的原因，把先秦时期医和以来倡导的“淫生六疾”思想贯彻始终。他认为人体内部、人同自然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整体。人体内部要保持生理机能的统一与平衡，尤其要同自然环境保持生态的平衡。自然界寒暑燥湿风热的变化，必然引起人体生理机能的相应变化。一旦外界变化超过人体所能适应的界限，就会导致“虚邪贼风”侵袭人体，引起生理机能失调而产生疾病。

李时珍主张“六气胜复、主客”，制约病机。他认为天气、地气的变化，如果造成“上淫于下”，或“外淫于内”的局面，这时不是人胜天，而是天胜人，是为“反胜”。反胜必致疾病。他说：“当其时而反得胜己之气者，谓之反胜。元气之胜。何以证之？燥胜则地干，暑胜则地热，风胜则地动，湿胜则地泥，寒胜则地裂，火胜则地涸是也。元气胜复、主客，证治病机甚详。”（《五运六淫用药例》校点本第一册，第76页）这是对《素问·至真要大论》观点的阐述。用寒暑燥湿风火对地的影响，证明“六淫”对人体生理机能影响的客观必然性。六淫是客观存在的，对外感作用是必然的。人们要正确认识这种必然性，才能预防疾病；或在疾病发生后，采取相应医疗手段去战胜它。

李时珍举例说，梅雨时节，人们往往易生病，就是因为当时的湿热之气侵犯人体。

劳动人民从长期生活经验和季节气候的变化中，总结出自然变化的规律，认为“三月为逢梅雨，五月为送梅雨”。按节气言，“芒种后逢壬为人梅，小暑后逢壬为出梅”。梅雨季节，人易生病，物易霉烂，都是由“湿热之气”，郁遏薰蒸造成的。（《梅雨水·发明》）这是家喻户晓的常识。以此比喻六淫之气，对人体的影响，或重或轻，或显或微，常人不易觉察而已。李时珍通过这种人人易晓的“气”的变化事例，阐述了更深刻的医理、药理。

李时珍认为，人同自然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物质交换。各种不同的天气、地气，会影响人们的生理机能，导致各种疾病和生理失常。他引用《淮南子》的观点来论证这一思想。《新汲水·发明》中写道：“人乃地产，资禀与山川之气相为流通，而美恶寿夭亦相关涉。金石草木，尚随水土之性，而况万物之灵者乎？……《淮南子》云：土地各以类生人。是故山气多男，泽气多女，水气多暗，风气多聋，林气多癯，木气多伛，岸下气多癯，石气多力，险阻气多瘦，暑气多天，寒气多寿，谷气多瘠，宣气多狂。”（校点本第一册，第399页）

尽管这些观点未必符合科学，但2000多年前的《淮南子》具有这类环境决定论观点，是无可厚非的。其中含有一定合理因素，即初步意识到人与自

然环境的统一关系。人们生活在一定地理环境，其水土条件同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人不能脱离特定地理环境而生活，就难免受地域性疾疫的折磨。所谓山气、泽气、林气、石气、丘气、谷气，不过是特定地理环境的代名词而已；至于寒气、暑气、风气、水气则是标志不同季节气候变化的特征。热带人的寿命、健康同寒带人的寿命、健康有区别，未始不同“暑气多夭，寒气多寿”的说法有相通之处。

李时珍更用气一元论来说明，只有保证人体内部元气的正常运行，才能保持健康。他提倡进行“河车功”锻炼，有意识地促成元气在人体内部的正常运行，以辅助生理机制的正常活动，维持生理机能的相互统一与平衡。

“河车功”吸取了道家“内丹术”的合理内容，其基本精神在炼精化气，炼气化神。李时珍用中医经络学说解释“河车功”的基本原理与方法。他在《奇经八脉考》的“督脉”条下，详细地介绍了道家“河车”功法的妙旨。论述“河车功”具有“通行任督”二脉的重要作用。督脉为“阳脉之总督”，任脉为“阴脉之主任”。督脉沿着背脊循行，主持一身的阳气；任脉沿着腹部正中由下而上行，主持一身的阴血。所以李时珍特别看重任督二脉的畅通。他说：“任督二脉，人身之子午也。乃丹家阳火阴符升降之道，坎水离火交媾之乡。”道家提倡的“河车功”，是促成任督相通的具体手段。根据某些学者的阐发，炼功时内气由尾闾穴上升，径夹脊穴、玉枕穴至泥丸宫，然后下降鹊桥、重楼、离宫，纳入丹田。在人体内，这是元气循环的，一条重要途径，所以李时珍称之为“人身之子午”。保持这一条阴阳升降、水火交媾的渠道畅通，就能使全身气血运行，促进健身延寿。李时珍用俞琰注释《周易参同契》的话，说明这一重要原理。“人身血气，往来循环，昼夜不停。医书有任督二脉，人能通此二脉，则百脉皆通。”

李时珍坚持气一元论，用以解释宇宙万物的统一，解释人与自然的统一，解释人体内部生理机能的统一及一切生理和病理。他用气一元论观点，论述了物质统一性及其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坚持用自然物本身来说明一切客观的运动变化，而不假于超自然的造物主。在哲学基本问题上，坚持了物质统一性，坚持了从客观事物出发、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路线。

当然，李时珍所坚持的气一元论，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用“形气转化”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不可能具体地说明生命现象的物质基础及其结构，也不能清楚地揭示生命活动中新陈代谢的具体方式。这样就不能不为唯心主义留下一些地盘。他的思想中，无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唯心主义思想杂质。

二、万有变化不离阴阳

阴阳学说，起初是我国传统哲学中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早在 3000 多年前，人们就运用这种思想来解释宇宙万物中对立统一的两种力量和两种性质，同神学思想进行斗争。《黄帝内经》借助这种哲学思想总结医疗实践经验，解释人同自然界的联系，阐述人体生理、病理以及医理、药理的不同特征。故阴阳学说成为中医学的理论基础之一。

李时珍全面地继承并创造性地发展了这一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中国医学理论。他在阐述自然变化、人体生理机能消长、疾病治疗原则、药物配伍原则及药性理论时，全面地运用了阴阳学说，从阴阳互根观点出发，分析阴阳消长、转化的原理，探寻达到阴阳调摄的途径。

李时珍运用阴阳学说，分析元气的盛衰，人体生理机制的消长，和以阳制阴，以阴制阳，以达阴平阳秘的治疗准则，从而发展了祖国医学。他运用阴阳学说，分析各种药物气味的不同特性，以及调和阴阳的药物配伍准则，发展了药理学。历代封建统治者和唯心主义思想家，利用阴阳学说宣扬神秘主义。李时珍揭开神秘主义思想，恢复阴阳学说的朴素唯物主义本来面目，使人人都能理会它，接受它，运用它。李时珍认为阴阳学说不失为祖国医药学进一步发展的理论工具。3000多年前流传下来的古代哲学思想，李时珍在研究中运用自如。

（一）阴平阳秘的施治原则

《黄帝内经》早已肯定“生之本，本于阴阳。”（《素问·生气通天论》）又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人体之所以发生疾病，乃由于内部生理机能的阴阳双方失去平衡。辨证的关键在于“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同上）施治的原则就是促成阴阳转化，回复到“阴平阳秘”的常人状态。李时珍对这些基本原理融会贯通，并创造性地加以发挥。

根据人同自然统一的原理，李时珍肯定一日之内人体元气的阴阳盛衰，同昼夜之间阴阳消长息息相通。《素问·金匱真言论》指出：昼夜之间阴阳消长分四个阶段，“平旦至日中，天之阳，阳中之阳也；日中至黄昏，天之阴，阳中之阴也；合夜至鸡鸣，天之阴，阴中之阴也；鸡鸣至平旦，天之阳，阴中之阳也。敌人亦应之。”（《金匱真言论》）李时珍根据这一“天人相应”的原理，解释某些疾病发生的规律性。例如强项筋急，许叔微指出，“有人患此，自午后发，黄昏时定。”为什么此疾多发于午后至黄昏？李时珍解释说：

予谓此必先从小起。足少阴之经自足至顶。筋

者肝之合。今日中至黄昏，阳中之阴也，肺也。自离至兑，阴旺阳弱之时，故《灵宝毕法》云：离至乾，肾气绝而肝气弱。肝肾二脏受邪，故发于此时。

——《木瓜·附方》校点本第三册，第1770页

这是说，筋者肝之合，肝气弱，易生强项筋急之症。午后至黄昏，乃阴旺阳弱之时，故此病多发于此时。把人体内部阴阳盛衰同自然界一日之内的阴阳消长的相应关系，阐释得十分清楚。

既然人体阴阳盛衰与自然界阴阳变化如此密切，在用药治病时，必须慎重考虑病变、时令与用药三者之间的阴阳调摄关系。本于此，李时珍提出“逆天时”用药的原则。春夏二季，阳气上升、旺盛，多得热病，宜用寒凉的药品，泻热以全阳；秋冬二季，阴气上升、旺盛，多得寒病，宜用温热药物，逐寒以存阴。

针对“夏月伏阴，冬月伏阳”（《四时用药例》校点本第一册，第74页）的特点，李时珍还提出“顺四时”用药的特殊情况。春夏之时，阳盛于外而虚于内，秋冬之时，阴盛于外而虚于内，所以春夏虽宜用寒凉之药以泻热，却不妨投之以辛热之药以顺其升浮之气以养阳。秋冬季节，本宜用温热之品以逐寒，却不妨投之以苦寒之药顺其沉降之气以养阴。前者针对“夏月伏阴”，后者针对“冬月伏阳”。顺天时也好，逆天时也好，其根本目的在

求得人体机能的“阴平阳秘”。李时珍写道：

春月宜加辛温之药，薄荷、荆芥之类，以顺春升之气；夏月宜加辛热之药，香薷、生姜之类，以顺夏浮之气；长夏宜加甘苦、辛温之药，人参、白术、苍术、黄芩之类，以顺化成之气；秋月宜加酸温之药，芍药、香梅之类，以顺秋降之气；冬月宜加苦寒之药，黄芩、知母之类，以顺冬沉之气，所谓顺时气而养天和也。

——《四时用药例》校点本第一册，第74页

“顺时气”，即顺应四季阴阳升降沉浮的节气变化；“养天和”，即适应节气的变化而达到人体内部的阴阳调和，避免“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的病态出现，使人体始终保持“阴阳匀平，以充其形，九候若一”（《素问·调经论》）的“平人”状态。

李时珍认为，人到中年，往往容易发生阴阳失调，三焦不利。他说：“凡人中年，精耗神衰。盖由心血少，火不下降；肾气惫，水不上升。致心肾隔绝，营卫不和。上则多惊，中则寒痞，饮食不下；下则虚冷遗精。”这时加能服用香附子和茯神制成的“交感丹”，就可益肝补肾，起到固精延年的妙用。因为香附子“气平而不寒，香而能窜。其味多辛能散，微苦能降，微甘能和”，能促成阴生阳长，以养天和。（《莎草·香附子·发明·附方》校点本第二册，第890—891页）他说，愚医不知调和阴阳之理，“徒知峻补下田，非惟不能生水滋阴，而仅见衰悴”。（同上）

李时珍根据自己长期积累的医疗实践经验一再申述治病必须贯彻阴阳调和的原则。他说：“上焦主纳，中焦腐化，下焦主出。三焦通利，阴阳调和，升降周流，则脏腑畅达。一长其道，二气淆乱，浊阴不降，清阳不升，故发为霍乱呕吐之病。”（《生熟汤·发明》校点本第一册，第408页）治疗的原则是要“分其阴阳，使得其平”。（同上）

在阴阳偏胜引起病症之后，人们或者“补阳而生阴”，或者“补阴而制阳”，须根据不同病症施用不同的药物。人参和沙参，同样是补品，也当因人而异。“人参，甘苦温，其体重实，专补脾胃元气，因而益肺与肾，故内伤元气者宜之；沙参，甘淡而寒，其体轻虚，专补肺气，因而益脾与肾，故金能受火克者宜之。一补阳而生阴，一补阴而制阳，不可不辨之也。”（《沙参·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712页）无论“补阳生阴”，还是“补阴制阳”，最终目的在达到阴阳调合。阴阳调合，并不是否认矛盾，它是在承认矛盾、正视矛盾的前提下，通过药物治疗手段，创造一定条件，促成矛盾的斗争和转化而维持动态平衡。这同否认矛盾、否认矛盾转化的形而上学矛盾调和论是不同的。中医学认为，人体正常情况下，尽管已保持着“阴平阳秘”，也并不是就不存在矛盾了，只是阴阳的对立斗争维持一定的均衡状态，阴阳的偏胜，没有达到超出“平人”所能适应的限度。即使出现了暂时的阴阳偏胜，人体生理机能的自我调节作用，可以使它不致于发展到危害生理机能协调的局面。这种观点，无疑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二）阴阳互制的药物配伍原则

李时珍还将阴阳观念应用于分析药物的性味及药物的配伍原则。

任何药物都有升降浮沉之气和辛酸苦甘咸之味。按照中医理论，升与浮属阳，降与沉属阴。四气属阳，五味属阴；气之厚者属阳，气之薄者属阳中之阴；味之厚者属阴，味之薄者属阴中之阳。酸苦咸诸味，具有收敛、沉降

作用，故属阴；甘辛之味，具有发散、升浮作用，故属阳。

根据以上基本原理，李时珍对许多药物的阴阳属性作了具体论述。然后他在处方原则上，有意识地利用药物性味的阴阳偏胜，去矫治疾病过程中的阴阳失调。

药物配伍中必须贯彻阴阳调和的原则。关于这一点，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留下许多著名的典型分析，对后代学者大有启发作用。

他根据几种治痢的古方，细心剖析了其中阴阳配伍的奥妙，发人之所未发。《黄连·发明》写道：古方治痢，香连丸用黄连加木香，姜连丸用黄连加于姜，变通丸用黄连加茱萸，姜黄散用黄连加生姜。治下血，用黄连加大蒜。“皆是一冷一热，一阴一阳，寒因热用，热因寒用，君臣相佐，阴阳相济，最得治方之妙。”（校点本第二册，第773页）这说明痢同其他疾病一样，是由阴阳失调引起的。诊治的基本准则，在于寒因热用，热因寒用，对症施药，以调整其阴阳偏胜之弊。药物配伍须做到“阴阳相济”，才能免除偏胜之害。

李时珍按“阴阳相济”思想，分析了豆蔻和知母一阴一阳两药同用以治寒热的原理。指出：“豆蔻治病，取其辛热浮散，能入太阴、阳明，除寒燥热，开郁化食之力。”（《豆蔻·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866页）“知母之辛苦寒凉，下则润肾燥而滋阴，上则清肺金以泻火，乃二经气分药也。”（《知母·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726页）豆蔻“与知母同用，治瘴疔寒热，取其一阴一阳无偏胜之害。盖草果（即豆蔻）治太阴独胜之寒，知母治阳明独胜之火也。”（《豆蔻·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866页）

服食药物，如能“阴阳相济”，固可疗疾得福；反之，若阴阳偏胜，则必招祸。李时珍分析了许多因药性偏胜而造成危害的典型医案，以警世人不可违背阴阳调摄的法则。

饮茶，这是人们通常的嗜好，从中医学看来，茶乃阴中之阴，脾胃虚弱之人，饮之过量，将招来阴气偏胜，元阳受损的危害。《茶·发明》阐述这一道理说：

茶，苦而寒，阴中之阴，沉也，降也，最能降火。火为百病。火降则上清矣。然火有五，火有虚实。若少壮胃健之人，心肺脾胃之火多盛，故与茶相宜。……若虚寒及血弱之人，饮之既久，则脾胃恶寒，元气暗损，土不制水，精血潜虚。……种种内伤，此茶之害也。

——校点本第三册，第1872页

脾胃火盛之人，饮茶可泻火，对调摄阴阳有利，故“相宜”；脾胃虚弱者，饮茶过久，会造成阴气偏胜，阴阳失调，则有害。莫道清茶一杯，无关宏旨，一经李时珍发明，知其中大有阴阳妙理。

魏晋时期，不少风流名士，为求健康长寿，讲究服“寒食散”。其中含有大量石钟乳，刚服时，形体壮盛；久服，不少人反遭夭折。李时珍分析石钟乳的特性，指出久服必孤阳偏胜，营卫不从，自招恶果。《石钟乳·发明》写道：石钟乳，乃阳明经气分药也。其气燠疾，令阳气暴充，饮食倍进，而形体壮盛。昧者得此自庆，益肆淫佚，精气暗损，石气犹存，孤阳愈炽。久之营卫不从，发为淋渴，变为痈疽，是果乳石之过耶？”（校点本第一册，第564页）

石钟乳是阳性药物，阳气衰弱者适当服用，可以救衰补偏，生调合阴阳、

壮盛形体之功。常人久服，反将破坏阴阳协调，造成“孤阳愈炽”的不良后果。李时珍用阴阳学说，分析了历史上许多名士服用“五石散”而折寿的症结所在，发人深思。

为了弄清某些药物阴阳属性的来由，李时珍作了别开生面的研究，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鹿茸属阳，麋茸属阴，这是什么道理呢，过去人们未能作出合理解释。李时珍进行深入考证，发千古之秘。

沈括《梦溪笔谈》指出，《月令》曰：冬至麋角解，夏至鹿角解。阴阳相反如此。李时珍沿着这一思路，进一步引证说：“按熊氏《礼记疏》云：鹿是山兽，属阳，情淫而游山，夏至得阴气角解，从阳退之象。麋是泽兽，属阴。情淫而游泽，冬至得阳气而角解，从阴退之象。”（《鹿茸·发明》校点本第四册，第2847页）这说明鹿茸与麋茸阴阳性味不同，由于山居、泽居之别。他得出结论说：“鹿之茸角补阳，右肾精气不足者宜之；麋之茸角补阴，左肾血液不足者宜之。此乃千古之微秘。前人方法虽具，而理未发出，故论者纷坛。”（《麋角·发明》校点本第四册，第2861页）

李时珍坚持阴阳学说来解释药理，终于“发千古之微秘”，这同他坚持正确的历史考证方法，善于集古人论说而融会贯通的精神是分不开的。李时珍还依照气味厚薄划分药物阴阳属性的原理，对许多药物作出新论断，使有关药物治疗功效的分析，更具有说服力。

他用阴阳学说，论断五灵脂治血病、止痛的功效。写道：“五灵脂，足厥阴肝经药也。气味俱厚，阴中之阴，故入血分。肝主血，诸病皆属于木，诸虫皆生于风，故此药能治血病，散血、和血而止诸痛。”（《五灵脂·发明》校点本第四册，第2643页）

在《枇杷叶·发明》中，李时珍根据阴阳学说论断此药的下气功效。写道：“枇杷叶，气薄味厚，阳中之阴。治肺胃之病，大都取其下气之功。气下则火降痰顺，而逆者不逆，呕者不呕，渴者不渴，咳者不咳矣。”（校点本第三册，第1797页）

李时珍对“地浆”治疗中暑霍乱的奇效作过研究。将地浆列为药物，起于《名医别录》。陶弘景将其列入下品，他说：“掘黄土地作坎，深三尺，以新汲水沃入搅浊，少顷取清用之，故曰地浆。”李时珍说，地浆气味甘、寒、无毒。在“主治”栏中称它能“解一切鱼肉果菜药物诸菌毒，疗霍乱及中喝卒死者”，为什么一种普通单方，会有如此神奇功效呢？李时珍根据文献作了进一步考证。“按罗天益《卫生宝鉴》云：中暑霍乱，乃暑热内伤，六神迷乱所致。阴气静则神藏，燥则消亡，非至阴之气不愈。坤为地，地属阴，土平，曰静顺。地浆作于墙阴坎中，为阴中之阴，能泻阳中之阳也。”（《地浆·发明》校点本第一册，第406页）

李时珍从处方施治的原则，到药物性味的分析，无不着眼于阐发《内经》中“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的千古定论，和“仅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的治疗法则。在他看来，千疾百病来自一个总根源，即阴阳失调，或一方有余，或一方不足，造成阴或阳的偏胜，导致生理机能失去平衡。为治之道，尽管千方百药，不外乎以阳治阴，或以阴治阳，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虚者补之，实者泻之，总之在创造一定条件，促成阴阳转化，达到阴阳协调平衡的目的。

李时珍的阴阳调摄思想，是对《内》、《难》以来祖国医药学的发展，

也是古代阴阳对立统一思想的创造性运用。由于他能结合医药实践对阴阳学说进行具体阐发，使人们对这一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思想更易于理解接受，从而对祖国医学理论的整体观念和原始系统论思想领会更为深刻。

三、造化之机显示五行生克

李时珍在进行医学、药学研究中，创造性地运用了我国传统哲学中的五行学说。他继承《内》、《难》以来的医学理论体系，把五行学说同元气学说、阴阳学说紧密结合起来，建立了朴素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这一自然观不言而喻，是同古代辩证法思想结合在一起的。

李时珍运用五行学说阐述人同自然的关系，人体内部脏腑机能的关系，以及医疗准则、方药性能特征等。五行学说成为他总结自己的医药实践知识的理论武器；同时，他在医药实践中，对传统哲学中的五行思想又作了重要发展。《本草纲目》成为我们研究 16 世纪朴素唯物论和自然辩证法的珍贵文献。尽管五行学说同阴阳学说一样，在长期封建社会里受到种种歪曲，蒙上了厚厚的一层唯心主义的尘雾，李时珍却独具慧眼，透过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迷雾，而剥取其朴素唯物论、辩证法思想的合理内核。这一思想理论，成为他在医学领域同神学唯心论作斗争的重要思想武器。

五行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很早。起初五行是指水火木金土五种实体。五行范畴是一种实体范畴。《尚书·大禹谟》强调的“水、火、木、金、土、谷，维修；正德、利用、厚生、维和”是如此，《尚书·洪范》中箕子所谈的五行，水润下，火炎上，木曲直，金从革，土稼穡，也是如此。正如明代哲学家王廷相指出的，在古代五行观念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五者流行于天地之中，切于民用，不可一日而缺；治天下国家，其政所宜先者”。（《五行辨》，《王氏家藏集》卷三十三）

西周末年的思想家史伯提出“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的原理，把五行看成构成百物的五种基本物质元素。尽管这仍是把五行看作一种实体，但已带有哲学概念的性质，比以前的五行观念前进了一步。

李时珍所继承并发展的，当然不是指作为简单实体的这种五行范畴。

战国时期，子思、孟轲、邹衍等唯心主义思想家，赋予五行范畴以伦理道德属性，对原始五行思想的这一改造，使五行观念得到新的发展，由实体范畴演变为属性范畴。有了不同的属性，从而也就演化出种种不同的关系。五行，由属性范畴进一步发展，乃成为关系范畴。从《黄帝内经》以来，医学理论所借用的五行范畴，已经不再是实体范畴，而是发展了的属性范畴和关系范畴。

当《内经》以五行木火土金水代表五脏肝心脾肺肾时，五行只是一个代名词，它所代表的对象是五种实体。不过，这里的实体同生物解剖学上的肝心脾肺肾等实体，已不可等同。

当《内经》以五行代表青赤黄白黑五色，酸苦甘辛咸五味，生长化收藏五化时，它已不是指的一种实体。而是描述某些实体所具有的属性。这里的五行概念已是属性范畴。

《内经》进而用五行概念概括五脏、六腑之间的相互联结、相互制约的关系，提出五行之间存在相生、相克等关系时，五行范畴已发展为关系范畴。李时珍在医学、药物学中使用的五行范畴，主要是属性范畴和关系范畴。

应当指出，五行范畴除了在医学、药物学中作属性范畴或关系范畴加以使用外，在中国哲学史上，再没有别的思想家作这样的运用。因此，结合医学、药物学研究五行范畴，对于认识五行范畴性质的演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李时珍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五行概念，作了广泛的运用。首先，结合医学研究，利用五行推演阐扬了造化之机，即人体的生理功能及病机转化问题；其次，结合药物学、方剂学的研究，利用五行生克关系，发明了药物性味功能及药物配伍的妙理。李时珍在其医学、药学实践中，对五行学说作了重要发展，这是中国哲学史上其他思想家所不及的。

（一）五行推行阐扬造化之机

李时珍发展医学理论中的“比类取象”方法，以五行代表人体的五脏、六腑的生理机能。用五行推行的方法，阐明脏与脏、腑与腑、脏与腑、脏腑与人体各器官之间的内在有机制约关系，对发展祖国医学理论作出了贡献。

在《本草纲目》中，五行学说不只处处同元气学说、阴阳学说紧密结合，同时更同医学中的脏象理论紧密联系。李时珍不仅运用五行推行的方法阐述脏腑功能相互制约的规律性，同时还用以说明疾病过程中生理机制变化的必然趋势，对于指导诊断、治疗都很有价值。

在应用五行概念的同时，李时珍还经常同时运用八卦思想。他认为八卦思想是五行思想的衍生，乾、离为火，兑、坎为水，坤、艮为土，巽、震为木，八卦无金。在医药学中，把八卦思想同五行思想结合使用，鲜明地表明李时珍受传统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为了医学、药学理论研究之需要，他总是先从传统哲学中寻找理论思想工具，同时又赋予传统哲学概念和哲学范畴以新的内容。

李时珍从生理学的具体内容出发，在五行中，特别看重水、火二行。从《周易参同契》所阐述的道家内丹思想看来，也就是重视八卦的坎离二卦。李时珍认为坎离、水火，人生不可须臾或缺；水火二气，是维持生命的最宝贵的东西。医学研究的基础，就在于调合人体的水火。水火不相济，百病乃由生。研究医理，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归结为研究水火相济以维持人体生理机能平衡之理。

医学史上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震亨（丹溪）是“五行尊火”论的创导者。他提出“火内阴而外阳，主乎动者也”的观点，认为“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自生”。方以智后来发展了这一思想，建立了火一气一元的唯物主义宇宙观。李时珍对朱震亨的“五行尊火”思想加以全面介绍，特别推崇朱氏发展《内经》而建立的“君火、相火”论。李时珍引述朱氏观点说：

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阳动而变，阴静而合，而生水火木金土，各一其性。惟火有二：曰君火，人火也；曰相火，天火也。火年阴而外阳，主乎动者也，故凡动皆属火。以名而言，形气相生，配于五行，故谓之君；以位而言，生于虚无，守位禀命，因其动而可见，故谓之相。天主生物，故恒于动；人有此生，亦恒于动。动者，皆相火之为也。……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自生。

——校点本第一册，第416页

李时珍之所以推崇朱丹溪的这些观点，着眼于它发展了医学、哲学上的两个基本原理。

第一，天人恒动观。把生命看作是一个永恒运动过程。“天主生物，故恒于动；人有此生，亦恒于动”。宇宙万物永恒运动的观点，是科学的真理。把医学研究建立在恒动观的基础上，排除了形而上学对医学的影响。

第二，君火主静，相火主动的对立统一观。“凡动皆属火”，“动者，皆相火之为”。说明动必以静为基础。动与静的统一，是事物自身具有的对立统一属性。事物的运动无须外界力量的推动，靠的是内部动力。这对生理、医理的研究都是极为重要的基本观点，同形而上学思想是根本对立的。

李时珍坚持这一正确思想研究医药，作出了独到的贡献。李时珍用君火相火对立统一的基本原则，阐述了正治、从治的原理。写道：

火者五行之一，有气而无质。造化两间，显仁藏用，神妙无穷，火之用其至矣哉。愚尝绎而思之，五行皆一，惟火有二。二者，阴火、阳火也，其纲凡三，其目凡十有二。所谓三者，天火也，地火也，人火也。所谓十有二者，天之火四，地之火五，人之火三也。……合而言之，阳火六，阴火亦六，共十二焉。

——校点本第一册，第415页

李时珍分析天、地、人三火的阴阳之别，目的正是引导人们“善反于身”，从中理会人体内部君火、相火之别及其施治过程中孰当正治，孰当从治的妙理。李时珍强调火的重要性，还因为火与人的身体健康、疾病治疗密切相关。他详细阐述了古代“四时变国火以救时疾”的具体涵义。写道：

周官司燧氏四时变国火，以救时疾。季春出火，季秋纳火，民咸从之。盖人之资于火食者，疾病夭寿生焉。四时钻燧，取新火以为饮食之用。依岁气而使无过不及，所以救民之时疾也。……顺天道而百工之作息皆因之，以免水旱灾祥之流行也。

——《燧火·集解》校点本第一册，第418页

这里讲古人重视“火政”，设专职官员“四时变国火”，具有西方面科学意义。一是顺“岁气”，使无亢，不及，这是属于气象学的问题；一是顺“天道”，观大火星之见伏。以定百工之作息，这是属于天文学的问题。二者都与火政有关，直接影响人们的衣食住行，涉及人们的疾病健康，所以“五行尊火”是有道理的。以上从医学立场阐述了“火为生命之本”的思想。

其次，李时珍又特别重视水，肯定水也是“万化之源”，一切药物的性味都直接与水有关。水土结合对人们的美恶寿夭，有决定性影响，是任何医家所必须认真研究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水部前言》中写道：

水者，坎之象也。……其体纯阴，其用纯阳。上则为雨露霜雪，下则为海河泉井。流止、寒温，气之所钟既异；甘淡苦咸，味之所入不同。是以昔人分别九州水土，以辨人之美恶寿夭。盖水为万化之源，土为万物之母。饮资于水，食资于土。饮食者人之命脉也，而营卫赖之，故曰：水去则营竭，谷去则卫亡。然则水之性味，尤慎疾卫生者之所当潜心也。

——校点本第一册，第387页

以上都是从实体上分析了五行中水火二行对人们的疾病寿夭的密切联系。

李时珍更推崇祖国医学中的易水学派，重视脾土，成为“补土”学派的

发扬者。

易水学派的创始人是张元素，他创立“脏腑寒热虚实标本用药式”。其后继者为李东垣，创立脾胃论。李时珍接受这一学派的思想影响，重视脾胃命门在医理中的地位。《本草纲目》中充分阐发了脾胃（土）的生理功能，认为它是人体内水火交媾的枢纽，是“血气生化之源”，“元气之母”。善于培养脾胃，则可期望“百病不生”。李时珍写道：“土者，万物之母。母得其养，则水人既济，木金交合，而诸邪自去。百病不生矣。”（《黄精·发明》校点本第一册，第720页）今天看来，李时珍发扬东垣之学，重视“补土”，是有深刻科学道理的。

土即脾胃，属于中州，它的生理功能在于消化食物，吸收养分，是人体新陈代谢的主要部位。脾胃虚弱，饮食无力消化，气血就会受到阻碍。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强调“补土”的重要性。

（1）营血不能不靠土。他说：“人之水谷入于胃，受中焦湿热熏蒸，游溢精气，日化为红，散脏腑经络，是为营血，此造化自然之微妙也。”（《红曲·发明》校点本第三册，第1547页）

（2）元气不能不靠土。他说：“土为元气之母。母气既和，津液相成，神乃自生，久视耐老，此其权舆也。”（《莲藕·发明》，校点本第三册，第1894页）

（3）五行之运转，以土为中心。五脏的机制，以脾胃为枢纽。李时珍说：“脾者，黄宫。所以交媾水火，会合木金者也。”（同上）

脾属土，居五脏之中，上通心肺，下达肝肾，口服方剂要通过脾胃，调节水人之偏胜，而使之得平，因此，脾胃升降枢机之正常与否，关乎全身。他说：“土气得令，清气上行，天气明爽。”（《泽泻·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1350页）“人之中气不足，清阳不升，则头为倾，九窍为之不利。”（《辛夷·发明》校点本第三册，第1936页）

辛温之药，有温中之功，“能取胃中清阳上行通于天”，治九窍之病。李时珍认为，能理解而阐发脾胃温和则百病不生的医理的医家为数不多，“轩岐之后，能达此理者，东垣李杲一人而已”。（同上）

李时珍根据五行生克制化原理，评定了许多药物的性味及功效。

木瓜，能治转筋。寇宗奭认为：“木瓜得木之正，酸能入肝，故益筋与血。”李时珍从五行生克原理出发，认为这种看法并不全面。他认为木瓜治转筋，实是“土中泻木以助金”的关系。

说木酸入肝以治转筋，那是从表面看问题。本质的联系是木瓜理脾而伐肝，助土以伐木，平木而使土得令。这才抓住了木瓜治转筋的关键。

李时珍还讲了一个“以土胜水，木得其平”的故事。宋神宗元丰年间，皇子仪国公病瘵（即“抽风”），国医不能治。长公主推荐名医钱乙人治。钱乙仅投以一剂黄土汤就把病治好了。神宗召见钱乙，问这是什么道理。钱乙回答说：“以土胜水，木得其平，则风自退尔。”神宗大悦，擢为太医院丞。（《黄土·发明》校点本第一册，第427页）患瘵，于是抽搐。一味单方就能治病，的确神奇。用五行关系予以解释，其基本原理就是调节生理机能，使阴阳平和。语言异常简单，但“木平风退”的道理，实为深刻。五行范畴对于论述医理、病理的妙用，由此可见一斑。把五行学说看作神秘主义，是一种偏见。

（二）以五行生克原则论述方药妙理

李时珍不止用五行、八卦思想解释生理、病理及医疗法则，在《本草纲目》中，更用五行生克的原则阐述药物性味及医方妙理。

在医药史上，同一味药属金、属木往往有争论。李时珍结合临证经验，予以考订。如小麦，属木、属金、属人，说法不一。《素问》说：“麦属火，心之谷也。”郑玄说：麦有孚甲，属木。许慎则认为，麦是金王而生，火旺而死，属金。三种说法莫衷一是。《名医别录》认为麦养肝气，同郑玄的说法相台；孙思邈认为麦养心气，与《素问》一致。李时珍考订的结果，认为麦“除烦、止渴、收汗、利溲、止血，皆心之病也。当以《素问》为准”。他进而分析了三种不同说法产生的根源，“盖许以时，郑以形，而《素问》以功性，故立论不同耳”。（《小麦·发明》校点本第三册，第1451页）

甘草的性味最特殊，它有“协和群品”的特征。李时珍用五行、八卦概念分析其属性。写道：

甘草，外赤、中黄，色兼坤、离；味浓气薄，资全土德。协和群品，有元老之功：普治百邪，得王化之道。赞帝力而人不知，敛神功而已不与，可谓药中之良相也。

——（甘草·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693页

李时珍把甘草的特性，高度抽象概括为“土德”二字。在这里“土”是一个属性范畴，其特点是生长万物，容纳万物。有调和百物的特性，用以代表甘草具有协和群品、治疗百邪的功效，生动具体，雅俗共赏。

薏苡，有治疗泄痢、水肿的功效。李时珍用五行关系阐明其特征说：“薏苡仁属土，阳明药也。故能健脾益胃。……上能胜水除湿，故泄痢、水肿用之。”（《薏苡·发明》校点本第三册，第1491页）火具红色，牡丹皮也是红色，李时珍阐发了牡丹皮可治“相火”的千载秘奥。他说：“牡丹皮治手足少阴、厥阴四经血分伏火。盖伏火即阴火也，阴火即相人也。古方惟以此治相火，故仲景肾气丸用之。后人乃专以黄蘗治相火，不知牡丹之功更胜也。此乃千古秘奥，人所不知。今为拈出。”（《牡丹·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854页）《仙传方》载有一种成药名“冲和膏”，它的特点是一方之中，五行均备。此膏由紫荆皮、独活、赤芍、白芷、木蜡五药制成，治一切痈疽发背流注诸肿毒。李时珍分析说：紫荆皮乃木之精，破血消肿；独活乃土之精，上风动血；芍药乃火之精，生血止痛；木蜡乃水之精，散肿散血；白芷乃金之精，去风生律止痛。最后总结道：“盖血生则不死，血动则流通，肌生则不烂，痛止则不焮，风去则血自散；气破则硬可消、毒自除。五者交治，病安有不愈者乎？”（《紫荆·发明》校点本第三册，第2127页）

以上是李时珍借用五行概念概括植物性药物的特性。至于动物性药物，他同样利用五行、八卦概念去揭示其性味、主治的特点。

羚羊角入肝经甚效。按一般说法，羊属火，为何有此特效？原来羚羊属木而不属火。李时珍在《羚羊·发明》中写道：

羊，火畜也，而羚羊则属木，故其角入厥阴肝经甚捷，同气相求也。肝主木，开窍于目，其发病也，目暗障翳，而羚羊角能平之。肝主风，在合为筋，其发病也，大人中风抽搐，……而羚羊角能舒

——校点本第四册，第2843页

关于鸡肉在药物学上的功效，诸家本草用五行概念进行解释，颇有争论。

寇宗奭认为：“巽为风，为鸡。鸡鸣于五更者，日将至巽也。感动其气而然也。今有风病之人食之，无不发作。”这是肯定《周易·说卦》“巽为鸡”的说法。八卦巽又为风，故食鸡肉易动风。朱震亨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鸡属土，而有金木火，又属巽，能动肝火。寇言动风者，司俗所移也。”李时珍同意寇说而批评朱说。尽管同意鸡属巽，为风木之说，用以解释食鸡肉易“生热动风”，毕竟欠科学根据。这说明传统哲学中八卦学说，有些卦象，实在莫名其妙，如《周易·说卦》所谓“乾为马，坤为牛，震为龙，巽为鸡，坎为豕，离为雉，艮为狗，兑为羊”之类。何以作如此规定，是无法论证的。根据这种规定，容易束缚科学家的头脑，妨碍科学的发展。李时珍虽欲有所修正，但并不能摆脱这种束缚。《乌骨鸡·发明》中李时珍用五行、八卦思想分析，乌骨鸡的药用价值，写道：“鸡属木，而骨反乌者，巽变坎也。受水木之精气，故肝、肾血分之病宜之。男用雌，女用雄。（校点本第四册，第2590页）乌骨鸡能治肝肾血分之病，其科学根据来自历代医家的临证经验。为使这种有效的验方带上理论色彩，就提出“巽变坎”、“受水木之气”的说法。其所以用八卦、五行概念，目的只在便于“比类取象”。古代科学家未掌握别的科学方法，只好借用传统哲学中某些般范畴来概括复杂的自然现象，不可避免产生局限性。

平时珍将五行、八卦看作一种进行类比的逻辑符号，用以概括共性，引起触类旁通的作用。对丹砂的分析就是如此。他写道：

丹砂，生于炎方，禀离火之气而成。体阳而性阴，故外显丹色而内含真汞。其气不热而寒，离中有阴也。其味不苦而甘，火中有土也。是以同远志、龙骨之类则养气，同当归、丹参之类则养心血。……可以明目，可以安胎，可以解毒，可以发汗，随佐使而见功，无所在而不可

——《丹砂·发明》校点本第一册，第520页

用“离中有阴”、“火中有土”概括丹砂的气味特征，进而说明它“随佐使而见功”的基本特性，实际上是表明它有调和阴阳的功效。如此表述，显然不落常套而别有情趣。

五行说成为李时珍袭用的一种比类取象的思想工具，在总结某些医、药实践经验上，产生一定良好的效果。但用五行进行比类，纯属直观取象方法，难于概括复杂的自然现象，揭示事物的本质。五行生克模式，用来概括药物、病变之中复杂的、多变的联系，很难避免简单、粗放、肤浅的弊病。

运用阴阳、五行、八卦思想总结中医、中药学中的经验。已有几千年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它是有效的、科学的。今天要研究发展祖国的医药学，应当采取更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但我们又不能割断历史，那将导致对待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正确的方法只能是批判地继承，取其精华而弃其糟粕。

四、论医论药强调天人统一

人的生命，同自然界的变化息息相关。不管论医、论药，都需要考虑自然界的客观条件及其变化。在中国传统哲学上就是研究天人关系问题。“天”，指自然界及其一切变化；“人”，指人类对大自然的适应和改造。天人关系问题，是我国传统哲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李时珍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天人统一思想。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刘禹锡“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

的思想，在《本草纲目》里都得到了具体的运用和发展。

李时珍考虑天人关系时，着重研究的是人们的一切医药实践活动，要严格遵循季节和地理条件的限制。医药学者诊病、论治、处方、制药，时时都要考虑天文、地理的影响。从时间上考虑，不同的季节，易患不同的疾病；同一病症，在不同季节，处方用药要依天时变化而有所不同；药物的栽培、收藏、炮制都应遵循严格的季节要求。从地理条件考虑。不同的地域，生长不同的药物；地域水土不同，对人体的生理特点和治病用药都有所影响。

一个医药学家，坚持唯物论，就是要遵循客观自然法则，遇事要以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为转移。李时珍在科学研究中严格地遵循了这一原则。

（一）治病论药必顺天时

天时或岁气，是客观的存在，有它变化的客观规律。李时珍强调，论药、治病，必须首先考虑天时条件。他说：同样一种药物，“生产有南北，节气有早迟，根苗异收采，制造异法度。”（校点本第一册，第47页）“南北”指地域差别，“早迟”指节气差别。同一药物，采根、采苗，季节要求不一样，炮制方法也不一样。不同的季节，对药物的栽培炮制影响很大。李时珍以最常见的霜、露为例，二者同是自然界水蒸气的变化，时间有早晚，特性则大异。“阴盛则露为霜。霜能杀物，而露能滋物”。一杀一养，“性随时异也”。同是霜。时机不同，亦有利、有弊，“当降而不降，当杀物而不杀物”。或“不当降而降，不当杀物而杀物”，对人类的生命和身体健康都会造成危害。（校，点本第一册，第393页）

农作物同天时的关系至为密切。顺应天时耕种，则产量高，粮食籽粒饱满，富有营养；违反天时耕种，不但减产。而且质性不良。李时珍引用《齐民要术》的论断说：“粟之成熟有早晚，苗杆有高下，收实有息耗，质性有强弱，气味有美恶。”（校点本第三册，第1482页）

李时珍根据这一普通原理，论定同是稻米，因其生长于不同节气，不同地域，其性味亦异，有的可入药，有的不可入药。《粳米·发明》写道：

粳稻六七月收者为早粳，止可充食；八九月收者为迟粳，十月收者为晚粳。北方气寒，粳性多凉。

八九月收者，即可入药。南方气热，粳性多温，惟十月晚稻气凉，乃可入药。迟粳、晚粳得金气多。故色白者入肺而解热也；早粳得木气多，故赤者益脾而白者益胃。若滇岭之粳则性热，惟彼土宜之耳。

——校点本第三册，第1467页

这是从药物学立场，看待不同季节、不同地域的稻米，对人体营养卫生的差异，以及在药物上的不同价值。李时珍本着这一天人统一原则，看待一切药物的栽培、收采与炮制。

人参有坚实、虚软之分，究其原因，乃由于采取异时使然。李时珍说：“人参，亦可收子，于十月下种，加种菜法。秋冬采者坚实，春夏采者虚软。非地产有虚实也。”（《人参·集解》校点本第二册，第701页）

根据《内经》“必先岁气，勿伐天和”的原则，提出“顺时气而养天和”的主张。人们与不同的季节流行病作斗争，应坚持两条基本原则：一是在一般情况下，顺天时而用药，即升降浮沉则顺之；二是在特殊情况下，逆天时而用药，即寒热温凉则逆之。一顺一逆，似相反，而实相成，都是从治本出发，

贯彻“先岁气、养天和”的原则。《本草纲目》中，有不少“顺天时”用药或“逆天时”用药的医案。例如治疗湿热痢疾，用雄黄、荆芥等辛热之品，以顺夏浮之气；但也有用黄芩、黄连、柏叶等清热之药以止痢。这是逆天时用药了。（《百病主治药，痢》校点本第一册，第175页）如治中暑，固然用香薷、桂心、雄黄等辛温之品，以顺夏浮之气；但也用黄连、滑石等清暑之药，是逆天时用药了。李时珍批判某些庸医不知顺逆天时的诀窍，误投药饵以害事。他申述《素问·移精变气论》的观点指出：“暮世治病，不本四时，不知日月。不审从逆，病形已成，以为可救，故病未已，新病复起。”（《神农本草经名例》校点本第一册，第50页）“本四时”，“先岁气”。紧密地结合时令来观察疾病的变化和决定用药的原则，这是医家治病所必须遵循的。李时珍严格遵守这一原则，实质上就是在医药学中，以唯物主义态度看待天人关系。

（二）病因地而异，药随地而变

对人类生理卫生的影响，除四时气候变化这一重要因素外，地理环境也十分重要。空间是人类活动的舞台，生产活动、起居饮食无不受其限制。地域不同，流行的病症大不相同，生产的药物品类大异，气味悬殊。李时珍十分重视地理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提出“随地所宜”原则，作为处方投药的宗旨。《本草纲目》中论病论药都紧紧扣住这一点。《方民》中写道：

人禀性于乾坤，圜形于一气。横目二足，虽则皆同，而风土气习，自然不一。……水食者腥，荤食者膻。膏粱藜苳，肠胃天渊；藁褐罗纨，肌肤玉白。居养所移，其不能齐者，亦自然之势也。故五方九州，水土各异，其民生长，气息亦殊。

——校点本第四册，第2968页

“风土气习，自然不一”，是讲地理条件有差异；“膏粱藜苳”。腥膻之异是讲人们的“居养”受地理环境的限制，人们的“气息”既殊，则寿夭疾苦随之而异，说明自然环境对人的制约作用。“圜形于一气”，是论世界的物质统一性；“气息各殊”，是论事物的特殊性。李时珍广采关于“方民”问题的论述，“以备医诊”（同上），目的十分清楚。

李时珍从“五方九州，水土各异”的客观规律出发，考察了不同地域人民的不同气质、不同病症以及不同治疗方法。

首先他推崇《素问·异法方宜论》中的有关论述：“东方之域，鱼盐之地，滨海傍水：其民食鱼而嗜咸，……，故其民皆黑色疏理；其病多为痲痲，其治宜砭石。西方者：……，其民陵居而多风，水土刚强：其民不衣而褐荐，其民华食而肥脂；……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北方者：……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其病脏寒生满，其治宜灸焫。南方者：……其地下，水土弱，雾露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附，故其民皆致理而赤色；其病多挛痹，其治宜微针。中央者：其地平以湿；……其民食杂而不劳；故其病多痿瘳寒热，其治宜导引按砭。”（《方民》校点本第四册，第2968—2969页）李时珍认为上述分析，是从地理条件差异出发而得出的一般原则，具有普遍意义，值得医家认真思考，严格遵循。

为了充实上述观点，李时珍从《河图括地象》一书中，引用了佐证材料：

“九州殊题，水泉多异；风声气习，刚柔不同。胃州：其音角羽，其泉咸以酸，其气舒迟，其人声缓。荆扬：其音角徵，其泉酸以苦，其气慄轻，其人声急。梁州：其音商徵，其泉苦以辛，其气刚勇，其人声塞。……徐州：其声角宫，其泉酸以甘，其气悍劲，其人声雄。”（校点本第四册，第 2969 页）这里反映了古代的一种地理决定论思想，由不同地域水泉之差异，决定当地人民“风声气习”。这种观点并不完全符合科学道理，但却坚持了朴素唯物主义立场，力图用统一的客观因素来说明人的生理特征。《吕氏春秋》企图仅仅用水的不同，说明同一水域之人的病理特征。“轻水所，多秃与癯人。重水所，多旭与壁人。甘水所，多好与美人。辛水所，多疽与痤人。苦水所，多力^力与伧人”。这可以称为水域决定论。亦应列入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一种类型。值得重视的是李时珍引用《宋太史集》中资料，论述了“五行”决定论。认为由于生活环境不同，所受“五行之气”有偏胜，因而形成人民在生理上的不同特征。“山林之民毛而瘦，得木气多也。川泽之民黑而津，得水气多也。丘陵之民困而长，得火气多也。坟衍之民皙而方，得金气多也。原隰之民丰而瘠，得土气多也。”（校点本第四册，第 2969 页）这种观点，从人与自然环境统一的角度考虑，所反映的特征，似乎有较大的合理性。对此，李时珍作了进一步申述，他说：“人乃地产，资禀与山川之气相为流通；而美恶寿夭，亦相关涉。……《淮南子》云：土地各以类生人。是故山气多男，泽气多女，水气多暗，风气多聋，林气多癯，木气多伧，岸下气多力^力，石气多力，险阻气多瘦，暑气多夭，寒气多寿，谷气多瘠，丘气多狂。……皆应其类也。”（《井泉水·发明》校点本第一册，第 399 页）以上这些说法，未必尽合科学，只反映了古代医家或学者们对地方常见病、多发病力图作出朴素唯物主义解释。在科学不够发达的古代，这种解释对于引起人们严格注意生理特征、地域病变同其所处自然环境之间的客观联系，无疑有着启发作用。李时珍并非毫无批判地接受这些说法，只是将这类观点集中引述，以备医家独立思考。他所肯定的只有一点：凡人“资禀与山川之气相为流通”。人的寿夭，与山川之气也存在某种联系。这种天人统一的哲学思想，有不可忽视的科学价值。

李时珍十分肯定水性同人的寿夭、药物的性味有密切关系。《井泉水·集解》引述麻知几《水解》，以论证这一观点。写道：“天下之水，用之灭人则同，濡槁则同；至于性从地变，质与物迁，未尝同也。故蜀江濯锦则鲜，济源烹楮则晶。南阳之潭渐于菊，其人多寿；辽东之涧通于参，其人多发。晋之山产矾石，泉可愈疽：戎之麓伏硫黄，汤可浴厉。”（校点本第一册，第 398 页）

麻知几肯定水性同土地的关系，提出“性从地变，质与物迁”的原理。李时珍引用《渔隐丛话》论述温泉有不同的性质，有的可治病，有的不可浴。他说：“温泉，有处甚多。……多作硫黄气，浴之则袭人肌肤。惟新安黄山是朱砂泉。春时水即微红色，可煮茗。长安骊山是石^石石泉，不甚作气也。朱砂泉虽红而不热，当是雄黄耳。有砒石处亦有汤泉，浴之有毒。”（《温汤·释名》校点本第一册，第 403 页）李时珍进而告诉人们山中流泉有的可用，有的不可用，辨别的方法是：“山有玉石，美草木者为良；其山有黑土、毒石、恶草者不可用。”他还讲了含毒的山水毒死马群的故事，以引起人们警惕。“昔在浚阳，忽一日，城中马死数百。询之，云：数日前雨，洗出山

中蛇虫之毒，马饮其水然也。”（《山岩泉水·释名》校点本第一册，第404—405页）

总之，李时珍在论病、论药时，紧紧坚持两条原则：一看时间的差异，不同季节，发生不同的病症，施用不同的药方，收采不同的药物；二看空间的差异，不同的地域，水土不同，气候各异，影响人们的生理特点、生活习惯，以致制约着疾病的类型。凡此种种，他都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天人统思想，教导人们要认真研究天时、地理条件，发挥人们的主观能动作用，趋其利而避其害。论病、论药都应当困时制宜、因地制宜，才能达到卫生保健目的。李时珍坚持唯物主义自然观，肯定自然界是客观存在，人能认识自然，掌握其运动变化的规律，利用自然规律，改造自然，使之对人类造福。他所坚持的这种哲学思想，同宋明时期的性理空谈，不可同日而语。

第十二章无神论思想

李时珍一生同道教神仙方术进行了坚决斗争。他的药物学巨著《本草纲目》，是揭露和批判道教鼓吹的所谓“长生不死”之药、“炼丹成仙”之术的锐利武器，处处闪耀着无神论思想的光辉。这部著作，是研究我国古代无神论思想的重要文献，在古代无神论反对宗教神学的斗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数百年来，它对于人们破除宗教迷信，提高医药卫生知识，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本草纲目》在同道教斗争中写成

李时珍生活的明代后期，是一个道教盛行的时代。道教之所以能在这时盛行，是明代封建统治者大力扶持的结果。明成祖朱棣通过“靖难之变”以武力夺取政权之后，早就假托真武帝显灵的神话，来为自己的政权披上一层神学外衣，以便愚弄人民。永乐中，又假托邈邈道人张三丰的预言，说武当山是真武栖息之地。于是统治者“督丁30余万人，大营武当山宫观，费以百万计”。（《明史·张三丰传》）用金碧辉煌的庙宇，隆重地奉祀真武帝，从此道教大为行时，湖广地区尤为突出。明代统治者，仿效唐代统治者奉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的故事，尊封道教祖师张天师为全国教主，大大抬高道教的政治地位。后来，封道士张正常为“真人”，食二品官俸，享有封建特权。明朝还在京师设道篆司、府设道纪司、州设道政司，增强政府与道教之间的密切联系。道教风行全国。到明宪宗时期（1465—1487）、“真人”、“高士”“充满都下”。李时珍幼年，明世宗（1522—1566）嘉靖皇帝朱厚熜，崇信道教，迷信方士，竭力追求仙丹、神药，依重道士来帮他长生、成仙。嘉靖五年，世宗封道士邵元节为“真人”，大加宠信，以其建醮祝祷皇嗣有验，拜礼部尚书。世宗十八年，宠信道士陶仲文继邵元节总领道教。陶仲文乃黄冈（今湖北省）人，曾于罗田（今湖北）万玉山受符水诀。世宗有病，他为之祈祷，病果愈，有功，特授礼部尚书。世宗二十三年，特封为“少师”，不久增封为“恭诚伯”。朝廷允许方士借炼丹之机，出入宫廷，参与朝政。道士们普建雷坛于乡县，有敢反对者，无不下狱，拷掠。嘉靖四十四年，制造了所谓“获仙药于御座”的奇端，举行“告庙”庆典，朝野震惊。（《明史·世宗本纪》）

当时，上行下效，炼丹成风。上自皇帝、王公贵族，下至地方豪绅，多是道修炼丹术的积极奉行着，武昌的楚王朱英^{火命}，在遭受旱灾、水灾的情况下，不顾人民死亡、疫病流行，还请去许多方士帮他炼丹；统治李时珍家乡蕲州的蕲宪王，更是一个炼丹迷。他从四方收集大量贵重药物，耗费在炼丹上。由于李时珍医术高明，治好了楚王儿子的病，楚王特任命他为奉祠正（掌管王室祭祀礼仪的小官），还让他兼管良医所（王府的医疗机构）。李时珍本想利用这个机会，精研医药，重修《本草》。楚王却成天迷恋炼丹术，会见李时珍时。尽问炼丹之事，根本不关心医药，使李时珍非常失望。更可

恨的是，在奉祠所的旁边，楚王修了九个神坛，供奉道教神像，让道士经常在那里念经、打醮，吹法螺、敲锣鼓，一片乌烟瘴气，弄得李时珍心烦意乱，无法研究医药。李时珍反对炼丹，常与道士们发生争执。道士甚至把炼丹失败说成是由于李时珍的破坏。不久李时珍就离开了楚王府，被推荐入太医院。在太医院，他与那些迎合皇帝、支持炼丹、追求长生不死之药的御医们依然格格不入，不受重视，只好托故回乡。

李时珍行医、采药，还不时遭到道教势力的凌辱。他家的后山上，有个“玄妙观”，是座道教庙宇，李时珍和他的父亲常在那里为群众诊病，道士们为了炼丹，竟不让李时珍父子到那里去。武当山是各种名贵药物的产地，可是道士们说那里的一草一木都是真武大帝的，禁止百姓采用。有一年，李时珍同弟子庞宪特地上山去采药，凶恶的道士没收了他们采集的药物，扬言要捆打他们，将他们赶下山来。李时珍屡遭道士们的凌辱，而他研究医药，重修《本草》的意志却更坚决。决心发愤研究医药学，戳穿道士们关于长生不死、服丹成仙的骗局。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竭力剔除《神农本草经》及著名道教医学家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人的医药著作中有关神仙方术的内容，用科学思想同宗教迷信进行斗争。

二、批判“长生久视”的谎言

道教宣扬一种观点，认为只要信道者坚持一定修炼方法，服用某些丹药，就可长生不死，甚至羽化升天为神仙。

李时珍从医学科学立场，指出这种说法和做法不但荒唐可笑，而且十分危险。对他们散布的种种谎言，作了尖锐的批判。

（一）批判服菌桂长生之说

菌桂又名小桂。生交趾、桂林山谷岩崖间，正圆如竹，叶似柿叶，味辛温无毒。李时珍说它“主治百病，善精神，和颜色，为诸药先聘通使”。这种药曾经被神仙家宣扬为久服长生的妙药。唐慎微本草中写道：“《抱朴子》云：桂可合竹沥饵之，亦可以龟脑和服之，七年能步行水上，长生不死。赵佗子服桂 20 年，足下生毛，日行 500 里，力举千斤。《列仙传》云：范蠡好食桂，饮水卖药，世人见之。”李时珍批判道：“方士谬言，类多如此。唐氏收入本草。恐误后人，故详记。”（校点本第二卷，第 1932 页）李时珍先考订，昔人所服食的佳，是指的这种小桂，不是指牡桂（大桂）。接着详细记载了神仙家的谬说而加以批驳，告诫后世之人不可受其欺骗。

（二）批判服水银长生

水银，是神仙家大吹特吹的长生之药。早在《神农本草经》中，就有“久服神仙”的说法。晋代金丹道教的创始者葛洪，在其《抱朴子》中大加宣扬，使不少人受骗。李时珍予以揭露说：“水银乃至阴之精。……阴毒之物，无似之者。而大明言其无毒，《本经》言其久服神仙，甄权言其还丹元母，《抱朴子》以为长生之药。六朝以下贪生者服食，致成废笃而丧厥躯，不知若干人矣。”（校，点本第一册，第 526 页）李时珍批判了久服水银长生的说法，指控了它在历史上造成的社会危害。但是他并不否认水银的医药价值。他

说：“水银，但不可服食耳。而其治病之功，不可掩也。同黑铅结砂，则坠镇痰涎；同硫磺结砂，则拯救危病。此乃应变之兵，在用者能得其肯綮而执其枢机焉。”（《本草纲目》校点本第一册，第526页）

（三）批判服芫花长生之说

芫花，是气味辛温，“有小毒”的草本药物，李当之说它：“有大毒，久服令人泄。”其毒可以杀鱼，故又名“毒鱼”。唐慎微修本草时，采用《三国志》上的记载，说“魏初平中。有青牛先生，常服芫花，年百岁余，常如五六十人”。李时珍批评说：“芫花，乃下品毒物，岂堪久服？此方土迂怪之言，不足信也。”（校点本第二册，第1215页）

（四）批判饮茶轻身换骨之说

茶，本是人们常用的解渴提神之物。陶隐居《杂录》说丹豆子、黄山君，“服茶轻身换骨”，壶公《食忌》说，“苦茶久服羽化”。李时珍在《茗·发明》中写道：“茶苦而寒，阴中之阴，沉也，降也，最能降火。”“若虚寒及血弱之人，饮之既久，则脾胃恶寒，元气暗损。”说久服可轻身，可羽化，“皆方士谬言误世者也”。（校点本第三册，第1872—1873页）

（五）批判服黄连长生说

黄连，是一种降火燥湿的良药，医家常用之。道士们把它说得神奇，妄称久服黄连可以长生不死。不少人盲目服用。反遭短命之灾。李时珍批判道：

《本经》、《别录》并无黄连久服长生之说。惟陶弘景言道万久服长生。《神传仙》载封君达、黑穴公并服黄连五十年得仙。窃谓：黄连，大苦大寒之药，用之降火燥湿，中病即当止。岂可久服，使肃杂之令常行，而伐其生发冲和之气乎？《素问》载歧伯言，五味入胃，各归其所喜攻，久而增气，物化之常也。气增而久，夭之由也。

——校点本第二册，第773页

李时珍指明，久服黄连，不但不能长生，反将迫害。因为久降肃手之令，物极必反，必伤人身冲和之气，违反用药的原则，是生命夭折之根由。所以他说：“陶氏道书之说。皆谬谈也。”（同上）

（六）批判服杏仁长主不死说

杏仁，可以消积化秽，医家常用。道教方士把它说得神乎其神，称道教首领左慈有秘传仙方，名杏金丹，吃了长生不死。辽说左慈讲过，“方出浑皇子，服之长生不死，夏姬服之，寿七百年，乃仙去也”。李时珍批判道：“杏仁，性热降气，并非久服之药。此特其咀嚼吞纳津液，以消积秽则可尔。占有服杏丹法，云是左慈方。唐慎微收入本草，云久服寿至千岁，其说妄诞可鄙。今删其纵谬之辞，存之于下，使读者毋信其诞也。”（校点本第三册，第1731页）

（七）批判久服龙胆轻身之说

龙胆，是一种草本药物，“叶如龙葵，味苦如胆”，故名龙胆。味苦、大寒，无毒。本经和别录都说它“服轻身”。李时珍批评说，“相火寄在肝胆，有泻无补，故龙胆之益胆气，正以其能泻肝胆之邪热也。但大苦大寒，过服恐伤胃中生发之气，反助火邪，亦久服黄连反从火化之义。《别录》久服轻身之说，恐不足信。”（校点本第二册，第816页）

（八）关于服玉屑长主说

玉屑，有防腐的功效。道士们宣扬它“服之长生”。长生不得，死后又随尸葬玉，以求不朽。求玉者盗墓，反而暴尸山野。道士谎言危害是多方面的。李时珍揭露这种谬论说：“汉武帝取金茎露和玉屑服，云可长生，即此物（指玉屑）也。但玉亦未必能使生者不死，惟死者不朽耳。养尸盗墓，反成暴弃。曷若速朽归虚之见理哉！”（校点本第一册，第501页）

（九）批判吞蝙蝠长生的奇谈

蝙蝠，本是一种常见的动物。因其能长期潜伏岩穴，不食不动，生命较长，葛洪就说服它可以长生不死。不少人因而受害，李时珍对这位金丹道教的祖师，进行了无情的挹代。《本草纲目》中写道：“（蝙蝠）《仙经》以为千岁，服之令人不死者，乃方士谎言也。陶氏、苏氏从而信之，迂矣。按李石《续博物志》云：庸陈子贞得白蝙蝠，大如鸦，服之，一夕大泄而死。又宋刘亮得白蝙蝠、白蟾蜍综合仙丹，服之立死。呜呼？书此足以破惑矣。其说始载于《抱朴子》书，葛洪误世之罪，通乎天下。”（校点本第四册，第2636页）

（十）关于服用五加近老还童说

五加，是木本药物。其根与皮，味辛温无毒，服之补中益气，明目，补五劳七伤。仙家把它说得很神奇，说青精入其茎，白气入其节，赤气入其花，玄精入其根，黄烟入其皮，“五神镇生，转相育成。饵之者真仙，服之者反婴”。李时珍不同意久服“真仙”、“反婴”之说，却正确地分析其合理成分。指出：“五加，治风湿痿痹，壮筋骨，其功良深，仙家所述，虽若过情，盖奖辞多溢，亦常理尔。”加木瓜煮酒服，“能去风湿，壮筋骨，顺气化痰，添精补髓。久服延年益寿。”（校点本第三册，第2110页）科学地论述五加的功效，又同仙家溢美之辞划清界限，这是李时珍在批判方家谬说时所持的实事求是态度。

李时珍对于道教所宣扬的种种长生观及长生不死之药，逐一地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开导人们不应相信道士们的谎言。他认为维持人的生命、只能靠水谷，人生的血气，都是水谷入胃造化而成的。“人之水谷入于胃，受中焦湿热熏蒸，游移精气，日化为红，散布藏府经络，是谓营血。此造化自然之微妙也”。（校点本第三册，第1547页）因此，人想延年益寿，最要紧的是注意饮食，善于调养水谷。李时珍竭力反对长生不死之说。但他认为，

只要善于发挥人的积极性，不仅疾病可以防治，生命也是可以延长的。他从医疗实践中，总结出延长生命的秘诀，正确地阐明人类的正常生活规律。基本之点在于调和五味，加强营养，通畅血气。他说：“夫阴之所生，本在五味；阴之五官，伤在五味。谨和五味，脏腑以通，血气以流，骨正筋柔，腠理以密，可以长久。”（校点本第三册，第1571页）这是李时珍在同道教鼓吹的长生久视之术进行斗争中，总结出来的科学卫生原则，乃医学的真言，卫生的要诀。

三、戳穿“羽化登仙”的骗术

方士们鼓动人们在活着的时候，通过宗教手段，修炼自身，以求肉体永存，羽化登仙。李时珍以医药科学为武器。无情地戳穿方士们宣扬的服用金丹妙药可以成仙的骗局。

（一）批判“银化水服，可成地仙”之说

银是人们常见、常用的一种金属，生银气味辛寒无毒。李时珍说它“服之明目镇心，安神定志”。可治小儿诸热丹毒。葛洪《抱朴子》却说“银化水服，可成地仙”。李时珍批评道：“银无毒，其毒则诸物之毒也。今人用银器饮食，遇毒则变黑；中毒死者，亦以银物试探之，则银之无毒可证矣。其人药，亦是平肝镇怯之义。……《抱朴子》言银化水服，可成地仙者。亦方士谬言也，不足信。”（校点本第一册，第463页）

（二）戳穿服丹砂成仙的骗术

丹砂即朱砂，是红色硫化汞。方士们讲炼丹，说服丹砂可成仙。李时珍戳穿他们的骗术，指出久服丹砂反有丧生的危害。他写道：“（抱朴子）言丹砂化为圣金，服之升仙。《别录》陈藏器亦言久服神仙。其说盖自秦皇、汉武时方士流传而来。岂知血肉之躯，水谷为赖，何能堪此金石重坠之物久在肠胃乎？求生而丧生，可谓愚也矣。”（《本草纲目》第461页）

（三）戳穿服灵芝成仙的骗术

方士们鼓吹灵芝为“不死之草”，食之可以成仙。李时珍根据大量调查资料，分析了芝的品类，考察其产生的原因，驳斥了服芝成仙的谎言。他说：“芝类甚多，亦有花实者。……有五色龙芝、五方芝、天芝、地芝、人芝、山芝、土芝、石芝、金芝、小芝……，名状不一。张华《博物志》云：名山生神芝，不死之草。……时珍尝疑，芝乃腐朽余气所生，正如人生瘤赘。而古今皆以为瑞草，又云食之可仙，诚为迂谬。”（校点本第三册，第1711页）石芝，是芝类的一种，《抱朴子》中有神奇的描写，说石芝不易见，要“久斋至精，佩老子人山灵宝符，乃得见”。采时，先要以“开山卻符”置其上，使不得“化去”。再“择吉日设醮”，才能采摘。“得石芝，捣三万六千杵，服方七七，日三。尽一斤则得千岁，十斤则万岁。”李时珍认为石芝并不神奇。他说：“神仙之说，渺茫不知有无。然其所述之物，则非无也。贵州普定分司署有假山，山间有树，根于枝条皆石，此乃石桂芝也。”（校点本第一册，第577页）

（四）关于服松脂成仙之说

《抱朴子》记载一故事。上党赵瞿病癩多年，垂死，家人将他放人一山穴。有一仙人见而怜之，给他一袋松脂。瞿服之百余日，其疮都愈，乃归家长期服用，身体转轻，气力百倍，登山涉险，终日不困。年百岁余，齿不落，发不白。后人抱犊山成地仙。李时珍转记这一故事，明知其说荒诞，但仍分析松脂的药用价值。他说：松脂。“气味苦，甘，温，无毒”。“松叶、松实，服饵所须，松节、松心，耐久不朽。松脂则又树之津液精华也。在土不朽，流脂日久，变为琥珀，宜其可以辟谷延龄。”（校点本第三册，第1918页）

（五）戳穿服泽泻轻身之说

《神农本草经》列泽泻为上品，说它“久服轻身，面生光，能行水上”。《典木》也说：“泽泻久服令人身轻，日行五百里。走水上”李时珍说：“泽泻，行水泻肾，久服切不可，安有此神功耶？”他对泻泽的功效，作了分析：“泽泻，气平，味甘而淡。淡能渗泄，气味俱薄，所以利水而泄下。脾胃有湿热，则头重而目昏耳鸣。泽泻渗去其湿，则热亦随去，而上气得令，清气上行，天气明爽，故泽泻有养五藏，益气力。治头旋，聪明耳目之功。若久服，则降令太过，清气上升，真阳潜耗。”（校点本第二册，第1350页）

（六）驳吞衣鱼致仙之说

衣鱼，是损害衣帛、书画的蠹虫。呈黄色，老而有白粉，碎之如银。形似鱼，故又名蠹鱼。方士传说衣鱼入道经中，食神仙字，则身有五色，“人得吞之，可致神仙”。段成式《西阳杂俎》说，衣鱼三食神仙字，则化为“脉望”，细如长发，长四、五寸。“夜持向天，可以坠星、求丹”。李时珍说，“衣鱼乃太阳经药”，主治小儿中风强项，目翳口喎，小便不通。“古方盛用，而今人罕知。”所谓“脉望求丹”，吞衣鱼致仙之说，“大抵谬妄，宜辨正之。”（校点本第四册，第2319—2320页）

（七）驳斥服朴硝轻身神仙之说

朴硝，是一种苦寒药物，有治肠胃实热积滞之效。《神农本草经》说，“炼饵服之，轻身神仙”。李时珍认为，这决非药物学家的观点，乃方士之言。他驳斥了这种谬论，并详细阐明它的正确用法。说：“《神农本草》言朴硝炼饵服之。轻身神仙。盖方士窜人之言。后人因制为玄明粉，煅炼多遍，佐以甘草，去其咸寒之毒，遇有三焦肠胃实热积滞，少年气壮者量与服之，亦有速效；若脾胃虚冷，乃阴虚火动者服之，足速其咎矣。”（校点本第一册，第649页）

伟大的药物学家李时珍，对方士们久服丹药可以成仙的种种谬论，不只是简单地指出其荒谬，更以医学、药物学知识，仔细进行分析。一般说来，方士们认为久服可以成仙的灵药，如丹砂、灵芝、松脂、泽泻、朴硝等，治某些疾病有一定特效，方士利用宗教思想，故意夸大这些药物的效用，说得神乎其神。过去的本草学家，受宗教思想的影响，不作科学分析，公然也将

这些方士言论写入本草著作，以讹传讹。李时珍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以科学家的立场，对所涉及的药物，深入地研究它们的具体效用及其正确使用方法。既批判了宗教神学的谬论，又丰富和发展了药物学知识。

四、驳斥“辟邪”、“禁忌”诸胡说

方士们为了欺世惑民，骗取钱财，常散布许多奇谈怪论，或传“辟邪”妙法，或指“禁忌”诸物，令人疑神疑鬼，去求神消灾赐福。其中药物禁忌之说，对防治疾病妨碍极大。它使人们误信鬼话，增强有神观念，当服之药不服，可种的药材不种，把某些普通药物说得神怪莫测。李时珍从医药科学立场，对方士们宣传的禁忌诸物，秘传妙诀，予以有力驳斥，批判其封建迷信思想，宣传了无神论。

（一）驳斥“养白鸡能辟邪”的妖言

白鸡、白犬，乃城乡常见动物，本不稀罕。道士们故弄玄虚，说什么养白鸡、白犬可以“辟邪”。祈神消灾，一律用白鸡为祭品。李时珍批判道：“陶弘景《真浩》云：学道山中，宜养白鸡白犬，可以辟邪。今术家祈禳，皆用白鸡，其原本此。是乃异端一说耳。鸡亦何仙何妖哉！”（校点本第四册，第2585页）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了白雄鸡肉的药用价值，能“安五脏，伤中消渴，调中除邪，利小便、去丹毒”。（同上）

（二）驳斥“种决明生跛子”的禁忌

决明，是可以人工种植的药用植物。方士散布谎言，胡说谁家种了决明，就要出跛子，阻碍这一药物的生产。李时珍批判说：“刘绩《菲雪录》云，人家不可种决明，生子多跛。此迂儒误听之说也，不可信。”（校点本第二册，第1057页）

《本草纲目》记还了决明的产地，以及种置的季节。对于它的药用功效，在《决明》中作了正确阐述：“《相感志》言，圃中种决明，蛇不敢入。”“马蹄决明，苗、角皆韧而苦，不宜于食。纵食之，有利五脏明目之功，何遂至于患风耶？”（校点本第二册，第1075页）

（三）辟带铜剑可避水神之说

《抱朴子》言，铜有牝牡。在火中尚赤时，令童男童女以水灌之，铜自分为两段，凸起者牡也，凹下者牝也。“以牝为雌剑，以牡为雄剑，带之人江湖，则蛟龙水神皆畏避也。”（校点本第一册，第465页）李时珍认为铜剑辟邪谬说，勿庸深驳。他充分分析了赤铜的药用价值，肯定它可“明目，治风眼，接骨焊齿，疗女人血气及心痛”。并集有治腋下狐臭的验方。

（四）驳斥“服麻勃能先知”的谬论

麻勃，即大麻的花，温辛无毒。正确服用，有使人恢复记忆力之效。方士神化其功用，陶弘景载人药药物学著作，说：“合人参服之，逆知未来事。”李时珍澄清道：“按范汪方有治健忘方：七月七日收麻勃一斤，人参三两，为末，蒸令气遍。每临卧，服一刀圭，能尽知四方事。此乃治健忘，服之能记四方事也。陶云逆知未来，过言矣。”（校点本第三册，第1445页）李时珍并不否认麻勃有治健忘的功效，道士陶弘景说它服之“逆知未来事”，有意加以神化是不可信的。

（五）驳斥“食雉肉成遁尸”之说

雉，即野鸡，其肉乃常用野味。方士书中谬称丙午日不可食雉肉，否则成遁尸。著名医药家陶弘景、孙思邈却附和这种说法，并写入自己的著作中。李时珍批判道：“有鄙人者。假黄帝为书，谓丙午交不可食（雉肉），乃成遁尸之说，乃不经谬谈。而陶氏和之，孙氏取之，皆误矣，今正其误。”（校点本第四册，第2615页）

（六）戳穿榔梅是“仙果”的鬼话

榔梅，是一种野生山果，产于武当山，树干似榔榆木，果实似梅子。武当山道士将它蜜制后，进贡给皇帝，说是“仙果”，吃了长生不老。还编造神话，说这是真武大帝在武当山修炼时，将梅枝插在榆木上嫁接成的。当地官府下令，禁止百姓采摘。李时珍不顾禁令，冒险采来进行研究，揭穿其中秘密。他说，榔梅之实，“气味甘，酸、平、无毒”。主治“生津止渴，清神下气，消酒”，并无别的功效。（校点本第三册，第1740页）

以上表明，李时珍对方士们散布的种种奇谈怪论，力图从医药学角度作有力驳斥。同时，也不放过机会对“辟邪”妙法、“先知”神药作认真研究。化腐朽为神奇，发现其中的合理因素。不过，《本草纲目》一书，不是没有缺点的。正如王充自评其《论衡》说：“丰草多落英，茂林多枯枝。……大羹必有淡味，至宝必有瑕秽，大简必有不好，良工必有不巧。”（《论衡·自纪篇》）《本草纲目》就残存着：悬古镜、古剑可“辟邪”；“寡妇床头土”可治耳上月割疮；“天子藉田梨下土”，主治惊悸癫邪；鼻上生疮，私用“孝子衫”拭之即愈等谬说。这的确是“至宝”中的“瑕秽”。一部古代的科学巨著，不可能尽善尽美。小小的“瑕秽”，决不能损害《本草纲目》这一“至宝”的光辉。伟大的科学家也是生活在为世俗偏见所包围的环境中，有些传统偏见，不容易一下子摆脱干净。对某些荒唐说法，李时珍未加批判，无异于默认。这种现象，恐怕属于李时珍受世俗偏见影响而留下的斑痕，我们不可苛求于古人。

五、揭开“仙方”、“神药”的秘密

方士、道人编造了许多“仙方”、“神药”大显特效的故事。李时珍从各种著作中，摘录了有关仙方、神药的说法，——加以科学分析。不是简单地否认“仙方”存在，而力图从医药学上以合理解释，揭开其中的奥秘。使某些“仙方”、“神药”还原为民间验方，著之于书，广为传布。

（一）揭开“仙官赐方治久痢”的秘密

洪迈《夷坚志》中有个故事。虞允文患痢，久治无效。一夜做了一个梦，到某地，一仙官延他入座，示以壁上写着的治痢秘诀。他醒后依方服用，痢果痊愈。这仙官秘诀是：“暑毒在脾，湿气连脚，不泄则痢，不痢则疟。独炼雄黄，蒸饼合药；别作治疗，医家大错。”（校点本第三册，第1573页）李时珍认为，雄黄有治痢手毒功效，“方士乃炼制服饵，神异其说”罢了。此验方是将雄黄水飞九度，用竹筒盛，再蒸七次，然后研为末，蒸成饼，分成丸如梧子大，每日用甘草汤服”。

（二）揭开“甘露汤疗痼疾”的秘密

《澹寮方》中有个故事。常熟一富人病反胃，往京口甘露寺求神。泊舟岸下，梦一僧持汤一杯与之，饮罢便觉胸快。次早入寺，供汤者果如梦中所见僧。所赐汤即“甘露汤”。李时珍据《澹寮方》研究，甘露汤并非贵重药物，它是用六两^ㄟ糟（即农家用糯米、秫、黍、麦，熬煎^ㄟ、饴所余之糟粕晒干者），四两生姜，同捣作饼，焙干。加入炙甘草末二两和盐少许，煎成汤液。李时珍亲自试用，果有良效。他分析此“仙方”的药理说：“^ㄟ以蘖成，暖而消导，故其糟能化滞缓中，养脾止吐也。”（校点本第三册，第1570页）

（三）剖析朱衣人赐方治骨哽

洪迈《夷坚志》记有病人梦中得药治病的故事。鄱阳汪友良，误吞一骨，哽于喉中，百计不下。恍惚梦一朱衣人，告诉他取蓬砂可治。于是取一块含化咽下，脱然而失。李时珍对古人从梦中得来的验方，加以研究，肯定了蓬砂（一名硼砂）有“除噎膈反胃、积块结瘀肉、阴痿骨哽”等功能，透过神奇的故事，剥取其合理内容，发展药物学知识。朱衣人赐方之说，无非是方士们故神其说，剥开迷惑人的外衣，蓬砂消瘀的特效即可发现。

（四）揭开“观音授方止惊狂”的秘密

《夷坚志》记有另一个神奇故事。“秀川进士陆迎，忽得吐血不止，气蹶惊颤，狂躁直视，至深夜，投户而出。如是两夕，遍用方药不疗。夜梦观音授一方，但服一料，永除病根。梦觉记之，如方治药，其病果愈。”《本草纲目》转载了这一仙方：“用益智子仁一两，生硃砂二钱，青桔皮五钱。麝香一钱，碾为细末，每服一钱，空心，灯芯汤下。”（校点本第二册，第872页）李时珍更进一步研究了益智子的种种功效，发现了一些独到的用法。

（五）对“返生神药”持保留态度

《博物志》说，汉武帝时，月氏国人贡三枚“返魂香”。此药“大如燕卵，黑如桑椹”。时长安大疫，烧一枚辟之，“宫中病者，闻之即起。香闻百里，数日不歇。疫未死三日者，熏之皆活”。时人称此香为“返生神药”。

李时珍对此药奇效持保留态度。他说：“此说虽涉诡怪，然理外之事，容或有之，未可便指为谬也。”（校点本第三册，第1974页）表明这位科学家对任何事物，一方面持科学怀疑态度，不加轻信；另一方面又十分慎重，对自己尚不了解的东西，不轻易指为荒谬。

（六）关于“胡王使者”治风病

李时珍认为占书上记载的一些验方、传说虽近神怪，内容则不可忽视。他在《独话·发明》中引用了一个故事。唐朝刘师贞兄病风，梦一神人曰：取胡王使者浸酒服便愈。师贞兄遍访，皆不知此药。后来又得一梦，其母告之曰：胡王使者即羌活也，求而用之，病果然痊愈。李时珍根据这一记载。证之以实践经验，对羌活的功效作出新的论断说：“羌活、独活皆能逐风、胜湿，透关利节，但气有刚柔不同尔。《素问》云：从上下者，引而去之。二味苦辛而温，味之薄者，阴中之阳，故能引气上升，通达周身，而散风湿。”（校点本第二册，第794页）

（七）详记“辟谷仙方”的苦心

道士们根据《抱朴子·杂应篇》，传播所谓“辟谷术”。其法是先作美食。极饱，然后服药，延缓食物消化，可做到长期不进食而能维持生命，终至成仙，李时珍反对这种愚蠢野蛮的“辟谷术”。但他对王桢《农书》所载的“辟谷仙方”比较重视。《本草纲目》详加转载。其方是：“用大豆五斛淘净，蒸三遍去皮。用大麻了三斗，浸一宿，亦蒸三遍，今口开取仁。各捣为末。和捣，作团如拳大，入甑内蒸，然后晒干为末，干服之，以饱为度。则食一顿而七日不饥。”李时珍之所以重视它，是因他同意王桢的看法：“水旱虫荒，国有、代有，甚至怀金立鹄，易子炊骸。为民父母者，不可不知此法也。”（校点本第三册，第1502页）李时珍将此方记下供非常时期参考。别具苦心，同道教宣扬“辟谷”求长生，大有区别。

李时珍对神仙方士宣扬的长生不死药、羽化登仙术、辟邪辟谷方及其他奇谈怪论，莫不根据医学、药理学原理，予以深入地批判，指出其荒谬性；同时，细心剥除其神秘主义外壳，而摘取其中合理的颗粒，力图在反对宗教神学、迷信方术斗争中，发展医药科学。这种同宗教神学、神仙方术作斗争的科学态度，对于我们今天反对封建迷信的斗争，仍有借鉴的作用。李时珍所以能如此，在于他本身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善于运用手中掌握的科学武器，以他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朴素的辩证法哲学思想作指导。可贵的是，他在反对道教神学思想及神仙方术的斗争中，发展了祖国的医药科学，也对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无神论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李时珍是一位伟大的医学家、药物学家，也不愧是一位唯物主义无神论者，值得我们永远纪念。

第十三章 李时珍在 国内外的影响

李时珍这位卓越的科学家，学识渊博，著述宏富，在中国和世界文化史上有着多方面影响，受到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崇敬。

新中国建立后，广大人民怀念李时珍。李时珍墓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再修葺。陵园内有李时珍塑像，有“医中之圣”（郭沫若题）的巨大牌坊。李时珍文物陈列馆陈列着反映李时珍生平事迹的大量文物图表、

《本草纲目》珍本与药物标本。中国邮政部门发行了李时珍纪念邮票。1983年，在李时珍的家乡湖北省蕲春县召开了纪念李时珍逝世390周年的全国性学术讨论会。蕲春县城里耸立着纪念李时珍的现代建筑“濒湖会堂”和“东劈楼”宾馆。

李时珍以其杰出科学成就，长期饮誉世界，为东西方学者所尊崇。1951年，世界和平理事会维也纳会议上，一致通过决议，尊崇李时珍为世界文化名人之一，世界和平人民将永恒纪念。

一、对祖国医药学的深远影响

李时珍的本草学思想，在国内流芳百代。《本草纲目》自1596年问世以来，390多年间，世代相传，一再刻印，共有60多种版本。明代版本7种，清代版本40多种，辛亥革命至今印本10种。其中多数为木刻本，少数是石印本和铅字排印本，还有《四库全书》缮写本，大致10年左右就有一种新印本问世，印数无法确记。

根据医学史家分析，在60多个印本中，基本上存在四种底本，有珍本、善本，也有质量欠佳者。简介如下。

金陵本——《本草纲目》初刻本，1596年根据李时珍手稿刻印于金陵。印成于李时珍逝世后三年，书中只增加了当时知名学者王世贞写的序言1篇，附药图2卷，1109幅。此外别无附录。此书印成后，时珍次子李建元写了《进本草纲目疏》，连同此本进呈明神宗朱翊钧。神宗将书“留览”，他是封建帝王中第一个见到此书的人。

此本刻印精良，错、脱字较少，被后世各版奉为祖本，是为现藏珍本。目前发现，世界共存7部：中国2部，在北京中医研究院、上海科技出版社；日本3部，分别为伊藤笃太郎博士、京都植物园大森文库、年阁文库所珍藏；美国1部，藏美国国会图书馆；法国1部，藏皇家图书馆。

江西本——第一次重刊本，1603年刊于江西。据金陵本翻刻，略有误、脱，与原版出入不大。可贵的是前有御史夏良心序、按察使张鼎思序，李建元《进本草纲目疏》；书后附刻有李时珍《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药图亦同金陵本。是为善本，明末清初多据以翻刻。

杭州本——又名武林钱衙本。1640年据江西本翻刻，沿袭其误脱之处，又增少量误订误刻，体例亦有改动，变动药图800幅，共有图1110幅，部分药图失真。清代中叶多据此翻刻，流传较广，是较好刊本。附刊的医书增加蔡烈先《本草万方针线》。

味古斋本——1885年合肥张绍棠刊印。据以江西本为蓝本的张朝璘本翻刻。刻工精细，但脱误甚多，很多校文误入正文，少数条目补入了后代医书的内容。有学者统计篡改原书1600余处。将原本370幅药图改换成清代学者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中的图，又另加新图。药图已达1122幅。附刻医书又增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此本大失原书风貌，学者多有非议。由于刻工精细，为清末以来各版的底本。建国以来，我国共出版《本草纲目》三

种，商务印书馆铅印本，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都属于味古斋本。1975—1980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刘衡如校点本是以江西本为底本，参照金陵珍本和其他多种古籍校点排印的。

《本草纲目》在我国药学史上影响深远。明中叶以后，医药界研究本草学的风气大为盛行，写成许多本草学专著，是受其影响的结果，其重要著作有下列诸种：

缪希雍《炮制大全》（1622）、林起龙《本草纲目必读》（1667），王翎《东皋握灵本草》（1683）、王游《药性纂要》（1694），汪昂《本草备要》（1694），严洁等撰《得配本草》（1761），特别是赵学敏（1719—1805）的《本草纲目拾遗》（1658）对《本草纲目》有重要补充和发展，吴其濬（1789—1847）的《植物名实图考》（1848），以《本草纲目》所列植物药为基础，参考文献800余种，收载植物1714种，均附图，分12类。对植物的品种、名称、形态、性味、药用价值和主要产地都有详细记述，所载植物比《本草纲目》多500余种，成为我国当时最完善的植物学专著，为本草学研究打下了更好的科学基础。此书流传日本等国，具有世界文化影响。法国科学家依布来斯耐德在所著《中国植物学文献评论》（1870）中对此书评价很高，认为其绘图之精审，“往往可赖以鉴定科和目”。

《本草纲目》的出现，把中国本草学研究推向一个新水平，既重视气味厚薄、升降沉浮、药性归经等基本药理的研究；又重视对药物的名实考订、栽培、采制、临证运用等实践经验的总结。本草学日臻科学化而成为更加成熟的独立科学。此书对中国古代植物学、动物学和农学的研究与发展，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李时珍的医学贡献，无论脉学、医理、方剂学在历史上影响都很深远。

他在医学上最突出的成就在脉学方面。《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脉诀考证》等著作，对脉学的发展有划时代贡献。《濒湖脉学》以歌诀形式阐述科学内容，易懂易记，便于初学，取代了流行的《脉诀》而成为脉学基本教材，正如《四库全书提要》指出的，《濒湖脉学》问世，“《脉诀》遂废”。《奇经八脉考》发明奇经之要义，阐述奇经八脉同十二经脉的关系，发前人所未发，有承先启后之功。

关于医理。《本草纲目》中大量医案、医话，阐述了李时珍的独到医学见解。关于三焦、命门学说的论述，尤有显微阐幽之功，对清代医学家赵献可、张景岳等影响至深。赵献可《医贯》一书，以肾间命门学说为纲，凡病机、诊治、方药，无不依命门学说立论。张景岳《类经附翼》中《三焦包络命门辩》、《大宝论》等篇，极力强调三焦、命门学说的重要性。称命门“为水火之府，为阴阳之宅，为精气之海，为生死之窦”；称三焦为“五脏六腑之总司”。这都看出他们是李时珍的三焦、命门学说的直接继承发扬者。

李时珍对方剂学的发展，尤有巨大历史功绩。《本草纲目》保存的1万多附方，启发后代医家从不同角度研究方药，促成清代掀起研究方剂学的新高潮。汪昂的《医方集解》（1682）和《汤头歌诀》（1694年）、吴仪洛的《成方切用》（1761）、徐大椿的《兰台轨范》（1764年）、赵学敏的《串雅》内外篇（1759年）等，还有检索性方剂著作《本草万方针线》（1712）、《本草类方》（1735）、《本草纲目万方类聚》（1800）等，都是在《本草纲目》影响下编撰的。

李时珍对祖国医学、药学发展的划时代贡献，为世代人民所景仰。中国

人民尊称他为“医中之圣”，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二、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光荣地位

李时珍不只是中国的著名科学家，他的著作和思想影响世界，成为世界公认的杰出科学家、思想家。其科学巨著《本草纲目》，无论在东方和西方各国都有广泛传播。

据潘吉星考察，《本草纲目》在国外已有四种外文译本，日文全译本，英、法、德语三种节译本。此书在东西方医药界、生物学界、文化界都有良好影响。

（一）在东方，《本草纲目》被视为药物学宝典

《本草纲目》最早流传到日本、朝鲜、越南、印度等国家，由于这些国家受中国医学药学影响较大，《本草纲目》是被作为医药书籍流传、翻印、翻译、学习的。学习研究者所注重的尾本书关于医药理论、药物识别、种植、采制、临证运用等方面的价值。对日本、朝鲜医药学的发展有着直接影响。

在日本，《本草纲目》出版不到20年，就已受到朝野一致重视。日本庆氏十二年（1607），学者林罗山（林道春）从长崎得《本草纲目》（可能是江西本），将其献与幕府首脑德川家康。幕府首脑得此书后，异常宝贵，常置幕府座右备查，日人称之为“神君御前本”。后来，日本医药家曲直濑玄朔（号东井）义得《本草纲目》金陵版珍本，1875年由井口直树呈交日本明治政府，至今藏日本内阁文库。

《本草纲目》原本传入日本后，日本学者可以直接阅读，勿须翻译，故早在宽水十四年（1637）就开始翻刻。明末清初七、八十年间，翻刻此书的次数，甚至超过了中国，同时还多次从中同进口新刻本。日本译本的出现，是在1699年，由冈本为竹节译的《图画和语 本草纲目》（称和刻本）。全译本《头注国译本草纲目》，是用现代日语译成的，出版于1934年。

《本草纲目》在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8）受到广泛的学习和研究。200多年间，掀起过研究热潮，形成过不同的本草学派，出现了不少著名本草学专家，写成颇有科学价值的本草学专著。

京都本草学派、创始人稻生若水（稻宣义）毕生研究《本草纲目》，以它为教材教育学生。他著的《本草图卷》，乃参照《本草纲目》写成。还著有《炮炙全书》。其博物学巨著《庶物类纂》，也以《本草纲目》为重要参考书。其门人松冈玄达亦负盛名。此派学者中影响最大的是小野兰山，他是以讲授《本草纲目》闻名，而其代表作《本草纲目启蒙》，在日本曾多次修订重印。

江户本草学派、著名学者贝原笃信，曾校订和刻本《本草纲目》，他一面潜心研究《本草纲目》，一面进行实地考察，写成最有影响的本草巨著《大和本草》（即《大倭本草》）。此书被达尔文誉为“古代的日本百科全书”。此派还有著名本草学家向井元升，也受《本草纲目》科学体系的重要影响。

不难看出，江户时代，日本医药学的发展，《本草纲目》起了主导作用。当代日本科技史家矢岛拓利对此有过高度评价，他说：“《本草纲目》刊行后不到20年，就已在庆长十二年（1607）传入我国。它支配了我国江户时代

的本草、博物学界，其影响更远及至 19 世纪末叶。”

在朝鲜，《本草纲目》流传的时间，估计不会比日本晚多久。正式见于历史记载是李朝三十八年（清康熙五十一年，公元 1712 年）。自 18 世纪 20 年代以后，《本草纲目》成为朝鲜医药学家的重要参考书。引用和依据《本草纲目》的内容而编撰的朝鲜医药学著作，就有《本草精华》、《广济秘方》（李景华）、《济众新编》（康命吉）、《附方便览》（黄度渊）等，都是把《本草纲目》作为药学宝典加以研究的。19 世纪朝鲜学者徐有渠大量引用《本草纲目》中有关资料，编撰了《林园经济十六志》，这是一部关于自然经济和博物学的巨著。这说明《本草纲目》对东方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不仅受到医药学家重视，也受博物学家、经济学家重视。它已是东方文化界的共同财富。

（二）在西方，《本草纲目》被看作博物学百科全书

《本草纲目》通过西方来华传教士和驻华使馆人员传入西方，比在东方传播的时间要晚一些。它在西方学者心目中的价值，与日本、朝鲜相比有所不同。因为西方医学理论体系同中医完全不同，西方人那时对中医中药还缺乏正确认识，《本草纲目》远未作为医药学著作而受到重视。他们所感兴趣的，首先是它的矿物学和植物学方面的广博知识与资料，而在生物学方面的影响最为突出。

《本草纲目》最初引起西方重视的是它的金石部。1732 年，在华法国传教士范德蒙德从金石部摘译了有关资料，连同部分矿物标本带回法国，经过巴黎科学院院士儒瑟转交到巴黎自然史博物馆。不言而喻，这同西方殖民主义者千方百计侦察中国的自然资源这一意图有密切联系，不是从这本书的科学价值出发的。这份译稿在 19 世纪末，由法国学者整理题为《中国之石》而发表于《古今之石》一书中。

欧洲人真正重视《本单纲目》的科学价值，是法国学者、传教士巴多明、汤执中等向法国科学界介绍此书的全部内容之后开始的。其重要标志是 1735 年《中华帝国全志》的出版。这是一部全面介绍中国情况的巨著，它的第三卷题名《节录 本草纲目》。这虽是一个法文节译本，实际上是欧洲人最初所了解的《本草纲目》的概貌。其中许多知识都使欧洲人大为惊奇，开拓了他们的眼界。《全志》后来译成英文，改名《中国通史》在伦敦出版；译成德文，改名《中华帝国及华属鞑靼全志》在德国出版；还译成俄文在圣彼得堡出版。随着《全志》在欧洲的流传，《本草纲目》的内容日益为更多的欧洲学者所了解，引起了科学家们的深入研究。

最初，法国植物学家、医生勒牡萨研究了《本草纲目》，发表了著名的论文，介绍此书的科学价值，获得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后来成为法兰西学院教授。在他的带动下，欧洲人开始重视对中药学的专门研究，陆续出版了几部学术著作和论文，如勒巴日的《中国医史研究》（1813）、里佛的《中国人所用某些本草药物的说明》（论文，1826），德彪的《论中国药物学和本草学》（1865），还有巴黎药学院教授苏贝朗同驻华领事合作的《中国本草》。法国学者贝尔兹也着重研究了《本草纲目》的金石部。

《本草纲目》在英国学术界的影响，19 世纪才显露出来。英国人把它作为博物学著作来加以研究，比之医药学著作更为重视。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韩伯里在英国《药物学杂志》上发表论文介绍《本草纲目》，1862年整理为论文集出版，后来又发表了专著《药物学与植物学论文集》（1876），其后半部分是专门介绍《本草纲目》的。1871年，史密斯医生发表了《中国本草学及博物学之贡献》，显然对《本草纲目》中植物学、博物学资料的兴趣十分浓厚。

众所周知，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1809—1882）对《本草纲目》十分重视，称它是“1596年出版的中国百科全书”，其重点自然不是在医药方面。他在《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一书中，引用关于鸡的七个品种的资料和金鱼家化的资料，可见《本草纲目》中有关动物、植物的资料，对他来说更感兴趣。这是并不奇怪的。早在18世纪，瑞典植物学家林奈的朋友拉格斯特朗当他从印度获得《本草纲目》中文本后，就特地从中国采集了1000多种植物标本，提供给林奈，足见林奈的这位友人也是从植物学角度研究《本草纲目》的。林奈撰写《植物种志》（1753），开辟了生物分类学的新时期。他是否直接参考过《本草纲目》，尚待探讨。

俄国学者对《本草纲目》的研究，同样是看重其植物学和博物学价值。最早介绍李时珍及其《本草纲目》的是曾在北京俄国传道团任过职的塔塔林诺夫医学博士，他的长篇论文《中国医学》，肯定《本草纲目》的医药价值。曾任俄国驻华使馆医官、俄籍学者贝勒，是欧洲著名的《本草纲目》研究家，他的重要著作《中国植物志：中国土产及外来植物随笔》，该书的第三部分《中国古代本草学植物研究》，着重考订了《本草纲目》中的植物种名。他称赞李时珍：“不愧为中国自然科学界卓越今古之一作家。”苏联最高学府莫斯科大学的礼堂长廊上，至今还塑有李时珍的大理石雕像，这位世界著名科学家一直受到苏联人民的崇敬。

20世纪《本草纲目》日益引起美国学者的研究。先是美国米尔斯教授在朝鲜讲学期间，和朝鲜学者一起开始将它译成英文，同时收集有关标本，但未能完成。1920年他将译稿和标本交与英国伊博恩教授。伊博恩与朝鲜学者合作，译成了《本草纲目》的8—37卷、39—52卷，共44卷，并用英文作了较全面的介绍。它虽然不是全译本，却为欧美学者研究《本草纲目》提供了更大的方便，西方学者得以更全面地研究《本草纲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席文教授，是中国科技史专家，发表过许多关于中国医药史的论文，1973年曾发表《李时珍》专文，对这位中国科学家作了全面评价。美国本菲教授，是研究化学和科学史的专家，1981年在日本刊物上发表了《作为丹家中毒的解毒剂的菠菜》。所依据的资料，出自《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在欧洲和美洲有广泛的传播，英、法、德、苏、美等国许多大学和科学机构的图书馆里，都藏有它的不同版本。它对西方科学的影响，涉及医药学、矿物学、植物学、动物学、化学诸方面。令西方科学家们感到惊异的是，李时珍在16世纪的中国，完全没有接受到西方自然科学发展的信息，却能做出如此辉煌的成就，难怪著名科技史家英国李约瑟博士高度称赞李时珍的成就说：“李时珍达到了与伽里略-维萨里的科学活动所隔绝的任何科学家所不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三）《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流传国外

《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于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附刊于御使

夏良心、按察使张鼎思刊印的《本草纲目》（江西本）。此后《本草纲目》都沿袭江西刻本，致使二书得以保存，并随着《本草纲目》传至国外，在国外医学界发生影响。

公元1607年，日本长庆十二年，《本草纲目》江西本传入日本，日本学者除对《本草纲目》发生浓厚兴趣，其附录《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亦引起注意。宽永十四年（1637）《本草纲目》和刻本问世，其中即附有《奇经八脉考》；正德四年（1714）《新校正本草纲目》和刻本，附有《濒湖脉学》与《奇经八脉考》二书。当时，日本医学基本上沿袭中国医学理论体系。不难想象，李时珍的脉学著作和脉学思想，是日本医学界注意学习和研究的内容之一。

江西本《本草纲目》曾流传于英、德等国，附刻的《濒湖脉学》和《奇经八脉考》传入欧洲，亦在意料之中。西方学者对李时珍的脉学思想是否有过深入研究，目前尚未掌握更多的参考资料。《濒湖脉学》有德文译本，个别德学者对它有所研究，这是可以肯定的。《中华医学杂志》1953年第4号曾经刊载芸心《德译（濒湖脉学）小考证》一文，指出《濒湖脉学》“德文译本，系由许宝德氏所译，刊于他所著《中华医学》一书中”。该书译者许宝德氏，为德国人，1927年来华，曾任职于湖南益阳的信义医院，抗日战争爆发前后移居青岛自行开业，于1949年前回国。《濒湖脉学》这一德文译本，于1929年由莱比锡书店出版，可能是他来华前后所译。许氏不只是一般地翻译此书，显然他对脉学有所研究，因为许氏曾将书中内容同日本学者浅因所著的《和汉医学分类》中所论各脉加以比较，有所评释。

总之，李时珍对后世的影响，除了医学、药学、博物学等方面，还突出地表现在他的坚韧不拔、勇于探索的创造精神：实事求是、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救死扶伤、与人为善的高尚医德。这些方面都给人以深刻印象，树立了学习的典范。特别是他对医理、药理的精湛哲学分析，贯彻在科学方法、思维方法中的传统哲学思想，处处给人以深刻启迪。《本草纲目》是运用中国传统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思想分析解决医药实际问题的精深著作，对后世医药学发展的影响是无可估量的。在这方面，还有待深入地研究。

附录

一、李时珍传记文献

本草纲目序

[明]王世贞

纪称望龙光，知古剑；覘宝气，辨明珠。故萍实商羊，非天明莫洞。厥后博物称华，辨字称康，析宝玉称倚顿，亦仅仅晨星耳。楚蕲阳李君东壁，一日过予弇山园谒予，留饮数日。予窥其人，癯然貌也，癯然身也，津津然谈议也。真北斗以南一人。解其装，无长物，有本草纲目数十卷。谓予曰：时珍，荆楚鄙人也。幼多羸疾，质成钝椎；长耽典籍，若啖蔗飴。遂渔猎群

书，搜罗百氏。凡子史经传，声韵农圃，医卜星相，乐府诸家，稍有得处，辄著数言。古有本草一书，自炎皇及汉、梁、唐、宋，下迨国朝，注解群氏旧矣。第其中舛谬差讹遗漏不可枚数，乃敢奋编摩之志，僭纂述之权。岁历三十稔，书考八百余家，稿凡三易。复者芟之，阙者缉之，讹者绳之。旧本一千五百一十八种，今增药三百七十四种，分为一十六部，著成五十二卷。虽非集成，亦粗大备，僭名日本草纲目，愿乞一言以托不朽。予开卷细玩，每药标正名为纲，附释名为目，正始也。次以集解、辨疑、正误，详其土产形状也。次以气味、主治、附方，著其体用也。上自坟、典，下及传奇，凡有相关，靡不备采。如入金谷之园，种色守目；如登龙君之宫，宝藏悉陈；如对冰壶玉鉴，毛发可指数也。博而不繁，详而有要，综核究竟，直窥渊海。兹岂禁以医书觐哉，实性理之精微，格物之通典，帝王之秘策，臣民之重宝也，李君用心加惠何勤哉。噫！砮玉莫剖，朱紫相倾，弊也久矣。故辨专车之骨，必俟鲁儒；博支机之石，必访卖卜。予方著弇州厄言，恚博古如丹铅厄言后乏人也，何幸睹兹集哉。兹集也，藏之深山石室无当，盍锲之，以共天下后世味太玄如子云者。时万历岁庚寅春上元日，弇州山人凤洲王世贞拜撰。

进本草纲目疏

[明]李建元

湖广黄州府儒学增广生员李建元谨奏，为遵奉明例访书，进献本草以备采择事。臣伏读礼部仪制司勘合一款，恭请圣明敕儒臣开书局纂修正史，移文中外。凡名家著述，有关国家典章，及纪君臣事迹，他如天文、乐律、医术、方技诸书，但成一家名言，可以垂于方来者，即访求解送，以备采入艺文志。如已刻行者，即刷印一部送部。或其家自欲进献者，听。奉此。臣故父李时珍，原任楚府奉祠，奉敕进封文林郎、四川蓬溪知县。生平笃学，刻意纂修。曾著本草一部，甫及刻成，忽值数尽，撰有遗表，令臣代献。臣切思之：父有遗命而子不遵，何以承先志；父有遗书而子不献，何以应朝命。矧今修史之时，又值取书之会。臣不揣谫陋，不避斧钺，谨述故父遗表。臣父时珍，幼多羸疾，长成钝椎；耽嗜典籍，若啖蔗怡。考古证今，奋发编摩；苦志辨疑订误，留心纂述诸书。伏念本草一书，关系颇重；注解群氏，谬误亦多。行年三十，力肆校讎；历岁七旬，功始成就。野人炙背食芹，尚欲献之天子；微臣采珠聚玉，敢不上之明君。昔炎皇辨百谷，尝百草，而分别气味之良毒；轩辕师歧伯，遵伯高，而剖析经络之本标。遂有神农本草三卷，艺文录为医家一经。及汉末而季当之始加校修，至梁末而陶弘景益以注释。古药三百六十五种，以应重卦。唐高宗命司空李勣重修，长史苏恭表请伏定，增药一百一十四种。宋太祖命医官刘翰详校。宋仁宗再诏补注，增药一百种，召医唐慎微合为证类，修补众本草五百种。自是人皆指为全书，医则目为奥典。夷考其问，疵瑕不少。有当析而混者，如葳蕤、女萎，二物而并入一条；有当并而析者，如南星、虎掌，一物而分为二种。生姜、薯蕷，菜也而列草品；槟榔、龙眼，果也而列木部。八谷，生民之天也，不能明辨其种类；三松，日用之蔬也，罔克灼别其名称。黑豆、赤菽，大小同条；硝石、芒消，水火混注。以兰花为兰草，卷丹为百合，此寇氏衍义之舛谬；谓黄精即钩吻，旋花即山姜，乃陶氏别录之差讹。酸浆、苦耽，草菜重出。掌氏之不审；天花、

栝楼，两处图形，苏氏之欠明。五倍子，构虫窠也，而认为木实；大蘋草，田字草也。而指为浮萍。似兹之类，不可枚陈；略摘一二，以见错误。若不分类品列，何以印定群疑。臣不揣狼愚，僭肆删述，重复者芟之，遗缺者补之。如磨刀水、潦水、桑柴火、艾火、锁阳、山柰、土茯苓、番木鳖、金柑、樟脑、蝎虎、狗蝇、白蜡、水蛇、狗宝、秋虫之类，并今方所用，而古本则无；三七、地罗、九仙子、蜘蛛香、猪腰子、勾金皮之类，皆方物土苴，而稗官不载。今增新药，凡三百七十四种：类析旧本，分为一十六部。虽非集成，实亦粗备。有数名或散见各部，总标正名为纲，余各附释为目，正始也。次以集解、辨疑、正误，详其出产形状也。次以气味、主治、附方，著其体用也。上自坟典，下至传奇，凡有相关，靡不收采，虽命医书，实该物理。我太祖高皇帝首设医院，重设医学，沛仁心仁术于九有之中；世宗肃皇帝既刻医方选要，又刻卫生易简，蔼仁政仁声于率土之远。伏愿皇帝陛下体道守成，遵祖继志；当高明之正位，司考文之大权。留情民瘼，再修司命之书；特诏良臣，著成昭代之典。治身以治天下，书当与日月争光；寿国以寿万民，臣不与草木同朽。臣不胜冀望屏营之至。臣建元为此一得之愚，上干九重之览，或准行礼部转发史馆采择，或行医院重修，父子衔恩，存歿均戴。臣无任瞻天仰圣之至。

万历二十四年一月，日进呈。十八日奉圣旨：“书留览，礼部知道，钦此。”

李时珍传

[清]顾景星

李时珍，字东壁，祖某，父言闻，世孝友，以医为业。时珍生，白鹿入室，紫芝产庭，幼以神仙自命。十四补诸生，三试于乡不售。读书十年，不出户庭。博学无所弗窥，善医，即以医自居。富顺王嬖庶孽，欲废适子，会适子疾，时珍进药，日附于和气汤。王感悟，立适。楚王闻之，聘为奉祠，掌良医所事。世子暴厥，立活之。荐于朝，授太医院判。一岁归，著《本草纲目》。年七十六，预定死期，为遗表授其子建元。其略曰：臣幼苦羸疾，长成钝椎，惟耽典籍，奋切编摩，纂述诸家，心殫厘定。伏念本草一书，关系颇重，谬误实多。窃加订正，岁历三十，功始成就。自炎皇辨百谷，尝众草，分气味之良毒：轩辕师歧伯、尊伯高，剖经络之本标，爰有《神农本草》三卷，梁陶弘景益以注释，为药三百六十五；唐高宗命李勣重修，长史苏恭增一百一十四；宋太祖命刘翰详较，仁宗再绍补注，增药一百；唐慎微合为《证类》，修补诸本，自是指为全书。夷考其间，瑕疵不少。有当析而混者，葳蕤、女萎，二物并为一条；有当并而析者，南星、虎杖，一物而分为两种；生姜、薯蓣，菜也，而列草品；槟榔、龙眼，果也，而列木部；八谷，生民之天，不能辨其种类；三菘，日用之蔬，罔克其质名；黑豆、赤菽，大小同条；芒消、硝石，水火混注；兰花为兰草，卷丹为百合，寇氏《衍义》之舛谬：黄花即钩吻，旋花即山姜，陶氏《别灵》之差讹；欧浆、苦胆，草果重出，掌氏之不审；天花、栝楼，两处图形，苏氏之欠明：五倍子。构虫窠也，认为木实；大苹草，田字草也，指为浮萍，似兹之类，不可枚举。臣不揣愚鄙，僭肆删述，复者芟，阙者补，如磨刀水、潦水、桑柴火、艾火、锁阳、山柰、土茯苓、番木鳖、金柑、樟脑、蝎虎、狗蝇、白蜡、水蛇、狗宝、秋虫，今方所用，而古本无；三七、地罗、九仙子、蜘蛛香、猪腰子、勾金

皮之类，方物土苴，而稗官不载。旧一千五百一十八，今增三百七十四。分十六部。五十二卷。正名为纲，附释为目；次以集解、辨疑、正误，详其出产、气味、主治。上自坟典，下至稗记，凡有攸关，无不收掇。虽命医书，实该物理。伏愿皇帝陛下，特诏儒臣补注，成昭代之典，臣不与草木同朽。万历中，敕中外献书，建元以遗表进。命礼部誉写，分两京、各省布政刊行。晚年，自号濒湖山人，著《过所馆诗》、《医案》、《脉诀》、《五藏图论》、《三焦客难》、《命门考》、《诗话》。以子建中贵，封文林郎。

顾景星曰：余儿时闻先生轶事，孝友，饶隐德，晚从余曾大父游，读书以日出入为期，夜即端坐，其以神仙自命，岂偶然与？诗文他集失传，唯《本草纲目》行世。蒐辑百氏，采访四方，始于嘉靖壬子，终于万历戊寅，凡二十八年而书成。本附方二千九百三十五，增八千一百六十一。

赞曰：李公纷纷，乐道遗荣，下学上达，良师古人。既智且仁，道熟以成，遐以愧之，景纯通明。

李时珍列传

[清]张廷玉

李时珍，字东壁，蕲州人，好读医书。医家本草，自神农所传，止三百六十五种；梁陶弘景所增，亦如之；唐苏恭增一百一十四种，宋刘翰又增一百二十种，至掌禹锡、唐慎微辈，先后增补，合一千五百一十八种，时称大备。然品类既烦，名称多杂，或一物而析分二三，或二物而混为一品，时珍病之，乃穷搜博采，芟繁补阙，历三十年，阅书八百余家，稿三易，成书曰《本草纲目》。增药三百七十四种。厘为一十六部，合成五十二卷。首标正名为纲，余各附释为目。次以集解，详其出产形色，又次以气味、主治、附方。书成，将上之朝，时珍遽卒。未几，神宗诏修国史，购四方书籍。其子建元以父遗表及是书来献。天子嘉之，命刊行天下，自是士大夫家有其书。时珍官楚王府奉祠正，子建中四川蓬溪知县。

二、李时珍年表

(1518—1593)

公元1518年戊寅明武宗正德十三年

李时珍出生在湖广黄州府蕲州（今湖北省蕲春县蕲州镇）东门外瓦硝坝一个医生家庭。

祖父是走乡串户的乡村医生（铃医），社会地位卑微，没有留下名字。

父亲李言闻，字子郁，号月池；母亲张氏。父在乡村行医多年，医术高明，医德高尚，深受群众爱戴，后被推荐为明朝太医院史目（从九品），即皇家宫廷医生。著有《四诊发明》、《医学八脉注》、《痘疹证治》、《人参传》、《蕲艾传》等，均失传。唯《四诊发明》部分内容保存于李时珍《濒湖脉学》。

兄李果珍，不习医术，生平无可考。

李时珍字东壁，号濒湖。生活于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落时代。国家面临严重内乱和频繁外患，科学技术不受重视。他忍辱负重，刻苦钻研，写成《本草纲目》、《濒湖脉学》等著作，成为16世纪伟大的医学家和药物学家。

是年，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明武宗自称成武大将军，巡视北部边防。爆

发于 1516 年的江西农民起义军，是年失败。

佛郎机（葡萄牙）殖民者遣使来华，为中国与西欧直接海上交通之始，开西方殖民者侵华之先河。

著名哲学家王守仁（阳明）哲学著作《传习录》编成。公元 1519 年己卯明正德十四年

李时珍 2 岁。

明代统治者内部矛盾加剧，宁王朱宸濠在江西叛乱。南赣巡抚王守仁起兵讨之，很快平定叛乱。武宗以亲征为名，南下，民间大受骚扰。

公元 1520 年庚辰明正德十五年

李时珍 3 岁。

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武宗于闰八月始由南京北返。十二月到京师，赐宸濠死。

公元 1521 年辛巳明正德十六年

李时珍 4 岁，身体瘦弱，性迟钝。

明武宗死于豹房，迎世子朱厚熜于湖广安陆，即帝位，为世宗。豹房中番僧及教坊乐工悉被放逐。

公元 1522 年壬午明世宗嘉靖元年

李时珍 5 岁。

七月，湖广、江西、两浙及四川大旱，人畜死者无数。

正德末年到嘉靖初年，安徽徽州商人兴起，成为强大势力。出现“商贾既多，土田不重”的现象。

公元 1523 年癸未明嘉靖二年

李时珍 6 岁。开始读书识字。

世宗于四月在宫中建醮，祈长寿。明末炼丹求仙之风自此始。

葡萄牙人人寇广东新会，明官军战败之，缴获佛郎机大炮，始接触西方新式武器。日本使者以进贡为名，在我国互相攻杀，乘机劫掠沿海诸郡。明廷以倭患始于市舶为由，罢市舶司，停止与海外交通。

诗人、画家唐寅（1470—）卒。寅字伯虎，号文始居士，为画苑吴派代表，著有《六如居士集》。

公元 1524 年甲申明嘉靖三年

李时珍 7 岁。在塾中读书，聪明好学。

世宗定“大礼议”，以其生父兴献王为“皇考”。群臣反对。杖杀 17 人，下狱百余人。

公元 1525 年乙酉明嘉靖四年

李时珍 8 岁。

世宗颁《大礼集议》。

张居正生于湖北江陵。后为明代著名政治家。

公元 1526 年丙戌明嘉靖五年

李时珍 9 岁。

文学家、书法家祝允明（1460—）卒。允明与文徵明、唐寅、徐祯卿号“吴中四子”。

公元 1527 年丁亥明嘉靖六年

李时珍 10 岁。从塾师学“制义”（八股文）之类（科举考试科目之一）。五月，王守仁总制湖广、江西、两广军务，加紧防范民众和少数民族闹事。

李贽生于福建泉州府晋江县。后为著名思想家。

公元 1528 年戊子明嘉靖七年

李时珍 11 岁。

八月，王守仁镇压广西瑶族、壮族起义军。

十一月，王守仁（1472—）卒。守仁字伯安，号阳明，浙江余姚人，提倡唯心主义“心学”，成为明代统治思想。著有《王文成公全书》。

戚继光生于山东牟平，后为明代平倭名将。

公元 1529 年己丑明嘉靖八年

李时珍 12 岁。封建教育制度所规定的四书、古诗等教材，已基本读完，学做八股文、学写诗。

十月，蒙古贵族俺答等人寇西北边塞，开始成为明代后期重要边患。

公元 1530 年庚寅明嘉靖九年

李时珍 13 岁。父亲把入学中举、光大门庭的希望全部寄托于他。他夜以继日地刻苦学习，积极准备参加明年科试。

九月，仿制佛郎机大炮，开始研制西方新式武器。

十一月，修订孔庙祀典，尊孔子为至圣先师，力兴儒学，铃束人心。

公元 1531 年辛卯明嘉靖十年

李时珍 14 岁。由蕲州知府周训选送黄州府应科试，中秀才。这次“童试”考两门，一为“四书义”（八股文）；一为“试帖诗”。李时珍一举考中秀才，少年得志，取得进入府、州、县儒学的生员资格。

监察御使傅汉臣请求朝廷推行“一条鞭法”，为明代后期议论赋役改革的开始。“一条鞭法”将所征各项徭役、杂税统一摊入田亩，与田赋合并，折收银两。实是实物地租、徭役地租合并折为货币地租。明中叶以后，在江南及沿海地区，纺织业、印染业、造纸业、制瓷业、铸铁业、榨油业等行业，资本主义萌芽有日益兴起之势，一条鞭法的实行，对这种新的生产关系无疑有促进作用。

公元 1532 年壬辰明嘉靖十一年

李时珍 15 岁。

明朝封建统治者连年大兴土木，营造宫室。苦于采伐、运送木料的湖广、四川等地民众，同苦干烧制大砖的应天、苏、松民众，苦于采珠的广东民众，怨声四起，群起反抗。

公元 1533 年癸巳明嘉靖十二年

李时珍 16 岁。刻苦钻研四书、五经，认真练习八股文和律诗，积极准备参加明年“乡试”。

大同兵士苦于工役，发生兵变。

公元 1534 年甲午明嘉靖十三年

李时珍 17 岁。

首次赴省城武昌参加“乡试”考举人。共考三场：四书：论、判、诏、浩；经、史。未能中试，名落孙山。明代实行三级考试——乡试、会试、殿试。初级考试未通过，青年李时珍第一次遭受失败痛苦。

公元 1535 年乙未明嘉靖十四年

李时珍 18 岁。继续苦读深思，准备三年后再次应试。

闭关锁国的明朝政府，同意开辟澳门为葡萄牙商地，租银每年 2 万两。

公元 1536 年丙申明嘉靖十五年

李时珍 19 岁。为应乡试，深入钻研四书、五经，熟悉重要史籍，扩充理论、历史知识。进一步习做八股文。

明室宫廷宗教斗争激烈。是年毁宫中太善殿旧藏佛像 169 座，拆毁宫中元代所建佛殿，焚毁佛牙、佛骨，掀起小规模毁佛斗争；同时，抬高道教，重用道士邵元节为礼部尚书，为以后掀起炼丹之风埋下祸根。

严嵩于十二月继任礼部尚书，是此明末奸相发迹之始。

公元 1537 年丁酉明嘉靖十六年

李时珍 20 岁。第二次赴武昌应乡试考举人，再次落第。思想十分苦恼。是年前后，与吴氏女结婚。

御史游居敬劾王守仁。湛若水私创书院讲学，引起思想混乱。朝廷下令停止各地私创书院，进一步钳制思想。

是年，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同时发大水，湖广群众受灾尤为严重。

公元 1538 年戊戌明嘉靖十七年

李时珍 21 岁。承父命，发愤攻读经史，准备再试。寒窗苦读，身体更加虚弱，患咳嗽，转为骨蒸病，卧床月余，几乎死去。幸得父亲精心治疗，投以一味黄芩汤，转危为安。李时珍深佩中药之奥妙。

朝廷为控制矿业开发，是年派出大量太监分赴湖广、四川、云南、两广、江西、大同等地兼理矿课，由此埋下祸根，引起明末反对矿监、税吏的强大市民运动。

公元 1539 年己亥明嘉靖十八年

李时珍 22 岁。为第三次应乡试而刻苦学习。

明世宗向往长生成仙，加紧扶植道教。封曾任黄梅县吏的道士陶仲文（典真）为秉一真人。

明世宗南巡湖广安陆，湖广民众大受骚扰。

公元 1540 年庚子明嘉靖十九年

李时珍 23 岁。八月，第三次赴武昌应乡试，仍然名落孙山。通过科举而平步青云的美梦彻底破灭，心灵遭到巨大打击。得父亲同意，不再应乡试。但他多年寒窗苦读，并非徒劳，为尔后从事医学、药学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第三次乡试的失败，促成李时珍人生道路的根本转折。拜蕪州知名学者顾日岩为师。顾日岩是著名理学家，常在蕪州崇正、阳明书院讲学。李时珍前去听讲，并求他指点钻研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方法。

学者王艮（1483—）卒。王艮号心斋，泰州人，盐丁出身，王守仁的弟子，轻视封建名教，专在下层民众中传播文化，创立泰州学派，造就一批出身下层的学者。

明世宗一心服药求仙，不理朝政。以道士陶仲文为少保、礼部尚书，参与朝廷大事。

是年，在湖北钟祥县大兴土木，为世宗的生父兴献王朱祐杭（1476—1519）营造陵墓——显陵。占地 600 亩，围以朱色高墙。神道长 1300 米，两旁立文臣武将及狮、象、马、骆驼等石像。大殿两重，十分壮观。湖广人民大受苛税、劳役之苦。

公元 1541 年辛丑明嘉靖二十年

李时珍 24 岁，随父学医，同在蕪州玄妙观为群众治病，暇则刻苦研读医学著作。

贵戚武定侯郭勋，曾刻印《水浒传》，失宠，被动下狱。

公元 1542 年壬寅明嘉靖二十一年

李时珍 25 岁。随父行医，并深研医药典籍。《蕲州志》称：“益刻志读书，十年不出户，上自坟典，下及子史百家，无不该洽。”

俺答以十万骑入寇山西，掠十卫三十八州。

大高元殿（祀天神用）落成，世宗听信真人陶仲文进言，建立雷坛，析求长生，费用浩大，祸及人民。

奸臣严嵩入阁，政治愈加腐败。严嵩以善写“青词”（道教祀神之文）为世宗所赏识。世宗所作所为，深为群众不满。宫婢杨金英等谋杀世宗，未遂，遭诛。

公元 1543 年癸卯明嘉靖二十二年

李时珍 26 岁。约于此年生长子建忠。

世宗不临朝听政，专事炼丹求仙，强迫民间搜捕梅花鹿、采灵芝进献，人民受累不堪。玄妙观内设坛、炼丹，李时珍父子再不能去那里为群众治病。

公元 1544 年甲辰明嘉靖二十三年

李时珍 27 岁。一面行医，一面钻研主要医学著作。史称李时珍“读书不治经生业，独好医书”，当指此后情况。

世宗宠信奸臣严嵩，升之为史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

俺答数万骑寇边，进至完县，京师戒严。兵退之后，世宗听信道士胡言，归功于神灵保佑，加真人陶仲文秩少卿。

思想家王廷相（1474—）卒。廷相字子衡，号浚川，河南仪封人，官至左都御使，因郭勋案被牵连，三年前罢官。著有《慎言》等。

公元 1545 年乙巳明嘉靖二十四年

李时珍 28 岁。蕲州连发大水，瘟疫流行，官家不顾人民死活。李时珍父子发扬高尚医德，精心为群众治病，史称“千里就药于门，立活不取值”。

世宗昏庸至极，竟于宫中设坛求仙。上行下效，州县设坛求仙成风，社会风气日益败坏。

是年，抗击葡萄牙殖民者，明政府于宁波毁坏其船只 37 艘。

公元 1546 年丙午明嘉靖二十五年

李时珍 29 岁。其父补贡生，取得国子监生员资格，社会地位有所改变。加上医术高明，群众爱戴，地方人士刮目相看，出入于蕲州顾、郝等家豪门，较受尊敬，与郝家交谊尤深。郝家藏有大量医药典籍，李时珍常去借阅。

是年，俺答以 10 万骑寇掠延安等地。倭寇劫掠宁波、台州，焚毁官民房舍数百处。山东农民以田斌为首倡白莲教发动起义。

公元 1547 年丁未明嘉靖二十六年

李时珍 30 岁。借阅郝家所藏医药书籍。自称“行年三十，力肆校讎”，即广泛参考医药书籍，反复加以比较。积极扩充医药知识，提高医药理论，为尔后创造性研究打下更坚实的科学基础。

葡萄牙殖民者寇掠福建漳州月港。

思想家罗钦顺（1465—）卒。钦顺字允升，号整庵，江西泰和人。坚持唯物主义思想，著有《困知记》。公元 1548 年 戊申明嘉靖二十七年

李时珍 31 岁。此乃他博览群书，收获最大，提高最快的时期，对以后的研究工作具有决定意义。

因湖广、贵州苗族屡起义反抗，特设湖广、贵州、四川三省总督以镇之。

公元 1549 年己酉明嘉靖二十八年

李时珍 32 岁，大量阅读本草著作，不断发现旧本草存在许多缺点和错误，认识到《神农本草经》所载药物不多，三品分类法已不实用：《名医别录》也有不少欠妥的地方，《经史证类本草》最为完备，也已成书 400 多年，药物品种应加以充实，分类应加以改进。

是年，浙江海盗王直等与倭寇相勾结，大掠沿海。

公元 1550 年庚戌明嘉靖二十九年

李时珍 33 岁。经过十年读书，刻苦钻研医学典籍，不断提高医药理论知识水平，终于立下雄心壮志，重修本草，造福人民。

八月，俺答围困京师，焚掠外城三昼夜而去。

公元 1551 年辛亥明嘉靖三十年

李时珍 34 岁。开始重修本草的准备工作。约在此年前后，收庞宪（号鹿门，蕲州人）为徒，充当自己的助手。另一学生瞿九思（字睿夫，黄梅人）后举万历乡试。

连年边防吃紧，军费日增，财力日困，令江南诸地增加银赋，是为明末穷困人民的“加派”之始。

公元 1552 年壬子明嘉靖三十一年

李时珍 35 岁。正式编纂《本草纲目》。首先考虑按《通鉴纲目》体例重新建立分类原则。

是年，俺答犯大同，分兵犯三关、宁夏。倭寇入浙江，大掠舟山、象山。河决徐州，淤运河 40 余里。内忧外患日益严重，统治者仍荒淫无耻，选民女三百入官。

公元 1553 年癸丑明嘉靖三十二年

李时珍 36 岁。声名大震，求他治病者日众。授徒、行医，颇费精力，修订本草事，进展甚缓。

倭寇为患日烈。屡犯沿海，流窜内地三月之久，曾到上海、乍浦等地，大掠而去。

葡萄牙殖民者以海船遇难、借地晒物为由，扩展澳门租地。

公元 1554 年甲寅明嘉靖三十三年

李时珍 37 岁。为修订本草准备第一手资料，继承父亲写《蕲艾传》、《人参传》的经验，对蕲州名贵药物“蕲蛇”进行深入地实地考察，写了《花蛇传》。书已失传，部分内容保留于《本草纲目》。

世宗迷信道教益甚，迫切地祈求长生成仙，日夜斋戒祷告。

连年大饥，四方流民就食京师，死者枕籍。

公元 1555 年乙卯明嘉靖三十四年

李时珍 38 岁。因医术精湛，楚王朱英^焜聘李时珍为奉祠所的奉祠正（主管祭祀），兼管良医所事。楚王长子患暴厥症（即抽风），李时珍医治得愈。

倭寇在江苏、浙江、福建沿海大肆劫掠。杭州被围、受屠，“数十里外，血流成川”。戚继光从山东调浙江，任参军。

是年十二月，陕西、山西、河南等地同时发生强烈地震，死亡 83 万人。

公元 1556 年丙辰明嘉靖三十五年

李时珍 39 岁。在楚王府。楚王酷爱炼丹求仙，宠信道士。李时珍常与道士发生争执，无法施展精湛医术，只得去武昌蛇山观音阁为群众义务治病，向群众寻方问药，继续研究医药。

世宗求仙益急，命官吏采灵芝上贡，又派官吏到蕲州、河南等地采矿，

到处勒索群众。蕲州的白花蛇也是贵族官僚勒索之名贵药物。人民苦于捕蛇上贡，编有诉苦民谣：“白花蛇，谁叫尔能辟风邪！上司索尔急如火，州中大夫只逼我，一时不得皮肉破。积骨如巴陵，杀尔种类绝，白花不生祸始灭。”（《蕲州志》）

倭寇围困上海 17 天。鞑靼贵族以十万骑兵进犯辽东，明总兵官被杀。

抗倭名将戚继光始于浙江组织民众建立“戚家军”。

公元 1557 年丁巳明嘉靖三十六年

李时珍 40 岁。住楚王府。时往武昌观音阁与和尚攀谈，为群众治病，接近群众，询问方药，为修本草作准备。

为求长生，世宗命顺天府、广东采贡珍珠。派官员去福建、广东采龙涎香。福建、广东，时有民众起事。

葡萄牙殖民者窃据我澳门，自设官吏。

公元 1558 年戊午明嘉靖三十七年

李时珍 41 岁。是年，朝廷令地方举荐名医入太医院补缺，经楚王推荐，李时珍入北京太医院。有机会出入御药库、寿药房，见识许多珍贵药物，对重修本草有利，他和酷爱炼丹求仙的贵族们不相投，故不受重视。且淡于功名利禄，一心钻研医药学，任职一年，托病辞职。史称曾任太医院院判（正六品），不确。

公元 1559 年己未明嘉靖三十八年

李时珍 42 岁。离太医院，途经河南，返乡，沿途略作药物调查。“旋花”治筋骨疼痛的知识，即从车夫调查得来。《本草纲目》写道：“时珍自京师还，见北土车夫每载之。云暮归煎汤饮，可补损伤。则益气续筋之说，尤可证矣。”（《旋花·发明》）

文学家杨慎（1488—）卒。慎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明代第一流大学者，著述 400 余种。除诗文、戏剧、词典外，于医学、药学亦颇有研究。著有《升庵集》、《丹铅余录》等。

书画家文徵明（1470—）卒。徵明号衡山，江苏苏州人。善画山水，工行书、草书，能诗能文，与唐寅等合称吴中四才子。著有《甫田集》。

公元 1560 年庚申明嘉靖三十九年

李时珍 43 岁。居家编撰《本草纲目》。同时总结自己的医学心得，写医书、脉学著作。

福建大埔窑民，南湾水民，尤溪山民，龙岩矿工及永定等处流民纷纷暴动。御倭兵士发生哗变。福建、广东、江西边境起义军首领据寨称帝，年号造历。

学者唐顺之（1507—）卒。顺之字应德，号荆川，江苏武进人。通晓天文、数学、兵法、乐律，提倡唐宋散文，同归有光等号称“唐宋派”。著有《荆川先生文集》。

泰州学派传人何心隐入京师讲学。

公元 1561 年辛酉明嘉靖四十年

李时珍 44 岁。在雨湖北岸红花园筑新居，号**苴**所馆。新居濒临雨湖。时珍自此别号瀕湖山人。写成医学著作《瀕湖医案》、《三焦客难》、《命门考》、《五藏图论》。诸书均失传，《本草纲目》保留其部分内容。

文学名著《金瓶梅词话》约于此时由著名文学家李开先记录整理成书。

四川、福建、广东、江西等地流民、山民起事，此伏彼起。

公元 1562 年壬戌明嘉靖四十一年

李时珍 45 岁。居菑所馆，继续整理自己多年研究医学的心得。并为撰写《本草纲目》作资料准备工作。

严嵩以罪罢官，其子世藩下狱，大快人心。

倭寇猖獗，福建惨遭蹂躏，命俞大猷、戚继光为正副总兵以剿之。

山西、陕西、宁夏各处地震。江苏、浙江遭大水，死者无数。

世宗求仙更急，派官吏四处搜求方士、方书。

徐光启生。后为著名科学家，编《农政全书》。

公元 1563 年癸亥明嘉靖四十二年

李时珍 46 岁。居菑所馆。研究脉学和本草学。

鞑靼骑兵入侵河北，京师戒严。下诏增修北京外城。

戚继光败倭寇于福建。倭寇受重创。

公元 1564 年甲子明嘉靖四十三年

李时珍 47 岁。脉学专著《濒湖脉学》写成，序中自署：“嘉靖甲子上元，书于濒湖菑所。”脉学著作《奇经八脉考》、《脉诀考证》也写于此时前后。长子建中举于乡。在此以前，父亲月池公逝世。

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受困 20 多年的倭患基本平息。

公元 1565 年乙丑明嘉靖四十四年

李时珍 48 岁。不辞辛劳，外出查访药物，弟子庞宪和次子建元随行。此后三、四年间，经常在外，足迹遍于湖广、江西、安徽、江苏等地，所到之处向药工、药商、农夫、樵夫、渔翁、矿工、老妪询问各方面药物知识，亲自采摘尝试，随手记录，带回标本，为《本草纲目》收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风餐露宿，备受辛苦。

杀严嵩之子世藩。抄没严家财产，得黄金 3 万多两，白银 300 多万两，珠宝价值数百万。削严嵩为民，两年后死。国内除一大害。

黄河在沛县决口，淤塞运河航道 200 余里。首次命治河专家潘季驯总理河道。潘季驯是与李时珍同时的著名科学家。自此年至 1592 年，潘季驯曾经四次出任总理河道的职务，在治河理论与实践方面作出重要贡献。

农民领袖蔡伯贯在四川大足以白莲教聚众起兵，连破七州县，国号大唐。

公元 1566 年丙寅明嘉靖四十五年

李时珍 49 岁。继续外出，采集药用植物，解剖药用动物，绘制药物图。同时注意收集民间各种单方、验方，后来编辑为《濒湖集简方》，书已失传，其内容保存于《本草纲目》附方中。

户部主事海瑞上疏批评世宗久不视朝，专事斋醮。触怒世宗，被捕下狱论死。

十二月，世宗因服方士“长生”丹药，中毒而死（1507—）。太子朱载堉即位，为穆宗。

巡抚御使庞尚鹏在浙江试行“一条鞭法”。

浙江、江西、广东等地矿工、山民起事。

公元 1567 年丁卯明穆宗隆庆元年

李时珍 50 岁。继续外出访查药物，收集资料。

明代著名政治改革家张居正入阁，参与机要。此后，居正秉权 15 年，其中为首辅 10 年，国事稍有改良。

穆宗下令废除一切坛醮，撤除炼丹所，严惩宣扬封建迷信的方士，社会

风气为之一变。同方士进行多年斗争的李时珍扬眉吐气。

重抄《永乐大典》的工作，自 1562 年开始，至是年四月完成。

公元 1568 年戊辰明隆庆二年

李时珍 51 岁。继续外出访药。

大学士张居正向穆宗直陈核名实、饬武备等六条政纲，力求改革吏治，振兴朝政。

议论核实勋戚所占庄田。限制勋爵占田不过百亩。改订盐法。

江西巡抚刘光济请行“一条鞭法”。十二月，江西开始推行。

著名文学家李开先（1501 年生）卒。开先字伯华，号中麓，山东章丘人。有传奇《宝剑记》等，《金瓶梅词话》由他整理而成。

文学家袁宏道生（卒于 1610）。宏道字中郎，湖北公安人，兄弟三人合称“三袁”，创立“公安派。”公元 1569 年己巳明隆庆三年

李时珍 52 岁。居^世所馆。编《濒湖集简方》。撰写《本草纲目》初稿。

海瑞以右佥都御使巡抚应天，整饬吏治，刚直不阿，贪官、恶霸不敢作恶。

戚继光为总兵官，镇守东北边关，国威始振。

公元 1570 年庚午明隆庆四年

李时珍 53 岁。继续撰写《本草纲目》初稿。

文学家李攀龙（1514—）卒。攀龙字于鳞，号沧溟，山东历城人。与王世贞、李梦阳、何景明号称明代中叶“四大家”。

公元 1571 年辛未明隆庆五年

李时珍 54 岁。长子李建中任光山（今河南省）县教谕。李时珍取道麻城，横越大别山，入河南与之相见。

明朝封俺答为顺义王，名其住所为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实行互市。自此大同、宣府以西平静无事。

戚继光编成《练兵实纪》：加强边军训练。

文学家归有光（1506—）卒。有光字照甫，号震川，江苏昆山人，著《震川文集》。

潘季驯第二次主持治河，坚持“束水攻沙”主张，提倡“四防”、“二守”的护堤制度。

公元 1572 年壬申明隆庆六年

李时珍 55 岁。著成《奇经八脉考》。中秋日，友人吴哲写《题奇经八脉考》，赞云：“读濒湖李君《八脉考》，原委精详，经络贯彻，顿觉蒙开塞决，胸次豁然。”

是年十二月庚申日，李时珍同兄果珍为父母合墓葬立碑。碑石犹存。

五月，穆宗（1537—）卒。神宗朱翊钧继位。

政治家张居正任首辅，力行系统的改革措施，上《帝鉴图说》。

隆庆年间，宁国府太平县（今属安徽）已行人痘接种法，17 世纪末传入俄国、土耳其，再传入西欧。是年，尼德兰革命爆发，是为欧洲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

公元 1573 年癸酉明神宗万历元年

李时珍 56 岁。编撰《本草纲目》已进入完成初稿阶段。先后查阅了前人的药物学著作 800 多种。

张居正设立章奏考成法，整顿吏治。明神宗万历年间，中国封建社会在

政治改革家张屠正治理下，有一度好转，但为时不久。统治集团更加腐朽，土地高度集中，社会危机日益严重，不断出现农民起义、市民暴动，边境亦无宁日。

公元 1574 年甲戌明万历二年

李时珍 57 岁。居^菴所馆，反复修改《本草纲目》初稿。

王世贞任湖广按察使。

文学家钟惺生（卒于 1625）。惺字伯敬，号退谷，竟陵（今湖北天门县）人。万历进士。官至福建提学佾事。与谭元春同创“竟陵派”，反对诗文复古，提倡改良文学。著《隐秀轩集》。

文学家冯梦龙（卒于 1646）生于江苏长洲。后来编辑《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部短篇小说集。其中不少小说反映了明清之际早期市民的思想情趣。

公元 1575 年乙亥明万历三年

李时珍 58 岁。居^菴所馆。长子李建中任四川蓬溪知县，阶文林郎（正七品官）。后按封建制度规定，经儿子建中申请，朝廷敕封李时珍为文林郎、四川蓬溪知县。

是年，湖广、江西、河南、京师等地连续发生地震，黄河决口。浙东海潮涌高数丈，人畜漂没。公元 1576 年丙子明万历四年

李时珍 59 岁。居^菴所馆。此时，李时珍已有四子：建中、建元、建木、建方；四孙：树宗、树声、树勋、树本。

复修《大明会典》。

是年，耶稣会在广东澳门设立教区，从此天主教在中国开始活动。

公元 1577 年丁丑明万历五年

李时珍 60 岁。居^菴所馆，作《本草纲目》的定稿工作。刻印脉学专著《奇经八脉考》，请其老师写序。他的老师顾日岩写了《奇经八脉考·引》称许此书。序中写道：“濒湖世儒，兼以医鸣，一门父子兄弟，富有著述。”

张居正居父丧，但仍“夺情”任职，主持朝政，引起保守人物的攻击。

公元 1578 年戊寅明万历六年

李时珍 61 岁。《本草纲目》编撰完成。编写过程中“三易其稿”，历时 27 年。《本草纲目》卷一序例末段写道：“始于嘉靖壬子，终于万历戊寅，稿凡三易。分为 52 卷，列为 16 部，部各分类，类凡 60，以类为纲，以药为目。”书中共收药物 1892 种（据刘衡如校点本统计实为 1897 种），其中李时珍所增药物为 374 种。附药图 1109 幅，为次子李建元绘；附方 1096 方。它是中国医药史上的空前巨著，集 16 世纪前医药学之大成，为发扬中国文化作出光辉贡献。这一药学巨著，实际上是李时珍一家三代人辛勤劳动的成果。金陵版《本草纲目》上载有辑书姓氏：“敕封文林郎四川蓬溪知县蕲州李时珍辑。云南永昌府通判男李建中、黄州府儒学生员男李建元校正。应天府儒学生员黄申、高第同阅。太医院医士男李建方、蕲州儒学生员男李建木重订。生员孙李树宗、李材声、李树勋次卷。荆府引礼生孙李树本楷书。”又《本草纲目》附图卷上有：“阶文林郎、蓬溪知县李建中辑，府学生男李建元图，州学生孙李树宗校。”其中还包括他弟子庞宪等的功劳。《湖广通志》说：“弟子庞鹿门尝助成《本草纲目》。”

是年，神宗下诏清丈天下田亩，限三年完成。全国户数为 10621466 户，人口为 60692856 口。岁入银 355 万两，岁出银 380 万两。

潘季驯第三次总理治河工程。

公元 1579 年己卯明万历七年

李时珍 62 岁。到黄州、武昌等地联系《本草纲目》刻印之事，没有结果。只身赴南京寻求书坊，接洽刻书事宜。此后数年，常为刻书事劳神。

神宗下诏毁天下书院，共毁 64 所。

学者何心隐（1517—）遇害。心隐原姓梁，名汝元，号夫山，江西永丰人。著《原学原讲》大讲办书院讲学之益，以“妖道”罪被捕致死。

是年，潘季驯主持的巨大治河工程完工，筑堤 300 余里，费银 56 万余两。使上下千里一片汪洋的重灾区，得以恢复生产，出现多年未有的兴旺景象。

公元 1580 年庚辰明万历八年

李时珍 63 岁。留居南京，联系刻书事；并继续作药物调查工作。九月初，曾去江苏太仓弇山园访问学术界著名领袖王世贞，请他为《本草纲目》写序。王世贞曾任湖广按察使，时已罢官居家；延李时珍留居数日，相谈甚洽；欣然同意为书写序，并写诗戏赠李时珍。

是年，全国田亩清丈完毕，总计田 7013976 顷，比弘治（1488—1505）年间增加 300 万顷。“于是豪猾不得其隐，里甲免赔累，而小民无虚粮。”

意大利耶稣会教士罗明坚以重贿入居广东肇庆，建教堂传教，是耶稣会士大批来华之始，在此之前，葡萄牙人将烟草、望远镜等物，首次传入中国。

刊刻《十三经注疏》。

文学家凌濛初（卒于 1644）生于浙江吴兴。后模仿“三言”，编成“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其中有些短篇小说反映了市民思想。

公元 1581 年辛巳明万历九年

李时珍 64 岁。可能仍留南京。

是年，张居正全面推行“一条鞭法”，按实际丈量田亩，履亩征银，积极推行货币地租制，促进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

著名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意大利人）在广州穿僧衣，扮和尚，传天主教，后入南京、北京与上层知识分子结识，传播西学。

公元 1582 年壬午明万历十年

李时珍 65 岁。南京书坊无人愿意刻印《本草纲目》。李时珍约于此年前后失望而归。从此晚年居家，继续以医术为人民造福，间与师友往来，饮酒赋诗自娱。

六月，著名政治家张居正（1525—）卒。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死后谥文忠公。著有《张文忠公全集》。1573 年居首辅（即首相）以来，掌权十年，推行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措施，加强中央集权，限制豪强势力，清丈全国田亩，实行一条鞭法，提倡“厚农以资商”、“厚商以资农”。社会稳定，国势日强。

《西游记》作者吴承恩（1500—）约卒于是年。学者王畿（1498—）卒。王畿字汝中，号龙畿，浙江绍兴人，传王阳明心学，影响很大。著有《困知记》。

公元 1583 年癸未明万历十一年

李时珍 66 岁。居^逝所馆。对《本草纲目》再作个别修改。

张居正死后，忌恨者纷纷攻击之。是年，追夺其官爵。

女真贵族努尔哈赤起兵犯辽东。以后统一建州诸部，成为威胁明朝的强

大势力。公元 1584 年甲申明万历十二年

李时珍 67 岁。居^逝所馆。世态炎凉，刻书渺茫，心情沉重。

封建顽固势力对改革家张居正实行残酷报复，抄没张居正家产；封锁门户，眷属饿死十余人；长子张敬修被拷打、自杀死。潘季驯等竭力疏救，始准酌留田宅养其老母。凡与居正亲近的大臣，多受攻击。榜示居正“罪行”于天下。

神宗提倡儒学，以王守仁从祀孔庙。

是年，利玛窦在端州绘《坤輿万国全图》、《山海輿地图》成，是新型世界地图首次传入中国。

公元 1585 年乙酉明万历十三年

李时珍 68 岁。长子建中升任云南永昌府通判（正六品官），不肯就。乞归家省亲，未果。

起用海瑞为南京右佥都御使。后改南京吏部侍郎。

神宗下诏毁天下私立书院。

农田水利专家徐贞明受命督治京东水田。贞明著有《潞水客谈》，主张大兴西北水利，以增产粮食，改变依靠东南漕粮状况。

地理学家徐霞客（卒于 1640）生于江苏江阴。后周游岭南各地，考察江山形势，写成《徐霞客游记》，颇有文学、地理学价值。

公元 1586 年丙戌明万历十四年

李时珍 69 岁。居^逝所馆。晚年多玩诗词自娱，写有《^逝所馆诗话》，已佚。

是年，李时珍的家乡爆发农民起义。首领梅堂被官兵所俘，刘汝国继续领导斗争。徐贞明督治水田，不及一年，已垦田 39000 余亩，还准备疏浚河道，以利灌溉。受到勋戚、宦官反对，京畿水田作罢。

公元 1587 年丁亥明万历十五年

李时珍 70 岁。为纪念 70 寿辰，自纪《^逝所馆诗集》（失传）。长子建中从四川蓬溪回家，全家团聚。建中无子，后来收其弟建木之子树初为嗣子。树初年方 2 岁。后万历四十六年乡试中举人，明年成进士，授户部主事，升山西按察副使。黄河决口于开封。江南大水。江北大旱，民食草木。抗倭名将、民族英雄戚继光（1528—）卒。著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海瑞（1514—）卒。南京罢市为之送葬。瑞号刚峰，有《海刚峰集》。

利玛窦到南京，改穿中国儒服，以接近士大夫，不反对中国的祖先崇拜。

《天工开物》作者宋应星生于江西奉新。

公元 1588 年戊子明万历十六年

李时珍 71 岁。居^逝所馆。

农民领袖刘汝国称顺天安民王，领导数万农民军，转战于黄州、宿松、太湖等地。

起用潘季驯第四次总督河道工程。神宗下诏修江南水利。

学者罗汝芳（1515—）卒。汝芳字帷德，号近溪，江西南城人，文学家汤显祖之师。著《近溪子文集》。

女真族首领努尔哈赤（清太祖）兼并建州女真族五部，形成统一的强大势力，为明末主要威胁。

公元 1589 年己丑明万历十七年

李时珍 72 岁。可能再次去南京联系刻印《本草纲目》事，同时再次会晤王世贞，将已写好的《进〈本草纲目〉表》给他看。王世贞在给《本草纲目》写序时，引用了其中不少词句。

农民领袖刘汝国兵败被俘，死于安庆。

云南永昌卫兵变。

湖广、江西、浙江大旱。潞王侵夺湖广民田 4 万余顷。

耶苏会传教士利玛窦到北京。公元 1590 年庚寅明万历十八年

李时珍 73 岁。完稿 12 年的《本草纲目》，终于在金陵藏书家胡应龙支持下开始刻版。是年春上元日，王世贞为《本草纲目》写序，称赞《本草纲目》：“博而不繁，详而有要。”“实性理之精微，格物之通典，帝王之秘篆，臣民之重宝。”李时珍多年来的抑郁心情为之一扫。后来，此书传于欧洲，陆续译成多种外国文字，著名科学家达尔文称赞它是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

思想家李贽的重要著作《焚书》刻印于湖北麻城。

文坛领袖王世贞（1526—）卒。世贞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江苏太仓人。嘉靖进士。官至刑部尚书。诗文均有名。著有《彝州山人四部稿》、《画苑》等。

公元 1591 年辛卯明万历十九年

李时珍 74 岁。

日本“白关”（丞相）丰臣秀吉，起水陆兵 15 万准备入侵朝鲜和中国，致书朝鲜王李晫说：“吾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入于明。”

长江中下游大水，房屋田地多受害。

汤显祖指斥奸臣误国，被谪广东徐闻。

公元 1592 年壬辰明万历二十年

李时珍 75 岁。病卧^逝所馆。

日本人将军丰臣秀吉领军 13 万入侵朝鲜，陷王京。“旦暮且渡鸭绿江。”朝鲜求援。明朝命海防御倭总兵官李如松等领大兵援朝抗倭。

全国手工业、商业发达地区，声势浩大，长达 40 年的市民暴动，从此开始，突出地反映了新的生产关系同封建制度的矛盾。

公元 1593 年癸巳明万历二十一年

李时珍 76 岁。一代科学巨人病卒于家。临终前未见到刻印的《本草纲目》。嘱次子建元来年将《本草纲目》进奉于朝。他去世后三年，1596 年（万历二十四年）十一月，建元将书进献给神宗。在《进〈本草纲目〉疏》中写道：“臣故父李时珍，原任楚府奉祠，奉敕进封文林郎、四川蓬溪知县。生平笃学，刻意纂修。曾著本草一部，甫及刻成，忽值数尽。撰有《遗表》，令臣代献。”《疏》中全文引入李时珍《遗表》。疏上，神宗批道：“书留览。礼部知道。”科学巨人李时珍同妻吴氏合墓葬于蕲州东门外雨湖南岸土耳其地。

李时珍临终有四子：建中、建元、建方（太医院医士）、建木（过继与李果珍为嗣子，乐善好施，有美誉），有五孙：树宗、树声、树勋、树木、树初（本建木之子，过继与建中为嗣子）。后人将李时珍、建中、建木、树初祀于乡贤祠，建有“四贤坊”。

文学家、书画家徐渭（1521—）卒。渭字文长，号天池山人，浙江绍兴人。词曲、书画、诗文均有名，著有《徐文长集》、《南词叙录》等。